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王紹光 著

王紅續 主譯

中文大學出版社

中国文革研究网 wengewang.org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此書原由英文寫成，名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由Oxford University Press於1995年出版。

《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王紹光 著
王紅續 主譯

© **香港中文大學** 200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346-0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in Chinese)
By Wang Shaoguang
Translated by Wang Hongxu et al.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346-0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獻給我的父親和母親

目 錄

自 序 vii
英文原著序言 xv
翻譯説明 x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分歧的根源，1949–1966年 23
第三章　舊遊戲與新犧牲者，1966年6–7月 53
第四章　新遊戲與新玩家，1966年8–12月 67
第五章　派性剖析 91
第六章　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衝突，1967年1–4月 107
第七章　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衝突，1967年5–7月 125
第八章　造反派之間的衝突，1967年8–12月 151
第九章　造反派之間的衝突，1968年 169
第十章　1969–1973年間的派別鬥爭 191
第十一章　1974–1976年間的派別鬥爭 207
第十二章　超凡領袖的挫敗 241

附錄：受訪者情況 257
注 釋 263
參考書目 301

自序

西方有個說法：「歷史是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然而這本書記錄的歷史並不全然是這麼回事。

算起來，這本書的寫作可以追溯到42年前，即1966年。那一年，文革爆發，我12歲。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時，我還在武漢市三元里小學五年級畢業班(這是一所十年一貫制學校)。當紅衛兵運動興起時，我已進入武漢市實驗學校讀初一。這使我有機會親身投入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在這種豪氣沖天的口號激勵下，我打起背包，與幾個小夥伴到首都北京串聯。在北京期間，我們沒去頤和圓等名勝景點遊玩，而是認認真真地花了不少時間在街頭抄大字報，「取」革命之「經」。

從北京返回武漢已是秋天，學校裏成立很多組織。我申請參加「紅衛兵」，但也許是因為成份不夠過硬，沒被批准。正好「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總站」招兵買馬，我就入了他們的夥。同時，還跑到武漢二中參加了一個名為「國際紅衛兵」的組織。但那時畢竟只是個初一的小男生，沒人把我當回事。為了過「革命」的癮，我和幾個小夥伴回到三元里小學，弄到油印機、鋼板、蠟紙和紙張；然後又到已被「砸爛」的市委大樓佔了一間辦公室。於是我們自己的「武漢市毛澤東思想小八路」誕生了，隔幾天我們就刻印一批傳單。最讓我們興奮的是在鬧市區向人群撒出傳單那種感覺。看到人們紛紛搶那從天而落、五顏六色的傳單時，我著實過了把電影中那種革命工作者的癮。不過好景不長，家長們很快發現了我們早出晚歸的秘密，加上他們此時自身難保，於是我們被趕回了家。

此後兩年中，武漢文革高潮迭起，「二八聲明」、百萬雄師、1967

年6、7月的大規模武鬥、「七二零事件」、大聯合、三結合、鋼新之爭、成立各級革委會、1968年夏天的搶槍和武鬥……。這一切令我這個十三、四歲的少年眼花繚亂。我既是這些事件的觀察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參與者。説是觀察者，是因為哪裏熱鬧我就往那兒跑，哪怕是槍林彈雨也滿不在乎。即使人到不了現場，也會想方設法找各方的傳單和小報來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看完這些印刷品後，也沒有隨手丢掉，總感覺某一天可能有用。沒想到幾十年後，當我著手研究文革時，它們果然派上了大用場。説是參與者，是因為這期間我又加入了幾個紅衛兵組織。至今我還保留著武漢「中學紅聯」的兵證、以及實驗學校「東方紅紅衛兵」和「紅旗兵團」的袖章。「紅旗兵團」以學校新教學樓為據點，把各樓層用鐵柵欄分隔，並用課桌椅疊起工事。「革命」之餘，高中生時常聚一起打撲克，輸者罰背唐詩、宋詞、元曲一首，讓我甚是佩服。現在四十多年已經過去了，想起發生在1967–1968年的往事，仍然歷歷在目。

1973–1976年，武漢文革派系鬥爭的戰火重燃。那時，我已成年，在近郊堤角中學任教。每天下班之後，我都會騎著自行車趕赴大字報集中的水塔、民生路、武勝路、航空路等地，打聽最新進展。這幾年留下的日記和與友人的通信日後也成為我研究文革的素材。

1977年8月，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正式宣布文革結束；同月，鄧小平決定恢復高考。這樣，我幸運地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成為「七七級」的一員。北大畢業後，教育部公派我到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

1985年，我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下一步就是寫博士論文了。寫什麼呢？出國前的打算是以研究西方政治為主攻方向，但在美國待了幾年後，卻覺得用學到的新方法研究中國政治更有意思。於是，我馬上想到了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

一旦定下來寫文革，首先要瞭解的是兩方面的情況。一是西方對文革的研究已有什麼樣的成果。「吃人家嚼過的饃」就沒有意思了。二是在美國能找到多少有關文革的原始資料。泡了幾個月圖書館後，大致摸清了兩方面的情況。雖然西方有關文革的書籍和文章可以稱得上是汗牛充棟，但基本上是「以毛澤東為中心」的研究，其重點是分析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和圍繞毛澤東召開的權力鬥爭。直到七十年代後

期，才出現了一些有關文革學生運動的研究，但集中在廣東和北京兩個地區。以毛澤東為中心研究文革，是史學中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偉人史觀」的表現。誰也不能否認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關鍵作用，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沒有億萬人民的參加，文革就不成其文革了。我決定將分析重點放在群眾身上。老百姓為什麼會投身文革？群眾為什麼會分化成水火不容的派系？大眾參與的行為模式有什麼特點？這些便是我所關注的問題。

但如何研究群眾行為呢？是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宏觀研究，還是解剖麻雀，對一個單位進行微觀研究？前者似乎超出了我的能力，後者的普遍意義則可能遭到懷疑。權衡之下，我決定取中觀路線，即以一個城市作為分析單位。這個城市當然就是我所熟悉的武漢。那麼在西方能找到有關武漢文革的資料嗎？答案是否定的。我仔細查閱過美國各主要圖書館收藏的文革出版物，雖然中國各地的文革出版物都有，但絕大多數來自兩個地方：廣東與北京。這也不奇怪，文革時，中國對外不開放，國外收集文革資料只能通過北京的外交官和港澳的旅客。來自武漢的小報當然也有一些，但我知道那只是滄海一粟而已，寫博士論文靠這點資料是絕對不夠的。

為了收集論文資料，我於1986年返回武漢。在武漢市圖書館和湖北省圖書館我足足蹲了三個月，每天早出晚歸。中午圖書館休息，我就在附近轉轉，思考問題。圖書館沒有文革小報目錄，館員們每天上午捧出一大摞小報，他們拿出什麼，我就看什麼。館裏規定不許複印，找到有用的資料，只能一個字一個字抄在筆記本上。三個月後，無論圖書館員新拿出什麼材料，我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時我相信文字資料已看得差不多了。此後，我將重點放到了人物專訪上。幾個月裏，共採訪80多人，包括武漢文革時期各大派的核心人物2–30人，包括聶年生、吳炎金、馮天艾、孫德州等。讓我吃驚的是，文革雖然已結束了十年，幾大派的地下網絡依然存在。他們不僅在經濟上互相接濟，而且在分頭準備各自的武漢地區文革史。人物專訪讓我瞭解到不少任何文字資料也無法提供的內情。

1987年初，返回康奈爾大學後，我先花了幾個月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寫出論文大綱。不幸的是，1987年夏，我遭遇了一次嚴重車

禍，險些丟了性命。此後有近半年時間躺在病床上，無法工作。身體康復後才開始論文的寫作。我寫東西很慢，一天最多能寫三四頁。就這樣日復一日趴在桌前，吭哧吭哧地寫了一年多，終於在1989年春完成一個近1200頁的初稿。之後，數易其稿，將篇幅壓縮到九百多頁，算是完成了博士論文，標題是"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據説，這是康大歷史上較長的論文之一。論文之所以長，是因為我當時想同時達到兩個目的。一是系統地論證我對文革的解釋；二是替武漢寫一部地方文革史。如果僅僅是為第一個目的而寫，很多章節是不必要的。

我對文革的解釋很簡單：在瘋狂的表象下，文革參與者實際上是理性的。這個解釋基於文革期間自己的觀察：一個人參加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幾乎是可以預測的。記得有一次在華盛頓遇到一位國內來的著名學者，她對我的文革解釋嗤之以鼻，認為我要麼是讀洋書讀昏了頭，要麼是太年輕沒親身經歷過文革。她認為人們在文革中受了毛澤東的蠱惑，完全喪失了理智。我反問她，「在你所在的單位，文革中是否分了派？」她不以為然地答道，「當然分了派。」我再問她，「各類人在這些派別裏是隨機分布呢，還是其分布有什麼規律可循？」她想了想，回答説，「似乎有點規律。」我告訴她，如果人們沒有理智，他們參加哪一派應該完全是隨機的。如果人們加入哪一派不是隨機的，則説明他們進行過選擇。這種選擇應是理性的選擇。那位學者仍不願接受我的解釋，但也不知道如何反駁我了，兩人不歡而散。

我當然並不否認文革中人們的行為有瘋狂的成分。這種瘋狂與他們對毛澤東的崇拜分不開。用韋伯(Max Weber)的説法，毛澤東屬於那種有超凡魅力的領袖(charismatic leader)。事實上，在文革期間，國外很多研究者正是用這個詞來描述毛澤東的。韋伯認為，這類領袖的追隨者往往對其偶像戰戰兢兢，誠惶誠恐，惟命是從，不免會作出些旁人看來奇奇怪怪的事來。問題在於，韋伯也好，其他學者也好，當談到超凡領袖現象時，他們似乎都認為這類領袖的追隨者必然會喪失理性分析能力。但文革參與者並不是這樣。如果他們真是完全喪失了自我，只會盲目地按「最高指示」行事，文革進程決不會亂到連「偉大領袖」也難以駕馭的地步。我自己的觀察以及對幾十人的訪談都證明，文革參與者在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問題上表現得非常理性。文革這個個案説明，超凡魅力型領袖的追隨者可以同時既是瘋狂的也是理性的。這就需要對韋伯有關超凡魅力領袖的理論稍加修正。我認為個人崇拜有兩個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對偶像充滿了信賴、敬畏，甚至有願意為之獻身的情感；另一方面，他們又把偶像作為認知的對象，試圖理解偶像發出的種種信息。處於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對同一信息的解讀有可能截然相反，解讀過程便是理性發揮作用的過程。文革中各派大打「毛主席語錄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情感向度可以解釋為什麼毛澤東的崇拜者會有瘋狂的行為，而認知向度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他們能在個人崇拜的大環境下進行理性選擇。

1993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我博士論文的中譯本。由於原論文篇幅龐大，處理的任務又不單一，乃至成書時無論如何取捨，都難面面俱到，只能擇其一端而不計其餘。該版本保留的主要是武漢地方文革史的部分，定名為《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而對其他篇什，則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刪減。一是砍掉了分析文革前社會結構和潛在衝突的所有章節；二是砍去了餘下各章中涉及外地文革的內容(很多章節從幾十頁壓縮為幾頁)；三是刪掉了不少分析性的討論(如對1973–1976年武漢派系鬥爭特點的分析)；四是刪掉了所有注釋。這些刪剪無疑削弱了原著的學術性。

1995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又為我出版了英文版*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在準備英文書時，我對論文進行了大幅度刪改，篇幅從900多頁壓縮到300多頁，但刪剪與改寫的原則與《理性與瘋狂》不同，目的是突出我對文革的理論解釋。此時，為武漢留下一部文革史至多只是個陪襯性的目的。

英文書除了論證文革參與者是理性的以外，還試圖解開一個理論上的疑團。熟悉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的朋友們都知道，理性的人並不一定會因為具有共同利益而參加集體行動，他們更可能採取「搭便車」(free-riding)策略。這樣一來，如果我們説文革參與者真是理性的話，就必須解釋文革中的種種集體行動為什麼會發生。通過對比各種「理性選擇」理論和深入分析文革這個實例，我發現狹義的理性選擇理論難以解釋文革中的群眾行為，只有將

理性的假設條件有限度地放寬，才能比較好地解釋群眾為什麼參加文革、在多大程度上捲入派性鬥爭、在什麼條件下訴諸武力、何時退出運動。這本英文書出版後第二年，被美國學術書籍評論雜誌*Choice*授予「1996年最佳學術書籍獎」(Choice Award for an Outstanding Academic Book of 1996)。

英文本好固然好，但它最大的問題是價格太貴，標價75–100美元。這麼高的價錢不要說別人，我自己都不會花錢買，只能供歐美國家的圖書館收藏。偌大一個中國，沒有幾家圖書館願意買這本書。為了讓更多的讀者看到這本書，我最近從牛津大學出版社贖回了版權，於是才有了這個英文書的中文版，由中共中央黨校的王紅續先生與徐海娜女士譯出，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如此說來，文革的故事，我已講了四遍，一次是博士論文，一次是博士論文的中文縮譯本，一次是英文書，一次是英文書的中譯本。

由像我一樣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來寫文革史既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勢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親身經歷不僅有助於我們解讀文革時期留下來的史料，更能用記憶來填補史料不可避免存在的巨大空隙。任何史料都不是完全可靠的。很多文革研究者千方百計搜羅文革小報，但後來人恐怕不知道，文革小報有個特點：造反派出得多，保守派出得少。原因很簡單，造反派中聚集了當時的知識精英，舞文弄墨本是他們的拿手好戲；而保守派多為大老粗，不善言辭。Henry L. Stimson說「歷史往往不是真實發生的事，而是被記錄下來的事」，可謂一針見血。難怪James Monaco呼應說，「歷史只存在於媒介中；媒介製造者就是歷史的製造者」。如此說來，保守派當年的失聲可能使他們在文革史中永遠居於下風。作為文革的親歷者，我必須提醒未來的研究者注意這一點。

親歷者的劣勢是不易察覺的，因為作為親歷者，他們難以避免的偏向會不知不覺地影響文革故事的講法；而文革故事由誰來講、講什麼、如何講，又可能造成後世對文革理解上的偏差。「誰來講」尤為重要。有位美國作家說得很直白：「歷史就像故事，關鍵是看誰來講。」市面上，親歷者有關文革的中文和外文書已不下上百種，文章更是數以千計。除了少數例外，其作者不外乎兩類人，即「舊精英」(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知識分子) 及其子女，以及「新精英」(軍隊與地方幹部) 及其子女。這兩類人加在一起，在中國也只是鳳毛麟角，但他們幾乎壟斷了講文革「故事」的權利；絕大多數普通中國人的文革「故事」沒有人講，他們自己也沒有能力或沒有興趣講。西方人對文革的印象就是從這些新舊精英的「故事」中得來的。再過幾十年，中國人自己關於文革的印象恐怕也只是來自這一小批人的「故事」。在一定意義上說，誰壟斷了講「故事」的權利，誰就壟斷了歷史。

這倒不是說新舊精英及其子女蓄意歪曲歷史，正如Joseph Freeman所說，「每個人都會歪曲歷史，哪怕是他的個人經歷。有時，歪曲是有意的；有時，歪曲是無意識的。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過往總是被改造用以服務當今。」新舊精英及其子女講文革「故事」時往往不吝筆墨大談自己的傷心往事。舊精英及其子女喋喋不休的是兩個階段裏遭遇的不幸：一是文革的頭3–4個月，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舊」時期；另一個是1968年下半年以後的「清理階級隊伍」時期。新精英及其子女則集中控訴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直到「清理階級隊伍」以前那段時間裏自己如何被迫害。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各個時期攻擊的對象很不一樣；在一個時期遭受迫害的人往往會在另一個時期以十倍的瘋狂報復他人。更重要的是，億萬普通人在文革中既沒有遭到迫害，也沒有迫害他人，他們的「故事」幾乎完全被忽略了。他們的「故事」本應是文革歷史中重要的篇章。

作為文革的親歷者，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優勢與劣勢，並試圖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儘量爭取發揮優勢、克服劣勢。但是，我必須提醒讀者，任何親歷者都難以做到不偏不倚，包括我自己。他們應該抱著「懷疑一切」的態度來對待親歷者講述的「故事」和進行的「研究」；他們應該記住喬治．桑塔亞納 (George Santayana) 的忠告：「歷史總是被人寫錯，因此總是需要重寫。」

不過，對桑塔亞納的另一句名言，讀者大可不必當真。他說，「那些忘記歷史的人注定會重複歷史」。老黑格爾的觀察似乎更加深邃：「我們從歷史中學到的是，我們從未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

2008年10月22日

香港吐露灣

英文原著序言

我寫作此書耗時數載。在此期間，我得到了許多個人和機構的慷慨幫助。沒有他們的幫助，這部書是無法完成的。

我感謝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的老師們。對於我的博士論文委員會主席許慧文 (Vivienne Shue)，我感謝她對這項研究的鼓勵，也感謝她在我寫作書稿期間不斷對我的精心指導。我也感謝委員會另外兩位成員對我的鼓勵和建議，他們是馬丁．伯納爾 (Martin Bernal) 和本杰明．金斯伯格 (Benjamin Ginsberg)。我在康奈爾學習的幾年裏，其它很多學者和朋友也給予了幫助。我要特別感謝舍曼．科克倫 (Sherman Cochran)、邁克爾．戈德菲爾德 (Michael Goldfield)、西奧多斯．羅伊 (Theodors Lowi) 和維克多．倪 (Victor Nee)，他們給予我無窮的支持和寶貴的評論和批評。

我也感謝耶魯大學的同事為我提供極其熱情友好的環境。我在這種友好的環境中寫完了這本書。我要特別感謝戴維．阿普特 (David Apter)、伊扎克．布魯尼 (Yitzak Brudny)、黛布拉．戴維斯 (Deborah Davis)、威廉．福爾茨 (William Foltz)、戴維．梅休 (David Mayhew)、布魯斯．拉西特 (Bruce Russet)、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伊恩．夏皮羅 (Ian Shapiro) 和蕭鳳霞 (Helen Siu)。

我非常感謝85位受訪者，他們慷慨地花時間回答我的問題，還很信任地向我提供私人信息。沒有他們的合作，這項研究是絕不可能完成的。由於答應不公開所有受訪者姓名的緣故，我就無法逐一向他們表示感謝了。

在武漢作實地調查工作時，我在武漢市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和武漢市檔案館待了很長時間。這三個機構的工作人員為我的研究提供了許多便利。我感謝他們對我近乎無窮要求的耐心和遷就。

這項耗時數載的研究得到了來自多個機構的資助。康奈爾大學的劉氏紀念獎學金 (Liu Memorial Award)，使我能夠到武漢為此項研究收集資料。梅隆博士論文獎學金 (Mellon Dissertation Fellowship) 和麥克阿瑟國際和平與安全基金會學術獎 (MacArthur Foundation Fellowship 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提供了我在1987–1988年和1989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在同一時期，康奈爾大學研究生院為我提供了暑期研究獎學金。耶魯大學A · 惠特尼 · 格里斯沃爾德教師獎 (A. Whitney Griswold Faculty Award)，為我提供了後期寫作和修改的資助。

斯坦利 · 羅森 (Stanley Rosen) 閱讀了全部書稿，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批評，我對他表示感謝。

我非常感激牛津大學出版社及其編輯們對這項研究的大力支持。

最後，我要把感激、欽佩和愛獻給內子趙利群和女兒王曉曦。內子不僅承擔了繁重的書稿打字任務，而且同我一起分享了寫作過程中的快樂與艱辛；而從女兒八個月大時，我便負笈留學美國，直到她八歲才得以父女團聚。

王紹光
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

翻譯説明

本書的「主譯者」是我，「次譯者」是中央黨校的博士生徐海娜。

我作為「主譯」做的工作是：第一，翻譯了除了第10、11、12三章以外的所有正文和附屬內容。第二，對自己和「次譯者」所翻譯的內容進行了審校。

徐海娜作為「次譯」做的工作，就是翻譯了本書正文最後三章：第10、11、12章。

王紅續

第一章

緒 論

在1966至1976的十年間，中國人不斷地被告知：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然而，本書通過對武漢這個中國城市裏發生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卻展示了一幅與之迥然相異的畫面。回顧起來，這場運動似乎是在一個接一個的危機中蹣跚而行。從本書描述的頭兩三年（1966–1968）發生的事件來看，中國當時正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中。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他無法駕馭這場運動。甚至在這段動蕩時期過後，毛澤東領導的這個政治運動仍不斷偏離他所指引的路線。最後，1976年毛澤東屍骨未寒，處於文化大革命核心的激進領導人就被一舉抓捕入獄。文化大革命結束沒幾年，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就被徹底拋棄。看來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極大的失敗。

有關文化大革命的當代研究集中於精英政治，所論述的問題包括政治陰謀、權力鬥爭、政策衝突以及某些關鍵人物的浮沈等。而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動機，成為人們最為關注的問題。[1] 人們或明或暗地把毛描繪為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中國人民則被看作他的盲目追隨者，或者如同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所說的「真正的信仰者」。[2] 毫無疑問，毛澤東的確非常像這種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但是，對毛澤東特徵的這種表述卻會引起一種疑惑：按照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理論，如果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話，那麼這位領袖就可以在其追隨者中產生諸如獻身、敬畏、崇敬等情緒，尤其是產生盲目信仰的情緒。換句話說，在超凡魅力領袖的真正信仰者的眼中，這

位領袖說某件事是對的，那麼它就是對的。這種領袖確定目標，選擇實現目標的手段。他可以隨意改變目標和手段，甚至提出相反的目標和手段，卻不會失去人們的支持。[3] 然而，這就產生了一個疑問：舉世公認毛澤東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但為什麼他指導的政治過程卻總是與他所設想的方向背道而馳，產生了出乎意料的危機、停滯、挫折和社會變化呢？[4]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角度發生了變化，出版了一些「自下」研究這場史無前例運動的著作。[5] 這些研究作品努力透過政治事件的表象，從下層尋求可以解釋政治事件的社會因素。其立論基於對從內地到香港的難民的精心採訪材料，而受訪者多數是來自廣州市的極可能具有「中等」或「很差」階級成分的中學生。這些研究著作的結論都是一致的，都認為遠非許多早期作品所假設的那樣，參加文革政治事件的人們都是鐵板一塊；相反，文化大革命的參與者實際上由於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社會意識，而被分化成眾多完全不同的集團，具有各自不同的目標。這些研究包含了對上面所提問題的回答：文化大革命的參與者都是理性的行為者，因為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及獨立的行動議程，妨礙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

上述研究豐富了我們對於導致1966–1976年期間混亂和波動的社會力量的理解。但是，這些研究卻通常具有四個缺點：首先，多數研究以鄰近香港的廣州市為中心，而廣州也許只是一個特例，並不反映普遍規律。其次，多數研究建基於中學生的經歷，而中學生至多是政治活動中的邊緣角色。第三，多數研究僅僅集中考察1966–1968這三年，而實際上沒有考察1969–1976年間的歷史。在地域、部門及時間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對這些研究就這一時期政治運動所作的抽象和提煉形成了制約。[6]

如果說前三個缺點源於信息的局限性的話，那麼第四個缺點則源於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時，不能理解集體行動模式的意義。他們都同意關於文革參與者是「理性的」觀點，卻不努力探索這種理性的含義。一方面，他們聲稱這些參與者是理性的行為者，但並不能調和這一看法與以下事實之間的矛盾：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是真正意義上的真實信仰者，因為他們絕對地、心甘情願地服從毛澤東。超凡魅力領

袖的真實信仰者怎麼可能是理性的呢？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學者應當面對而不是迴避這個問題。另一方面，他們沒有令人信服地回答曼庫爾．奧爾森 (Mancur Olson) 提出的尖銳問題。奧爾森認為，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群體的個體成員可能沒興趣對共同事業作出貢獻。[7] 然而這些研究通常始於確認「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背景，接著就跳到有關這兩派集體行為的結論上去：似乎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便會從事集體行動，以促進共同利益為天經地義的事。拉薩爾．哈丁 (Russell Hardin) 把這種表述含糊的推斷稱之為「組合謬誤」(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8] 我並不認為，理性的人決不會為推進其共同利益而進行集體行動或一起獻身。他們也許會這樣做；並且在許多情況下，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的確這樣做了。但是，這種現象必須得到解釋，而不能只是作出假設。[9]

本書的研究也運用「自下」的方法進行探討，但試圖對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的行為提出一種新的解釋——毛澤東失敗的終極原因。我打算通過拓寬調查範圍、優化分析工具來克服上述四項缺點。本書從三個方面來擴展調查範圍：第一，它選取武漢這個位於華中的大城市，作為本書研究的中心。從來沒有人系統地考察過這個城市的革命運動。[10] 第二，它所關注的不只是中學及大學、工廠、醫院、政府機關、文化和科研機構等單位發生的微觀政治，還關注城市整體的宏觀政治以及微觀政治與宏觀政治之間的關係。第三，本書討論的不僅是1966–1968年間的派性問題，而且討論從1969至1976年間的派性，而後者在現有文獻中並未得到探討。[11] 比起此前有關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城市政治運動的研究，我這項範圍擴展的研究是否更具有代表性，有待大家的評判。

更加重要的是探索關於參與者理性假設的意義。本書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克服「組合謬誤」。顯然，如果我們不能對集體行動的興衰作出理性的闡述，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對參與者理性地行動的假設提出質疑了。為此，我將用這個緒論及後面十章的篇幅，來闡釋億萬中國人參與文革十年集體運動的原因。這場運動的參與者儘管具有明顯的非理性特徵，但的確是理性的行為者，他們參與集體行動是由理性的算計所指導的。只要我們能證實這一點，那就容易破解毛澤東超凡魅力失

敗之謎了。至於真正的信仰者怎麼會理性地行動的問題，本書最後一章將試圖給予一個理論性的解釋。

分析框架

即使在今天，也有研究者認為，參與文化大革命的群眾是沒有理性的。在他們看來，這個社會一度發生畸變，每個人都瘋狂起來。一位作者說：

> (在這個運動過程中，）中國人民崇敬自己的領袖，不僅把他視為皇帝，更當成上帝。在毛澤東面前，他們必恭必敬，盲目服從，無比信任。他們向毛澤東表示願意甚至急於犧牲自己的自由和獨立判斷……他們無比熱愛毛澤東，無比熱愛黨，無比敬畏權威。當他們自己的個人認識同黨和毛澤東所說的發生衝突時，多數人不是懷疑黨或毛澤東，而是懷疑他們自身。在這種情況下，人類所具有的獨立判斷能力可笑地、可憐地、悲劇式地受到極大的摧殘。[12]

多數參與這場運動的人至今還堅持認為，他們被毛澤東愚弄了、欺騙了，或者說利用了。

不可否認，毛澤東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中國人民接受了他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這並不能進一步斷言，群眾沒有自己值得追求的願望。如果我們像馬克斯・韋伯那樣認為，毛澤東的追隨者沒有自我利益，只是盲目服從他，[13] 那麼，我們將在下面各章中所討論的許多現象就會顯得難以解釋了。如果人們是非理性的，他們的行為一定是隨機的，沒有任何規律可循。然而，正如我們在本書中將要表明的那樣，文革參與者的行為絕不是隨意的、沒有規律可循的。恰恰相反，他們的行動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要改善他們的生活境遇。因此，假設這些參與者是理性的，要比假設他們是非理性的要更現實些。

一旦我們以理性來作假設，我們就得直面奧爾森的挑戰。在那個時期，千百萬中國人熱情地參與各種事件，這種現象不應看作一個不

可避免的過程，而且要當作一個需要加以分析的複雜對象。我們必須探討這十年裏單個中國人的行為特點與集團政治特點之間的關係，或者用托馬斯．謝林 (Thomas Schelling) 的術語來説，探討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之間的關係。[14] 具體地講，需要探討四個關鍵問題：在什麼意義上，參與者是理性的？在什麼情況下，理性的個人會參與集體行動？在什麼情況下，理性的參與者會撤出集體行動？我們怎樣來解釋集體非理性？

在什麼意義上，參與者是理性的？

一般來説，理性地行動是指作出更好的選擇，而非作出更差的選擇。這個簡單的定義包括四個因素：(1) 有一批追求某些目標的行為者 (既包含個人行為者，也包含機構行為者)；(2) 他們面臨一些選擇方案；(3) 他們的偏好是有次序的；(4) 在無法控制的環境裏，他們選擇自己偏好的方案。而環境限制了他們追求自身利益的機會，迫使他們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作出選擇。

首先，我們必須分清兩種關於理性的定義：狹義的理性定義和廣義的理性定義。[15]

狹義的定義基於四個假設：(1) 行為者尋求期望效用的最大化。(2) 他們只有利己主義的偏好。(3) 他們自覺地進行抉擇。(4) 只有客觀的約束才是行動的直接決定因素。狹義理性定義的優點是，如果我們把解釋性變量限制在特定種類的偏好和約束範圍內，那麼這一理論就會有預測力。而這個狹義定義帶來的問題是，它限制得太死，因而無法運用到很多真實的政治問題上，包括文化大革命。[16]

為了獲得可以恰當地解釋現實世界政治現象的理性定義，我們必須考慮來自人們看到的現實中的因素。換句話説，狹義定義所依賴的假設需要作些修改，以使其更具現實性。

(1) 行為者通常會像赫伯特．西蒙 (Herbert Simon) 所稱的那樣，是「容易滿足者」，而非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效用最大化作為一種學術問題更有價值，但它並不能真實地描述人類的決策過程。按照赫伯特．西蒙的理論，人們很少企圖取得一種精心設計的最優結果。相

反，只要他們找到一種能提供可接受結果的方案，他們就常常中止尋求更好的方案。由於探索更好方案的代價是高昂的，所以理性行為者傾向於適可而止，這是不足為怪的。在存在極大不確定性如文化大革命的條件下，行為者或是傾向於使蒙受最大損害的風險最小化 (最小化策略)，或是使他們可能得到的最小回報最大化 (最大化策略)。在這種環境下，因為人們對其決定的後果的瞭解可能是極其有限和片面的，並且會有很多不可預測的事變及影響，所以與其大膽地去從事可能會被證明是莽撞的冒險事業，倒不如更明智地去腳踏兩隻船，或者至少要防止重大挫折。[17]

⑵ 行為者的偏好排序並不是只有一種。這裏需要對狹義定義的假設進行兩方面的擴展：第一，人們並不只是由經濟因素來驅動。[18] 對於很多捲入文化大革命的人們來說，權力、地位、名望、精神收益、自我發展、情感滿足等比金錢收益要重要得多。第二，他們的偏好可能不僅要按照自私原則來安排，而且也要按照利他主義、理想主義或其它方面的原則來安排。[19]

⑶ 行為者並不總是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目標。人們的行動經常受到下意識或潛意識的動機驅使。[20] 事實上，我們多數看似理性的行為並不是有意識的選擇。[21] 因此，我們沒理由期望，所有政治行動和政治決定都出自精心的盤算。換句話說，人們有時可能在自覺的層面上非理性地思考和談話，同時卻在下意識的層面上理性地行動。正如第十二章將要說明的那樣，在參與文化大革命的多數人身上恰恰表現了這一點。

⑷ 各種制約和機會都可能是解釋性變量。外部形勢以及決策者的能力，或許會嚴重地限制一個人的選擇範圍，又或許會極大地擴展一個人的選擇餘地。譬如，信息不靈也許會嚴重妨礙行為者進行戰略謀劃能力的發揮。「不僅會出現信息匱乏的問題，政治行為者可能也會受到其它問題的制約，如資源有限、通訊不暢、知識不足、缺乏認清客觀條件並作出周密謀劃的能力，以及一系列其它現實生活中的限制性因素。」[22] 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可能會約束或促進個人的選擇。[23] 如今受到廣泛重視的新制度主義認為，制度有助於解釋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同樣一組偏好怎樣產生不同的結果。

被普遍接受的社會行為規範也可能深刻影響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規範可能具有的最大影響，就是其本身要求的行為方式，或者對追求某些目標或尋求達到這些目標手段的選擇權加以限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密切關注規範性的限制(例如，「克己奉公」)。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希望避免負面的外部制裁，而且是因為他們自己接受了這些規範。由於存在這些約束因素，遠距離觀察家所認定的客觀上的最佳行動方案，行為者卻極少選擇。因此，「選擇」也就僅僅是「盡力做好你所能做的事」。

(5) 人類並不總是像冷靜的算計者那樣行事。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曼庫爾·奧爾森、戈登·特勞克(Gordon Tullock)要求人們盡量使用狹義的理性定義。但這些學者也承認一些政治行為是無理性或非理性的。[24] 例如，不加批判地接受規範就是無理性的，因為對規範的排斥或修改會使人擴展其選擇範圍。[25] 無理性也可以通過衝動的行為表現出來。例如，除了實用收益(instrumental benefit)以外，人們有時還尋求表現收益(expressive benefit)。[26] 有些人也許不把參與政治運動看作是付出「代價」；相反，參與可能會為他們帶來蒂博爾·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所稱為的「愉悅」，[27] 特別是當只要求「一起行動」而不要求「一起貢獻」時更是如此。[28] 青年人特別是學生比成年人擁有更多可支配的時間，同時他們又相對地缺乏政治經驗，這就使他們最有可能受到表現收益的驅動，而成為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29]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學生之所以毫不猶豫地投身運動之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在人們相當理性的行為中存在的無理性和非理性因素，並沒有使他們成為非理性的人，正如在某些背景下，他們的理性也不能防止他們作出無理性和非理性的舉動。明白了這一點，當我們觀察到毛澤東的狂熱追隨者在其單位和地區的派性鬥爭中也進行理性算計時，並且看到這些理性行為者還作出了很多也許被旁觀者當作愚蠢荒唐舉動的事實時，就不會感到吃驚了。

對理性的狹義定義把最大化和理性算計都當作假設，而我的研究所採用的廣義定義則把它們視為變量。換句話說，動機、偏好、思想狀況以及約束(機會)都不是「既定的」，而是取決於特殊的環境。理性的廣義概念，使我們能夠「圍繞環境條件來形成理論觀點和研究方

式」，並決定「在什麼條件下最大化和理性計算會以『純粹』的形式顯示出來，在什麼條件下它們以另外的形式出現，在什麼狀況下它們會失效。」[30]

關於理性的廣義定義使分析的視野更加寬闊，同時，它又保留了關於理性的狹義定義的基本假設，即人類行為一般都是目標導向的，以大體的理性計算為基礎。換言之，借用喬恩．埃爾斯特 (Jon Elster) 的術語來説，政治行為者「在戰略上是理性的」，[31] 即使他們有時也許會作出無理性和非理性的舉動。局部的非理性只有在全局的理性背景下才能被理解。[32]

在什麼情況下，理性的個人會參與集體行動？

理性的個人只有在消除了以下兩個障礙時才會參與社會運動：對參與運動所涉及的風險和對成本的算計。「風險」指的是敵對行動的外部代價。這種代價通常是由政府的反應和鎮壓所帶來的。「成本」指的是以團體方式行動產生的代價，比如組織成本和聯絡成本等。對風險的擔憂構成了「行動」的障礙，而對成本的顧慮則構成了「集體行動」的障礙。

政治行為者通常必須遵照通行的遊戲規則行事。這些規則限定了遊戲成員、許可的行動和這些行動的順序等。[33] 每位遊戲成員都熟悉的規則是由國家來實施的。通過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措施，國家可以使不順從的行動在與順從行動相比時，很難引起人們的興趣，從而引導人們順從政府。因此，這種遊戲規則實際上使某些理論上可行的行動方案很難付諸於實踐。這種制度上的約束是既定的，是行為者所無法控制的。藐視遊戲規則的行動是要冒很大風險的。當潛在的行動者面臨極可能迅速到來的鎮壓時，他們傾向於繼續等待時機，以避免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但如果風險明顯很小，那麼很多人也許就會行動起來。

換句話説，當人們普遍認為行動是徒勞無益的，或者頂多是沒有效果的象徵性抗議，特別是這種抗議可能招致強硬政府的嚴厲打擊時，那麼政治行為者就沒有集體行動或個人行動的動力。[34] 因此，出

現社會運動的最重要決定因素之一，就是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是否存在這種機會，取決於政府的控制意願和能力。[35] 事實證明，當一國政府的控制能力由於國際衝突或領導人間的不團結而受到削弱，或者當統治者出於某種原因放鬆對政治舞臺的控制，並且容忍甚至鼓勵一些以前遭到禁止的行為時，社會運動就容易積聚動力。[36] 就文化大革命的例子來講，這就是毛澤東打開社會控制防洪閘的結果。如果他沒有這樣做，那麼中國社會存在的潛在矛盾也許會持續幾十年而不至於演變成公開衝突。況且，正如第三至十一章將要展示的那樣，文化大革命包含了許多激進化和去激進化的循環(radicalization-deradicalization cycles)，這種循環的節奏是與毛澤東撤銷或重新恢復社會控制機關的決定相吻合的。

新的機會可以幫助克服「行動問題」，促使潛在的反對現政權的衝動變為政治行動。但是，沒有適宜的環境，任何社會運動都不會自動產生。它首先要求克服「集體行動問題」。

當由理性個人組成的團體在提供公益(public good)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時，就會產生集體行動問題。公益是一種大體來說有利於這個團體所有成員的利益，而不管他們是否對這種提供作出過貢獻。革命和社會運動的目標(例如，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消費者保障或公民權利等)就是公益的實例。公益分析與集體行動問題之間的關係癥結在於，公益事實上對任何人都具有的開放性，使人們可能搭便車。也就是說，分享別人提供的好處，而自己不用操心費力。如果許多人都來搭便車，那麼公益的提供就會產生不足，甚至完全付諸闕如。

由於理性的個人都更喜歡搭便車而不是通過集體行動來獲得公益，因此我們要分析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解釋為什麼集體行動仍然會發生。千百萬中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參與集體行動顯然與人們熟悉的集體行動邏輯相矛盾。怎麼會產生這種情況呢？奧爾森的預測是，人們傾向於逃避供給公益的代價，或者把這種代價推到別人身上。在研究集體行動的著作中，學者們無數次地試圖論證這樣一個觀點，即在某種條件下，理性的個人可能會發現合作(而不是搭便車)更符合自己的利益。比起奧爾森最初推測所提出的範圍來說，集體行動發生的範圍實際上更加寬泛，這是因為奧爾森的預測可以通過以下五個重要

考慮來加以充實：目標的性質、行為者的類型、選擇性激勵、團體的規模和政治企業家。

目標的性質

我們可以從兩個向度來探討集體行動目標的類型：一方面，是爭取公益還是防止公害 (public bad) ？另一方面，是追求二元性目標還是追求持續性目標？[37] 基於三個理由，防止公害 (例如，促使化學工廠遷出小區，抗議歧視某些社會群體的階級成分制度等) 往往比爭取公益 (例如，號召義務廢品回收，或自願維持社會秩序等) 更可能促成集體行動 (如果行動問題已經得到解決的話) ：第一，控制公害與提供公益付出代價的方式有所不同。因為公害已經存在，無論是行動還是不行動都要付出代價。即使你選擇不參與集體行動來削除這種公害，你也要遭受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更可能願意合作。第二，即使量一樣大小，相對於收益來講，損失所帶來的感覺常常來得更加強烈。換言之，人們常常認為，消除一個壞處帶來的收益要比參與所可能付出的代價要大得多，甚至在面臨可能的失敗而使收益大打折扣時也是如此。第三，如果一個團體面對的公害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那麼這個團體的成員就可能產生一種不平等感。對這種不平等感的道義反應，也可能促進集體行動。[38]

同樣，二元性公益或公害 (binary goods or bads，例如好的或壞的政治成分) 更可能促使人們參與集體行動。因為對於這些公益的提供或這些公害的消除來說，個人的貢獻可以起關鍵作用，決定其能否產生。在這個範疇裏的一些公益或公害 (例如，參與政治行動的權利或缺少這種權利) 還具有另一個重要特性，人們認為，它們的提供或消除，對於實現許多、甚至其它所有目標都是極端重要的。因此，連那些謹小慎微、一般不願意承擔任何風險的人也可能願意為集體行動付出代價。

把這兩個觀點統一起來，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當面對二元性公害時，人們就比追求其它類型的目標時更有可能參與集體行動。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初期的造反動力，是對解除壓迫、達到自我解放的欲望——換句話說，是一種消除二元性公害的欲望。

行為者的類型

一些理性學派的理論家假設，團體呈現出對稱性。也就是說，團體的所有成員對提供某種公益的興趣是相同的，對提供既定單位的公益給予同樣的價值，也對既定單位的代價給予同樣的價值。認為行為者類型相同並且可能互相轉換角色的觀點儘管對於解釋問題有所幫助，但卻顯然不太合乎現實情況。事實上，人與人之間是千差萬別的，因此參與集體行動的起點 (thresholds) 也是各不相同的。[39] 由於集體行動具有不確定的前景，所以大多數潛在的積極分子都可能恐懼風險。即使他們在一定條件下願意參與，他們也會採取一種等等看的態度。在決定投身運動之前，他們要觀察集體行動是否有可能成功。但有些人參與集體行動的起點極低，或者根本不需要這種起點。對他們來說，參與集體行動也許是一種得益而不是一種代價。他們參加集體行動也許是為了自我實現、覺悟提升、自尊等等。不管怎麼說，有些人也許「要比別人更加看重公益，能夠從追求公益中得到更多的心理滿足」。[40] 起點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說明政治積極性展現的方式。由於人們具有不同的起點，所以參與集體行動的次序注定是參差不齊的，而不是步調一致的。那些起點最低的人往往會充當開路先鋒的角色。接下來，加入組織或參與事業的人會越來越多。一旦參與者的規模超過一個節點，這時就可能出現趕潮流、隨大流的效應。[41]

此外，與對稱性團體相比，非對稱團體集體行動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在中國，由於學生和落後工人具有相對低的起點，造反派就形成了一個非對稱性的團體。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造反運動的龐大規模是逐步形成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選擇性激勵

有著高起點的個人在參與集體行動時，除了獲取人人都能得到的公益以外，還需要一些選擇性激勵或附加的誘惑。由於這些人反正會享受公益，所以就需要選擇性激勵促使他們共擔代價。在提供公益時，人人都是有份的。而選擇性激勵卻不同，這些激勵要視個人行為而定。選擇性激勵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負面激勵或懲

罰與不合作的行為相聯繫，而正面激勵或獎勵則與合作的選擇相聯繫。選擇性激勵在性質上可以是物質性的，也可以是社會性的。由於物質獎勵最容易被接受，衡量起來也最準確，所以當我們在尋找政治參與背後的動力時，最先找到的通常就是這些東西。從本質上講，社會性激勵產生於希望被稱讚、不喜歡受責難的心理。社會性激勵通過批評、朋友和夥伴的羞辱等機制發生作用。許多研究表明，在動員人們參與集體行動方面，社會性激勵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朋友、同事、工作夥伴或社團成員，對你參與集體行動的要求或無形的壓力，常常促使個人對集體行動做出貢獻或參與其中。你無法對這些人説「不」，否則就會失去認可、尊重或合作。因此，社會性激勵減少了搭便車的誘惑，而增加了在集體行動中合作的吸引力。[42]

正如接下來幾章將要説明的那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選擇性激勵的確對人們的參與產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在成年參與者中起的作用更大。

團體的規模

小團體要比大團體更可能具有克服集體行動問題的能力。在大的團體裏，個人的貢獻是微不足道的，看不出明顯的效果；而小的團體則不然，它們具有五個優點。第一，小團體更可能具有一種特性，即它至少包含這樣一位成員，他從增加了的公益提供中得到了非常多的收益，以至於他願意單方面承擔所有的代價。第二，即使小團體不具有這種特性，其單個成員也可能對公益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第三，當緊迫的、高度本地性問題促使他們動員起來後，這種團體的成員具有一種要爭取迅速而實在收益的強烈動力。第四，由於這種團體的成員已經互相熟悉，就更容易相互監督各自的行為。搭便車的人就容易被識別出來，其它人就會迫使他或她盡自己的職責。最後，小團體的組織成本要比大團體更低。小團體的決策更容易得到協調，更可能具有相互依賴性。團體成員可以更方便地互相傳達信息，更容易達成互利的合作協議，也可以用相對低的代價來實施社會制裁。[43]

如果大的團體具有一種聯盟式結構 (federated structure)，而這種結構能夠通過眾多更小的地方分支來動員支持的話，那麼它就可能成

功地提供公益。[44]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中國所有的群眾組織都具有這樣一種聯盟式結構。

政治企業家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群眾運動來說，僅靠選擇性激勵和聯盟式結構本身並不能解決集體行動問題。要解決問題，就需要有人願意提供和操作這兩種機制。這便是政治企業家扮演的角色。這些政治企業家願意付出對大眾進行動員和協調的代價，以換取個人收益，如權力、聲望或者來自集體行動得益裏應得的一份。[45] 政治企業家的任務就是讓其它人去做他們本來不願意做的事情。這個目標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達到。

運動的發動者可以運用其組織才能來建立組織。例如，通過提供負面或正面的選擇性激勵，他們可以引誘或強迫其它人參與集體行動。他們也可以通過把大的目標分解成許多具有重要起點的步驟，來擴大參加運動的成員的數目。要成功地推進全市規模或全國規模的運動，就要首先解決好地方或更小範圍的集體行動問題，迅速取得看得見的收益。[46]

政治企業家也許還可以不使用威脅或利誘就能夠讓其它人參與行動。他們可以通過邁克爾·泰勒 (Michael Taylor) 所稱的「勸說」來很好地做到這一點。勸說是就以下問題提供信息和見解：方案的性質是什麼、人們要承受多大代價和能夠獲得多少收益，採取不同行動方針的可能後果是什麼，其它人的態度和信仰是什麼，等等。[47] 如果運動領導人能夠使人們相信：他們的努力會徹底改變現狀，其它所有人都正在加入，而別人的行動要依賴於他們的貢獻情況，那麼這些領導人就能夠發起大的集體行動。[48] 通過改變人們的期望和信仰，並給這個團體增加資源，政治企業家也許會使團體的努力更加富於成效，因而有助於解決或消除潛在團體中存在的集體行動問題。

為什麼有些人願意冒發動運動的高度風險，並願意承擔巨大的組織激活代價？一種回答是，政治企業家已經考慮了自身的利益：他們之所以建立和擴大組織，並努力為相關團體提供集體收益，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前程將由這些組織的規模和擴張而得到提升。對他們來說，

安排對集體收益的提供就是一種投資，就像其它類型的投資一樣，雖然面臨一些風險，但可以預期這種投資是有利可圖的。他們得到的回報就是對其政治生涯的獎勵。此外，政治企業家也許是那種樂於為他人服務的利他主義者。

個人生涯激勵似乎更適合於解釋已經成立了一段時期的組織，而不是剛產生的組織；[49] 而利他主義和低的參與起點則更有助於說明運動發動者的崛起。顯然，利他主義和不同的參與起點與狹義的自我利益假設不相吻合。然而，在現實世界裏，超理性的考慮的確推動人們參與集體行動。這種例子包括：宗教、自我懲處(比如內疚、失去自尊等，它們是由未能遵守規範、未達到自己的理想或者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等引起的)、道義動機、利他主義動機、表現性動機、通過參與實現自我發展的要求以及無知和誤解等。也許需要這樣的超理性因素來促成合作，「至少也要把它當作酵母拌到正在加緊醞釀的理性主義行動中去」。[50]

埃爾斯特(Elster)是這樣勸告我們的：「在試圖解釋個人參與集體行動問題時，你應當以邏輯上最簡單的動機類型作起點：理性行為、自私行為、結果導向行為。如果證明這些東西還不足以解釋我們觀察的現象，我們就必須引入更複雜的類型，或是單個引入，或是結合起來引入。」[51] 下面各章將遵循這個思維路線。

除了政治企業家以外，如同我們將要在武漢文化大革命的案例看到的那樣，也許還有政治先鋒(political forerunners)。政治先鋒在其它人之前就參與了集體行動，因為他們具有更低的參與起點。他們對開放性公益作出的貢獻，也會有力地促使其它人這樣做。我們知道，多數集體行動都存在一定形式的有條件合作，因為只有當其它人都進行合作時，個人才來合作。政治先鋒出現後，就提供了一個「起動器」，它能夠向前推進其它人的有條件合作。有些政治先鋒可能在以後轉變為政治企業家，但多數不會或不能進行這種轉變。畢竟政治企業家要雄心勃勃，善於演說，並且富於冒險精神。他們也要具備進行人類交往和組織的才能，以便為潛在的積極分子提供進行集體行動和組織建設的信號和刺激。具備這些領導素質的先鋒並不多。而按照定義，所有的政治企業家當然都是政治先鋒。

在什麼情況下，理性參與者會撤出集體行動？

參加社會運動的人心裏總會懷有一些目標。除了團體目標以外，那些站在運動前沿的人可能會追求富有吸引力的政治地位。但是，這些給予領導者的回報，普通成員向來都是得不到的，領導階層通常不會為他們提供其它補償。

如果運動獲得成功，領導者可能會贏得專職席位(比如成為革命委員會成員)，以作為對他們的獎勵；但在普通成員看來，此時積極參與政治運動的收益已開始遞減。許多忠誠分子從繼續進行的集體行動中得不到多少收穫。由於普通成員感到他們已經得到了很多期望的收益，因此並不看重剩下的要求。換句話說，進一步集體行動的邊際效益開始減少。很多人認為，他們已經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其它人可以做收尾工作。因此，許多積極分子會退出運動。[52] 在第八章中我們將會看到，1967年夏，武漢造反派在戰勝保守派之後，就出現了這種情況。

相反，如果運動沒有帶來參與者所設想的東西，或者更確切地說，如果團體目標沒有達到，或只是以極高昂的代價實現，那麼普通成員就可能感到失望。當他們的勞動果實沒有達到期望要求時，他們也可能中止參與而退出運動。撤離過程也正像動員過程一樣，在這一期間也會出現趕潮流、隨大流的效應。運動領導者也會感到沮喪，但他們在這項事業作出的巨大投資卻使其更難於急流勇退。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武漢的造反勢力經歷了許多高潮和低潮。當他們處於低潮時，很多先前的積極分子變得灰心喪氣，他們不再參與後來的集體行動。當造反派看來恢復了以前的陣地時，一些逃兵又重新加入到造反隊伍中來。如同第七至十一章將要說明的那樣，雖然這些人同情過去的同志，但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再參加派性鬥爭。不管在哪種情況下，個人對集體行動價值的考慮都起著決定作用。到1976年為止，武漢的造反勢力已經萎縮得只剩下一個架子，主要由各級的運動領導者組成。總之，滿足和失望都會導致運動的消亡。無論造反派是處於退潮還是高潮狀態，有些積極分子都傾向於脱離造反隊伍。當派性鬥爭似乎處於勢均力敵狀態時，運動的聯盟式結構最能推動人們加入行動。

我們怎樣來解釋集體非理性？

人們有一個共同看法，即在文化大革命的歲月裏，中國人都發了瘋。我們如何解釋人們行為中明顯的瘋狂性呢？對於這種集體非理性現象的一種解釋是，人們行為的總和反映了單個人行為的特性。換句話説，「他們發了瘋」是因為「他發了瘋，她發了瘋，每個人都發了瘋」。[53] 但是，人們行為的總和並不必然是單個人行動的平均。相反，它也許帶有集體的某些特點。理性個人的偏好或行動加在一起卻導致集體非理性的結果，這並不是一個異乎尋常的現象。安東尼 · 唐斯 (Anthony Downs) 提出，一致的個人偏好的總和也許會產生一種不一致的集體偏好安排。[54] 曼庫爾 · 奧爾森認為，單個人對自我利益的追求可能會導致集體對自我利益的損害。進一步講，我們經常會發現，本來有理性的人卻會違心地參與他們自己絕不會發起的團體行動。因此，人們之間的互動常常會導致出現單個人既不打算也沒有必要意識到的總體結果。這種結果有時在單個人的層面上是不會出現的。換言之，理性的人並不總是產生理性的結果。這一觀點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表述，即我們可以下結論説，理性行為者模式可以解釋集體非理性。你不必瘋狂到採取瘋狂行動的程度。完全理性的人一起行動時往往會做出一些蠢事。理性行為者模式在解釋為什麼每件事都出了問題時是非常有用的，因為社會活動的結局也許並不是由行為者個體的主觀意圖來決定的，而是由他們的行動來決定的。[55] 比起基於個人瘋狂性產生群體瘋狂性的模式，這一模式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的群眾行為提供了一種更好的解釋。

理性選擇模式的優點和局限

本書試圖運用理性選擇方法來解釋1966–1976年間武漢的群眾行為。但是，運用這個方法時需要加上兩個條件。

第一，在本書的研究中，分析的簡潔性讓位於現實主義。[56] 很多分析家指出，以幾個嚴格理性假設作基礎的模式可以產生精緻的假説，對行為提供一種簡潔的解釋。誠然，理性選擇方法最受稱道的優

點是在進行理論建構時表現出的極大優雅性和簡潔性。然而，受到高度讚美的優雅性和簡潔性卻只是在抽象意義上具有吸引力。當把基礎狹窄的理性選擇方法應用到現實政治衝突的喧鬧世界中的時候，人們就會發現這種方法常常缺乏具體性和準確性。所以，你必須決定是否希望以缺乏説服力的代價來換取一個精緻的理論分析框架，想要花巨大的代價來取得一點微小的成果。[57] 由於歷史決不可能從理論中演繹出來，所以在研究政治現象時應當把現實主義放在首位，簡潔只能放在次要位置上。

在運用理性選擇方法時，本書純粹是從闡釋的角度著眼，僅僅把它當作一種解釋文化大革命期間群眾行為的便捷方法。本章從狹義的理性概念出發，然後逐步引入某些現實主義因素，以便增強解釋力。對最簡約的理性主義假設作寬鬆化處理，也許會損害像奧爾森這類學者主張的純粹理性方法的分析嚴密性。但是，這種修改可以使我們對文化大革命作出更有意義的解釋。

第二，本書反對認為理性選擇方法能夠解釋一切現象的觀點。事實上，沒有哪一種抽象的模式是萬能的。所以，當我們運用理性選擇方法或任何其它有關方法時，應該認識到它的局限性，並且把它與其它模式結合起來使用。

純粹理性主義模式存在很多漏洞。例如，在任何理性選擇模式中，偏好和約束都是最重要的兩個獨立變量。但是，在理性選擇的框架裏卻沒有回答這兩個問題：偏好是怎樣產生的？約束源自哪裏？[58] 當不得不作出解釋時，理性選擇理論只是籠統地把人們的偏好看作是外生的。正如黛布拉．弗里德曼 (Debra Friedman) 和邁克爾．赫克特 (Michael Hechter) 所指出的那樣，「理性選擇理論閉口不談 (人們的) 偏好是什麼和它們來自哪裏」。[59] 與之類似，理性選擇理論也把約束 (機會) 視為外來事物。

如果我們想解釋偏好的形成和變化及約束 (或機會) 的出現 (或消失)，那麼我們就需要求助於結構主義分析。結構主義理論堅持認為，結構狀況很重要，因為只有這些條件才能幫助我們理解，在特定時間裏，特定範圍的人們怎樣得到特定系列的選擇。結構條件具有自身的動力，不受必須生活在這些條件下的人們的利益考慮的影響。理性選

擇思維在這方面是無能為力的。[60] 顯然，結構主義和個人本位政治理論之間並不必然是不兼容的。結構主義理論可以在解釋某些結果時發揮更好的作用，而理性選擇理論則在解釋另外一些結果時也許更適用。[61] 換句話說，理性模式與其它方法結合起來運用才能收到最佳效果。只有當理性選擇方法與其它方法中包含的概念和理論結合使用時，它才能獲得真正的解釋力。

本書的研究並不想裁剪現實世界以適應一種抽象的模式，而要運用理性選擇方法以及來自其它方法的分析工具。如果我們想對文化大革命這樣複雜的歷史現象取得有根有據的理解，那麼就很需要有意採用一下折衷主義。[62] 第二章將表明，對文化大革命前十幾年中國社會的結構主義闡述，是對十年動亂年代群眾行為理性主義分析的補充。

文化大革命為研究集體行動提供了極好的機會。為了理解集體行動，我們不僅需要進行理論抽象，而且要像哈丁所提出的那樣，「進行連人類學家都會感到厭煩的精細觀察，注意區分連語言學家都會感到頭疼的細微差別」。[63] 理性選擇理論家常常採納經濟學家將事實程序化的誘人觀點。這種對真實事件過度簡化的考察對於建構抽象模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這些真實事件卻往往受到高度歪曲。當然，「事實」絕不會自我說明，然而對行為者在真實形勢下的行為做認真細緻的研究卻也是無可替代的。對規律性現象的細緻觀察，或者如克利夫德．格爾茨 (Clifford Geertz) 所說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64] 對於促進我們以理性視角理解政治行動，至少與推理的方法一樣重要。

基於這個原因，本書並不想在讀者面前炫示成套的抽象模型及其應用。相反，本書將通過真實事件來揭示理性選擇政治理論的優點和缺點。本章提出的思想和理論將被自覺地應用到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群眾行為的探討上面，但會盡最大限度地減少專業術語。

方法論

為了透徹地考察這裏要討論的各種問題，本書採用了編年體論述框架。通過整合社會政治分析與歷史敘述，本書試圖再現武漢文化大

革命的真實歷史以及於運動中在該市建立的各種政治團體的興衰模式。顯然，局部決不可能充分反映整體。所以，這部書並不奢求完美的代表性。然而，在武漢展開的文化大革命的確能展示一些有代表性的特點：如在運動中的節奏、派性的泛濫、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的分野、派性暴力、運動後期的政治冷淡以及在許多其它方面中存在的有代表性的特點。

而且從一些方面看，發生在武漢的文化大革命要比在北京、上海或廣州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更典型地反映這一時期文革群眾運動的特點。強而有力的中央干預，扭曲了北京和上海派性的模式，以至於北京的工人運動很不發達，而上海的工人運動超過了學生運動。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在其它省份通常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廣州的運動偏離了一般的模式，因為在武漢1967年7月事件(參見第八章)之後，各地幾乎所有的保守力量都被驅散，唯獨廣州是個例外，保守力量繼續存在。這是由於他們得到了當地軍事首長黃永勝的保護，而黃恰好有當時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林彪撐腰。基於這些理由，即使武漢不能提供一個全國文革的真實縮影，但對這一城市的個案研究卻有益於瞭解文化大革命時期派性的一些共同特點。這些特點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個案中也許是難於觀察到的。

雖然本書是按年代順序安排的，但每一章除了敘述特定時期內發生的事件之外，還特別關注一些集體行動的理論問題，比如機會結構的重要性、選擇性激勵的分量、對立團體的形式、政治企業家的作用、聯合的形成、積極分子退出的時機與原因、無政府與暴力之間的關係，以及其它一些問題。為了理解這一時代派性產生的根源，第二章考察了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分歧現象。第三章探討了政治機會的重要性。在文革開始的頭幾個月裏，人們原有的行為模式變化不大，因為遊戲規則在那段時間裏還沒有出現大的變化。此外，反政府行動所包含的高度風險也使潛在的造反分子不敢浮出水面。第四章從相反的角度評估了政治機會的重要性。當毛澤東在1966年秋逐步打破現存的權威結構時，就極大地降低了參與行動所包含的風險。一些政治先鋒很快變成政治企業家。經過他們的努力，造反勢力被逐漸動員起來。第五章分析了運動期間群眾組織的構成，並指出派性分歧是文化大革

命前社會結構衝突的必然產物。這一章還解釋了眾多中國人積極參與集體行動的原因。

第六章和第七章考察了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衝突模式，第八章和第九章則考察了造反派組織之間的衝突模式。這幾章所探討的問題是：無政府的含義、聯合的形成、對立組織之間的暴力以及派性激進主義的興衰。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考察了以後幾年，即1969–1976年間的派性。在有關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文獻中，對這幾年派性的研究至今幾乎還是空白。這兩章探討了文化大革命後期派性與其前期派性之間的相似和不同之處。這裏的關鍵問題是，為什麼當大多數以前的派性鬥士冷靜下來之時，少數人仍然積極地進行派性鬥爭。

在第二至十一章中，我試圖闡明以下三個觀點：

(1) 雖然毛澤東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但他領導的政治過程卻總是偏離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選擇的「正確路線」。

(2) 運動的參與者雖然都是毛澤東真正的信仰者，但他們參與或者撤出集體行動卻主要基於他們對個人回報的理性算計。因此，對代價和收益的考慮，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些真正信仰者參與運動的程度和方式。

(3) 正是參與者在個人和集體行動中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迫使毛澤東在運動的每一轉折關頭都把精力轉到緊急糾偏上來。當文化大革命這隻怪物長得過於龐大時，毛澤東發現他自己既無力指揮它，也沒辦法把它塞回魔瓶中去。文化大革命這場由舉世公認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所導演的戲劇，就只好以巨大的失敗而告終。

前十一章所要闡明的是這十年運動的參與者的確是在理性地行動，而第十二章則開始解釋毛澤東真誠的信仰者如何能同時成為理性行為者。這種解釋只能通過理論思維來得出，而不能僅靠經驗的質疑來發現。本書最後一章駁斥了韋伯關於超凡魅力與非理性密切關聯的假設。我認為，韋伯超凡魅力理論的致命缺點在於忽視了魅力關係中的感知維度。我們一旦認識到感知方面的存在，那麼這場歷史戲劇中的行為者就無任何神秘可言了。儘管他們在感性方面深深地依賴毛澤東，但他們的行動卻主要出於自我利益考慮，按照自己的議程進行。

因此，毛澤東超凡魅力的失敗，也就不再是一個神秘的事實了。從這個案例研究獲得的領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從一般意義上理解超凡魅力現象。韋伯把超凡魅力當成傑出人物特性的理論，使這個概念陷入混亂的泥潭，妨礙了經驗性研究。最近的研究試圖通過重新定義超凡魅力，把它看作一種關係，而不是事物，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超凡魅力關係仍然被視為這樣一種關係，而在這種關係中「追隨者會執行領袖發出的任何指示，而不考慮指示的正確與否」。[65] 這種新定義沒有認識到追隨者的理性，所以就不容許超凡魅力失敗，而這與文化大革命的案例是矛盾的。忽視超凡魅力關係中的感知維度，正是這個定義的錯誤根源。本書的研究表明，一位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之所以會遭到災難性的失敗，正是因為真正的信仰者可以理性地行動。

本研究使用的材料主要來自六個方面：我自己對那些歲月的回憶；我的日記和在那十年裏與朋友的個人通信；全國性和地方的公開出版物；1966–1969年間群眾組織主辦的全國性和地方報紙；當地檔案；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則是採訪數據。1986年，我在武漢進行實地調研。由於那一年存在自由的氣氛，我得以接觸武漢檔案館中收藏的武漢市教育局的檔案，看到了武漢市圖書館和湖北省圖書館藏有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版的當地小報。我還採訪了來自各行各業的85個人。從這些採訪中，我瞭解了參與者的動機、參加集體行動的程度、他們的行為模式以及進入和撤出的時機。我的一些被採訪者曾經是那場運動期間武漢市的著名派別領導人。他們的證詞的特殊價值在於，使我能夠在基層政治和城市及更高一級政治之間建立起聯繫。這些資料互相補充。我用當時的檔案和報紙的記述，核對了受訪者的回憶和印象。

第二章

分歧的根源，1949–1966年

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爆發不能不經歷一個醞釀的過程。1966–1976年十年間發生的事情，源於此前十七年的中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方面出現的緊張關係。更具體地說，十年文革中發生的派性鬥爭，植根於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已經存在著的社會分歧 (social cleavage)。不瞭解這些社會衝突，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戰爭就似乎是無意義的和不可理解的。為什麼千百萬中國人投身於這場運動之中？是什麼力量把看起來團結統一的國家變成了戰場？為什麼一些人成為攻擊現政權的造反派，而另外一些人反對造反派以維護現狀？為什麼有些人在這狂熱的十年中寧願逃避政治運動？僅僅考察政治行為者在這一時期做了什麼以及沒做什麼，是不可能回答這些問題的。只有通過考察1960年代中期以前的社會權力結構以及各個社會集團在這種結構中的地位，我們才能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所以，對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社會進行結構主義分析，對於理解此後運動參與者行動偏好的根源，就是一個必需的前奏。

在我們開始考察前存 (pre-existing) 的社會分歧之前，有必要簡單地介紹一下武漢這個城市。

武漢是華中最大的都市。長江這條中國最大的水路動脈，在武漢與另一條大河漢水 (亦稱漢江) 交匯。橫貫中國南北的交通大動脈——京廣鐵路穿過這個城市。從前這裏是三個城市，即漢口、漢陽和武昌，而後來三城統稱武漢。漢口坐落在漢水河口的長江北岸；漢陽隔

漢水與漢口相望；在兩江交匯口不遠的長江南側，就是武昌。1950年，這三個城市合併成一個城市。

地理位置上無與倫比的優越地位，使武漢從19世紀中葉起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商業和工業中心。1949年以後，這個城市繼續發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十七年間，武漢建設了幾十個大型企業和幾百個中小型工廠。1966年，武漢的人口增長到250萬。[1]

武漢也一直是一個政治中心。1911年在武昌爆發了辛亥革命，國民黨一度把中央政府設在漢口。1949–1954年，武漢是中南軍政委員會所在地。1954年，武漢成為湖北省的首府。省市政府都在武漢，其中省政府設在武昌，市政府設在漢口。1980年代中期以前，武漢也是武漢軍區司令部所在地。武漢軍區管轄駐紮在湖北和河南兩省的部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十七年裏，當地領導層相當穩定。1950年代中期上任的當地領導人，1966年仍然在武漢掌權。

1966年，這個三位一體的城市分成六個行政區，[*] 每個區都有其明顯的特徵。江漢區地處漢口中心，基本上是個商業區，只有一些小型的傳統工業。漢口的工業集中在江岸區和礄口區。漢陽是一個新興的工業區，只有很少的商業設施，幾乎沒有文化機構或高等院校。大多數學院、大學、科研機構和文學藝術組織等大規模的現代行業，都設在武昌。青山區在武昌區以東，距離它約二十公里遠，主要有兩個巨型企業：武漢鋼鐵公司和第一冶金建設公司。

武漢市的居民類型在各區都不相同：礄口、漢陽和青山區主要居住著產業工人；江漢區主要居住著非無產階級勞動者、非知識分子「中等階級」和從前的資本家；武昌區主要居住著知識分子和在省政府、武漢軍區工作的文職及軍隊人員；江岸區則各類人等雜居。

文化大革命前的武漢像其它中國城市一樣，也呈現著三種社會分歧。

[*] 譯者注：現在武漢市轄七個城區、六個郊區。七個城區為江岸區、江漢區、礄口區、漢陽區、武昌區、青山區、洪山區；六個郊區為蔡甸區、江夏區、東西湖區、漢南區、新洲區和黃陂區。

幹部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分歧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私有制雖然在中國已被取消，但國有制並沒有賦予所有公民享有和處理財產的平等權利。勞動分工的等級結構仍然完整地保留下來。在勞動的經濟分工中，一些人擔負了計劃和指揮他人工作的創造性任務，而多數人則不得不去幹知識要求更低、更加平凡的活。

1957年，就在米洛凡·吉拉斯 (Milovan Djilas) 出版其《新階級》[2] 的同一年，北京航空學院助教周大覺獨立地提出了新階級理論。周認為，生產資料國有制在中國只存在於名義上。實際上，生產資料卻掌握在少數個人手裏。這些人不直接從事生產活動，卻在生產組織體系中佔據領導地位，成為生產資料的管理者。正因為他們控制了生產過程，於是就獲得了經濟優勢。周的結論是，這些人構成了脱離人民大眾的領導者階級，領導者與大眾之間的矛盾就是一種階級鬥爭。[3]

就那些當權派所佔據的地位與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領域的普通工人相距存在的差距而言，在中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裏的確出現了兩個基本階級：幹部階級和工人階級。由於他們處在社會生產的不同地位，因此這兩個階級之間產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國，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幹部階級內部和工人階級內部的衝突所掩蓋。

幹部階級內部的分歧

幹部階級由三類具有不同特點的幹部組成：黨政幹部、行政管理幹部和技術幹部。黨政幹部包括中國共產黨、共青團、工會和婦聯官員；各單位的政工、宣傳、人事管理和保衛人員。他們履行至關重要的思想、政治、組織和鎮壓職能。行政管理幹部從事生產和再生產的管理工作，比如各級經理，負責會計、賬目、供應和分配和福利等事務的負責人。技術幹部擁有知識和技能，對於促進政府目標的實現能夠起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憑藉自己的知識，能夠影響甚至否定其它

兩類幹部作出的決定。這類幹部包括企業裏的工程師和技術員，教育和科研機關裏的教師和科學家，以及醫生、記者、藝術家等等。[4]

在這些各不相同的幹部之間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內在區別。黨政幹部，特別是那些中下級幹部一般出身於工人階級或貧農，很少受過正規教育；而多數專業幹部則出身於非無產階級家庭，受過較好的教育。行政管理幹部包含了高低兩種出身的人。不同的社會出身和經歷必然容易引發矛盾。

共產主義制度形成初期具有一個特色，那就是精英的二元化 (élite dualism)。[5] 如果中國擁有一大批不僅政治可靠而且專業很強的幹部，那麼這種衝突也許就根本不會出現。但不幸的是，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時面臨著一種兩難境地：多數革命幹部沒有受過管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訓練，而受過這些訓練的人卻往往出身於中等或上等階級家庭。人們認為後者對新政權的目標、價值觀和綱領並不完全贊同。由於兼備政治可靠和技術內行的人很少，所以中國不得不在按照政治可靠性標準提拔一批幹部的同時，又任用具備技術專長的另外一些人。

人民共和國真誠地努力提高人民的社會地位，讓他們從受壓迫者轉變為統治者。1949年5月中國共產黨解放武漢以後，派了大約6000–8000名人民解放軍官兵和其它革命積極分子來接管城市，他們的頭銜叫作「軍代表」。[6] 差不多每一個企業和政府機關都派了軍代表。他們在每個單位都擔當了領導的角色。以後當政治形勢穩定時，大多數軍代表都被正式任命為相應單位的黨委書記或主要負責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很多單位的領導幹部仍然是從前的軍代表。

老資格的共產黨幹部數量畢竟有限，單靠他們顯然不足以填滿所有權力空位。因此，大批工農積極分子被放到一些政府和企業的崗位上。特別是在1952年大規模工業建設計劃實施後，體力勞動工人向管理崗位轉移的步伐大大加快。[7] 到1957年為止，1949年前入黨學的老幹部只佔當時武漢幹部總數的11%；另外89%是新幹部。[8] 大規模的提拔促成了一種高度而長期的社會地位變動，使許多出身卑微的人在社會上獲得了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為準備讓出身卑微的人擔任領導職位，新政權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知識階層。1950年代初期，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223所特別

幹部培訓學校。進入這些學校的學生大多數是年青有為的基層幹部。培訓是提拔他們到更重要崗位上之前的一個必要階梯。光是1956年一年，就有15,958名學生從這些學校畢業。此外，還開辦了87所工農速成中學。多數速成中學附屬於現有的大專院校，這些速成中學的學生畢業後又往往被這些大專院校招收為正規或特殊大學生。據估計，在1950–1957年間，大約有10萬名男女接受了這種培訓學習。[9]

儘管做了這些努力，幹部的總體教育水平仍然不高。1958年，在中國的中高級幹部中，有50%沒有接受過小學以上的教育。低級幹部的教育程度更差，只有11%的人達到中學或中學以上的教育程度。[10]由於黨要求迅速發展經濟、實現科技現代化，因此專家的技能更顯得重要。黨不得不向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的人作些讓步。[11]

建國初期，鑒於穩定社會和維持基本運轉的急迫需要，新政權不得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要依賴國民黨政府的前行政管理和技術人員。[12]解放一年後，有一個調查顯示，超過50%的武漢幹部是留用的國民黨官員。[13]

新政府也極其重視從前的資本家的管理技能。1956年將私營工商企業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時，政府答應要為所有以前的資本家分配與其才能相適應的工作。[14]當時在武漢有13,388名從前的私營股東，其中有6,480人被劃為資本家。所有資本家都得到了工作，其中有許多人在新組建的公私合營企業裏成為行政幹部、管理幹部和技術幹部（參見表2.1）。在有些行業裏，管理層內從前資本家的人數超過了革命幹部。例如，在武漢的四個主要行業（建築機械、紡織、輕工業和手工業）的374個企業的638名經理、副經理中，有444人是從前的資本家，佔總數的69.6%。其它194個管理職位由共產黨的老幹部和新提拔的工人擔任，但他們只佔總數的30.4%。[15]

隨著更多工人被提拔到管理崗位上，從前資本家在管理層所佔的百分比開始下降。但是，1956年走上管理崗位的多數前資本家在1966年仍然擔任這種職務。

技術幹部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知識分子。1960年代以前，知識分子在中國只是一個很小的階層。在1956年的整個中國，只有42,000位大學教師、31,000位工程師以及63,600位技術員。在6.5億的總人口

裏，按照中國標準只有384萬人可以被定義為知識分子。大部分知識分子出身於以前的特權階級。直到1966年，在武漢中學裏只有24.8%的黨委書記和校長、19.4%的教師出身於工人或農民家庭；其餘都出身於非無產階級家庭。在小學裏，出身的分佈情況更加不正常：在所有教職員工（包括黨的書記、校長和教師）裏，只有19.8%的人出身良好。[16] 無論黨認為這些知識分子多麼不可靠，他們卻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幾年裏始終佔據了多數的技術性、專業性和學術性崗位。因為，其它階層的人還沒有擁有他們掌握的知識和技能。知識分子的不可替代性，就使他們與政府的關係比新政權與留用的國民黨官員和前資本家的關係更難處理。有時（1956年和1962年初），中國共產黨公開宣佈，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7] 但在另外一些時期（1958年和1962年末）裏，黨卻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貶斥為無產階級的主要敵人。[18] 1965年，毛澤東會見訪華的法國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在同法國客人討論革命的命運時，毛斷言，知識分子在中國新修正主義階層中佔了很大比重，所以對於中國革命來講他們是最危險的一個集團。[19]

但是，新政權要完成培訓出既在技術上熟練又在政治上可靠的新一代專家，十七年（1949–1966）時間實在是太短了。這樣一來，政府不得不暫時允許充分任用現存的專家資源。

* 譯者注：馬爾羅時任法國國務部長。1965年8月作為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的特使訪華。毛澤東於8月3日會見馬爾羅時，後者問：「現在中國修正主義階層是否廣泛存在？」毛澤東回答說：「相當廣泛，人數不多，但有影響。這些是舊地主、舊富農、舊資本家、知識分子、新聞記者、作家、藝術家以及他們的一部分子女。」

表2.1　1956年對從前資本家的安置

從前的出身狀況	新的崗位	人數
上層資產階級	副省長	1
	副市長	1
	省局副局長	3
	市政協副主席	1
	市局副局長	5
	省或市局顧問	6
	副區長	4
	合計	**21**
工業資本家	董事會成員	12
	大公司經理或副經理	14
	大公司部門負責人	9
	工廠廠長或副廠長	532
	工廠科室負責人	282
	技術員	40
	普通人員	1,839
	合計	**2,728**
商業資本家	區商業局副局長	6
	大公司經理或副經理	17
	大公司部門負責人	14
	區商店經理或副經理	42
	商店經理或副經理	1,274
	商店部門負責人	84
	公司顧問	10
	董事會成員	24
	技術員	2
	普通人員	2,258
	合計	**3,731**

資料來源：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地方黨史》，頁272–273。

上面的討論應能使大家清楚地看到，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的幹部階級是由兩種類型的精英組成：新的政治精英和老的專業精英。這兩個集團在社會出身、受正規教育程度及功能上都大相徑庭。由於他們是從階級背景迥異的人中選拔出來的，又天天都在權力、地位和收入等方面的分配上進行競爭，所以緊張和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論述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的著作中，人們常常很看重韋伯的社會排斥論 (notion of social closure)。[20] 社會排斥是指一種過程，即社會團體通過把競爭者排斥在得到報酬和機會的大門之外，從而使自己的報酬最大化的過程。這就需要找出某些可識別的社會或物質的特徵作為排斥的基礎。在韋伯看來，實際上任何一種集團特徵都可以被用來「壟斷具體的 (通常是經濟的) 機會」。[21] 每一個集團都自然地傾向於採用那些與自身特殊和內在性質吻合的標準。[22]

為了使自己對權力和特權的要求合法化，無論是新的還是老的精英都把社會排斥作為一種策略。專業幹部認為，憑著他們的技能或教育，他們最有資格佔據一切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崗位。所以，他們渴望從那些他們認為缺乏治國技術和道德素質的人手中奪取政治權力。

在1957年的「百花齊放運動」期間，這種要求得到了充分的表達。留用的國民黨官員、從前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就對老資格黨員在政府和經濟部門佔據優越地位極為不滿，看不起這些文化水平極低的黨政幹部。對他們來說，外行領導內行是行不通的。「百花齊放運動」為他們提供了表達其不滿情緒的機會。從前的資本家提出，國家應當把它的代表從公私合營企業中撤出去，因為他們認為革命幹部和新提拔的工人由於教育程度和經驗不足，而沒能力管理經濟。[23] 即便國家不讓步，他們至少希望國家幹部只發揮政治方面的作用，而讓企業從前的所有者來管理日常業務。

知識分子譏笑老資格的革命幹部和工農出身的幹部是「階級鬥爭專家」。在他們看來，中國真正需要的是「經濟建設專家」。因此，有必要改變現存的幹部組成和任用政策。[24] 任用幹部的主要標準應當是才而不是德。由於很多黨政幹部沒有多少才能，所以武漢的一個「右派」建議：

至少10–30%的黨員應開除黨籍。所有工農出身的老幹部都應當送去休息，年輕的新黨員應當都送去學習。[25]

有人還提議，應當引入公務員考核制度，應當給予所有人競爭幹部崗位的平等權利，而不論其家庭出身如何。

前國民黨軍官和行政官員也趁機發泄他們的不滿。他們抱怨說，有些在1949年向人民解放軍投誠的高級軍官在武漢一直沒有工作做。他們認為，讓那些具有很高才能的人失去工作機會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明智的。[26] 所有這些批評都表達了這樣一種要求，即應當對權力進行再分配，應當改變有利於非專業幹部的社會和經濟機會封閉狀況。

老精英的進攻激起了被攻擊者的強烈反應。黨政幹部用他們自己的社會排斥策略來反擊專業幹部對社會封閉的挑戰。黨政幹部的確缺乏知識和技能。但是，他們卻擁有專業幹部所沒有的資產，即他們貧寒而「革命的」出身。因此，階級劃分可以用作解除專業幹部競爭力的武器。

1949年以後，中國對所有公民都進行了階級劃分。在農村地區，基於土地改革前經濟狀況的階級劃分，就被當作重新分配財產的依據。城市沒有像農村那樣的土地改革。城市裏的階級是一系列政治運動的副產品。這些政治運動包括勞保登記運動(1951–1954)、[27] 肅反運動(1955–1956)、[28] 社會主義改造運動(1956)、[29] 和反右運動(1957–1958)。[30] 到1958年為止，各行各業的城市居民都有了具體的階級劃分，如資本家、工人、城市貧民、自由職業者(如商販、小手工業者和其它小資產所有者)和職員(包括專業人士及其它知識分子)。除了這些經濟劃分以外，還有針對特殊人群的政治稱號：既有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幹部等政治稱號，也有反面的政治稱號如反革命、右派和壞分子等。[31]

最初，政府並不期望階級劃分在日常生活中會起巨大作用。按照1950年政務院頒發的《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地主在土地改革五年後，如果他們參加生產勞動、遵紀守法，就可以改變其階級成分。對於富農也有類似的政策，即三年後可以改變其成分。到社會主

義改造完成的1956年為止，很多地主和富農已經改變了這種階級成分。[32] 當時認為，私營企業主只是在拿紅利的七年裏才是資本家。1956年，黨甚至通過修改入黨程序來降低階級成分的重要性。按照1945年黨的七大通過的舊黨章，非無產階級申請人必須由四名黨員來推薦。其介紹人必須有很長的黨齡，其預備期要比出身無產階級的申請人更長。而八大通過的黨章對所有申請人的入黨程序都作了統一規定，表明階級成分在中國社會正失去其重要意義。[33]

老精英在「百花齊放運動」中的進攻，引起了黨的警覺。階級成分是右派猛烈攻擊的主要目標之一，[34] 同時，顯然大批右派出身不好。[35] 黨由此認為，一個人的家庭背景和/或個人階級狀況，對其政治觀點和行為具有重要影響。所以，階級背景需要進一步強調，而不是輕視之。[36]

各級黨的幹部發現，強調階級黨學恰好符合他們的集團利益。前國民黨軍事和行政官員、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無疑受過的教育訓練程度最高，因而最有資格去管理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事務。同他們相比，革命幹部在才的方面顯然居於劣勢。只有制定一套不同的規則，新精英才有可能戰勝老精英。因此，他們全心全意地擁護重視德且用階級成分作為衡量德的主要標準的政策。按照階級標籤(成分)對人進行的排序，創造了報酬和機會的分配結構。這種分配結構確保了革命幹部的統治地位。缺乏才能的新精英也許可以繼續利用老精英的技能，但老精英關於按照專業才能安排領導職位的要求卻不合法了。按照家庭出身對人進行排序，專業幹部被迫處於政治上的劣勢地位，而不管他們可能在其它方面得到了什麼。

在研究社會排斥問題時，弗蘭克·帕金(Frank Parkin)指出，既定社會集團維護或提高自身特權的一個最常用的策略，就是創造位於其下的另一個集團或階層。[37] 所以，應當把階級劃分理解為黨政幹部用來阻嚇其潛在挑戰者的一種策略，而不能僅僅視為一種錯誤政策的結果。

工人階級的內部分歧

工人階級也並非鐵板一塊。不論是在國營部門還是在集體所有制

企業，工人勢力大體上都可以分為三類：積極分子、落後分子和中間分子。

這種劃分是政治和經濟發展的群眾動員方法的副產品，同時也是資源稀缺的副產品。在像中國這樣的貧窮國家，增加生產率的一個方法，就是動員未加利用的勞動力。但是，正因為貧窮，所以可以用作報酬的資源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政府不得不盡量用廉價的道德獎勵來彌補昂貴的物質獎勵。

群眾動員的秘訣，在於區分群眾，首先動員積極分子。因為少數組織者不可能一下子動員起來所有工人。[38] 所以，他們總是鼓勵工人通過比、學、趕、幫、超來變成積極分子。[39] 積極分子因而成為領導者可以依靠的先鋒隊，並且作為其他工人學習的榜樣。

要當一名積極分子，在生產中必須成為創高產的能手，在重要政治運動和日常政治活動中要做熱情的戰士。[40] 然而，具備這些條件的人是不會自動成為積極分子的。一個人是否有條件成為積極分子，還要看他或她的工人同伴和領導的評價如何。因此，要想被評為積極分子，必須由你的同事來提名，並經你的上級來批准。

工人提名的積極分子和領導賞識的人常常屬於同一批人，但他們也並非一致。領導常常掌握著一個積極分子的秘密名單，其中只包括那些他們最信任的和打算吸收入黨和入團的人。[41] 儘管這種名單保密，工人通常很清楚誰是領導的「重點培養對象」。因為領導對「重點培養對象」的待遇是不同的。黨團支部經常開展一些特殊活動，如學習討論、義務勞動和外出參觀等。只有積極分子才可能參加這些活動。更重要的是，不管何時有了一項中心任務，特別是一場政治運動，領導總是提前向積極分子傳達諸如本次運動的任務是什麼、要做什麼等內容。[42]

領導和工人通常也知道誰被劃為他們單位的落後分子。在1949–1966年的十七年裏，「落後」這個一般概念的含義經歷了三次主要變化。在1956年前，「落後分子」主要指那些沒有完成生產指標、沒能努力提高技能、沒有充分發揮的能力和沒能遵守勞動紀律的人。[43] 而在1957年以後，當要求政治掛帥時，就更強調一個人的政治表現了。由於對政治積極很難進行清楚而客觀的考核，所以一個人在政治學習活動中的表現就成為最常用的衡量政治覺悟的標準。[44] 那些不經常參加

這種會議的人就被單位領導和積極分子説成「不關心政治」。甚至被動地出席這種會議也被視為「對政治冷淡」，因為他們在這些會議上很少發言。[45]

1960年代初嚴峻的經濟形勢迫使黨努力限制群眾消費，於是造成了一種強烈的禁欲傾向。當時，艱苦樸素開始同「無產階級美德」聯繫起來，而鋪張浪費則與「資產階級惡習」掛起鈎來。[46] 此時，如果一個人在生活方式的任何方面脱離一般群眾，比如穿鮮艷的花衣裳、上頭油、下飯館、養魚或下棋，那麼人們就會認為此人落後。[47] 由於社會生活的政治化，就極大地擴展了落後這個概念的範圍。甚至那些工作努力、很好地完成任務的人也可能被看作「落後分子」。

領導喜歡積極分子，另一方面，上級和積極的同事則歧視和孤立落後工人。在極端的情況下，有些單位的領導甚至舉行公開會議，批評那些落後工人，或者把他們的名字張貼在牆上來羞辱他們。[48]

在每個單位裏，積極分子或落後分子都不佔職工的多數。在這兩類人之間，就是「中不溜秋」的工人。他們屬於人們所説那種「聽話」的工人。[49] 他們尊重上級，認為自己天生就應該服從。他們參與政治和生產活動，但缺乏熱情。對他們來説，政治就意味著與別人一道喊遊行口號，生產就是通過誠實勞動來謀生的方式。

1960年代初社會生活的政治化給中間分子施加了日益增大的壓力。在過去的年代裏，走中間道路曾經是完全行得通的。而現在則不然，一個人就像在逆水行舟：你不向前進就會被激流沖回去。換句話説，每個人都只有兩種選擇：當積極分子，或者做落後分子。中間地帶不再存在。這一態勢進一步使工人兩極分化。回顧1962–1966年期間中國報紙的各種報導，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這一時期裏積極分子和落後分子之間的衝突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普遍和嚴重。

1950年代初，這種衝突還被認為「有損於工人階級的團結」。[50] 在1957年的「百花齊放運動」期間，有些受壓制的落後分子甚至公開地攻擊積極分子。[51] 但是，反右運動很快就使抗議者偃旗息鼓。[52] 在隨後幾年裏，對積極分子的公開批評減少了，但積極分子和落後分子之間的矛盾卻繼續存在。下面這段摘自《工人日報》對1964年報導的片斷，就典型地反映了這種衝突：

(我們組裏)有六七個落後的工人。他們幹活挑肥揀瘦，不遵守勞動紀律，成天幌幌悠悠。有的人有時一天就幹不到五六個小時。有的人特別看重工資獎金，還老伸手向國家要補助。組裏有個工人公開對人講：我做工就是為了吃飯，就是為了鈔票。每逢評獎金，他和另外幾個人，總要爭來爭去。組裏有些老工人對他們看不慣，有時說他們幾句，他們就罵人。有個老工人叫陸章郎，幹活很認真，早上班，晚下班，勤勤懇懇。有幾個落後的工人諷刺他……

那時，我抓生產，只依靠一部分人。我對思想既落後、技術又不高的人，不大理睬……我在分配任務時，把一些不重要的活、粗活、定額緊的活，讓他們做，做不好就批評。我把完成任務的希望，寄托在生產幹勁比較大，技術又高明的人身上。平時，和他們搞得也很親熱。這樣做的結果，後進的工人技術得不到提高，生產幹勁更不足，生產搞不好，老拿三等獎，有時候還拿不到獎，對我意見更大了。他們幾個人搞在一起，和我鬧對立。他們故意不參加會，不遵守勞動紀律，還老和我以及其它積極分子吵架。我見問題越來越嚴重，就想出了一個「教育」落後分子的辦法。和幾個積極分子一商量，訂出了一個小組獎金制度，規定了三條：不完成月度任務的人，不能得獎；一個月裏有三次無故不參加會的，獎金降級；不遵守勞動紀律，不得獎金或者降級。我滿以為，這樣總會使他們好好生產了，誰知，頭一個月還有點作用，以後就不靈了。今年3月上旬評2月份獎金的時候，還為這個「小制度」，把小組弄得四分五裂。當時，有些完不成任務的人，不承認這個「小制度」，非要分獎金；完成任務的人，要堅持這個「小制度」，不肯分獎金給他們。會開了許多次，各講各的理。要算徐文才鬧得最厲害，他到支部去說：「如果王文龍不給獎金，我就要和他『不客氣』。」[53]

黨和政府的領導人自然希望隊伍裏產生盡可能多的積極分子。所以，他們總是鼓勵基層領導和積極分子去幫助落後分子，使後者轉變

成先進分子。但是，從積極分子的角度來看，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因為獎勵是有限的，擴大積極分子的隊伍就會稀釋他們作為少數所享有的好處。因此，在作為盡責的積極分子誠心誠意地關心和幫助其工人夥伴的同時，他們也把這些同事看作潛在的競爭者。由於在使積極分子隊伍盡可能有限方面具有既得利益，他們常常不太情願敞開大門去接納任何人。[54] 這一社會排斥策略就使積極分子和落後分子之間的矛盾長期存在下去。

被認為落後的工人會受到同事的孤立。人們通常盡量與落後的同事保持一段距離，這是因為如果他們跟落後的朋友關係太密切，那麼他們也會被看作落後分子。[55] 然而，孤立會導致不良後果：它促使落後分子為獲得道義上和個人的援助而相互聯合，並因此而加深了落後分子與領導和積極分子之間的隔閡。從某種意義上講，落後工人擁有了一種重要的政治資本。把他們劃為落後分子而非反革命或壞分子，這就說明他們出身良好，並且沒有犯政治錯誤。換句話說，「落後分子」是他們可能獲得的最差政治標籤。一旦劃入這一類，他們就不會再失去什麼了。與處於中間狀態的人們不同，落後工人不必再小心謹慎，以避免被劃為落後分子。與那些由於政治問題而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也不同，落後工人不必害怕得罪上級和積極的同事。雖然中國企業領導者掌握分配報酬和實施懲處的大權，但他們缺少開除工人的權力。因此，落後工人常常成為他們單位當權者最大膽的批評者和最強而有力的挑戰者。從本質上講，落後工人努力爭取的是與積極分子同等的地位。為此，他們並不強調政治表現的重要性，而是要求增加個人自由。[56]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一個政治化了的社會裏，不關心政治的行為者卻只能在自己政治化並加入強勢政治集團時，他們才能爭取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前的落後分子正是這樣做的。

非對稱的不平等

在上一節裏，我已經指出，人民共和國不是一個均衡社會。在政治權力分配、經濟報酬和社會特權等方面並不是完全平等。這一節要

從兩個方面來量度主要社會集團之間的不平等狀況：當前的生活機會和向上社會流動的機遇。在生活機會方面的不平等往往是政治和社會不穩定的一個潛在根源。社會流動的政治意義也是明顯的。向上的流動 (upward mobility) 可以為非特權階級中最能幹、最有雄心的成員提供一條出路，從而可以緩解一些由不平等造成的緊張關係。相反，向下流動則使人沮喪，縱使他們當前生活的機會仍然比其它人要好。

有些評論家認為，幹部階級和群眾之間的經濟不平等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57] 事實上，經濟不平等並不像許多人所想的那麼嚴重。1949年共產黨革命勝利後，新政權推行了激進的平等主義收入政策。一般來說，中國的收入分配與西方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相比，帶有高度的平等主義色彩。[58]

1956年，中國實行了蘇聯式的工資制度，把行政管理人員分成三十個薪水等級，最高和最低等級之間的官方工資差距是28：1。[59] 但是，毛澤東作為一位利他主義的戰士，並不喜歡這個制度，並在隨後的十年裏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縮小收入差距。[60] 到1966年為止，收入差距已經降到17.5：1 (參見表2.2) 。1964年，當有人建議把政府官員的最高薪水降到每月200元時，[61] 連毛澤東也感到沒有必要。[62]

表2.2　武漢幹部在1960–1976年間的月工資等級(元)

等級	5	6	7	8	9	10	11	12	13
工資	**324.8**	**308.3**	**275.0**	**250.9**	**230.2**	**199.0**	**183.6**	**161.9**	**145.5**
等級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工資	**129.7**	**116.3**	**103.5**	**92.6**	**83.0**	**74.0**	**66.5**	**59.0**	**53.0**
等級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工資	**47.0**	**41.0**	**35.5**	**31.0**	**28.5**	**26.0**	**24.0**	**22.0**	

資料來源：湖北省勞動局：《工資報表選編》(武漢，1973年)。

省級官員裏極少有人達到5級以上。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為行政6級，工資為每月308.3元。[63] 武漢市委第一書記宋侃夫是一位行政7級幹部，每月薪水為275元。[64] 在武漢這個擁有超過250萬人口的城市裏，7級以上的幹部不超過10位，10級以上的幹部不超過100位。所謂高級幹部(即行政13級及以上)總數接近1,000位。多數市一級各局主要領導在行政13級至10級之間，每月工資在140–200元之間。[65] 除了少數例外，多數工廠、學校、醫院、研究所和政府機關的黨委書記和行政領導人都是低級或中級幹部(行政13級以下)。他們的每月工資在50–130元之間，高於他們所在單位的平均工資，但通常並不是最高工資。[66] 整個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大體上是平等的，更不可能有明顯的財富積累。

每戶人均收入的分配要比個人收入更加平等。1965年，武漢每人的平均月收入為18.86元(參見表2.3)。王任重和宋侃夫家庭每人收入分別為72.47元和60.07元，或者是市每人平均月收入的3.84倍和3.19倍。[67] 在武漢黨的高級幹部的家庭每人收入中，也許沒有誰超過王和宋兩家的每人收入。這個事實説明，在社會主義中國享受巨額收入和財富的可能受到了限制。[68]

表2.3　在1956–1965年間武漢家庭月收入(元)

年 分	1956	1958	1959	1962	1963	1964	1965
平均家庭收入	53.3	56.7	49.0	61.9	64.9	65.1	63.0
人均收入	15.6	16.0	18.1	18.9	19.2	19.3	18.9

資料來源：武漢市統計局：《武漢：1949–1984》，頁94。

除了貨幣收入以外，高級幹部還有一些非貨幣補貼和特權，如寬大的住宅、配備的汽車和特殊醫療服務。中低級幹部通常沒有這些待遇。他們的住宅面積也許比分配給其下屬的住宅略微大一點。但這與他們是幹部的地位關係並不大，更主要的是由於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他們分得住所時，人均居住面積比較寬鬆所致。[69]

如果說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社會還有富人的話，那也只能在老精

英中找到。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對資本家作了這樣的保證，即不降低他們的生活標準。不管他們的投資是否盈利，都按其股份向他們支付至少5%的紅利(參見表2.4)。到1966年9月取消支付紅利為止，從前的資本家總共得到了12億元。[70]

除了紅利以外，從前資本家的工資水平也沒變，不管1956年以前他們的工資有多高。越是大的資本家，他們的工資通常也越高。對73位資本超過50萬元的資本家的調查表明，他們的平均工資大約是500元，比毛主席的工資還高。[71] 在很多工廠裏，從前所有者的薪水比黨委書記要高。[72] 1964年進行了一項包括武漢在內的五個城市調查發現，在這些城市裏，24,000位從前的資本家每月工資超過100元，其中1,240人每月超過300元。有一位工廠經理每月收入高達1,676元。[73]

表2.4　1956年武漢股東的紅利

行業	股東數量	資本(元)	紅利(元)
工業	5,915	33,084,483	1,761,042
商業	4,906	6,511,854	313,612
餐飲業	446	205,900	10,294
建築業	107	52,542	2,628
交通運輸	474	892,964	44,618
服務業	960	1,013,573	50,760
農業	52	85,317	4,266
民生公司	72	420,000	33,600
建業公司	456	1,553,100	66,860
合計	**13,388**	**43,819,733**	**2,287,680**

資料來源：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地方黨史》，頁271。

有些前資本家還有另一項額外收入來源：房屋租金。1956年，武漢的私人業主出租的建築面積總計為364萬平方米。[74] 甚至在私人房屋出租業經歷了1956年和1958年的兩次改革之後，儘管數量比以前有所減少，但他們仍然獲得了巨額的租金收入。[75] 因此，相對高的薪水、

紅利和租金收入，就使前資本家享受了比大多數工人和革命幹部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一位前資本家的女兒聲稱：「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家非常富裕。我們從來用不著瞭解錢的真正價值。」[76]

知識分子經常比他們單位黨的領導收入高。[77] 在工廠、大學、中學、醫院和研究所裏，拿最高薪水的往往是工程師、教授、教師和醫生，而不是黨政幹部，這幾乎是一個規律。例如，武漢的大學黨委書記極少達到行政7級 (275元) 以上，而一級教授的工資為327元。專科學校的黨委書記極少達到12級 (161.9元) 以上，而專科的一級教師拿207元工資。中學黨委書記極少達到15級 (116.3元) 以上，而一級教師拿141.5元工資。醫院黨委書記極少達到10級 (199元) 以上，而一級外科醫生拿316元工資。[78]

文化精英能拿到更高的薪水。[79] 陳伯華是武漢著名的漢劇女演員，她在1963年以前的每月工資為360元，1963年以後為570元，兩倍於宋侃夫的工資。[80] 在三年困難時期 (1959–1961)，中央指示各級政府準備一個本地區著名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的名單。所有被列進這個名單的人，都有資格領到特別配給的食物、肉、魚和食油。而黨的幹部和普通公民得不到這些東西。在武漢，有幾千名知識分子 (包括醫生、教師、藝術家和科學家) 上了這個名單。[81] 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6年曾指出，「所謂的資產階級權威一般都比我們 (黨的高層領導人) 過得更好」。[82] 他說得並不誇張。

當然，普通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的收入差別相當小。但是，總體上看，知識分子的工資比工人高得多。

中國工人分為8級 (參見表2.5)。一個8級工的收入相當於一個16級幹部的工資。然而，在1960年代初，約50%的工人低於4級，約35%的工人低於6級。[83] 所以，大多數工人每月工資在40–60元之間。因此，工人之間的工資差別很小。即使從收入的整體情況來看，工資差別也不大。在武漢最大企業之一的中原機械廠，黨委書記是一位11級幹部，每月工資183.6元，是該廠最低工資的5.6倍。[84] 就生活方式而言，差別就更小了。此廠員工都同住在一個宿舍區，廠黨委書記在這裏有一套稍微大一點的單元房。但由於他一家共8口人，經常發現錢不夠花，所以也像住宅區的其它家庭一樣，他家也得省吃儉用。該廠工人

都知道他們的黨委書記過得很節儉。[85] 這種情況絕非少見。文化大革命前，大多數黨政幹部和行政管理幹部都生活得很樸素。他們無法像一些老精英那樣去過奢華的生活。因此，經濟差別並非1966年前中國社會的一個大問題。

表2.5　武漢工人的月工資等級(元)

	工人的等級								
工廠類別	1	2	3	4	5	6	7	8	比例
1	32.5	38.4	45.3	53.5	63.2	74.7	88.2	104.0	3.2
2	33.0	38.9	45.8	54.0	63.6	74.9	88.2	103.9	3.15
3	32.6	38.7	46.0	54.6	64.8	77.0	91.4	*	2.8
4	32.5	38.3	45.1	53.1	62.6	73.7	86.9	102.4	2.8
5	30.5	38.6	41.8	48.9	57.2	66.9	78.3	91.5	3.15

資料來源：湖北省勞動局：《工資報表選編》(武漢，1973年)。

* 資料不詳

從以上觀察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首先，並不存在有產階級。雖然有些人的收入比平均水平高得多，但他們的收入是固定的，而且不能再擴大。第二，經濟報酬的總體差別很小。第三，僅僅在政治意義上看，黨政幹部才可以被稱為中國社會最有特權的社會集團。從物質生活方面看，老精英的生活遠遠超過新精英。

在現代社會，教育程度是一個人的未來職業地位的主要決定因素。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不例外。[86] 所以，不同層次教育機構的學生組成就可以用作觀察各個社會集團向上流動機會的一個良好指標。

在1949年，受過教育的人非常短缺：文盲比例在90%左右。[87] 在城市人口中，這個比例相對低一點，但多數學生來自非無產階級家庭。1950年，在武漢只有44.2%小學新生和6.8%的中學新生出身於工人和農民家庭。[88]

新政權決心改變各級教育機構的社會構成，以利於工人和農民。這個目標在較低層次還是比較容易達到的。到1956年為止，工農出身

的學生比例已經在小學達到82%，在初中達到66%，在中專達到了64%。[89] 但在同一年，只有34%的大學生具有「紅色」階級成分，而這些學生又集中在本地師範類和農業類院校之中。在名牌大學裏，他們只佔學生總數的10–20%。[90] 國家可以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化改造，但無法社會化由老精英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富裕家庭仍然能夠承受讓他們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負擔(直接成本有學雜費、日常花銷和衣物等，間接成本則是學生如不上大學而去工作所得到的收入)。而且那些擁有稀缺技能和專業訓練的人很有才能，他們的家庭環境也使其它技能和訓練所帶來的有利狀況得以持續下去。新政權於是就面臨著一個困境：那些受教育程度高、最有才能的人往往出身於非無產階級家庭，而那些出身於無產階級家庭的人卻一般而言專業水平低、能力差。哪一個集團應當允許接受高等教育？應當採用什麼招生原則呢？如果把學習成績好壞作為唯一的標準，那麼高等院校將繼續主要成為老精英的專有領地。相反，如果過於推行補償政策 (affirmative action)，那麼教育質量又會降低。

然而，1956年前這個困境並未成為一個尖銳問題，因為在這七年裏大學招生人數比高中畢業生還要多。但是，1957年情況發生了變化，高中畢業生超過了大學計劃招生人數。這意味著大學新生必須經過選拔。在同一年，面對老精英的挑戰，政府認識到大學招生只考慮學習成績好壞是很危險的。[91] 由於這個緣故，出身於無產階級和農民家庭的學生數量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大幅增加。[92]

儘管努力執行一些補償政策，但出身於無產階級家庭的學生仍然在高中和大學裏佔少數。表2.6說明了1962年武漢的大學考生的政治背景。學校越好，家庭出身好的學生越少。重點學校裏的黨員和團員學生要比普通學校裏更少。總的來看，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大學考生出身無產階級家庭。儘管對出身好的考生實行了優先錄取政策，但出身於非無產階級家庭的大學新生仍然佔很高的比重。[93] 表2.7則說明，在1962–1963年間的大學裏，出身好的學生在任何一所院校中都沒有超過50%。

1960–1962年間的經濟困難導致了中國一半的大專院校關門。當高校入學競爭更加激烈的時候，政府認識到，要幫助工農子女贏得接

受高等教育的公正份額，光有補償政策是不夠的。在1962年秋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其子女的仁慈政策。[94] 此後，除了以前實行的補償政策 (在大學入學考試時為階級出身好的人額外加分) 之外，還實行了新的「抽肥」政策 (negative affirmative action) 政策 (嚴格限制階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上大學機會)。

表2.6　1962年武漢大學考生的政治背景(百分比)

學 校	好出身	差出身	其 它	黨員和團員
普通中學	35.6	20.8	43.6	32.0
市重點中學	28.1	22.0	49.9	26.6
省重點中學	23.4	27.2	49.4	25.6
平均	30.4	22.9	46.7	28.5

資源來源：武漢教育局檔案。

表2.7　1962–1963年武漢4所高校和其它地區3所高校學生的家庭出身(百分比)

學 校	「好」	「差」	「中等」
武漢師範學院 (1)	44.57	23.61	31.82
武漢醫學院 (1)	34.06	27.29	38.65
武漢衛生學校 (1)	46.99	12.05	40.96
武漢工學院 (1)	43.18	24.24	32.58
中山大學 (2)	40.00	30.00	30.00
北京大學地理系 (3)	40.00	23.00	37.00
中山醫學院 (4)	23.4	*	*

資料來源：(1) 武漢教育局檔案。

(2) Elsie Collier, *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p. 130.

(3)《青年報》，1966年8月16日。

(4)《紅衛兵出版物》，冊11，頁3384。

* 資料不詳。

1962年末，中共中央修改了高校招生的政治標準。長期以來，高等院校的學習領域被劃為普通、機密和絕密三類，每一領域在錄取新生時都規定了具體的政治標準。[95] 新文件禁止資本家和右派的子女進入絕密領域；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的子女不能進入機密領域；那些父母因為反革命罪而被判處死刑、監禁或公開監視者的學生不能進入任何領域學習。[96] 兩年後，黨又修改了這些標準，使之更加嚴厲，在高校招生時甚至對祖父母或兄弟姐妹被判過刑的學生也嚴加限制。海外關係也被認為非常可疑。[97] 在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之前，學校當局和公安機關對考生秘密進行審查和分類。[98] 如果考生被劃入「不宜錄取」的類型，那麼不管他或她的考試成績有多好，也不會被錄取。學生雖然知道對他們家庭出身的考查是招生工作的一項必要程序，但他們並不清楚這裏存在一個含有絕對不能錄取的人的名單。1964年，這種名單在武漢的一所高中不小心被泄漏出去，結果在學生中引起極大動蕩。這一事件發生後，上級指示所有學校都要採取更加有力的預防措施，避免再讓學生看到這種名單。[99]

在中學裏也實行了類似政策。過去，高中和專科學校招生時一直不需要進行家庭出身審查。但在1964年，這項審查正式實施。[100] 同時，也採取了增加良好出身學生入學機會的措施。家庭出身好且通過入學考試的學生具有優先被錄取的特權。甚至一些未通過入學考試的學生也被錄取。此外，一小部分出身好 (特別是出身於工人、貧下中農和革命烈士家庭) 的學生被免試錄取。[101] 這些補償政策措施增加了中學和大學裏來自無產階級家庭學生的比重。表2.8顯示了1962–1965年間武漢中等學校學生成分的變化。

在高等教育層次，1964、1965年武漢高校錄取的學生中70%以上具有「紅色」階級成分，整個中國也是如此。[102]

雖然作出了這些努力，高中和大學裏出身好的學生的分量仍然不能反映各階級在社會中所佔的比重。從小學到大學，學校層級越高，成分好的學生比重越低。正如表2.8和表2.9所示，1965年高中和大學裏仍只有不到50%的學生出身無產階級家庭；而在武漢小學生中，這個比重已達到85.73%。[103]

表2.8　1962–1965年武漢中等學校學生的成分（百分比）

	初中			高中		
年份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1962	62.71	33.08	4.21	40.19	49.37	*
1964	63.05	33.13	3.82	43.43	46.97	9.60
1965	61.82	35.60	2.58	46.67	47.59	5.74

資料來源：武漢教育局檔案。

* 資料不詳

表2.9　1951–1965年出身良好的中國大學生的百分比

年份	1951 (1)	1952 (2)	1953 (3)	1954 (4)	1955 (5)
百分比	19.0	20.5	27.4	36.7	29.0
年份	1956 (6)	1958 (6)	1962 (6)	1965 (6)	
百分比	34.1	36.4	42.3	49.7	

資料來源：(1)《新華月刊》，1958年第1期，頁139。
(2)《人民教育》，1957年第10期，頁6。
(3)《教育年鑒》，頁338。
(4)《新華月刊》，1955年第9期，頁7。
(5)《新華月刊》，1957年第1期，頁228。
(6) K. S. Karol, *China: The Other Communism* (New York: Hill & Wang, 1968), p. 333.

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不斷有人建議，要把特殊寄宿學校辦成專門培養中國新精英的子弟學校。[104] 事實上，幹部子弟特殊學校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普遍。北京確實有一些這樣的學校，而省裏的多數特殊學校在1957年就撤銷了。[105] 此外，多數特殊學校只在小學層次上開辦，是用來吸收革命烈士的孤兒、外交官和高級幹部（特別是軍官）的小孩，因為這些孩子的父母沒有時間照顧他們。1957年前，武漢有三所特殊學校：兩所於1957年關閉，保留下的一所是八一小學，只接受

軍官子女。[106] 沒有為幹部子女開辦的特殊中學。雖然在1962–1965年間中學生裏幹部子弟的比重有所增加，但他們還是遠不能與中等出身學生的數量相提並論的(參見表2.10)。這並不令人吃驚。多數幹部出身於農民或工人家庭，本人很少受過正規教育，所以對他們子女的教育提供不了什麼幫助。況且由於新精英還相對年青，多數出生於1930年代和1940年代，所以在1960年代，他們的孩子還不到上高中的年紀。[107]

表2.10　1962–1965年武漢中等學校裏幹部子女的百分比

年份	初中	高中
1962	2.66	3.37
1964	3.43	5.25
1965	5.01	*

資料來源：武漢市教育局檔案。
* 資料不詳。

總之，中國共產黨努力使國家教育制度無產階級化，並試圖改變社會地位分配模式。但這些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儘管實行了階級偏袒政策，但顛倒舊的階級秩序的目標在中國並未達到。如上所示，非無產階級集團仍能獲得更大的機會，這種情況與盛行的平等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是不協調的。但是，1962年以後堅決執行的補償與「抽肥」政策措施，則對出身不好甚至中等出身的學生都產生了威脅。到1960年代中期，中國已普遍接受了平等口號。問題在於，老精英及其子女把這一口號理解為機會的平等，而出身低下的人則把它理解為結果的平等。所以每人都覺得自己在某一方面受到了歧視。[108] 緊張關係由此而得以發展。推行階級路線使學生們日益成為具有自我意識的集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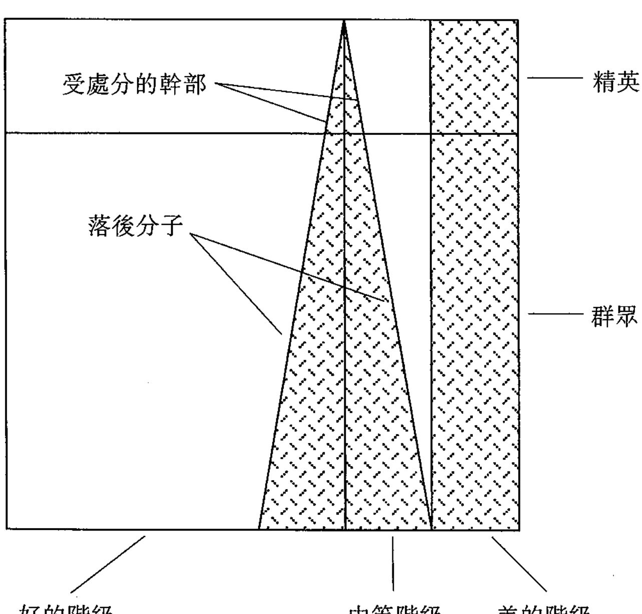
嚴重的不滿

就文革研究文革是不可能弄清中國人為什麼會以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種方式行動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通向這些事件

的那些年裏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結構中尋找到。本章前四節說明，文化大革命前中國城市中存在著三條主要分歧線：幹部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結構性分歧、舊精英與出身低下的新精英之間的殘餘性分歧、積極分子與落後分子之間的行為性分歧。從結構上講，在這三種社會分歧中，第一種是最基本的分歧。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後兩者僅僅是暫時的現象，隨著現行制度的鞏固，它們的重要性有朝一日終將消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後兩方面的分歧卻掩蓋了精英與群眾之間的矛盾，使中國社會裏的權力關係複雜化(參見圖2.1)

毛澤東在1965年宣佈，「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109] 這是一個大膽而錯誤的觀點。由於上面提到干擾性分歧，精英與群眾的矛盾還沒有成為中國社會最富政治意義的分歧。相反，在日常政治中，政治精英和積極分子為一方，專業精英和落後分子為一方，兩者之間的衝突更加明顯。

圖2.1 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的社會分歧



黨政幹部與積極分子之間的聯盟

革命幹部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統治集團。儘管他們掌握的巨大權力是不可否認的，但他們的薪水同前資本家、從事創作工作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相比，常常顯得很一般。這是老資格革命幹部廣泛不滿的一個持久根源。[110]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國，產業工人受人尊重，社會地位較高。黨政幹部在利用老精英的知識和才能的同時，還竭力使他們處於虛弱被動地位。為此，他們需要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而頌揚工人階級，讓工人階級的稱號顯得很光榮，正是黨政幹部為贏得與他們的聯盟而運用的一個重要策略。然而，賦予工人的高尚社會地位與他們的經濟狀況很不相稱。所以，他們同黨政幹部一樣，也很厭惡舊式精英相對高的生活水平。[111]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降低老精英的高工資，已經是人們的廣泛要求。[112]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老精英成為運動首當其衝的對象也就不足為怪了。另一方面，同1949年前相比，工人的福利得到了顯著的提高。所以，他們一般都歡迎新政權帶來的變革，並且比較相信，在不背離這個制度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他們的地位還可以得到進一步提高。工人積極分子尤其願意與黨政幹部合作以維持現狀，因為他們感到後者權力的擴大不會給他們的利益造成直接威脅。積極分子所擁有的進步機會，鼓勵他們從道義上忠於現存社會秩序。正如我們將在後面章節中看到的那樣，這就是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數自發的工人運動都由死硬的保守派發起，他們聯合起來對抗造反派。

專業幹部與落後分子之間的聯盟

專業幹部憑藉其人力資本，在管理商品和價值生產與再生產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於這個緣故，新政權允許老精英取得比社會大眾相對高的收入。但是，得到高工資的專業幹部卻並不願意從屬於在社會和文化方面劣於自己的政治領導。在「百花齊放運動」中，他們要求重新分配社會權力。1957年後，老精英對其政治從屬地位的憤怒

並沒有消失。相反，隨著政治壓力的加大，這一潛在的憤怒(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會找到發泄的機會)變得更加強烈。

落後工人跟其積極的同事一樣不喜歡舊精英，但他們更關注黨政幹部和積極分子加在他們身上的各種歧視。由於落後分子和老精英都在黨政幹部和積極分子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中屢屢成為被打擊的對象，他們就在聯合起來挑戰現政權方面具有共同利益。這種聯盟在「百花齊放運動」期間形成過。當時，落後分子和老精英肩並肩地向黨政幹部和積極分子展開鬥爭。但他們的對手很快就粉碎了這一進攻。[113]

這兩個聯盟過去經常互相對抗，爭奪權力、地位和其它稀缺資源。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它們之間的對抗多以不公開的形式進行，各方不僅要竭力爭取所要求的價值，而且要消除來自對手的威脅。

從某些方面看，這兩個聯盟間的衝突反映了幹部階級和工人階級間的衝突。工人積極分子所恨的是老精英的經濟和文化特權，而落後工人所厭惡的是黨政幹部的政治特權。雖然對象不同，但他們的爭鬥揭示了這兩個階級互相對立的利益衝突。如同任何聯盟一樣，我們討論的這兩個聯盟也是不同集團的暫時聯合，只有當策略上需要而形勢又允許時才能形成。1966年以前，這兩個聯盟之間的對抗通常並不引人注目。只有當文化大革命爆發之時，這種默默的聯合才公開地出現在社會上。

在上述分析中，我有意地簡化了1966年前中國社會存在的權力關係。例如，在討論社會分歧的三條線時，並不試圖觸及現實生活的複雜性。現實生活中還存在著其它分歧，如國營企業與集體企業職工之間的分歧、國營企業中臨時工與正式工之間的分歧、同一城市居住在不同區域的人之間的分歧以及代際分歧等。而且這三種分歧並非總像上文所講的那麼截然分明。例如，並非每個專業幹部都出身於過去的特權家庭。有些老精英成員可能已經淪落為普通勞動者，從而失去了專業工作。與此相似的是，並非每位黨政幹部都出身低下。況且如下文將要討論的那樣，有些黨政幹部可能像舊精英和落後分子一樣對現存秩序有許多怨恨。還需要指出的是，積極分子與落後分子之間的分歧不僅存在於工廠中，而且存在於學校、醫院、研究機構、文化劇團

以及政府機關裏。然而，如同下面章節將要展示的那樣，三種分歧間的區別提供了分析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派別間看來錯綜複雜鬥爭的清晰框架。

最後，讓我們大體估計一下，武漢人口中有多大比例進入圖2.1所標出的灰色區域。雖然毛澤東一貫堅持，階級敵人只佔人口的5%以內，但實際的比例要大得多。作為一個「和平解放」城市，武漢比其它地方有更多存在政治問題的人。據估計，1949年5月共產黨軍隊接管武漢後，有22,000名國民黨正規軍官兵、32,000名國民黨雜牌軍官兵、6,200名國民黨員警和大約10,000名國民黨政府各部門人員留在這個城市裏。有十幾個大的「反動」道會門組織。例如，其中的「一貫道」在全市分佈有17個大的分支和200多個小的組織，對成千上萬當地居民的社會經濟生活施加了巨大的影響。在有些工廠裏，過半數的工人曾經是國民黨或「反動」道會門的成員。在工業企業的民主改革(1951–1954年)過程中，3%的工人(約8,000至10,000人)被正式劃為或作為「反動封建殘餘勢力」分子鬥爭。[114] 此外，1949年資本家有40,000名。[115] 1949年武漢有100萬人口。上面的數字雖然不完全，但也表明這個城市居民中有遠超過5%的人是所謂的敵對階級分子。

在以後的政治運動中，更多的人成為鬥爭對象。在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1953年)中，有幾千人被判刑。[116] 在忠誠老實運動(1951年)中發現2,464名幹部有個人政治歷史問題。[117] 肅反運動(1955–1956年)把6,652名幹部定為「反革命」和「壞分子」。[118] 反右運動正式把6,261人劃為「右派」，把945名工人、職員和警察定為「壞分子」。同時，把1,928人秘密地劃為「中右」。[119] 在1959–1960年的反右傾運動中，有1,784名幹部(包括這個城市11.9%的高級幹部)被降級或開除出黨，還有1,139名幹部受到批評。[120] 武漢市委於1963年估計，這個城市裏10–15%的黨員有問題。所以，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1966年)期間，幾萬名黨的幹部被清洗，6.35%的黨員被開除黨籍。[121] 此外，在1949–1965年的17年裏，被判處監禁的「反革命」有8,437人。[122] 在上面引證的數字中可能有些重合，因為有些人是多次政治運動的對象。但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文化大革命前因為某種原因受到懲處的人，遠遠超過武漢人口的5%。況且，如果發現一個人有「問題」，那麼不僅他或

她的直系親屬而且其遠親也會受到牽連。如果把這些人包括進去，那麼受懲處者的總數會超過這個城市的20%。

儘管抱有怨恨，但這些人並不想挑戰現政權。1966年春，中國的政治制度似乎像以往一樣穩固。沒人會預期出現大動亂。以往的事件、權力關係的性質、心理狀態和道德條件可能已建構了人們的偏好，但他們的行為選擇面臨政治約束，不允許人們按照他們自己的偏好行動。如果這些約束沒有發生變化，那麼中國社會潛在的敵對關係也許會持續幾十年，而不會以暴力的方式出現。要打破政治平衡，總是需要有一種推動力。就在這個關頭，毛澤東決定攻擊現存的權力體系，儘管這是他一手締造的政權。在他看來，社會主義中國正面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巨大危險。為了肅清中國的修正主義，他發動了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章

舊遊戲與新犧牲者，1966年6–7月

文化大革命並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它只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一場運動。1966年6月1日晚，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全文播發了由聶元梓和其它六位北大教師與研究生寫的一張大字報。[1] 這張大字報批評「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竭力「保護資產階級權威」。毛澤東希望通過播發這張大字報向千百萬中國人傳達一個重要信息：攻擊當地黨的領導並不一定是不合法的。[2] 幾天後，重組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長彭真被撤職的決定，加強了這一信號。從此，6月1日事件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的開端。

然而，毛澤東的信息並沒有傳達到大多數中國人。在中國的政治體制裏，等級制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壟斷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傳播。各級官僚都像科特·萊文 (Kurt Lewin) 所說的「看門人」那樣行事，代表最高領袖毛澤東管理信息的傳播。[3] 他們向群眾提供關於毛澤東的信息的權威解釋，將其轉化為具體的行為指導方針。正是由於存在著這樣一個強而有力的機制，毛澤東才能夠發動統一的行動。但是，只有當毛澤東的指示基本適應操作者的利益時，這種機制才會有力而高效地發揮作用，否則的話，毛澤東的信息就可能受到歪曲。出現這種情況，並不是因為官僚們敢於同毛澤東的指示唱反調，而是因為他們傾向於結合自身利益來解釋毛澤東的話。1966年6–7月所發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從北京的中央到基層的各級領導人都把新的運動看作另一場反右運動。[4] 按照這種理解，任何未經批准而對黨支部或黨

的高級官員的攻擊，都被看作是對黨本身的進攻，而這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只允許對基層個別黨的官員進行善意的批評。

對官僚們來說，毛澤東還從來沒有否定整個國家體制。所以，遊戲規則沒有發生多少變化，人們仍然會扮演他們以前扮演過的那種角色。因此，權力關係基本完好，政治機會結構仍然未變，潛在反叛者的風險如同以前一樣大。為了阻止可能打破權力平衡的行為，在維持現狀方面具有既得利益的地方領導和社會力量，嚴厲懲處那些在行動上沒有完全遵循舊的遊戲規則的人，對他們的大膽舉動予以重拳打擊。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裏，人們即使對政權不滿也不敢攻擊領導。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兩月裏，儘管中國社會的某些部門(特別是學校)搞得轟轟烈烈，但毛澤東發現，由於政治仍然基本上按舊的自上而下的方式開展，所以整體形勢像一潭死水。毛澤東後來斷言，在這「白色恐怖的五十多天」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全國盛行。

新的反右運動

武漢的文化大革命始於1966年4月。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參加了毛澤東召集的3月杭州會議。他回到武漢就宣佈，文化大革命要打擊的主要社會集團，是文化名人或資產階級權威。[5] 在湖北省委4月25日舉行的會議上，王說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有必要，是因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了文教領域。他預測說，文化大革命會挖出百分之五至十的知識分子新右派。[6]

攻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種對手，正好適應了地方權力精英的利益。他們得知知識分子將是新運動的打擊目標時，立即以巨大的熱情投入戰鬥。

普通人民群眾和低級幹部最初對文化大革命並不太關注。「文化大革命」這個術語並不讓人吃驚，因為這個詞早在1958年以後就開始流行。[7] 他們所做的僅僅是顯示應有的革命熱情。從表面上看，群眾積極參加運動，寫文章和大字報批判「三家村」和其它「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但這些遙遠的目標其實並不能喚起他們的真正興趣。在多數人心

目中，當前運動的目標是那些攻擊政權的人，而不是政權本身。換句話說，他們也把這個運動看作另一場反右運動。[8]

然而少數中學生和大學生卻抓住了聶元梓大字報中透露出的信息，儘管只看到一些表面的東西。他們無意於挑戰現存制度，卻決定模仿聶元梓一幫人那樣行動。後者攻擊了北大黨委。這些學生才十幾歲，政治上天真幼稚，因而行動的起點很低。由於沒有經歷過1957–1958年的反右運動，他們不知道怎樣來評估採取政治行動所要承擔的潛在風險。他們還預計，批判個別黨的幹部和黨支部沒有多大風險，因為聶的行動似乎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他們樂於行動的第三個原因是，他們多數人家庭出身良好，這又會減少風險。[9]

聶的大字報剛一公佈，武漢的一些學生就貼大字報批評他們所在學校的黨委，說他們缺少支持批判「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運動的熱情。6月2日，大字報首先在武漢測繪學院出現。[10]

當地領導人對這種挑戰感到震驚。自1949年以來，黨的幹部經歷了許多政治運動。他們在各種運動中幾乎無一例外地發揮了領導作用。只是在1957年，黨政幹部才在短時間裏受到別人的攻擊，但後來表明只是虛驚一場。那些膽敢冒犯黨的幹部的人付出了沉重代價。大約十年後，他們現在第一次發現自己又面臨來自下面的公開挑戰。[11]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要把反對派消滅在萌芽狀態。

6月3日，湖北省委指示武漢各學院和大學黨組織去「統一學生的思想」。在接下來的幾天裏，他們在各個校園召開大會。武漢測繪學院黨委書記在大會上對學生們說：「有的同學惶惑了。當前北京市委、北大黨委出了問題。共產黨是否還值得相信？毛主席是否還值得相信？彼此之間是否還值得相信？」[12]

但是，大學的鬧事者還沒有壓下去，一些中學生卻又加入。6月5日，第十四中學的一個高中生貼出一張大字報，題目是《質問黨支部》。這所學校的黨支部曾要求畢業班學生集中精力準備高考，而允許其餘學生減少課程，參加運動。大字報認為這個決定是錯誤的，因為「現在是我們投身於階級鬥爭偉大戰鬥的時刻，而不是進行平靜的書呆子學習的時間」。這是武漢的第一個由高中生公開質問黨支部決定正確性的例子，它立即引起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注意。[13]

6月9日，第二中學校園出現了一張大字報。它以《炮轟(學校)黨支部》為題，使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大為震驚。他們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處理這一事件的對策。在24小時之內，他們派600人組成的第一批工作組，趕赴指定的一些高中。[14]

6月11日發生了兩個似乎更危險的事件。在一所中學裏，一群學生貼出了一張點名攻擊武漢市委第一書記宋侃夫的大字報；在另一所中學裏，發現一些學生成立了叫做革命行動小組的秘密組織。當地領導人獲悉這兩個事件後，對中學能夠發生這樣的「反革命活動」十分震驚。同一天，宋侃夫憤怒地趕到張貼攻擊他的大字報的那個學校，部署對「牛鬼蛇神」的反攻。湖北省委派遣了160人的特大工作組，來到發現「反革命集團」的學校。[15]

當然，並不是所有學校都發生了這種事件，表達對當地黨的領導人的懷疑的學生也很少。甚至未經學校黨支部的發動，這些學生就迅速受到了來自各方的批評。

到6月中旬為止，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已經完成了派遣工作組進駐教育機構的工作。實際上每所學校都派去了工作組，參加工作組的人員超過了一萬名。工作組被當成「毛主席和黨中央派來的代表」受到了熱烈歡迎。但不幸的是，「毛主席的代表」組成得如此倉促，使他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16]

工作組在校園裏駐守，才使地方官員感到放心了一些。6月最初幾天的混亂形勢，又讓他們回想起1957年春一小撮右派公開進攻中國共產黨的情形。一些人想抓住文化大革命的機會再次鬧事。他們一定是打著革命幌子的右派。[17] 所以，在他們看來，當前運動的目的就是「揪出」隱蔽的右派。[18]

由於把文化大革命看作另一場反右運動，所以本地領導人感到，他們在過去政治的運動，尤其是1957年反右運動中積累的經驗，仍然適用於指導當前的運動。1957年形成的判斷右派和極右派的標準再次被拿出來當作參考，[19] 甚至還定出了右派指針數字。王任重在湖北省委的一次會議上估計說：「1957年挖出了55萬右派，這個運動會發現更多的右派。(每單位右派)的百分比可能不低於百分之三，也可能會達到百分之五。」他還更具體地宣佈，大約百分之一的大學生和高中畢

業生將被定為右派。[20] 隨著另一場反右運動的準備已經就緒，地方領導人就像毛澤東1957年那樣，急於同「牛鬼蛇神」玩這樣一場遊戲：先讓他們放心地跳出來，然後再將他們一網打盡。這些領導人所需要的只是耐心，要等待合適的時機反攻。

6月23日，湖北省委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長許道琦在一次重要會議上告誡與會者不要急躁：「有些學校反擊了，不要反擊過早，反擊過早，打壞人就會跑掉……先讓他們放。」[21] 一周後，宋侃夫在武漢市委常委會擴大會議上闡述了下面的觀點：

> 要注意放透，不要怕燒到自己。有些單位的反擊，不是領導組織的，而是左派自動反擊的。這樣一反擊，有問題的一露頭就縮回去了。我們要等人家放得差不多了，再反擊也不遲。……總而言之，不要怕亂，亂一點不可避免。但心中要有數，要有準備。只要有了真正革命的左派隊伍，就不會出大亂子。[22]

久已盼望的反攻時刻終於在7月到來。不久前升任權力巨大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的王任重，於7月3日給湖北省委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斷言，通過上一月各種觀點的自由鳴放，差不多一切「牛鬼蛇神」都自我暴露了。他用毛澤東的話，稱這種策略叫「引蛇出洞然後痛擊之」。他指示說，再過10到20天就應發動對這些「牛鬼蛇神」的反攻。至於如何選擇反攻目標，他提出了兩條原則：「擒賊先擒王」和「槍打出頭鳥」。王任重作為一位謹慎的政治家，還將此信呈送給6月28日就已到達武漢的毛澤東，向他請示。毛澤東沒有表示任何反對。[23] 所以，王認為他的信已經得到了毛的首肯。

王任重的反攻大體上只打擊學生右派。與政治上不成熟的學生不同，成年的中國人害怕1957–1958年反右運動之計再次施展，參加運動就會被抓。政治運動使他們變得更聰明、更謹慎、更狡猾了，所以很難把他們引出洞來。[24]

總共有來自13所學院的254名武漢大學生被定為「假左派、真右派」，[25] 比起北京的一萬名學生右派來，這個數字似乎微不足道。在武漢，公開對抗黨委或工作組的事件的確很少出現。在整個6月和7月，

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基本上能夠把形勢置於他們的有力控制之下。把學生打成右派，是作為阻嚇其它潛在挑戰者的一個警告信號。

打亂仗

但是，除了254名學生以外，文化大革命前兩個月期間還有其它受打擊者。他們遭到打擊並非因為向當地領導進行了挑戰，而是當地領導在政治運動中為了裝裝門面而需要打擊對象。最方便的目標就是那些有個人歷史問題的人。王任重對這一點說得十分清楚：「上下左右一起燒，不要限制群眾，什麼都可以揭，先來一個大揭露。大小人物都可以揭發，『右派』、『小流氓』、『反革命』、『小野心家』都應該叫群眾批判鬥爭。」[26] 當然，他所說的「任何人」，排除了像他自己這樣的人。

中學

王的兒子是位初中生。他是第一個將其父親的指示付諸實踐的人。6月6日，他貼出一張大字報，攻擊他所在中學的一些教師，並暗示其父已經審閱過大字報稿。人們認為王的兒子的行動意義極大，故引起了廣泛關注。武漢市委的喉舌《黨支部生活》甚至刊登了這個年青學生的文章，論如何同「牛鬼蛇神」作鬥爭。[27]

如果說就是王任重兒子的大字報掀起了武漢中學生侮辱老師的浪潮，也許是一種誇張。事實上，教師受凌辱是文化革命早期的全國性現象。劉少奇關於運動在中學裏的主要任務是純潔教師隊伍的話，可能要對這種行為負責。[28]

最引人注目的目標是所謂的資產階級權威。[29] 這是一個極端模糊的概念。在文化革命的政治氣候中，任何顯示出學術成就的人都被視為學術權威，而一切學術權威都被當作資產階級權威。這一稱號可以用於反對一大批學校教師。例如有一位26歲的臨時教師被批為資產階級權威，僅僅是因為他年紀不大，卻被公認為學校裏最能幹的教師之一。[30] 資格老的教師更難於避免被批判成資產階級權威。

不管定義如何寬泛，但「資產階級權威」的標籤並不能用到所有教

師身上。然而，政治標籤從來就沒有缺乏過。在武漢廣泛使用的一個稱號是「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當時武漢約40%的中學教師出身不好。中學黨委書記和校長的比例更高，甚至達到48%。[31] 現在，任何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人都可能被稱為「孝子賢孫」。一位中學教師回憶說：

> 在我所教的學校，第一個被打成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是龍××。龍××家裏有台留聲機，收藏有許多老唱片。他經常邀些年青的同事去他家聽唱片，如「梁山泊與祝英台」之類。文革一開始，有人把此事捅了出來，說他散布黃色音樂。他父親是個資本家，他的所作所為就被解釋成不願與資產階級家庭劃清界限。
>
> 不久，我自己也開始有麻煩。我有次講「把仇恨填滿炮膛」這一課，其中有一句「美帝必敗，越南必勝」，我講得太動情，口誤為「美帝必勝，越南必敗」。下課後，有學生把這事提起，我認為是小題大做，沒理他。現在學生說，我在兩個班的課上把這句話說反了好幾遍。聯繫我的資本家出身，指控我是故意的。還有一次講「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這課，我說到衛生部長在天安門與群眾狂歡。現在學生說，我們黨中央首長只聯歡，不會搞什麼狂歡。憑著兩條就把我定為反革命。
>
> 倒霉的當然不止我們兩人。幾乎所有教員都多多少少受到了衝擊。但出身不好的教員首當其衝。[32]

這所學校裏發生的事，正是當時運動整體狀況在武漢各中學的縮影。[33]

幾個月後，人們對學校黨委和工作組展開批判，說他們為了保護自己而「把鬥爭矛頭向下對準群眾」。但許多人形容這個時期是一個「打亂仗」時期。[34] 在多數情況下，目標並不是由黨組織和工作組選擇的。因為人們感到有巨大的行動壓力，就進行了互相攻擊。如果他們不批判別人，就可能被人家指責為對運動不太積極。雖然行動並不必然會帶來回報，但不行動卻幾乎一定會蒙受風險。在這種緊張氣氛中，理性的人們就會通過挑剔別人言行中的漏洞來顯示自己的革命熱情。黨

組織和工作組並不進行干預，因為只要鬥爭矛頭向下指，他們就什麼也不會損失。

但是，「打亂仗」並不意味著學生盲目選擇目標。的確，幾乎每個學生都企圖在一些教師的言行裏找出毛病。但他們極少進行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學生集中火力攻擊的特別目標，通常是那些他們出於一些原因不喜歡的教師。學生很少攻擊他們非常尊敬的老師，除非受到極大壓力而不得不這麼做。[35]

在教師中間誰攻擊誰，現存的社會分歧和個人之間的矛盾起了重要作用。一般來說，出身於良好或中等階級家庭的積極分子在攻擊資產階級權威時最有熱情。他們公佈別人過去犯的錯誤，揪出「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在狂熱的政治氣氛裏，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感到了更大的互相揭露的壓力。大多數人似乎都遵循一個秘而不宣的規則：「如果我不得不攻擊什麼人，那麼我會攻擊那些我不喜歡的人。」一位中學教師描述了在他的學校當時發生的事情：

> 當時，誰也不能袖手旁觀。尤其是像我這樣出身不好的人，壓力更大。如你不積極投入運動，就可能被人指為對運動抱抵觸態度。所以每個人都挖空心思揭發別人的「罪行」。學生們很幼稚，恨哪個教師就整哪個教師。老師中間也是誰與誰的關係不好，就大揭特揭。我所在的學校有兩個老頭，都在外語教研室。兩人關係從來不好。這時鄭老頭貼出大字報「看周××的反動嘴臉」；周老頭也不甘示弱，貼出大字報「請看鄭××血淋淋的事實」。筆仗打得不亦樂乎。我平時看不慣孫××，這時貼出大字報揭發他曾打算改名為孫遠東，並說他這樣做暴露了他企圖征服遠東的狼子野心。這當然是胡扯。但當時就是這樣撲風捉影，根本不管什麼證據不證據。[36]

多數情況下，中學生在這一期間沒有受到批判。[37]但是，一些學生也成為「打亂仗」的受害者。一位以前的中學生回憶說：

> 6月初，我所在的學校揪出一個「小三家村」，它的三個成員是迷上鄧拓《燕山夜話》和秦牧《藝海拾貝》的學生。那兩本書當時被

> 批為「毒草」。不久，揪「牛鬼蛇神」運動在我校展開。誰是學生「牛鬼蛇神」？是那些經常發牢騷、穿漂亮衣裳、談戀愛的學生。就在我的班級裏，50位學生中有18人被批為「牛鬼蛇神」。其中有兩人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後來，三名「小三家村」、18個「牛鬼蛇神」和我都參加了造反組織。[38]

不論這種事情在哪裏發生，通常都是熱情的學生積極分子而非黨組織或工作組發動攻擊。但是，對有一類中學生，即流氓學生，當地領導部門採取了鎮壓行動。在學校停課、教師聲望被摧之際，那些在正常情況下受到壓制的調皮學生則開始在一些學校為所欲為。地方政府把這種情況視為對當前運動的威脅。6月16日至7月24日，按照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命令，在39所中學逮捕了159名所謂「流氓學生」。[39]

教育改革是分化學生團體的另一個問題。6月中，北京發佈了關於高中和大學招生的兩個指示。指示批判現行招生制度有利於非無產階級子女而不利於家庭出身好的孩子。[40] 這兩個指示在高中生特別是在這一年畢業的學生中引起了動蕩。出身好的學生當然對這個新政策感到高興，[41] 但出身不好甚至出身中等家庭的學生都感到沮喪。對於出身不好的學生，學業是他們向上流動的最後一個機會。如果這道通向成功的門關閉的話，他們就沒有其它路可走了。對於出身中等家庭的學生來講，前途似乎也是暗淡的。因為這個政策對出身好的學生有利，自然意味著其它學生的機會更少了。鄧小平的弟弟鄧墾是當時的武漢市副市長。他在一次高中生大會上的講話，使這些學生更加灰心喪氣。鄧說：

> 在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果廣大工農子弟升不了學，那還是什麼社會主義社會？什麼無產階級專政？那就不是了！新的招生辦法，可以更好地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使大量優秀的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革命烈士子女得到升學機會，可以培養出大批的、我們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青年學生，一般說（當然也有少數例外），他們是鄙視勞動、鄙視勞動人民的。他們迷戀走

> 白專道路，想由中學到大學，將來當工程師、當高薪階層，脫離勞動。這些人只有通過勞動改造，擺脫剝削階級的影響，才能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成為勞動者。……有人要求一視同仁，不管是哪個階級大家都一樣，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當的。[42]

這篇講話是通過有線廣播網播發的，36,000名初中畢業生和6,000名高中畢業生收聽了講話。20年後，一位從前的中學生仍然記得當時聽講話時的矛盾心情：「從本能上講，我恨這個政策，但從理智上講我又不能懷疑它。」[43]

7月，市政府改革了高中招生程序。入學考試被取消，錄取新生是根據學生的階級出身和政治表現。出身不好的學生是失敗者。在36,000名初中畢業生中，89.43%出身好和中等的學生被高中錄取，而只有14.62%的出身不好的學生得到升學的機會。

有一個調查發現，那些被剝奪深造機會的學生極為憤怒。他們抱怨說：「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我們就沒有什麼希望了。」「推薦入學看不出學習成績好壞，這不公平。」「階級路線對我們不公平，我們堅決反對它。」出身於知識分子和中等家庭的學生也遇到了問題，特別是在重點中學。長期以來，出身好的學生對知識分子後代佔上風很不滿，現在則感到揚眉吐氣，他們優越的階級出身可以使知識分子家庭學生的學業優勢黯然失色。[44]

中學和大學招生改革使每一位學生都強烈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並對政治氣候的變化敏感起來。不同出身的學生之間以前存在的小裂痕變成了巨大的鴻溝。雖然公開的衝突仍然很少，但潛在的緊張正在增加。

大學

大學裏的形勢與中學的形勢並無太大區別，只是在以下兩個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個方面，五個大學的黨委被認為已經「腐爛」，因為它們已經被「階級異己分子」掌握了。在其它院校裏，黨委和工作組在指導運動時通常互相合作，而在這五所院校裏，工作組取代了黨委。華

中工學院就是這樣一個「腐爛」的單位。工作組一到校，就開始動員學生造學院當局的反。工作組希望集中火力批判院領導，但受害者大多數是學生的政治輔導員和黨支部書記。這並不令人吃驚，因為學生對他們非常瞭解，而且對他們有這樣或那樣的不滿。得到了工作組的批准，抨擊當權者就不會有任何風險。結果有一大批黨政幹部被打成「黑幫分子」。在其它四所學院也出現了同樣的形勢，工作組也讓它們的黨委靠邊站了。這些學院裏的許多黨的幹部之所以在後來變成造反組織的支持者，也可以從這個事實中得到解釋。[45]

第二個方面，與中學裏的學生不同，大學生的年紀已大到可以成為合法的鬥爭目標。在中學裏，只有教師可以被當作「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揪出來。而這個稱號也可以用在大學生身上。[46]甚至出身好的學生也可能成為目標。在那個時候有一個流行口號說：「如果有違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和行動，那麼不管什麼人，不管他是什麼家庭出身，都可以用大字報的形式來批判。」因此，在進行「揪出剝削階級孝子賢孫」運動的同時，又開展了反對「歪風邪氣」運動。結果，一些出身於良好家庭（多數是落後分子）的學生也受到批鬥。例如，到7月底為止，在華中師範學院有300多名學生受到大字報的攻擊，佔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十。其它學院的形勢也大同小異。[47]

在學院裏，選擇造反對象也主要是由學生自己決定，而不是由黨組織或工作組來決定。[48]原因是在選擇鬥爭目標上沒有明確的指導方針，所以學院裏的批鬥目標多種多樣。教師或者是學生、黨的幹部或者是普通群眾，以及出身好的或者是出身不好的人，統統可能成為這種「打亂仗」的受害者。文化革命初期高等教育機構的運動特點，也許對於理解後來在大學造反派與保守派間出現的組織成分相對模糊的特徵，是大有幫助的。[49]

雖然黨組織和工作組並不決定目標，但這也不意味著他們對在自己管轄之地發生的事情不負責任。黨組織和工作組鼓勵學生和教師互相攻擊，因為他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牛鬼蛇神」會暴露出來。對他們來說，整錯一些清白的人正是任何政治運動都必須付出的代價。[50]但是，受害者既不會原諒批鬥自己的同學或同事，也不會放過他們遭難時在一旁觀望的工作組和黨組織。

其它部門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1966年)在武漢還沒有結束，還有社教工作隊在武漢。[51] 工作組和黨委一般有工作分工：前者要指導政治運動，而後者負責其它方面的一切事情。二者間的關係在各單位都不同。在多數情況下，他們互相合作得很好；但在有些單位，他們則互相對抗。[52]

在醫院、科研所和文化機構，由於那裏很大一批職工是知識分子，所以「資產階級權威」和「孝子賢孫」就成為主要的鬥爭目標，正像在學校裏那樣。在那些單位裏，通常有很大比例的人員受到批判。[53]

在工廠裏，由於沒有多少人可以被劃為「資產階級權威」，所以鬥爭矛頭就指向了那些表現不好的人和壞分子。然而，工廠裏的工人和低級幹部一般既不像年青學生那樣熱情，也不像知識分子那樣在政治上成熟。在他們的心裏，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一個攻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運動，跟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太大的關係。[54] 只有一些教育程度較高的政治積極分子才迅速響應工作組的號召。他們在多數情況下或者攻擊那些在過去政治運動中受過衝擊的人，或者批判壞分子的瑣碎劣行。通常在一個單位裏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職工受到大字報的批判。[55] 武漢電信局是一個極端的情況，那兒有約80%的職工受到大字報的批判。這個遊戲的一個潛規則是，「當你被指責犯了某項『罪行』時，不要企圖通過與批判者爭辯來澄清自己」。與批判者爭辯，會讓人看成是一種可能破壞運動的行動。所以，自我防禦的最佳策略，就是攻擊別人。攻擊別人不僅顯示你願意積極參加運動，而且可以借此機會報復那些向你發起攻擊的人。這種規則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打亂仗」。

當這種鬥爭在一個單位裏展開時，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曾指示工作組準備一個秘密名單。這個名單把單位的人劃分為五類：左派、中左派、中間分子、中右派、右派。[56] 當名單弄好以後，工作組就會讓積極分子知道下階段作為運動目標的人的名字和作為爭取對象的人的名字。接下來，工作組所選擇的目標就會受到正式批判。武漢重型機床廠有四位業餘詩人：朱鴻霞、劉傳富、李向陽和姜詩成。這四位業

餘詩人被指控組成了一個「文學三家村」，所以就成為這個廠的主要批判目標。他們後來在武漢最大的激進組織——工人造反總部中，擔任了領導職務。在第二機床廠，工作組把兩名工人打成「反黨分子」，把36人定為「反黨走卒」。他們中有19人於8月17日參與成立了武漢第一個工人秘密的激進團體。[57]

這種名單在沒有公開時，是黨的領導層和工作組用以指導運動的工具。但如果它被公諸於眾時，就可能產生事與願違的後果。左派當然沒什麼可抱怨的，因為他們的地位更好了；右派並不敢抱怨，因為他們長期以來就是鬥爭的目標。但是，左派和右派都很少。被放到中間三類的人，對這種劃法就不滿意了。積極分子會對把自己放入「中左派」類別裏感到憤怒。中間分子會感到，領導這樣劃分是對他們不信任。甚至公認的落後分子也會認為被劃為「中右派」不公平。[58]幾個月後，造反組織通過公佈這個名單，成功地獲得了那些對這種劃分不滿的人對自己的支持。

在工作組與以前的領導層互相對立的單位裏，形勢就更加複雜了。在這種形勢下，一般是以前的領導層受到攻擊。由於不信任從前的積極分子，工作組就努力培養自己的積極分子。在運動最初階段，內部權力結構上的這種重新組合，可能與以後階段裏的標準模式有所偏離。如果工作組從以往中間和落後分子中選擇新的積極分子(通過指責前領導錯誤地對待了這些出身好的人)，並依靠他們攻擊以前的領導和以前的積極分子，老積極分子就可能成為造反派，而新積極分子成為保守派。[59]如果工作組引入外來幹部來取代原來的當權派，以後就可能有至少兩個互相分離的造反組織，其中在舊領導時受到壓制的那些人主要攻擊以前的領導，而以前的領導人和積極分子則攻擊工作組和新領導人。[60]如果工作組成功地把大批以前的領導幹部和積極分子爭取過來，那些被排斥的幹部和積極分子就可能參加造反組織。[61]

但是，在這一時期，並非每個單位都深深地捲入到運動中來。由於各種原因，一些工廠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兩個月裏幾乎沒有被這場風暴所觸及。那些單位通常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結束或者那裏的絕大多數職工都出身很好。由於這些單位十分乾淨或者剛被清理乾淨，所以當地政權允許他們至少暫時不開展橫掃牛鬼蛇神運動。[62]那些單位

也就躲過了這個引起大量分歧的多事時期。因此，它們以後也比其它單位派性更少。[63]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兩月裏，真正的變化並沒有發生。儘管政治氣氛日益狂熱，但舊的遊戲規則依然本質上完好無損。仍然用從前的政治運動模式來指導人們：動力、目標、當地政權使用的策略，等等，[64] 特別是任何頭腦清楚的人都可以看到當前運動與1957–1958年反右運動的相似之處。由於任何反政府行動都有很高的風險，所以人們一般不願意去做違背這種遊戲規則的事。這一時期的多數行動都經過允許、鼓勵，甚至是政府所要求的，自發的運動極少。除了少數政治上天真幼稚的大、中學生以外，沒人敢於藐視現行的遊戲規則。而像這些學生那樣惹麻煩的人，則為他們的行動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與此同時，大批個人在6月和7月裏成為受害者。他們卻從來沒有想過要藐視工作組或黨的權力機構。無論如何，1966年6–7月份的文化大革命顯然偏離了毛澤東期望它運行的方向，即整頓這個黨。當權者的地位同以前一樣安全。7月中旬，毛澤東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不改變舊的遊戲規則，那麼這個運動就不可能改變現存的權力平衡。

第四章

新遊戲與新玩家，1966年8–12月

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不久，於7月18日斥責工作組，使武漢的領導人莫名驚詫。[1] 按照毛澤東的判斷，文化大革命前兩個月由工作組實施的有控制的動員，妨礙了運動的健康發展。為了達到他的激進目標，毛澤東決定通過放鬆一些舊的遊戲規則來打破現存的政治平衡。他推行的第一項變革，就是宣佈「放手發動群眾」的原則。新原則具有三個重要意義：第一，它剝奪了黨組織限制群眾動員的權力。在以往的政治運動中，黨組織總是受托擔負實施領導群眾動員的任務，但現在它不再具有以下權威：選擇動員對象的權威、否定某些社會集團參與的權威，以及專斷地設定攻擊對象的權威。

第二，公民個人第一次獲得做出他或她自己判斷的權利。在過去，黨組織以列寧主義組織原則的名義壟斷了這個權利。第三，如果發現黨組織犯了企圖扼殺群眾革命積極性、壓制不同於自己的意見或對於群眾運動設置障礙等錯誤，人們就可能運用放手發動群眾這個武器反對黨組織。按照毛澤東的觀點，黨的幹部對待放手發動群眾的態度，是決定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階級鬥爭中是「革命幹部」還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重要標準。通過極大地降低自發政治行動的風險，放手發動群眾原則的引入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潛在造反者的政治機會結構。[2]

由於被允許的行為範圍被逐步拓寬，就可以期望具有低政治參與起點的人首先站出來，成為政治先鋒；而且他們還可以推進群眾動員的過程。

紅衛兵的興起

毛澤東對工作組的斥責，起初使武漢的權力精英大為震動。但是，當王任重這顆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被調到北京後，他們很快就鎮定下來。王這時被提拔擔任新設立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當時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被當成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他還是被指定參加十六條起草的少數人之一。十六條是用以指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方針性文件。在北京有這樣一位大權在握的保護人，武漢黨的領導人就有理由感到安全了。如果做錯了什麼事，他們相信王會第一個來告訴他們，因為他還是湖北省委第一書記。

但當地領導必須改變策略，以順應毛澤東的最新指示。8月初，工作組開始從學校撤出。[3] 在所有大中學校都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以取代工作組的位置。[4] 只有階級出身好的學生和教師才有資格成為這種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對政治壟斷的要求，是基於所謂的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當時在這個城市開始流行。這個口號傷害和排斥了出身不好和出身一般的人，抬高了出身好的人。

按照十六條的要求，文化革命委員會也在非教育部門建立起來。那些部門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也是由階級出身好的政治積極分子佔主導地位。[5]

在文化革命委員會鞏固其權力之前，一種新式群眾組織在北京出現，並迅速擴及全國，這就是紅衛兵。毛澤東於8月18日在天安門接見了一百萬名青年，遊行隊伍中出現大量身著綠軍裝、自稱「紅衛兵」的學生，毛澤東本人也帶上了紅衛兵袖章。這使武漢人第一次注意到紅衛兵。[6]

第二天上午，武漢第一支自我命名的紅衛兵已經在這個城市的街上遊行。對這種異乎尋常的事態發展，當地權力部門頗為吃驚。[7] 自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以來，還沒有出現過像紅衛兵這樣的自發群眾組織。如果毛澤東沒有表示他對北京紅衛兵的支持，當地政府會將這些未經批准而建立政治團體的人逮捕入獄，不管他們的綱領是什麼。但北京發出的信號似乎是準確無誤的。縱使他們仍然對毛澤東寬容乃

至鼓勵這種自發群眾組織感到迷惑不解，也只能採取響應毛澤東指示的穩妥行動方針。8月19日，省當權者視察11所大中學校，表示對「青年革命闖將」的支持。由於當紅衛兵便馬上得到榮譽、尊敬和名望，而且也沒有什麼風險或代價，因而每個人都想成為這個團體的一員。隨後幾天，紅衛兵組織像雨後春筍，在這個城市裏到處出現。當地政權只得從一所學校到另一所學校去祝賀新的紅衛兵組織的誕生。[8] 同時，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又召開各校紅衛兵「經驗交流」大會。[9] 這些會議的真正目的，就是把紅衛兵拉到與當地黨的領導一致的路線上去。然而，魔鬼一旦被釋放出來，就很難再把它們裝回潘多拉盒子之中。

8月22日，北京紅衛兵開始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的消息傳到武漢。破四舊運動迅速席捲全市。正如克蘭．布爾頓 (Crane Brinton) 所指出的那樣，沒有什麼比用外表的變革來預示所謂革命的來臨更簡單易行，更引人注目。[10] 學生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使城市面貌革命化，特別是使不革命的街名和商店名革命化。[11] 例如，任何名稱中包含「福」、「壽」、「祿」、「和」、「裕」或「泰」等字的街道或商店，都要重新命名，用「東方紅」、「紅旗」、「工農兵」、「東風」、「紅衛兵」等取而代之。

學生們並不只是忙於改名字。從1964年開始，緊身褲、尖頭皮鞋、高跟鞋、西服領帶和長頭髮等均被視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象徵。現在這些全都遭到禁止。學生們勒令理髮店、裁縫店和照相館不得做任何有違無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工作。此外，全市遍設檢查站。當檢查站發現誰的打扮不符合學生理解的無產階級風格，就強迫其符合 (例如，把長頭髮剪短、把婦女鞋子上的高跟去掉)。

幾天之內，街上所有四舊的痕跡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學生於是開始搜查舊精英的家，沒收或銷毀任何他們認為需要這樣做的東西。出身不良階級家庭的學生，希望顯示他們與其過去的階級決裂，甚至請同學去搜查他們自己的家。受害者常常告訴來抄家的人，還有哪些人的家可以抄，他們的名字和地址是什麼，特別是個人對手的名字與地址。有些剝削階級家庭在學生面前先自己銷毀這些四舊。沒收的貴重物品通常是金條、鑽石、古董和善本書等，不太貴重的東西便就地銷

毀。由於價值的判斷是由十幾歲孩子作出的，以至很多真正的寶貝被摧毀。當工人和低級幹部子女發現，許多「吸血鬼」(他們起的名字) 的生活水平比他們高得多，就產生強烈的嫉妒心理，使他們常常把一切物質享受的東西都與四舊聯繫起來，並當場銷毀而後快。[12]

針對老精英的暴力在1949年以來的其它時期也發生過。過去的暴力總是由當地政府發動和組織，而1966年8月的暴力則不同，它是由自發的學生們進行的，結果就更加肆無忌憚、更加野蠻。武漢總共有21,000個住宅被抄，沒收了17,845兩黃金、28,936兩白銀、267,000個銀元和4.4億現金。[13] 學生還開會批鬥「牛鬼蛇神」，帶他們遊街，甚至強迫他們離開城市。體罰成為一件常事。在武漢，有32人被毆打致死，還有112人企圖自殺，其中62人死亡。[14]

為什麼武漢學生那麼熱心參加破四舊運動？第一，這裏沒有什麼風險。因為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讚揚了北京紅衛兵的破四舊行動，[15] 武漢黨的領導人沒有別的選擇，對學生本來不可容忍的行為採取了自由放任的態度。湖北省省長張體學在同其它領導人討論混亂形勢時說：

> 放手搞大革命，放手搞大民主，要怎麼幹就怎麼幹。你要成立紅衛兵就成立；你要上街就上街；你要幹什麼可以。要到長沙、北京去，可以的。你要打廟，支持他去打。不採取這個精神，我們就被動了。[16]

紅衛兵的過激行動畢竟沒有對當地政權造成直接威脅。中央和地方政權對紅衛兵初期的過分行為的縱容，使學生們更加肆無忌憚。

第二，除了時間外，不需要付出什麼代價。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因為學校已經告訴他們停課半年，以使他們能夠投身於文化大革命之中。所以，他們的問題不是時間的缺乏，相反是時間的過度供給。

第三，還有收益。與成年人不同，學生可能會輕易地受表現性收益 (expressive benefits) 的驅動而參加政治行動。對多數學生來說，參與破四舊的集體行動的確又刺激又有趣，在一起行動的經歷給他們帶來了巨大快樂。此外，許多學生還期望能從他們的積極行動中得到回報。8月底，雖然在多數學校都有自稱的紅衛兵，但紅衛兵組織還沒開

始正式徵收學生。非紅衛兵學生認為，他們參加破四舊就是表明其決定做文化大革命先鋒的方式。他們希望，當學校紅衛兵組織開始擴充隊伍時，會考慮他們在這個革命行動的表現。所以，非紅衛兵學生正像紅衛兵一樣急於走出去破四舊。[17] 總之，表面上瘋狂的破四舊運動，儘管是下意識的行動，但也有學生理性的基礎。

紅衛兵的過激行動危害了公共秩序，卻放過了毛澤東心目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8月末，北京黨的領導人開始讓紅衛兵平靜下來。[18] 由於地方社會控制機關仍然很有效，群眾暴力很快得到控制。但這一時期開了使用暴力的先例。當社會控制機關癱瘓時，暴力就會成為文化大革命突出的特點。

在破四舊運動期間，紅衛兵組織開始吸收成員。誰是合格的？在8月26日《人民日報》登載的一個聲明中，北京的一些紅衛兵制定了標準：

> 我們憑什麼當毛主席的紅衛兵？就憑我們是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的子弟。……非紅五類子弟，你要革命嗎？你就要背叛自己的家庭，你就要革自己的命，你就要和紅衛兵站在一起。要革命就站出來，過來我們就歡迎，就團結。[19]

紅五類原則當然受到階級出身好的學生的熱烈歡迎，同時也被武漢採納為紅衛兵標準。這樣一來，紅衛兵變成一個排他性組織，只有紅五類學生有資格加入。在一些學校裏，允許紅五類之外的學生加入叫做「紅外圍」的紅衛兵外圍組織。問題是紅衛兵組織應當如何挑選其成員？如果吸收所有的紅五類學生，那麼紅衛兵組織就會太大，從而難以被視為先鋒團體。一些學生，即高幹子弟，有意將紅衛兵組織盡量變成一個排他性組織。在政治精英子女相對集中的北京，常常規定非常嚴格的標準，只有所謂最革命的分子才有資格參加紅衛兵。在這裏，一個人成為革命家的潛力是由其父母的幹部級別來衡量的。

在武漢，高幹子弟在中學生裏極少，並集中在武昌區的幾所學校，因為那兒是省政府和武漢軍區司令部所在地。他們享有作為第一批紅衛兵的特權，但很難採用非常嚴格的北京標準。否則的話，在幾

所重點學校裏，只有少數人有資格加入紅衛兵，以至於很多學校根本不會有紅衛兵了。因此，武漢紅衛兵吸收成員的模式與北京很不相同。在武漢的重點學校裏，吸收成員的標準與北京那類學校使用的標準比起來相對寬鬆一些。[20] 其它學校的標準就更加寬鬆了。

但是，階級出身不好的學生被徹底排除在紅衛兵組織之外，而不管他們的政治表現有多好。中等階級出身的學生處於一種困難的地位。從理論上講，他們有資格成為紅衛兵，但他們會不會被吸收為紅衛兵的決定權卻掌握在從前他們看不起的少數人手裏。這些中等階級出身的學生，特別是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曾經是班級裏的尖子和老師的寵兒。對他們來講，淪落到從屬地位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雪上加霜的是，階級出身不好甚至出身中等的學生常常會受到當眾凌辱。有一位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的當時的高中生，回憶起1966年底的一個晚上：

> 那天晚上，召開了一次全校動員大會，每個人都必須參加。過去開全校大會是按班級分塊坐。可是那天晚上，把人分成三類。紅五類坐前排，高唱《東方紅》，並反復朗誦，「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我們所謂「團結對象」坐中間，只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黑五類最慘，他們坐在最後，什麼也不許唱。不少出身不好的老師被拉上臺，被逼著唱「我是牛鬼蛇神」之類的歌。文革前，出身不好的學生也受到歧視，入團比較困難。但那時歧視仍是無形的。那天晚上，歧視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現出來。學生中潛伏的矛盾便成了公開的對抗。當然受歧視的人當時誰也不敢反抗，但個個已是滿肚子火了。那天晚上是我一生的轉折點。[21]

類似的場面幾乎到處可見。如前一章所述，在武漢的中學裏，階級出身好的學生在學生總數裏不到一半。這些學生的排外和飛揚跋扈行為，疏遠了他們與其它學生的關係。[22] 這是一座隨時可能爆發的沉寂火山。[23]

紅衛兵的興起和破四舊運動具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紅衛兵開了這樣一個先例，即利益相同的人可以自己組成團體反對其它

人。雖然在1966年8–9月裏只允許出身好的學生這樣做，而且每個學校只許一個紅衛兵組織存在，但紅衛兵是自1949年以後，中國不受政治等級制度直接控制的第一個真正的群眾組織。工會、共青團和婦聯並不獨立於同級黨委，而紅衛兵則不同，它從開始起就是獨立的。它的建立、吸收成員、組成、綱領、策略和行動都由成員自行決定。由於它們的獨立自主性，就使其更可能與政權相對抗而不是合作。況且，黨的領導原則現在被解釋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24]這一條可以用來為其反對地方政權規定的方針作辯護。

第二，跨單位行動開始出現。在過去，社會力量受到垂直分割，一切政治活動都在各個單位內進行。只有中國共產黨有能力通過其等級網絡體系動員跨單位行動。紅衛兵則開了一個先例，使具有相同利益的人形成跨單位聯合，以便追求他們的共同目標。

這些突破是自發群眾運動的先決條件。毛澤東這時正集中精力爭取足夠的民眾支持，以打垮黨的領導層中的敵人，但他沒有充分認識到紅衛兵興起的長遠意義。他也沒有意識到，事實上紅衛兵正向他努力避免的方向前進。紅衛兵在8月的行動，只是對那些在過去十七年裏各種運動及文化大革命頭兩月的打擊對象所進行的又一次打擊。但是，他們沒有像毛澤東期望的那樣去攻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洶湧的造反浪潮

破四舊運動掩蓋了8月的另一個重要事件——北京和各省市之間串聯學生數量的增長。有關毛主席要接見更多紅衛兵的傳言，吸引了各省市大批學生來到北京。與此同時，北京學生想要去點燃停滯省份的文化大革命烈火，還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於是就奔向了全國其它地方。

8月底，一群北京學生到達武漢。[25]他們給這個城市帶來了一些異乎尋常的消息：每個學生都有權利去串聯；黨的領導層批判了劉少奇；可以「炮轟」地方黨委。由於這些消息的特殊內容和傳播方式，當地領導人聽後非常緊張。這些消息會損害他們正在試圖維護的社會秩

序。此外，如果允許另一條信息渠道存在，那麼地方政權對信息的壟斷就會受到破壞。

在當地政權採取行動之前，北京學生已開始直接攻擊湖北省委。由於來自國家的首都，許多北京學生有一種優越感。顯示其優越的一種方法，就是要做一件當地人不敢做的事情。他們找到的第一個問題相當微不足道。《湖北日報》於8月9日出版十六條時，沒有仿效《人民日報》套紅印出報紙。北京學生斷言，用黑色來印十六條是對文化大革命指導方針的有意藐視，他們要求省領導人應當至少為這一事件負些責任，[26] 但省領導人認為北京學生是在吹毛求疵，所以不想理睬這些毛頭小夥子。

省市領導人採用三種策略來對付北京學生。第一種策略是採取一項預防性措施。8月29日，湖北省委宣佈，已經查辦了省委宣傳部部長曾淳。一周後，又公開批判副省長陳一新。這兩人都是湖北省委常委。這是中國人所說的「棄車保帥」之計。通過犧牲這兩人，省委領導人希望表明，湖北省委內部「隱藏的敵人」已全部被識別出來，並得到處理。

第二種策略是防禦性措施。當地領導人努力給北京學生和本地居民這樣一種印象：在過去17年和文化革命頭兩月裏，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始終幹得很好。省長張體學從不錯過維護湖北省委工作的任何機會。在不止一個場合裏，他驕傲地說，「湖北省委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是一貫忠實於毛澤東思想的，是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路線的。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是搞得轟轟烈烈、扎扎實實的。」[27] 這是用以攻為守的策略來贏得同情。

第三種是進攻性策略。為了維持他們對信息的壟斷，並摧毀北京學生的威信，當地領導人對武漢居民說，北京學生帶給本城的只是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唯一可靠的信息來源仍然是通過黨的各級組織掌握的正規渠道。[28]

此外，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還秘密地動員力量發動對北京造反派的反攻。8月30日，湖北省委起草了一封呼籲書，以「湖北大學學生」的名義發表。呼籲書說，北京學生代表了一股「逆流」，妨礙了武漢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信中還聲稱，對湖北省委的任何攻擊，都是對毛主席

和黨的領導的間接攻擊。第二天，武漢市委發出了另一封緊急呼籲書，也假借別人的名義，號召抵制「南下一小撮」。[29] 為了證明在武漢製造麻煩的確實是「一小撮」，當地領導人需要在北京學生中找到一些同情者，[30] 王任重對此給予了幫助。王憑藉作為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的地位，把他精心挑選的幾組北京紅衛兵派到武漢去。這些人由兩個當時全國有名的紅衛兵卜大華和宋要武率領，[31] 以保衛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為使命。他們以「真正的」北京紅衛兵自居，譴責那些攻擊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人。武漢當權者把他們視為救兵，待若上賓。[32]

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努力至少暫時收到了效果。當地居民(包括當地紅衛兵)從一開始就把對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攻擊視為一種狂妄行為。他們現在對北京學生發起了反攻，使後者很快發現自己在武漢不受歡迎。

但他們並不準備屈服。8月31日，毛澤東在北京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在武漢的北京學生因此也要求與省長座談，但張體學拒絕了這個要求，並說他不想讓人感到他受學生的擺佈。這樣一來，雙方就面臨一場衝突。9月2日晚，40名北京學生在湖北省委大樓前面靜坐示威，在第二天增加到200多人，他們決定絕食。這個沒有先例的事件在全市引起轟動，大多數普通工人和幹部反對擾亂社會秩序，當地居民聚集到靜坐現場譴責學生攻擊黨的領導。[33] 民眾的支持加強了當地政權的不妥協立場。

9月4日，湖北省委在武昌體育館舉行了歡迎北京和其它省市學生的大會。張體學在講話中指出，他不想向示威學生道歉。[34] 當有人問他是否支持靜坐時，他回答說：「我只支持左派，不支持右派。」這個聲明激怒了絕食者。為了抗議，他們在武漢舉行了示威遊行，並派一些學生回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組控告湖北省委。那天晚上，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樹成通過當地廣播電臺發表了一篇緊急講話，他要求對本市所發生的事件給予客觀的報道，但他選用的詞語和描述事件的方式，都暗示靜坐學生要為這場動亂負責。[35]

正如所期待的那樣，王樹成的講話引起了民眾對北京學生的新一輪抗議。此時，各省市的地方政權都面臨著串聯學生的挑戰。在有些

地方，緊張局勢導致串聯學生與當地居民間發生武鬥。相比之下，武漢的形勢相對穩定，這也使張體學能夠得意地宣稱，「我們贏得了第一個回合的勝利。」[36]

9月7日，毛澤東嚴厲批評一些地方領導人煽動工人農民反對造反學生。[37] 王任重作為圈內人，第二天就給張體學打了一個電話，勸他向串聯學生作個自我批評。[38] 但張認為王過於謹慎了。9月5日以後，城裏出現了很多讚揚湖北省委的傳單。有人甚至還譜了一首歌，叫《湖北省委就是好》。[39] 擁護湖北省委的力量基本上是自發的，這就使張相信武漢的形勢與毛澤東批評的那些地方有所不同。[40] 他沒有認識到，遊戲規則正在發生急劇變化。

9月12日，那些9月4日返回北京的學生回到武漢。他們於9月8日見到了黨中央第四號領導人陶鑄。剛回武漢，大字報就貼遍全市，聲稱陶已經指示張體學作自我批評。串聯學生也提出了一個挑釁性的口號：「打倒湖北省委」。這個口號震動了全市。如果串聯學生所說的是真的，就會打破省領導不可侵犯的神話。武漢市民非常焦急，在隨後幾天，約百萬人聚集在街上，爭論湖北省委是否犯了錯誤。主導性的意見是，省委沒有犯錯誤。多數當地居民簡直不能相信，幾個學生就能改變過去17年確立的遊戲規則。作為與串聯學生所提口號的直接對抗，支持湖北省委的人喊出了「捍衛湖北省委」的口號。[41]

9月15日，湖北省委邀請串聯學生和當地學生代表召開所謂的協商會。此會變成了又一場爭鬥。串聯學生堅持說，陶指示張體學作自我批評。但按照湖北省委的說法，陶曾批評了「打倒湖北省委」和「打倒張體學」的口號。支援湖北省委的學生相信黨的權威的話。他們抗議北京學生無恥地歪曲了陶的指示。在當地學生熱情支持的鼓舞下，張一時失去理智，發表了一個衝動的即席講話。他在講話中說，「我代表我和湖北省三千多萬人民控訴趙桂林(來自人民大學的學生，是當時北京在武漢學生的領袖)。」此會不歡而散。[42]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有無數群眾集會譴責北京學生。同時出現了大量支持湖北省委的大字報和傳單。因此，北京的造反學生陷入了難堪的困境。他們走到哪裏，就會被憤怒的人群所包圍。9月19日，張體學再次驕傲地聲明：「我們是勝利者。」14天前，他是在湖北省委的一

間房門緊閉的會議室裏講了這句話，但現在他是在一個群眾集會上說這番話的。[43] 9月25日，張體學離開武漢去北京，他把此事當成一個肯定的信號，即串聯學生的挑戰已經失敗了。[44]

大約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決定完全改寫遊戲規則。到9月底為止，他已經認識到，最早出現的紅衛兵是維護現狀的力量。而他能夠依靠的造反力量只有極少數人，甚至在北京也是如此，更不用說在各省市了。使少數學生身處困境的，正是在過去十七年間確立的遊戲規則。為了將似乎停滯的文化大革命向前推進，毛澤東決定採取旗幟鮮明的立場來支持少數。10月初，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個斬釘截鐵的聲明：運動初期強加給學生的錯誤政治結論一律無效，受到錯誤處理的人必須予以平反*。這一行動的意義是雙重的。一方面，它打破了以往權力精英和普通公民所相信的神話：地方政權代表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所以是不能碰的。另一方面，對於數月以來受到打擊的人來說，他們渴望獲得地方政權的補償和糾正的要求得到了贊同和鼓勵。一句話，造反有理。

當毛澤東的態度發生急劇轉變之時，王任重沒有忘記給他的部下打電話。他勸告湖北省委在對待串聯學生和當地「少數派」時要更小心一些。但是，武漢領導人正沉醉於他們近來對串聯學生的勝利之中，並沒有理解王所傳達的信息中包含的緊迫性。當王再次打來電話時，才引起武漢領導人的注意。在這一次的電話裏，王用毫不含糊的語言指出，湖北省委必須承認趙桂林是「革命闖將」，還要為自己對串聯學生和當地「少數派」的所作所為作個自我批評。[45] 這是武漢文化大革命

---

* 譯者注：1966年10月5日，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為貫徹「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精神，根據林彪的提議，發出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使造反派得以「踢開黨委鬧革命」；指示還宣佈為運動初期被黨委和工作組打成的「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平反。中共中央於同日批發這個《緊急指示》時指出：「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地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從此以後，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權威開始瓦解。

串聯打破了現存政治的平衡，促成了有利造反的形勢，這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串聯能把保守派轉變為造反派。1966年8月，首批紅衛兵公佈了一條毛主席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現在，每個人都想要以造反派面目出現。但是，那些真想促進變革的人並不敢挑戰似乎還很強大的地方政權，而那些在8月和9月表現最積極的人卻沒有促成基本變革的願望。後者會盡力維護其工作單位和生活地區的現存權力關係。在這種形勢下，打破現存的政治平衡似乎就沒有什麼希望了。而串聯打破了均勢。當北京的保守分子到外地串聯時，他們與當地權力體系便毫無關係了。這時，他們就有可能起來造反了。現實也正是如此。

8月底9月初，只有出身好的學生可以出去串聯。所以，對武漢當局發起攻擊的多數北京學生，在他們自己的學校裏一般都是保守派。[46] 北京學生提出的口號就暴露了他們的真實面目。他們當時提出的三個頗受爭議的口號是：「炮轟湖北省委」、「懷疑一切」、「自來紅萬歲」。第三個口號就帶有保守派的標記。最有趣的是，北京學生在攻擊武漢當局時極少提出工作組的問題。這絕非偶然。更合理的解釋就是，多數北京造反學生在他們自己的學校曾經是工作組所喜歡的孩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最先點燃武漢革命烈火的人卻是來自北京的保守派。張體學可能是第一個認識到這種矛盾的人。在9月的一次會議上，他對來自北京的高幹子弟卻敵視武漢的高級幹部提出了疑問。[47] 所以，串聯起了把一個地方的保守派轉變為在其它地方的造反派的作用。[48]

第二，串聯有助於促進地方反對勢力的產生。在同武漢當局對抗時，串聯學生很難在當地找到同盟軍。[49] 他們確實有一些本地同情者，但那些同情者仍然處於動搖、分散和無組織狀態。對他們來說，公開表示支持串聯學生是一件很具風險的事。[50] 當9月中旬串聯的規模擴大時，有關外地事件的更多信息開始湧入武漢。此外，到9月底為止，大批本地學生陸續從外地串聯歸來。[51] 到北京和其它地區串聯的個人經歷，加上川流不息地來此串聯的外地學生帶來的消息，使越來

越多的武漢居民開始意識到，以前一直熟悉的遊戲規則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他們開始明白，「炮轟」當地權威部門不是件什麼了不起的事，一個學校裏可以有不止一個的紅衛兵組織，「少數派」學生應當與多數派學生一樣，具有成立自己組織的權利。實際上，當一名造反派要冒的風險並不像以前想的那樣大。因此，1966年9月底在武漢的一些學院裏出現了第一批少數派組織。為了將自己與最初的紅衛兵區別開來，那些小組織常常自稱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52] 紅衛兵創始組織壟斷地位的消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件大事，它打開了派性衝突的大門。[53]

第三，串聯有助於改變大學和中學裏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的平衡。9月份，幾乎所有出身好的學生都出外串聯，而他們的離開就解除了階級出身中等和不好學生的壓力。到了10月份，也允許出身中等甚至不好的學生出去串聯。他們離開武漢後，就沒人知道他們的身分了，他們就可以做別人所做的事了。[54] 更重要的是，他們很快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不是像他們父母那樣的人。因此，串聯給他們一個重新評估自身社會地位和在運動中應擔任角色的機會。當他們於11月和12月帶著新思想返回學校時，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被徹底批倒，他們就大批地加入了造反組織。

地方政權的瓦解和學校造反派的出現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出現在1966年10月。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向他們所說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實際上扭轉了運動的方向。他們命令地方當局為所有在運動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人平反，公開銷毀所有存檔的「黑材料」。[55] 當時還按毛澤東的提議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這個會議上，省市領導人受到批評，說他們在對待造反學生時很被動，並維護自己，壓制學生。[56] 這個會議特別對湖北領導人來說是一場災難。張體學從王任重那裏得知，毛澤東批評他「落後於形勢」，他不得不作自我批評。[57] 始料不及的是，王任重本人很快也成為受害者。會議結束不久，毛澤東就讓王離開北京到海南島，這標誌著他的倒臺。[58]

在武漢，運動在10月也發生了突然的轉折。直到10月4日，當地幹部仍然相信他們沒犯「路線錯誤」。[59] 但當北京的壓力不斷增加時，他們失去了信心，最初還想故技重演，「丟車保帥」，以躲過這場風暴。他們公開批判省文化局副局長任清和武漢市委副秘書長石渝，[60] 但這些努力現在都無濟於事了。所以，省市領導人別無選擇，只好承認「錯誤」，並向串聯學生和本地少數派學生道歉。[61] 王任重的倒臺，使他們失去了很快扭轉形勢的最後一線希望。

中國政治體系的權力結構就像一個金字塔，每一級當權者的合法性都來自其上一級的權力，最終來自毛澤東。在人民共和國最初的十七年裏，那些當權者已經習慣於統一的領導和沒有制約的權威。由於得到了來自上面的支持，所以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鎮壓來自下面的挑戰。但他們並沒有獨立地對付挑戰者的經驗。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幾個月裏，武漢領導人有王任重作為他們在北京強而有力的保護人，所以他們感到安全，行動也有信心。可現在他們的保護人已離開北京，而北京也對他們不滿起來。沒有來自上面的支持，當地領導人就黔驢技窮了。

串聯學生帶給武漢的激進思想為當地造反團體的產生鋪平了道路，而地方領導權威的下降則進一步減少了集體行動的風險。況且，很多人在一定程度上把本地權力機關的軟弱無力歸功於造反先鋒們的英雄行動。人們把當地政權同少數派學生打交道時表現出的日益懦弱，當成可以富有成效地進行集體活動的證明。新生造反運動的初戰勝利，就這樣決定性地改變了潛在造反派關於集體行動收益與風險的精細算計，從而使這種行動比以前更富有吸引力。

10月中旬，當趙桂林再次赴京後返回武漢時，[62] 發現串聯學生在與地方政權鬥爭時，已經無法繼續發揮領導作用了。此時，老紅衛兵組織已失去了壟斷地位，從前被疏遠的學生開始成立他們自己的組織。對「資反路線」的批判，使那些曾被老紅衛兵組織排斥在外的人也可以拋頭露面了。不管家庭出身如何，所有學生都第一次有了在學校裏成立政治組織的自由。實際上，任何想要成立組織的人都可以這麼做。接下來所需要做的，只是取個容易記住的名字，以方便吸收成員。

成立組織並不要求在政府部門登記註冊。即使沒有追隨者，那也可以是一個人的組織。這種組織的發起者被稱為光杆司令。只要一個團體成立，它就有權利以某種形式接受學校的財政支持。所有組織都想要擁有自己的油印機、刻字蠟紙、刻字鋼板、紙和廣播器材等，但學校無法滿足他們的所有要求。在10月和11月間，出現了大量關於有的團體偷竊或搶奪其它團體設備的報道。不管怎樣說，成員個人不必花自己任何錢來維持組織的運轉，就使成立和操作群眾組織在財政方面也具備可行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後來成立的非學生組織，也以這種方式解決財政問題。這一因素使集體行動變得相對容易起來。

由於可以隨心所欲地組團結社，1966年10月，在每個學校都出現了無數的組織。這些新團體都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的成員對老紅衛兵組織的排他性感到憤怒。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氣氛裏，團體的歸屬感是非常重要的。由於紅衛兵創始組織排他性強，所以一旦他們的組織壟斷被打破，那些被排斥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他們自己的組織，或者加入其它新建立的團體。他們用這種方式取得了自我實現、自尊以及其它形式的心理滿足。

為了與老紅衛兵組織競爭，新團體一般更願意互相合作，建立鬆散的聯盟。到了10月中旬，多數學校的學生大體上分成了兩個陣營：老紅衛兵組織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也稱思想兵）。鑒於前者在9月中旬已經建立了一個協調各個學校分支的全市性行動的司令部（第一司令部），[63] 後者很快提議建立自己的全市組織系統。[64] 在10月末，思想兵進行了迅速的擴張。這一成功源於兩個策略。第一，它吸收成員的標準比老紅衛兵組織的標準要靈活得多。老紅衛兵只接受出身紅五類的學生，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只吸收高幹子女，而思想兵實際上歡迎所有人。[65] 第二，思想兵善於促使尚在猶豫觀望的人加入他們的隊伍。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採取了公佈黑材料的策略，特別是對外公佈了工作組和黨委把人們劃為五類的秘密名單。很多人加入激進組織，僅僅是因為他們發現自己被劃入比預期更差的類別。[66]

組織上的擴展鼓舞了思想兵的勇氣。在10月下旬，思想兵開始發動進攻。他們在一些學校接管了的廣播站；在另一些學校，奪取了「檔案」；在其它學校，趕走了文化革命委員會。[67] 與此同時，他們準

備建立一個協調全市所有思想兵行為的司令部。他們邀請每個學院派幾名代表參與籌備。因為思想兵最先在華中工學院和湖北大學出現，所以這兩個學校的代表就期望其它人承認他們為自然的領導者。他們也想將起草的聲明和組織章程強加給其它參與者，但他們的自高自大在代表之間引起了強烈的反感。正因為這兩所學校的代表中沒有人是中共黨員，所以代表們堅持，只有出身純正的中共黨員才可以被選為領導人。結果，武漢測繪學院的學生楊道遠被選為未來司令部的領袖，而他顯然不具備領導大組織的才能。由於對選舉結果非常失望，華中工學院和湖北大學的思想兵撤出了這個統一的思想兵組織，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司令部。因此，當武漢思想兵司令部(它自稱第二司令部，或簡稱「二司」)於10月26日正式成立時，並不包括這兩所學校的思想兵。以後，他們成立了獨立的司令部，一般被稱為「新華工」和「新湖大」。未能組成統一的組織之所以沒有立即導致思想兵的公開內部衝突，是由於他們還面對強大的敵人——本地政權和保守派。在這個前途未卜的時期裏，他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強大的聯盟。但是，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當他們的共同敵人消失之後，源於這一事件的潛在內部矛盾就會浮出水面。[68]

二司的成立是一個意義重大的事件。省裏的一些領導人出席了二司的成立大會。這一姿態表明，地方政權首次不得不承認反對派存在的權利。與此前十七年期間的情況相比，它標誌著政治生活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革。

思想兵很快發展成為一股龐大的勢力。11月1日，當思想兵衝擊湖北省委的一個重要會議時，省當權者感到幾乎無能為力。他們不再敢約束本地反對派，因為任何這種企圖都會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批為「鎮壓革命群眾」。地方政權所能做的，就是在平等基礎上同造反學生談判。[69]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最重要結果就是，它摧毀了地方政權的合法性。隨著激進的中央政策逐步摧毀地方政權的合法性，後者的主要職能——社會控制——也就陷於癱瘓。由此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在缺乏社會控制整套機制支持的情況下，毛澤東能夠控制和指揮他所釋放出來的社會力量嗎？

在過去，地方政權起了「守門人」(gatekeepers) 的作用，即監管權力中心和基層間的聯絡，並擔當貫徹毛澤東指示的實施者。權力的等級結構可以通過對來自北京的信息作權威性的解釋，以及通過對不順從行為進行懲罰，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群眾中出現離經叛道行為的可能性。當然，這個模式存在這樣一種危險，即地方政權可能有意或無意地錯誤解讀北京的信息，正如文化革命前幾個月已經出現的那種情形。但是，對於北京的領導人來說，直接對付幾個守門人要比直接對付億萬人民要容易得多。現在，舊的權威結構正在解體，而一時間並沒有新的權威結構來取而代之。現在所剩下的一切，就是毛澤東的個人權威，這種個人權威並且在文革期間又得到了加強。個人崇拜無疑可以作為動員民眾的一種工具。但是，還不清楚這種崇拜是否能夠代替社會控制機制。有效的領導可能有兩種功能：激發活力和指引方向。[70] 如果一位領導人只能成功地激發活力而不能指引方向，他就將看到他所調動起來的追隨者向別的方向前進，而不是向這位領導人所設計的方向前進。正如下列章節將要揭示的那樣，不論億萬人民如何表白自己對毛主席的忠誠，個人崇拜本身卻並不能幫助人們理解毛澤東的意志，因為毛澤東摧毀了社會控制機制。這種控制機制對他指導和協調民眾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

群眾組織的激增

1966年後兩個月最重要的事態發展，就是運動超出了文化教育機構，實際上進入了社會的每個角落。

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工廠就基本上沒有受到學校裏和社會上各種事件的影響。十六條規定：「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的重點。」它還進一步指明，對於工人來說，這只是一場「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的運動。9月，黨中央通過規定工廠不應在上班時間進行政治活動，試圖限定運動的範圍。[71] 所以，工人所能做的只是在業餘時間更頻繁地參加政治學習和討論中央指示。正規的生產活動沒有打亂，多數工人從未想過他們有一天會被允許像狂暴的學生那樣行動。[72]

有些工廠工人很羡慕學生。這些工人在6–7月間曾被打成「右派」、「三家村分店」和「反革命」等。當看到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學生得到了平反，他們也想恢復名譽。但是，他們在採取行動之前，必須估量一下潛在的風險有多大。通過觀察運動的每一個轉折，他們對官方路線的微妙變化變得十分敏感起來。在他們還不能公開追求其目標的8–9月間，一些工人在單位內建立了秘密的聯繫，以評估形勢，交換意見，更重要的是相互給予支持。[73] 新信息對他們來說是極有價值的，而且為了得到最新消息，他們又在官方渠道以外尋找其它途徑。由於這個緣故，串聯學生吸引了他們。9月，湖北大學被指定為接待站，成為武漢接待串聯學生的大本營。許多心懷不滿的工人下班後到那裏靜靜地收集信息，並在相互間迅速傳遞。各種秘密聯絡網就這樣發展起來，成為未來激進工人組織的胚芽。這裏面的很多人將成為未來十年裏的著名人物。[74]

1966年10月，少數派學生的勝利激勵了受排擠的工人，他們開始變得更加好鬥。他們想，如果學生「右派」的冤案可以平反的話，那麼扣在自己頭上的帽子也可以摘除。所以，他們加快了行動步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爭取造反學生的同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他們的迫害很快引起了學生的注意。學生們認識到，這些工人的遭遇可以作為不利於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新證據。一些造反派學生同工人頻繁接觸，鼓勵他們尋找更多的同志，組織集體活動對當權者施加壓力。從這個意義上看，這些學生發揮了政治企業家的作用。工人積極分子和造反學生之間逐漸形成了眾多的聯絡網，其中最大的聯絡網出現在武昌。在9、10兩月裏，以串聯學生和本地少數派為一方、以本地政權為另一方，並以武昌為主戰場展開了鬥爭。所以，與其它區的同類工人相比，武昌的受排擠工人能和激進學生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也就不足為怪了。[75]

10月末，當形勢變得毫無疑問地有利於激進學生時，工人積極分子最終消除了他們的疑慮，決定公開宣佈他們的存在。10月28日，武昌的聯絡網舉行了第一次獨立集會，批判湖北省委執行的反動路線。一周後，它同二司和其它一些激進學生組織共同舉行了一次群眾大會，提出了「炮轟湖北省委」的口號。[76] 11月9日，一個叫做工人總部的

工人造反組織宣告成立。就在同一天，著名的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在上海正式成立。[77] 直到幾個城市中出現了一批工人群眾組織時，毛澤東才改變了有關不允許成立工人群眾組織的考慮。經過一番猶豫，北京終於在11月13日解除了禁令。[78]

自發工人組織的合法化，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如果允許工人成立他們自己的組織，那麼其它部門的人會感到他們也有資格享有同樣的權利。中國人第一次可以自由地組織任何他們想建立的團體，只要他們表示忠於國家的最高領袖毛澤東。不管這個自由多麼有限，它畢竟喚醒了人們長期受壓制的自我利益或團體利益的意識，並且提供了追求這些利益的機會。在隨後的幾個月裏，五花八門的群眾組織就這樣湧現出來。例如，有藝術家團體、合同工團體、學徒工團體、廚師團體、退伍軍人團體、小學教師團體、中學教師團體、居委會團體、學校教師團體、警察團體、法官團體、檢察官團體、街道清潔工團體、醫生團體、民兵團體、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隊團體和盲人團體，等等。

工人總部建立不久就發生了一次「宮廷政變」。由於最早的領袖是一個中型工廠的工人，所以，大型企業的一些同志強迫他辭職，理由是大企業的人更有資格，因而更便於獲得大家的支持。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又發生了四次「政變」。結果，工人總部的權力逐漸集中到來自幾間特大型工廠的一夥年青工人手裏。這幾間特大型工廠是武漢重型機床廠、武漢鍋爐廠和武昌造船廠等。這一過程導致造反的工人分裂成幾派。例如，工人總部前司令被迫辭職後，與其追隨者一起成立了八・一七革命造反司令部。這個組織在隨後兩年間與工人總部的關係一直不好。[79]

工人總部（簡稱「工總」）在武昌成立之際，另一個工人造反組織在漢口誕生。其誕生地武漢電子元件廠是一間中型工廠。10月，這間工廠的一些工人曾向駐廠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發起猛烈進攻，使得此廠聲名遠揚。工人的行動引起學生造反派和其它工廠受排擠工人的共同關注。在華中工學院學生的幫助下，這些工人成立了小的核心團體，並派人支持其它工廠的工人。不久就形成一個聯絡網，最後演變成於12月8日正式宣佈問世的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造總司」）。[80] 過了

四天，另一個工人激進組織九．一三兵團(簡稱「九一三兵團)在青山區成立。這個區有兩個巨型企業，即武漢鋼鐵公司和第一冶金建設公司。[81] 從此以後，工人總部、工造總司和九．一三兵團成為武漢無數工人造反組織的領頭羊。以後，工人總部設法滲透了武漢六個區的許多企業，而工造總司和九．一三兵團在漢口或青山以外影響很小。九．一三兵團主要從武漢鋼鐵公司和第一冶金建設公司吸收成員，工造總司則主要從漢口的中小型工廠吸收力量。[82]

群眾組織的激增，為造反派打擊中國官僚結構的基礎創造了條件。在1966年11月之前，雖然省市當局受到了猛烈攻擊，學校領導的權威幾乎完全喪失，但在除了教育部門以外的所有部門裏，文化大革命前一直存在的權力關係基本上依然完好無損。因為在這些部門裏，仍然把成年人的群眾組織當作非法組織。而群眾組織的激增，就在所有部門裏都產生了打破權力平衡的威脅，並使整個社會失去平衡。

保守派與造反派

激進工人在12月嶄露頭角，但在多數情況下，他們在每個單位裏仍然是極少數。[83] 對於激進工人組織的興起，多數幹部、中共黨員、共青團員、積極分子和老工人都感到迷惑不解。在他們眼裏，好人不造反，造反沒好人。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造反似乎得到了北京的支持，為什麼省市黨委受到攻擊，為什麼北京容忍日益混亂的局勢。[84] 當造反開始泛濫時，他們逐漸地失去了耐心。

11月9日，二司和其它激進組織佔領了湖北省委的喉舌《湖北日報》的辦公室，並威脅說要關閉這張報紙。中南局(統管中國的中南地區包括湖北、湖南和廣東等省黨的活動的黨組織)加以干涉，但造反派對其警告不予理睬。一周後，這個報紙被迫關閉。[85] 它也許是中國發生此類事情的第一例。[86] 報紙的關閉引起了大批本地居民的憤怒。在接下來的幾天裏，來自各行各業的工人、幹部、學生和民眾包圍了《湖北日報》大樓。他們高喊：「《湖北日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和黨的喉舌」，「我們要看《湖北日報》」。他們想迫使造反派離開大樓。但出乎意料的是，11月18日，張體學發表了一個聲明，承認造反派行動是革

命行動。這個報紙的編輯部和湖北省委都公開做了自我批評，承認報紙在最近幾個月裏犯了「錯誤」。但這個讓步並沒有討到任何人的好。造反派反而得寸進尺。他們在繼續佔領報紙辦公室的同時，又向湖北省委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讓步也使湖北省委的支持者大失所望。他們抗議省委的「投降主義」，並認為到了成立他們自己組織的時候了。[87] 由武漢機床廠一群工人發起，革命職工聯合會（簡稱「聯合會」）於12月2日宣告成立。它很快擴展成擁有40萬成員的組織。[88]

聯合會從性質上講是一個保守組織，在行動上是溫和的。受到造反派和保守派兩面夾擊的湖北省委，卻寧肯討好前者而不是後者。12月15日，湖北省委正式決定停止出版《湖北日報》。人們廣泛認為這是迫於造反派壓力的恥辱投降行為。而造反派卻由此而更加囂張，他們於12月18、19日進攻了老紅衛兵和聯合會。[89]

造反組織在與省市當權者的鬥爭中佔了上風，使一些造反工人壯起膽來，他們開始向單位提出個人要求。當時，所謂的「黑材料」是個焦點問題。根據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下的定義，「黑材料」是工作組和黨委在1966年5月16日至8月8日（發表十六條那一天）期間整的材料。中央文革小組命令，受害者寫的自我批評必須發還本人，各種形式的黑材料都必須公開銷毀。[90] 造反派想知道，除了5月16日以後整的材料外，他們的檔案裏還有別的什麼材料。但單位領導只想交出盡可能少的材料，因為他們考慮到，有些材料太寶貴了，即便是5月16日以後整的也不能交給造反派。[91] 從前的積極分子也反對讓造反派看檔案，因為有些材料也許就是根據他們的揭發形成的。此外，單位領導和積極分子不相信造反派會長期得勢，因為很多造反派過去始終被看作是壞人。

一邊想要公佈更多的材料，而另一邊拒絕交出材料，於是加劇了緊張關係。問題在於，不管是北京還是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都沒有説明白，誰有權力決定哪些材料是「黑」的，哪些不是，誰有權力確認是否交出所有黑材料，以及誰有權力裁決在整理黑材料過程中出現的爭執。[92] 在沒有規則和規則執行者的情況下，來自很多單位的造反派乾脆用武力搶奪一切個人檔案。這種行動常常引起暴力衝突。[93] 此類衝突終於導致了一位女檔案員的死亡，而死者碰巧是聯合會的一個成

員。聯合會抓住這個事件對造反派發動了反攻。在12月25日這麼個下雪天，全市的工人聚集在新華路體育場(武漢最大的體育場)，為這個女檔案員開追悼會。追悼會結束後，他們舉行了一個盛大遊行。很多單位的國旗甚至下了半旗。整個行動本身十分成功，但造反派指出，追悼會正好是在毛澤東誕辰(12月26日)的前一天舉行。他們污蔑聯合會攻擊毛主席的根據是，在追悼會中一些遊行者所舉的死者的畫像比毛的畫像還要大。造反派還發現，聯合會散發的帶有套花邊毛主席語錄的傳單裏，有飛機形狀的標記。據此，造反派指控聯合會想「炮轟」毛主席。對局外人來說，造反派的指責也許聽起來很荒唐，而且整個事情看起來也顯然很愚蠢。但當時每個中國人都知道，甚至對毛的畫像的一點無意的冒犯也是不可饒恕的。所以，聯合會發現很難為自己辯解。[94]

人們常說禍不單行。12月25日事件還沒有平靜下來，從中南局所在地廣州又傳來更不好的消息：在一個武漢造反派團體的壓力下，中南局的一位領導人李一清宣稱，聯合會是一個「保守組織」。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保守」是一個很不好的詞。說某人或某個組織「保守」是一種侮辱，特別是在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狂熱的革命背景下更是如此。聯合會認為李的話是對他們的公然污蔑。聯合會的多數成員長期以來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骨幹，他們怎麼會是保守派呢？1967年的頭幾天，成千上萬的工人包圍了湖北省委，要求追查李的言論。不幸的是，由於天氣的原因讓省委下了臺階。一場罕見的暴風雪使溫度降到零度以下，在這種情況下，戶外抗議不可能堅持太久，行動就這樣流產了。[95]

比天氣更糟糕的是政治氣候。北京對全國的保守力量日益持反對態度。保守派以尊重權威作為道德準則。沒有官方的承認，他們的組織就不能維持下去。

同保守派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67年初造反派卻在高歌猛進。由於受到了北京激進領導人的支持，他們現在要摧毀舊的權力關係的一切象徵。他們的進攻目標是權力機關、當權者個人和保守派。在造反派的壓力下，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在12月作了一些自我批評。但造反派不再滿足於道歉。在1966年的最後一天，他們關閉了武漢市委的機

關報《武漢晚報》。《湖北日報》和《武漢晚報》一直是這個城市的唯一兩家報紙。由於現在報紙被封，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不僅失去了喉舌，而且難於表明它們的存在了。的確如此，事件之後，這兩個權力機關就實際上停止了運轉。就個人當權者而言，武漢沒有誰比王任重更有權勢。12月25日，王任重被一夥造反派從廣州帶回武漢。兩天後，十九個造反組織成立了一個「批王聯合指揮部」。在1967年的頭幾天，他們舉行了三次群眾大會批判前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由於這個城市從前的頭號人物聲名掃地，造反派在攻擊本單位當權者時就再也無所顧忌了。幾乎所有黨的幹部都「靠邊站」了。造反派對他們舉行批鬥會，還污辱他們，帶其遊街。造反派還向保守派發動了猛烈進攻。他們於12月29日進攻了老紅衛兵司令部。1月5日，工總甚至開始逮捕聯合會的領導人。結果，有3,100人被監禁。[96] 武漢落到了造反派手裏。

武漢造反派勢力的興起過程，説明了政治機會對於群眾動員的極端重要性。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幾個月裏，因為老的遊戲規則依然基本未變，敵對行動所包含的高風險有效地遏制了潛在的造反派，使他們不敢出頭露面。直到北京學生揭示了本地政權的虛弱性時，第一批當地學生造反團體才敢宣佈他們的存在。就是在那個時候，成年的造反派還保持著一種低姿態。直到毛澤東決定性地削弱了社會控制機關，而且學生也進一步檢驗了造反的限度之後，成年造反派才開始消除疑慮，順應目前的潮流。當行動可能招致鎮壓時，人們就沒有行動的動力。所以，可以説他們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主要是基於對個人可能得到收益與風險的仔細算計。

第五章

派性剖析

衝突各派的構成

文化大革命的前六個月是個動員階段。到這一階段的末期，武漢居民已經分裂成兩個極端鬆散的派別：造反派和保守派。如前所述，那些在文革前兩月受打擊的人最可能成為造反派。但是，並非這類人中的每個人都參加激進組織，也不是每一個造反派都是以前的受害者。造反派內部也在分化，儘管這些緊張關係還未顯露出來。僅憑文化大革命開始階段的個人經驗，似乎對這個運動的派性問題無法作出全面的說明。外交部長陳毅中肯地指出，「學校裏分成幾派，有人說這是工作組造成的。實際上，這是社會上各階級、各階層的體現，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山東全部沒有派工作組，也分成幾派。這是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鬥爭的反映。」[1]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派性與文革前中國的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有必要對這個問題做一些分析。

保守派組織的構成

一般來說，文化大革命前與政府保持比較密切關係的人在運動中容易成為保守派。這種情況不僅在學校存在，在工業部門也存在；不僅在武漢存在，而且在其它地方存在。事實上，在文革的十年間始終都是如此。在運動過程中，保守組織常常攻擊激進組織是「牛鬼蛇神」

的防空洞。而造反派並不可能用同樣的話來回敬對手。保守派為其「純正的」家庭出身和文化大革命前的良好政治表現而驕傲。造反派幾乎無法否認保守派在這些方面擁有傲人的資本。毛澤東也指出，中共黨員、共青團員、積極分子和普通工人的多數參加了保守組織。但他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對他們的蒙蔽是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根源。[2]

其實並不是那麼回事。隨著舊權力結構的瓦解，文化大革命為每個人都提供了機會，讓人們在激進組織和保守組織之間作出自己的選擇。「無論你是否參加紅衛兵，參加哪一派紅衛兵，都是完全自願的。這時候已完全沒有必要對黨組織故意表現積極了。」[3] 多數人自願加入保守團體不是因為他們受到從前領導的蒙蔽，而是因為他們真誠地相信舊制度結構基本上是良好的。1949年以後，多數工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此外，在他們看來，多數黨的幹部是值得信任的，因為他們極少享有經濟特權，幾乎沒有濫用過職權來謀取個人金錢好處，而且總體而言他們與下屬關係不錯。雖然一些人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受過打擊，但多數工人總是被當作積極分子或同盟軍而得到依靠。所以，他們找不出多少理由來造這種基本良好的制度及其運作者的反。

造反派組織的構成

什麼樣的人可能成為造反派？在學校裏，造反派是那些被排斥於老紅衛兵組織之外的人。在工廠和其它單位裏，他們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或在運動最初幾個月裏被疏遠的人。[4] 所以，更多的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參加激進組織而不是保守組織，也就不足為怪了。[5] 為了把政治負債轉變成政治資本，一些造反派理論家提出了「階級關係變化論」來解釋這種現象。他們認為，1949年以來，中國的階級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許多階級出身好的人已經墮落成「工人貴族」，並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而以前的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已經變成無產階級。在人民共和國的頭十七年裏，後者常常在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迫害。他們構成了一個新的被壓迫階級，所以他們挺身而出

反對當權派是完全正義的。[6] 不僅如此，那些激進理論家還認為，在當代中國存在著兩個基本階級：由他們所代表的造反階級，以及由他們的敵人所代表的保守階級。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將在社會主義發展的整個時期裏都繼續存在。這個理論在造反派的普通群眾中很受歡迎。[7]

但是，階級出身並不是派性組合的唯一變量。例如，工總的頭頭家庭出身都不錯，其中有三個是中共黨員(參見表5.1)。為什麼他們都成了造反派？對他們過去經歷進行更細緻的考察，就會發現他們並不像其階級成分所表示的那樣「純正」。換句話說，他們都有對社會不滿的理由。

表5.1　1966年工總的主要領導人

姓名	性別	年齡	階級出身	中共黨員/共青團員
朱洪霞	男	34	城市貧民	非
胡崇元	男	31	貧農	中共黨員
姜詩成	男	29	貧農	非
胡厚民	男	29	獨立勞動者(店員)	中共黨員
李洪榮	男	39	下中農	中共黨員
余光順	男	33	貧農	非
劉　群	男	23	貧農	非
侯良正	男	33	獨立勞動者(店員)	非
周光杰	男	34	城市貧民	非
李成洪	男	24	職員	非

資料來源：《關於鋼工總問題調查報告》，1967年7月。

在文化大革命前，工總的多數頭頭都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受到處分。[8] 據說朱洪霞在1949年前參加過秘密會道門。1955年，他因為與策劃潛逃香港的一個組織有關係而受到處分。1957年，他因為同情右派而受批判。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與姜詩成和另外兩名同事被打成「三家村分店」成員。

胡厚民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年青人，他常說，「如果不能流芳百世，那麼我寧願遺臭萬年。」1961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在一年預備期過後，他並沒有立即成為正式黨員，因為很多人認為他太有野心、太狡猾、太懶。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他想取得工人俱樂部主任的職位，但黨支書和工作隊沒讓他當選。這兩件事使胡對領導十分不滿。在文化大革命最初階段裏，他也被打成廠裏的小「三家村」成員。

李洪榮是另一個中共黨員。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他受到留黨察看處分（一種黨內紀律措施），因為發現他與幾個婦女有不正當關係，非法倒賣布票和糧票牟利，還放高利貸。

余光順在1957年因詐騙錢財被判處七年徒刑。侯良正於1958年被定為「壞分子」，並被開除出廠。周光杰兩次被開除公職，一次是在1951年因為幫助一個資本家偽造稅務報告，另一次是因為腐化。

對這些個人的指控是否具有充分根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感到自己是受害者。所以，儘管他們家庭出身好，但仍然想要看到現存權力結構發生變動。

有些家庭出身好而且從未受過處分的人也加入了激進組織。他們這麼做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是「落後分子」。長期不被信任、遭受批評和歧視，使他們很不舒服。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們雖然有氣，但必須強忍著。現在他們可以發泄了。[9] 第二，運動初期，他們可能有親戚被打成「牛鬼蛇神」。在中國古代，一個人犯法會牽連親戚的。這種做法沿續到了1949年以後，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則達到了極端地步。所以，別人的污點可能使另一個人被動地改變身分。只要身分有了變化，此人的行為就會相應地發生變化。由於這個緣故，許多本來會參加保守組織的人卻反而加入了造反派組織。他們加入激進團體常常會使朋友感到驚訝，因為他的朋友原以為他會站在保守派一邊的。例如，一位年青工人是單位團支部書記，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一直表現積極。但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運動高潮中，他的一個在同單位工作的叔叔被揭露為「1957年的漏網右派」。由於叔叔的緣故，他的地位急速淪落而被人看不起。他知道，不管怎樣真誠地同叔叔劃清界限，他也絕不會再得到領導和同事的信任了。為了洗清

自己的名聲，他就必須首先澄清他叔叔的名譽。這個年輕人後來成為其單位工總分部的頭頭。[10]

理解階級出身不好和中等的人為什麼會成為造反派並不難，有時難的是解釋為什麼大批階級出身好的人也會加入激進團體。但一般來說，捲入運動的人都能夠清楚地指明他們同事之所以會參加造反派的具體原因。[11]

複雜性

有時，「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籠統稱呼卻會使人誤入歧途。在本單位保護當權者的人卻參加了全市性的激進組織，這並非是不尋常的事；反過來，在本單位攻擊上級的人卻加入了全市性的保守組織，也是不奇怪的事。這些情況常出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存在雙重權力結構的單位，即由工作隊為首的權力結構和由黨支部領導的另一個權力結構。前者的支持者必然與後者的支持者發生矛盾。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可能成立不同的團體，一個攻擊工作隊，另一個攻擊黨支部。

為了加強在單位內部政治層面爭權奪利的分量，所有基於單位的團體都會走出去將他們同強大的全市性組織聯繫起來。在內部問題上互相矛盾的團體不可能一起參加同樣的全市性組織。支持黨支部的可能成為造反派，而反對工作隊的可能與保守派結盟，或者相反。[12]

在探討文化大革命的派性時，一個普遍的做法就是，通過認定人們加入的主要全市性組織來給他們分類。這樣一來，在武漢，那些加入二司或工總的人就被稱為「造反派」，而那些加入老紅衛兵或聯合會的人就被稱為「保守派」。這種劃分是有用的，但可能是不準確的。參加過運動的人建議說，更好的劃分方法是依據人們在本單位內部事務中所處的地位。對研究者來說這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但當我們使用「造反派」和「保守派」這些籠統稱號時，這個勸告會使我們的頭腦更清醒一些。

對「保守」這個詞需要作進一步的限定。保守派常常被人稱為「保皇派」，指的是他們忠於從劉少奇到他們工作單位黨的書記這些當權者。

當劉少奇成為運動對象的消息最初傳到武漢時，保守派確實大為震驚。但造反派的反應也是如此。一旦證實劉少奇真的「犯錯誤」時，保守派與造反派同樣批判前國家主席。[13] 就王任重這個例子來講，在中央文革小組把他趕下臺之前，武漢造反派就不怎麼敢挑戰這位省裏的前第一號人物了。當造反派初次得知王被逐出中央文革小組時，他們像保守派一樣震驚。[14] 正是保守派在武漢舉行了第一個批判王任重的群眾大會。[15] 保守派對待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態度更加有趣。當這兩個權力機構領導反對串聯學生和本地「少數派」時，保守派是他們的熱情支持者。而一旦他們在北京的壓力下對造反派作出讓步，保守派在同省市當權者打交道時也採取了拒不合作的態度。在基層，保守派與他們單位的當權者命運與共。他們願意徹底維護那些幹部，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形成的主從關係已經把他們與當權者緊緊地捆綁在一起，任何對後者的攻擊就等於是對他們的打擊。為了保衛自己，他們必須保衛那些當權者。保守派對更高級幹部命運的關心遠不如對他們直接上級命運的關心，這一事實表明驅使他們參與運動的動力並不是對冠冕堂皇的思想問題的關切，而是對他們至關重要的切身利益的關注。從本質上講，保守派努力保護的不是當權者個人，而是他們從中受益的現存權力分配結構。[16]

逍遙派

需要注意的是，並非每個人都積極地參與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派性鬥爭，還存在著人稱「逍遙派」的旁觀者。在運動的初期，逍遙派主要由三個類型的人構成：被排斥者、免費搭車者和不願意參與者。「被排斥者」是指由於家庭出身極差而不被准許參加政治活動的人。任何組織都不想讓人斥責為「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所以他們一般拒絕吸收明顯的「牛鬼蛇神」作為成員。此外，在派性鬥爭中為這種人採取明確的立場，會冒太大的風險。這樣被排斥的人是不情願的逍遙派。「免費搭車者」是那些正式加入各種組織但極少或從不參與集體行動的人。他們想從其它人的集體努力中獲益，但沒有作貢獻的動機。「不願意參與者」是那些在政治上冷淡的人。因為他們感到從文化大革命中既無所失

也無所得，或者因為他們政治上十分無知。例如，中不溜秋的工人非常可能屬於這一類。他們之所以是自願的逍遙派，是因為他們既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也不太在乎哪一邊是對或是錯的，只希望運動別對他們的生活打擾得太厲害。[17] 除了第三類以外，逍遙派在派性鬥爭中還是有所偏袒的。雖然他們不參加集體行動，但他們不做任何對他們偏愛的那一派有損害的事。逍遙派在人數上絕非微不足道。在很多單位裏，他們至少佔職工總數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逍遙派的人數還會有巨大的增長。

參與集體行動

在前面我們已經清楚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派性源於中國存在了一段時間的潛在矛盾。但是，那些潛在矛盾的存在還不足以引起動亂。一個人渴望得到某件東西是一回事；他參與集體行動去追求那個目標則完全是另一回事。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投身於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派性鬥爭？他們怎樣才能克服本書緒論中討論的行動問題和集體行動問題呢？

行動問題

很多人認為，中國人都毫不猶豫地投身於文化大革命中去。與這種觀點相反，第三章和第四章表明，直到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對政治行動的制度約束之時，自發的行動才開始出現。

毛澤東首先通過使某一類人成立自由構成和自主運作的團體的行為合法化(比如，由出身好的學生成立的紅衛兵)，來擴展可准許行動的範圍。接著，他通過允許不滿現狀的社會團體要求政治發言權，來擴大可准許行為者的圈子。最後，他通過拒絕給予下級政府支持，來解除現存實施統治機關的武裝。他強調「造反有理」，就不僅使挑戰現政權正當化，而且使社會控制非正當化。通過改寫遊戲規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政治舞臺，其大門向長期習慣於被排斥於政治之外的人們開放。這是自發政治行動發生的先決條件。

下列事實支持了這個觀點。第一，直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大地削弱了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權威，並從而極大地降低了作為挑戰者要承擔的風險之時，造反派才成為武漢的一個有望成功的政治力量。第二，正是在社會控制最先受到破壞的地方，造反派才最先成為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這也正是學生造反派比工人造反派更早產生的原因。第三，中國的權力結構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解體：首先是中央領導人如劉少奇和鄧小平，其次是地區領導人，最後是基層的當權者。由於中國社會存在的是金字塔形權威結構，所以一旦它喪失最高領袖的授權，整個等級制組織就迅速瓦解。造反派本身決不可能打倒強而有力的社會控制體系。

集體行動問題

運動參與者在參加團體行動之前，他們還需要克服集體行動問題。那些加入老紅衛兵組織的人根本沒有遇到集體行動問題。在老紅衛兵成立之時，加入組織並不涉及任何代價或風險。相反，屬於這樣一個特權團體還是一種榮譽。其它群眾組織是在不同的政治環境裏產生的。它們都不是特權團體。如果它們所追求的是提供某種公益(維持現狀)或者消除某種公害(改變現在權力分配結構)，那麼為什麼有人會參加集體行動呢？這或許存在六方面原因。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早期，每個人都感到必須加入一個組織的無形壓力。因為，不這樣做就會被視為「在偉大的政治運動中不積極」，這是一個大多數人都要避免的嚴重指責。[18] 不僅如此，一個人沒有成為某團體的成員，常常被當作此人有嚴重問題而沒人要的證明。[19] 由於盛行的政治氣氛強迫每個人都得加入一個組織，人們當然傾向於參加到能夠為他們利益服務的那一邊去。在此，社會壓力作為選擇性激勵的一種特殊形式，迫使中國人至少得參加一些集體行動。

第二，公益和非公益之間的區別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對於造反派來說，尋求改變他們的社會地位既是公益也是非公益。作為公益，在於他們如果不集體地打破舊的權力平衡、促進政治改造的話，就不可能改變他們的個人地位。作為非公益，在於如果他們自己不努力爭取

的話，有利的政治環境並不會自動地導致個人社會地位的改變。

對於很多保守派來說，他們所追求的東西也具有雙重性質。他們之所以奮力維護現存的權力分配模式，是因為如果造反派佔了上風的話，就會危及他們在單位裏的有利地位。由於與他們的前途利害關係甚大，而非僅僅一般地維持現狀，他們就有了加入保守派的集體行動個人激勵，特別是當造反派的瘋狂行動正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時更是如此。此外，他們從經驗中看到，那些挑戰政權的人沒有好結果，而那些在政權遭受攻擊時表示忠誠的人會受到獎勵，這讓他們傾向於把加入保守組織作為一種投資。當然，投資必有風險。但為了取得高收益，冒點風險是值得的。總之，保守派以及造反派都具有做其所做事情的選擇性激勵。

第三，包括激進派和保守派的所有組織，都採用了以各單位為基礎、由無數小團體組成一個龐大的全市組織的聯盟式結構。這種多細胞的組織結構有兩個優點。一方面，在相互熟悉的成員追求直接現實利益的小團體裏，成員自己就容易辨別出「免費搭車者」，並且可以有效地對他們實施社會懲罰。用這種方式就可能促進更多有條件的合作。另一方面，只有全市性的體系才能為小團體提供必要的組織支持，使他們在本單位的激烈派性鬥爭中能夠生存下去，而且創造了小團體能達到自身目標的良好宏觀環境。

第四，在促進最初的動員方面，運動發起者發揮了重要作用。運動發起者並不一定是政治企業家。例如，造反運動的第一批發動者是來自北京的學生，而這批人既不在他們自己的學校造反，對武漢政治也沒有個人興趣。可北京學生培養出地方「少數派」學生團體，由這些人動員心懷不滿的同學開展了學生造反運動。在學生運動得到鞏固後不久，學生積極分子就同「少數派」工人建立起聯繫，鼓勵他們挑動心懷不滿的工人行動起來。在這一過程中，有些學生和工人成為政治企業家，他們促進了造反隊伍的擴大。

第五，對於參與者來說，集體行動具有很小或甚至沒有財政成本。串聯是免費的。在1966年末的幾個月裏，允許學生免費乘火車和汽車。他們可以去想去的全國任何地方。以後，又給予工人同樣的特權。城際和城內串聯對於動員是極其重要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政府財政承擔了動員的成本。與此類似的是，團體行動所必需的經費和設備也直接或間接地由政府財政來提供。動員中的參與者所付出的成本只有時間。但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樣，學生擁有過多的時間，所以他們願意參加集體行動。工人和其它人不管是堅守崗位還是離開崗位參加政治活動，都有工資保證。由於參與者不必由個人承擔聯絡和組織成本，而且他們行動的機會成本接近於零，所以一旦消除了政治行動的風險，他們就願意從事集體行動。

第六，對於潛在的參與者來說，成功地達到目標和成功的動員會使集體行動更富吸引力。很多造反派開始參加集體行動，是因為前一階段別人的造反行為帶來了預想不到的成功，比如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對造反派的讓步。這就向他們「證明」，集體的努力是很有效的。[20]一旦團體的規模越過一定的門檻，並且新的參與者不再面臨任何重大個人風險，此時即使不太堅定的造反派也會追隨他們了。[21]

派性的特徵

派性的強度

社會存在的潛在矛盾是億萬人民投身於這個史無前例運動中的主要原因。對這個觀點可以作進一步的發揮，可以進一步指出，在那些文化大革命前潛在矛盾就已經尖銳的單位裏，派性就會更加強烈。武漢存在成分單一、成分混雜和兩極分化三種類型的單位，它們在潛在衝突的強度方面各不相同。在成分單一的單位裏，絕大多數職工的出身類似。例如，負責機密或重要工作的黨政機關和兵工廠通常只招階級出身好的人。由於它們的純正性，那些單位極少成為過往歷次政治運動的重點部門。因此，那些單位裏的內部衝突比別的單位更不明顯得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那些單位裏的保守派多數通常佔據絕對優勢，使極少數造反派無法鬧出多大的事來。[22]

兩極分化單位從完全不同的階層中吸收職工。最好的例子是文化教育和科研機構，那裏的多數職工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少數是革命幹部和階級出身好的勤雜工。在文化大革命前，那些人相互

間就不斷發生衝突。在文革運動中，造反派勢力通常主導著這些單位，所以那些單位的派性比其它單位表現得更加強烈。[23]

成分混雜的單位處於成分單一和兩極分化單位之間。在文化大革命前，這種單位裏的潛在對抗不如兩極分化單位明顯，但比成分單一單位尖銳些。因此，保守派和造反派都不能在這裏建立絕對優勢，而這些單位裏的派性政治就可能更加複雜一些。[24]

造反派陣營的內部分化

由於人們是出於不同原因而成為造反派，所以也就不可能存在一個鐵板一塊的造反派集團。事實上，造反派分化成一些更小的派別，它們之間的衝突可能跟造反派和保守派間的鬥爭同樣激烈。下面四個例子有助於解釋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

例一，在一所重點中學裏，造反學生分為兩個集團。一個附屬於二司，另一個附屬於三司。前者主要由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組成，後者主要由家庭出身好但被認為「落後」的學生組成。他們之所以都被老紅衛兵所排斥，或者因為他們「不純正」的家庭出身，或者因為他們不太好的政治表現。受排斥是他們成為造反派的主要原因。但是，這兩個造反派團體心中各有不同的目標。由於二司分支的成員是因為優異學習成績和良好表現而受老師和領導寵愛的好學生，所以他們不願意批判那些老師和領導。但三司的分支不僅攻擊學校教師和領導，而且攻擊他們所稱的「學生團體內的少數當權派」，即以前的好學生。雖然在城市政治活動中三司一般比二司要溫和得多，但在這個學校裏，情況卻恰恰相反。[25]

例二，一所中學的教師分化為三個團體：一個是由階級出身好的從前積極分子組成的保守派組織；一個是工總的附屬組織，其成員多數是不受學校領導信任的出身好的教師；還有一個是自稱「紅教工」的團體，其成員主要是出身非無產階級家庭的人。第二個團體最激進，因為其成員不喜歡從前的學校領導依靠積極分子處理政治事務，依靠出身於非無產階級家庭的教師處理教學事務。他們認為自己這一類人受到了冷落。第三個團體不喜歡政治積極分子，同時也看不起那些業務不佳且屬於第二個團體的人。工總的附屬組織集中攻擊校長（兼黨支

部書記），而紅教工則對當權者抱有矛盾的情感，因為他對自己相對不錯。[26]

例三，在某個醫院裏，存在兩個激進團體。一個主要由曾經被認為落後的，然而出身好的勤雜工組成，另一個則主要由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醫生和其它專業人員組成。前者集中火力批判醫院院長，而後者則以院黨委書記為主要攻擊對象。他們之所以選擇不同的目標，是因為前者認為院長代表了專業人員的利益，看不起勤雜工，而後者認為黨委書記要為醫院裏歧視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知識分子的行為負責。[27]

例四，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認定一家大的交通公司已經「爛掉」。很多幹部被開除公職，由來自其它單位的工作隊成員取而代之。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被打成的「四不清」幹部及其同情者（多數是辦公室人員）起來反對新的當權者，他們認為前工作隊要為他們受的迫害負責。但是，他們的行動難於得到另一個造反派組織的支持，後者的多數成員是落後工人。後一個團體集中火力攻擊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前管理公司的幹部，因為新領導的上任時間很短，而以前的領導曾在多年中粗暴對待落後工人。[28]

這四個例子表明，造反派團體的構成以及造反派陣營的內部衝突與文革前中國社會的主要分歧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即同幹部與群眾之間、階級出身好的人與階級出身不好的人之間、政治積極分子與落後分子之間的緊張關係，都有不可分割的聯繫。造反派隊伍裏的不同分子確實有一些共同的目標和態度，因為落後分子和階級出身不好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前都受到過打擊。但在當攻擊當權派和從前的積極分子時，他們之間的互相猜疑並沒有消失。面對保守派的巨大壓力時，他們可能結成一時的聯盟，但不同或對立的動機，最終把他們引向互相廝殺的戰場。

內部組織問題

群眾組織的聯盟結構具有使成員保持高度積極狀態的優點，但也有缺點。因為核心集團和它各個附屬團體之間的垂直關係，以及小團體之間的橫向關係，都呈現著鬆散的、分權化的特徵，不統一的體系

終究與大規模的動員不相適應，而且常常妨礙其戰略的有效實施。核心集團也許偶而下發指導方針，但是否執行已發出的指令則由所屬團體決定。小團體也許偶爾會互相幫助，但他們並沒有責任這樣做。沒有一種獎懲制度，這種組織就不可能統一行動。[29] 造反派組織在內部協調方面一般比保守派組織更加鬆馳，在紀律方面更加懈怠，他們常常難以控制其下屬團體的行動。保守派組織相對地更集權化一些，因為他們的領導人通常都擁有造反派所不具備的非常重要的資源——在以前存在的社會政治組織裏的有利地位。他們可以利用那些關係來動員和組織其支持者。

在基層，互相爭鬥的派性團體也沒有力量對他們的成員進行嚴格的紀律約束。一個人也許會屬於幾個團體。有些成員也許從來就不參與團體行動。在文化大革命反官僚的環境裏，許多人排斥任何形式的領導和紀律。結果，有些組織僅僅比無法無天的團夥強一點點。

在社會控制陷於癱瘓、新成立群眾組織缺乏內部控制的情況下，發生偶然衝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參與者「壞」或者「天生好鬥」，而是因為沒有辦法防止人們訴諸武力。在正常時期，政府壟斷了使用暴力的權力。作為策略來實施的有組織暴力受到政府的嚴格限制，或者至少代價高得讓人望而卻步。如果任何個人或團體不經授權就使用暴力來反對別人，那麼政府就會嚴懲他們。然而現在，如果誰使用暴力來解決爭端的話，已不存在能夠可靠地實施懲處的機構了。由於規則和規則實施者的缺失，就使得甚至好人之間在利益發生衝突時，也會去運用暴力。在敵意普遍存在的氣氛裏，甚至在某個單位中發生小衝突的話，也可能被視為大組織傷害對手計劃的一部分。所以，敵對情緒和戰鬥行動就會升級，一個火星就可能點燃燎原大火。

微觀政治與宏觀政治

對多數運動參與者來說，真正重要的是他們各自單位內的問題，而不是宏偉的意識形態問題。例如，多數造反派主要關心的是如何補償個人所受過的委屈。他們從個人角度仇視本單位的一些領導和積極分子。這種個人化的衝突是舊的官方組織化惠顧制度（the old system

of officially organized patronage) 的直接產物。這種舊制度把社會控制和獎勵個人化帶到了與其它社會環境大相徑庭的程度。[30] 它使人們把憤怒從制度偏離開來，集中到特定的個人身上。

如果派性的重心在個別單位的話，那為什麼以單位為基礎的小團體還要附屬於全市性的組織？以這種附屬來威嚇本單位內的對立團體，或者要在這方面與對立團體相抗衡，是主要的原因。如果其它團體建立了對外聯繫而自己團體卻沒有這樣做，那麼這個團體是愚蠢的。而它一旦成為全市組織的一部分，小的團體就要與它的保護組織共同命運了。為了自己的利益，它必須在城市政治問題上與保護者相一致。也就是說，是結盟促使了一致，而不是相反。

此外，造反派喜歡在自己單位以外活動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中有很多人過去的表現「不純正」。如果他們的活動局限於單位內，那麼不光彩歷史這種令人難堪的標記，會被對手用來攻擊他們。但在外面活動，他們就可以隱藏自己的身分，從而能像別人一樣幹事。[31] 第二，在多數情況下，造反派是單位裏的少數。擁有外部關係可以使他們看起來比實際上更加強大。當各個單位的少數聯合起來時，他們就能壓倒任何單個單位的多數。造反派懂得，只有當造反派在城市政治中佔了上風時，造反派個人才能實現他們在本單位的目標。

保守派作為多數，沒有感到迫切需要建立與外部力量的聯繫。如果運動被限制在每個單位之內的話，那麼他們對少數派的優勢會使後者屈服。由於這個緣故，除了老紅衛兵以外，全市性的保守派組織都要比激進派全市組織成立的遲。[32] 雖然保守派不太喜歡越出單位的邊界，但只要感到造反派為所欲為時，他們就會團結起來同造反派鬥爭。

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

毛澤東對造反的鼓動以及他為使現存權力結構非正當化所作出的努力，是億萬中國人投身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必要條件。但並不能因此就說，作為運動發動者的毛澤東能夠控制他所喚出的力量。事實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創造了這樣一種局面，它使毛不能有效地同其追隨者溝通，從而不能有效地實施他的領導。

產生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的溝通新模式包含了四項新變化。第一，個人崇拜的盛行，使正常的公開談話成為教條式的陳詞濫調。雖然在革命詞藻的語言外表背後存在著不斷的資源再分配鬥爭，但參與者的真實動機卻極少公開表露。因此，信息流中的信息從一開始就被歪曲了。

第二，在完備的等級性溝通管道被摧毀後，北京的信息要傳達到群眾那裏，就不得不通過媒體來宣佈，通過群眾組織的小報以及通過口頭傳達。信息管道的多元化，降低了單個領導人或領導人小團體壟斷信息溝通的可能性。

第三，在地方權威的守門人作用被剝奪後，就沒人有資格聲稱，他或她對北京信息的解釋比其它人更權威。失去了等級制的守門人結構的幫助，毛澤東同他的追隨者之間的溝通就變得極端不穩定。這種情況使人們有可能隨意解釋北京的信息，並按照自己的理解來採取行動。[33] 他們也就能夠利用官方思想的高度抽象性來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更糟糕的是，失去了地方權威的制約，就使某些人更有可能為實現派別利益而編造北京消息。[34]

第四，省級以下支持機構的解體，就使毛澤東失去了軀幹、胳膊或腿，只剩下一尊威嚴的頭。對規則實施機構的摧毀，使得毛澤東難於把偏離他所要求道路的潮流糾正過來。以後，他會面臨這樣一種困境：追求激進目標的話，他必須依賴於動員造反派，而這樣做總是導致混亂；僅僅恢復最低程度的法律和秩序的話，他就必須重建地方權威機關，這又不可避免地會恢復舊的權力關係。兩種結局毛澤東都不想要，但在接下來的十年裏他又不能解決這個困境。相反，運動以日益增大的頻率從「左」到「右」、從「右」到「左」地來回搖擺。

第六章

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衝突，1967年1–4月

權力真空

解除禁令，允許工人自由結社，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作出的最大膽的一個決定。如果只允許學生自由成立團體，雖然也會打亂國內秩序，但容易恢復。而一旦賦予工人造反的權利，就會動搖社會的基礎。

1967年初，中國徘徊在無政府狀態的邊緣。由於地方權威實際上已經喪失，人們的行動就不存在機構的約束。在缺乏政府強力管制的情況下，沒人對做危害社會秩序的事進行自我約束。[1] 結果，無法無天的事情隨之發生。政府的缺位，很快促使當代中國媒體所說的「經濟主義泛濫」。[2]

在通過組織手段來爭取經濟利益方面，國營企業的合同工和臨時工最有積極性。同正式工相比，合同工和臨時工不僅拿的工資低，而且很少獲得補貼。更重要的是，由於不享有正式工那樣的工作保證，他們可能會因為一點過失就被開除。他們特別容易受到當權者的報復。所以，他們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獲得工作保障。迫於合同工和臨時工的壓力，湖北省委同意，所有於1966年6月1日以後被開除的人應准許回到原單位，而且從此以後不應當再開除合同工和臨時工。[3]

合同工和臨時工的勝利，刺激了「經濟主義」的繼續泛濫。無業青年要求得到工作。集體企業職工提出，應把他們的單位升格為國營企業。在農村勞動的城市知識青年不經准許就返回城市。1960年代初被

勸或強迫遷至農村的工人和幹部，則要求得到他們失去的工作。[4] 甚至國營企業的一些正式工也趁機爭取更高的工資或更多的津貼和好處。個體商販也趁機為自己謀利益。他們攻擊稅務部門，強迫他們返還自己已經交的稅，還要求減低稅率，改革稅收體制。此外，人們強佔從前資本家或公家的空房。有人甚至公然搶劫公家的倉庫。[5]

「經濟主義」給中國脆弱的經濟增添了巨大的財政負擔，但它只是由權威缺失引起的危險傾向之一。為了消滅無政府狀態，毛澤東認為有必要重建擁有足夠權力的公共權威機制。他當時面臨兩種選擇，或是恢復舊的權力結構，或是建立新的權力結構。毛澤東當然不想讓他的革命事業半途而廢。所以，他選擇了後者，也就是將文化大革命向前推進一步，號召奪權。

奪權、派別重組和混亂

奪權並不是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運動階段。[6] 相反，它只是毛澤東為了避免中國經濟崩潰而採用的一個權宜之計。[7] 當領導人鼓動奪權時，他們並沒有預計到這會帶來更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奪權涉及的基本問題有：在何種條件下，誰有權利奪權？要奪誰的權？奪什麼權？奪權行動如何展開？新的權力結構應該是什麼樣的？北京關於所有這些問題的信息都是模棱兩可和相互矛盾的。

結果，奪權成為一場沒有規則和規則實施者的遊戲。毛澤東是基於這樣一個假設提出他的奪權思想的，即能夠不費氣力地把造反派聯合起來，然後依靠他們從走資本主義當權派手中把權力奪過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設想。為了與舊政權作鬥爭，在近幾個月裏，不同的造反團體已經互相聯合起來，但對於他們的野心來說，掌權也實在是太出乎意料了。現在，造反有可能成為獲得社會地位的階梯，至少有些造反派可以在政權裏得到一官半職。成為新的當權派的前景決定性地改變了造反派的未來計劃，並改變了他們的策略和行為。由於每一個團體都想盡可能地獨自掌握權力，內部鬥爭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北京發出的奪權號召，立即啟動了武漢造反組織之間的派性戰爭。

在武漢，工總是響應北京向所謂走資派奪權號召的第一個造反組織。1月14日，它邀集13個團體來討論如何在這個城市奪權。它們很快就《致全市人民的公開信》達成一致，但討論到如何進行奪權和怎樣分配權力等具體計劃時，卻頓時陷入僵局。協商無果而終，公開信也無法公佈。

雖然協商終止，但奪權行動卻在幕後加緊準備。每一個組織都在尋找同盟，同時又密切注視著對手的行動。武昌的紅樓是工總、二司、九·一三兵團及其它一些造反組織總部的所在地，這時就成了陰謀的中心。張體學為了「將功補過」，主動派代表到紅樓，表示他願意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與那裏的造反派合作。這一姿態表明，過去的當權派並不打算在造反派面前設置障礙。但問題仍然存在，即由誰來奪權。

1月20日，經工總和二司提議，14個組織在武昌重新進行協商。在經過三天的爭吵之後，它們於1月23日宣佈已經就「大聯合」達到一致。新的最高機構稱為武漢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以工總為主。一般來說，總司令部應當處理奪權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並在權力轉移期間充當省市兩級臨時政府。但事實表明這只是一種主觀願望。人們發現，加入總司令部的工造總司卻在漢口秘密地組織另一個「大聯合」。這個「大聯合」由長江北岸的大約二十個團體組成。工造總司陰謀獨吞武漢市級權力，同時與其它團體分享省級權力。

在接下來的三天裏，協商中的爭吵達到白熱化。與會者在三個問題上互不相讓。第一個問題是，是否奪權的條件已經具備。工總、二司、九·一三兵團及其它駐紅樓的所謂「紅樓」聯盟認為，條件已經成熟，因為它們對自己主持奪權的能力非常有信心。此時工造總司已經完成接管市級政權的安排，並知道它作為武漢第二大的工人造反組織，誰也不能剝奪其參與奪取省級政權的合法資格。所以，它也同意時機成熟的說法。然而，那些還需要更多時間來提高其討價還價地位的組織，如三司、新華工和新湖大卻認為，奪權行動應當推遲。

第二個問題是，哪些組織將成為總司令部的常委會成員。二司提議，常委會應由五個成員組成——四個工人組織加上一個學生組織，而那個學生組織就是二司自己。當然，這個建議遭到其它學生團體的反對。經過激烈的爭論，四個工人組織（工總、工造總司、九·一三兵

團和紅色工人造反兵團）和三個學生組織（二司、三司和新華工）被選為常委會委員。

第三個問題涉及到武昌總司令部與漢口那個總司令部的關係。以前，工總與工造總司就勢力範圍的劃分曾經達成過默契：武昌是前者的勢力範圍，漢口是後者的勢力範圍。由於這個緣故，工總對工造總司在江北奪權的企圖不便於表示反對。所以，由二司牽頭批判工造總司，試圖迫使後者立即解散這個偽總司令部。而工造總司明確表示拒絕。1月25日，總司令部決定，對省級政府的奪權行動將於次日下午三點正式開始。但是，二司關於漢口總司令部必須解散的要求激怒了工造總司，它宣佈撤出「大聯合」。

為了避免奪權計劃的流產，總司令部敦促工造總司回到大聯合中去。後者卻主張，如果不把二司從常委會中清除出去，它就不參與奪權行動。二司「單一學生組織」計劃所得罪的其它學生組織，也支持這個提議。最後達成了一個妥協：仍然保留二司在常委會中的席位，但撤掉了二司在常委會中的主要代表。因此，當1月26日省級權力易手之時，二司並沒有它的代表在場。

湖北電臺立即播送了造反派接管省級權力的新聞。前省長張體學要求省裏各市、地、縣的前領導人都要與新政權合作。

然而，前當權派的合作並不能防止新領導層的內部分歧。紅樓聯盟意識到，缺少二司的參與就會極大地削弱其在常委會中的勢力，所以它們在權力轉移四小時之後就發出一個聯合聲明，宣佈這次奪權行動無效。隨後，武漢造反派分裂成兩個陣營。

雙方都沒有放棄奪取權力的打算，但它們再也無法合作了。1月30日，工總及其同盟者舉行了一個批判張體學和宋侃夫的群眾大會。兩天後，張體學又成為工總對手組織的群眾大會的批判對象。2月2日，工總及其它十二個組織成立了「湖北抓革命促生產革命造反司令部」。次日，工造總司及其它43個組織建立了「湖北抓革命促生產紅色造反司令部」。2月5日，革命造反司令部在《長江日報》上發出了一個反對「經濟主義」的「緊急通知」。次日，在《湖北日報》上刊登了一個內容幾乎相同的另一個「緊急通知」，署名紅色造反司令部。[8] 這一類競爭導致兩大陣營之間的關係持續惡化。

2月8日，工總、二司及其它十個組織在《長江日報》上發表了一個聲明，指名攻擊工造總司及其同盟者是「托派」、「分裂主義集團」和「湖北黑省委的別動隊」。這個聲明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在此月餘下的日子裏，所謂「二八聲明」成為武漢的焦點問題。反對者咒罵這個聲明是「一株毒草」。他們每天都圍攻《長江日報》的辦公室，指責這份報紙「挑動群眾鬥群眾」、「支一派壓一派」。而聲明的擁護者則稱讚它是一朵「美麗的香花」，因為革命者必須把「托派分子」從革命隊伍中清除出去。這個話題如此重要，以至於全市上下都圍繞聲明展開了大辯論。[9]

有趣的是，許多參加辯論的人並沒有閱讀過聲明的文字；更有趣的是，許多表面上擁護聲明的死硬派，卻在私下裏承認他們本人並不喜歡這個聲明，而是討厭它。一位前造反派頭頭在解釋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時說，「雖然一個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社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此人是個造反派還是個保守派，而其所參加的派別則注定了在關於二八聲明辯論中這個人站在哪一邊」。[10] 從本質上講，人們所爭論的並不是聲明本身，而是一個人的派別屬性。這樣一種辯論不會改變一個人對論題的態度，但可以有效地加強人們對已經參加的團體的認同。從前，對一月奪權的爭論只涉及到造反組織的高層領導人。自此以後，造反組織的兩個派別又接受了新名稱：「香花派」和「毒草派」。雖然兩派也許偶爾會形成針對保守派的策略聯盟，但它們之間的互相不信任卻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也沒有真正消除。

毛澤東期望奪權會帶來革命秩序，但事實表明這只是一個幻想。令他極為失望的是，奪權給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帶來了極大的混亂。首先，奪權並沒有導致新政權的建立。在多數情況下，奪權都半途而廢。也就是說，雖然舊的權力結構的喪鐘正式敲響，但造反派卻無法提供有效的權力替代者。舊政權在武漢被徹底打敗。從省長和市長到車間主任和生產組長的前當權派，統統被趕下臺。在有些情況下，甚至不列入國家公職人員名單的居委會幹部以及負責居民戶口管理的民警，也被視為當權派。[11] 在某些單位裏，造反派做得更加過分。非黨員造反派把黨員也當作一種權力的象徵，因而要求擁有把黨員開除出黨的權利。[12] 毛澤東常常說，不破不立。而在奪權中，卻是

破而不立，並由此產生了政權危機。由於缺少公共權威的支撐，社會處在於迫在眉睫的崩潰危機邊緣。

第二，奪權從內部分裂了造反派隊伍。最初人們設想奪權會遭到從前當權派的抵抗。然而，人們所預期的鬥爭並沒有出現。由於失去了最高領袖的授權，當權派乖乖地交出了權力。造反派的敵人並不是當權派，而是在自己人之間。奪權促成了造反派內部的權力鬥爭。

第三，毛澤東發動奪權的理由之一，是恢復內部秩序和生產，但事實上形勢在匆匆奪權之後變得更加糟糕。它所導致的權力真空為以前政治運動受害者提供了機會，使他們得以對黨的幹部和積極分子報仇伸冤。為了論證其「反攻倒算」有理，他們就宣揚「過去十七年的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重新評價」；「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徹底改造」；「文化大革命已經改變了階級關係」。[13] 由於沒有任何可以控制其行為的公共權力機關，所以，他們的報復行動通常比幾個月前老紅衛兵所做的更加殘酷。[14]

第四，國家處於無政府狀態時，不可能維持正常生產。1967年1月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工業生產最差的一個月。統計表明，工廠頂多完成了生產定額的60%；多數工廠只完成了40–50%，有些工廠僅完成了20%。[15]

最後，取得摧毀地方政權的勝利之後，造反派又試圖打倒舊政權的最後支柱——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地方文官政權與軍事權力之間始終保持著傳統的緊密關係。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同時兼任武漢軍區政委；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是湖北省委常委。當地方文官政府處於危機關頭時，中央軍委對各省軍區發出指示，要它們接收地方政府請求其搶救的任何秘密檔案和文件，同時要為地方領導人提供保護。正因為如此，造反派把軍隊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最後避難所」。[16]

秩序的恢復：二月逆流

武漢和整個國家面臨的緊迫形勢，迫使毛澤東採取迅速而果斷的措施來控制住瘋狂的造反派。

首先，讓人民解放軍介入到運動中來。軍隊始終是國家權力中的一個關鍵因素，而在1967年初，它是基本完好的唯一有組織的力量。毛澤東打出這張王牌，試圖使危險的形勢穩定下來。1月21日，他命令軍隊介入運動「支持左派」。[17] 為保證軍隊具備有效對付對立派別的威望和統一，毛澤東1月28日親自批准頒發了中央軍委八條命令。這個命令嚴禁民眾擅入軍事設施或攻擊軍事人員。[18] 不久，軍隊的權力得到擴張，從被動地履行支持左派的使命，擴大到維護法律和秩序，管理經濟以及重建權力結構。[19] 但問題是，在如何區分真左派還是假左派方面並沒有給予明確指示。這樣一來，支持左派的任務就使軍隊有權支持它所認定的革命派。

第二，強調了老幹部的作用。草率進行奪權導致了出乎意料的混亂，這種情況一定使毛澤東意識到，單靠造反派並不能建立起新的可以正常運轉的權力結構，他於是開始強調在新權力結構中，老幹部必須參與，以便利用他們的管理技能。他認為，革命幹部佔幹部的大多數。即使是犯過錯誤的人也應當給予重新做人的機會。[20] 對於成千上萬沮喪的黨的幹部來說，這個新政策十分令人鼓舞。

第三，為了克服在1967年頭一個月造反派行動的顯著無政府傾向，毛澤東發動了整頓造反派的運動。[21] 造反派在1月奪權期間的過分行為受到批評，他們的囂張氣焰受到打擊。

在恢復秩序的進程中，「三結合」模式開始出現。[22]「三結合」的意思是：在每個革命委員會中，軍隊代表、黨的幹部和造反派佔有平等的一份權力。讓士兵和黨的幹部參與奪權，意在抑制造反派的極端主義。以後的事實表明，形成這種聯合的任務不可能完成，因為這些力量是互相對立的。

雖然毛澤東試圖遏制激進主義和自發性的過分行為，但他並沒有失去對造反派的信任。他至多想要整頓一下造反派的行為，以使文化大革命能夠以更加平衡的方式進行下去。但在軍區領導人看來，毛澤東推行非激進化政策的目標，就是削弱甚至解散造反組織。由於這種錯誤領會，所以毛澤東的戰略再次導致他不願看到的事情出現，即產生「二月逆流」。

攻擊工造總司的二八聲明發表並激起武漢大亂之時，武漢軍區司

令陳再道和政委鍾漢華正在北京參加中央軍委的一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衝擊軍營的造反派中一定有「壞人」。陳和鍾對毛的這句話印象極深。毛澤東勸告軍隊在受到攻擊時，對攻擊者要「退避三舍」，以避免衝突。但陳和鍾卻以為，毛澤東的意思是，要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最多只退避「三舍」，而不是「四舍」、「五舍」，如果造反派得寸進尺，那麼軍隊就應該自衛反擊。[23]

2月11日，武漢軍區「支左指揮部」(十天前才設立) 受到造反派中「香花派」的攻擊。[24] 到此時為止，在中央軍委的支持下，成都、福州和廣州軍區都對攻擊軍隊的人發起了反攻。[25] 武漢軍區效法其它軍區，於2月18日發佈了一個「嚴正聲明」，批評二八聲明和「香花派」。[26] 第二天，武漢部隊在市中心舉行了空前的閱兵式，以顯示軍威。同時，軍營門前安放警戒線，以震懾侵犯者。[27]

武漢軍區的聲明自然受到「毒草派」的歡迎。雖然這一派並不特別喜歡軍隊，其中一些人還批評過軍隊，但他們樂於看到軍隊站在自己一邊反對勢力強大的「香花派」。權力鬥爭遊戲的實質就是，要使合法的參與者數量越少越好。「毒草派」相信，同地方軍隊當局站在一邊，會有助於把「香花派」逐出遊戲圈。因此，「毒草派」在2月下旬熱情支持武漢軍區的立場，他們以聲明、群眾集會和遊行示威等形式來反對「香花派」。[28] 此時，武漢軍區和「毒草派」似乎有了共同利益。[29] 隸屬「香花派」的許多組織的成員，因受不了兩面夾擊而脫離這些團體。所以，「香花派」很快就失去了對於「毒草派」的優勢地位。

大約在2月底，陳再道和鍾漢華回到武漢。離開北京之前，周恩來私下裏會見了他們，勸告他們要特別注意三件事：第一，要抓工業生產；第二，學校要復課；第三，要按行業、部門或單位實現聯合。周的指示使這兩位軍事領導人得出這樣的結論：恢復秩序是他們的主要任務。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小組對二八聲明的批評，也消除了他們對於造反派，特別是「香花派」可能會阻撓的擔憂。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個成員對二司北京聯絡站代表指示說，二八聲明是錯誤的。他還對武漢造反派警告說，不要把進攻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30]

得到了北京溫和派和激進派領導人的共同支持，陳和鍾很有信心在短期內恢復武漢的秩序。回到武漢不久，他們就採取高壓政策對付

造反派。第一個打擊對象就是「香花派」。武漢軍區用來對付這一派的武器，是中央文革小組對二八聲明的批評。

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鼓勵人們造反，但造反並不是屬於他們的合法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講，造反僅僅是毛澤東授予的一項特權，並且隨時有可能被收回。當一個團體擁有了這項特權時，它就能為所欲為，而不必受制於地方政權。然而，它一旦失去這種特權，就可能危及其生存。從理論上講，每個派性組織都擁有這項特權。但只要毛澤東等文革領導人對某個團體稍稍表示一點不喜歡，這一團體的對手就會趁機剝奪其特權，甚至予以毀滅性打擊。

中央文革小組指責二八聲明的消息一傳到武漢，「香花派」就意識到，他們同「毒草派」和軍隊的戰鬥已經失敗，而且唯一的選擇就是放低姿態，等待命運中下一個轉機的到來。2月27日，工總的頭頭到軍區請求得到寬恕。在接下來的幾天裏，「香花派」成員在武漢大街上川流不息地遊行，舉著表示低頭認「錯」的標語牌。在「香花派」蒙受屈辱之際，軍區愈益趾高氣揚。它命令隸屬「香花派」的所有組織清除城內貼有任何反對軍區2月18日聲明的標語和大字報，還不許人們對軍區政策提出任何批評。3月1日，陳再道宣佈，「必須鎮壓反革命。他們的唯一出路就是老老實實。不准亂説亂動。」軍區明白，對造反派的姑息會帶來災難。所以，它決不打算對造反派心慈手軟。

為了切斷本地造反派與北京以及與其它省市造反派的聯繫，軍隊於3月1日對電信局實行軍事管制。不事先得到電信局軍管會的批准，群眾組織就不能向北京發電報。對本地造反派與外地造反派之間的通訊聯絡也實施了秘密審查。軍區關閉了《長江日報》，使「香花派」影響民眾輿論的能力受到極大削弱。封鎖了「香花派」的通訊管道之後，軍隊又開始進攻其大本營。從3月2日至11日，部隊佔領了「香花派」自1966年末以來盤踞的五座大樓。[31] 這對造反派造成了致命的打擊，因為多數造反派分子在各自的單位裏處於少數地位，而且常常有著保守派同事能夠加以利用的短處。只有在單位之外，造反派才可能在城市政治舞臺上唱主角。一旦被迫在他們自己的單位裏進行活動，那麼即使保守派組織鬆散，也可以輕易地制服他們。

一場動搖造反派士氣的政治攻勢也已經發動。在陳再道的指揮

下，當地報紙發表了批判二八聲明的文章，當地廣播電臺則播發了批判二八聲明的節目。這場運動的目的是震懾「香花派」成員。為進一步搞臭造反派，還組織人們參觀部隊奪回的那幾棟樓，以向大家展示造反派的流氓面目。成千上萬人參觀後感到，造反組織只不過是一幫匪徒。[32]

同時，還對工總進行了秘密調查。為此，武漢軍區設立了一個特別小組，並調用武漢公安局刑警隊對工總頭頭進行偵察。通過調查，軍隊得出結論，認為工總的確是窩藏「牛鬼蛇神」的巢穴。因此，武漢軍區決定堅決取締這個組織。雖然中央文革小組並沒有肯定武漢軍區的建議，但它也沒有予以反對，而武漢軍區把北京的曖昧態度當成是默許。3月17日凌晨，武漢軍區逮捕了工總的頭目和骨幹分子共485人。3月21日，它發佈了關於工總反革命分子所犯罪行的公告。武漢軍區把工總斥為反革命集團在幕後操縱的組織，勒令它立即解散。[33]

假如「十六條」並不禁止軍隊解散學生組織，它也會迫使二司解散。但由於受到「十六條」的限制，軍區不得不在對付武漢最大的學生組織時採取一種不同的策略，也就是說，要讓這個組織的成員冒日益增大的風險，付出越來越大的代價。它聲稱二司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還宣稱二司的領導層有反革命分子滲透進去了。通過公佈這些指控，軍隊希望二司的群眾會下決心挖出「隱藏的階級敵人」，並批判其犯錯誤的領導人，以此來搞垮二司。這個策略似乎很見效。來自軍隊的巨大壓力使二司的領導人極為恐慌。他們在街上遊行，乞求軍隊對他們過去所做的壞事予以寬大處理。三個主要領導人甚至開始互相指責，企圖逃脫罪責。一些分支組織的頭頭聲稱自己受到蒙蔽，於是建立「整頓辦公室」，接管了司令部。[34] 在基層，普通群眾做得更徹底。在許多學校裏，他們召開批判會，批鬥二司在學校分支組織的頭頭。成千上萬群眾正式宣佈退出組織，而更多的人通過不參與團體活動來表示脫離組織。如果說在過去他們還期望通過參與造反來獲得一些社會和心理上的收益的話，現在看起來一切是那麼令人沮喪。參與組織所面臨的日益增大的風險，使他們意識到，現在是退出運動的時候了。由於各級領導都處於癱瘓狀態，加上普通群眾紛紛退出，二司在1967年3月底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35]

「香花派」的其它群眾組織如九．一三兵團、紅教工等，在壓力下也差不多處於瓦解狀態。[36] 最初，「毒草派」造反組織支持軍隊鎮壓「香花派」。他們希望這些行動能在未完成的奪權過程中消滅其競爭對手。當軍隊收集打擊工總的證據時，「毒草派」造反組織予以配合，提供材料。[37] 然而不久，他們就認識到，保守派正在利用批判「二八聲明」和「香花派」發起反攻。他們在3月4日的《湖北日報》(由「毒草派」控制) 上發表了一篇社論，警告保守派不要企圖恢復舊秩序，但軍隊指責這篇社論與「二八聲明」一樣「有毒」。3月9日，該報發表了一篇為那篇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社論而作的長篇自我批評。此後，軍隊從該報編輯部清除了所有造反派分子，並恢復了原總編的職務。[38] 3月4日社論事件標誌著「毒草派」造反組織與武漢軍區之間短暫蜜月的結束，「毒草派」很快開始衰落。到了3月底，造反派內的一些組織已經瓦解，另一些組織也在為生存而垂死掙扎。[39]

軍隊和所有曾經在過去幾個月裏受到造反派淩辱的人，都對「香花派」和「毒草派」造反組織的解體而感到歡欣鼓舞。武漢軍區一位副司令員對此作了如下評論：

>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現在就是要報，不是秋後算賬，而是春前算賬。

武漢軍區「支左指揮部」負責人補充說：

> 這次運動就是要整你們這些牛鬼蛇神。跳出籠來登臺表演，你們現在表演夠了，該我們表演了。如果你們不老老實實，就殺了你們的頭肥田，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現在是專你們政的時候了。[40]

保守派和幹部們都同意軍隊的觀點。他們曾經對文革開始以來的種種亂象迷惑不解，而現在開始明白了，並且認識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陷阱。在他們看來，毛澤東鼓勵人們造反，實際上是鼓勵隱藏的「牛鬼蛇神」現出原形。很多保守派和黨的幹部讚賞毛澤東的「陽謀」：「毛主席確實比劉少奇更聰明。劉用網捕魚，而毛乾脆竭澤而漁。」[41]

隨著造反派在軍隊壓力之下勢力日衰，保守派開始恢復元氣。在命運不濟時，他們曾經採取了兩種策略來保存力量。第一種策略是成立新組織。例如，紅武兵主要由以前的民兵骨幹組成，成立於1967年1月26日。在兩個月內，它的成員增長到50,000人。1月至3月間，類似組織出現了十幾個。其中「造反大軍」主要由以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隊隊員組成，「紅城公社」成員主要來自居委會幹部和積極分子。這些組織帶有舊體制框架的強烈痕跡，所以就使它們得以順利而高效地展開工作。[42]

另一個策略，就是集體加入他們單位裏最弱的造反組織。例如，大批保守派工人加入工造總司，以繼續與工總鬥爭；而大批保守派學生則加入三司，以保持他們對二司的獨立。起初，工造總司和三司熱烈歡迎來自保守團體的這些「反戈一擊者」，因為在他們與另一造反組織為權力展開競爭時，新力量顯得至關重要。但是，他們又逐漸認識到，從前保守派分子的大量湧入，會產生把他們的一些分支組織轉變成這些「反戈一擊者」的可利用工具的危險。[43]

成千上萬的保守派乾脆退出政治舞臺，滿足於在場外觀看派性鬥爭。然而，不管選擇什麼策略，保守派都竭力避免與他們單位裏好戰的造反派聯合。

武漢軍區對「左派」和「右派」概念的重新界定，也促使保守派重新振作起來。武漢軍區的一位負責人作了這樣的解釋：

> 什麼是左派，什麼是右派？按黨的政策辦事，就是左派；不按黨的政策辦事，就是右派。先說你們是反革命，你們不服氣，現在你們自己跳出來了，把革命群眾打成保皇派，鬥爭、戴高帽子、遊街。凡是這樣搞得統統是反革命。什麼保皇派？都是好同志，是按黨的政策辦事的，是真正的左派。你們是什麼紅色造反者？是國民黨、是法西斯、土匪。你們連資產階級也不如，資產階級還講人性，你們連一點人性也沒有。[44]

有了軍隊為自己撐腰，保守派組織得以重新振作起來，並迅速向造反派發起報復性反攻。在很多單位裏，造反團體的頭頭甚至普通群眾都被迫作自我批評。按照軍隊的指示，工廠建立了抓革命促生產委

員會，學校建立了復課委員會，但不讓造反派特別是「香花派」成員參加這些委員會。一夜之間，「造反派」在武漢成為貶義詞。[45]

軍隊在鎮壓造反派的同時，還重建了公共政權。陳再道和鍾漢華從北京返回武漢後，湖北軍區立即召開三級幹部會議(省、地、縣)。陳對與會者說，必須採取措施改變經濟停滯的現狀。他認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每一級和每一個單位都建立一個領導生產的實體。會後，省「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成立。一周後，武漢市建立了類似機構。不久，幾乎每個單位都出現這種辦公室。[46]

此後，「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成為一種標準的公共政權形式。基層進行的所有奪權，不管是成功的還是沒有成功的，統統被宣佈無效。人們認為，在每一級和每個單位建立的這種辦公室，是一種統一的、連貫的有效政權體系，並希望能夠通過它來填補自1966年末以來一直存在的權力真空。[47]

按照毛澤東的想法，「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應當以「三結合」原則為基礎建立。[48] 但是，軍隊在各地都控制了這種辦公室。[49] 群眾組織的代表即使沒有完全被排斥在外，也頂多讓他們參加其中，以擺擺樣子。例如，省辦公室有大約40名造反組織的代表，但告訴他們，一旦在辦公室工作，就不能代表任何具體的群眾團體了。此外還警告他們，在辦公室裏嚴禁「造反行為」，決不允許把任何辦公室的秘密泄露給群眾組織。即使有這些約束，軍隊仍然不能信任造反派，所以在3月底把所有的群眾代表都從辦公室裏趕了出去。[50]

在「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裏，黨的幹部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們是擁有恢復社會和經濟秩序所需要的技能的唯一群體。軍隊宣佈，從前的單位負責人恢復權力，群眾應當服從他們的領導。除了少數例外，大多數從前的幹部都官復原職。前省長張體學雖然本人在北京，也沒有進入省「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但讓他推薦這個辦公室的成員人選。前武漢市長劉惠農被任命為武漢市「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第一副主任。在基層，官復原職的情況更加普遍。[51]

到3月底為止，舊的權力結構似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得到恢復。幹部們官復原職，工人們回到生產崗位上，學生們恢復上課。公安系統又開始履行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能。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的作用重

新得到強調。原來停滯的經濟形勢現在開始好轉。[52] 3月28日，劉惠農在一次幹部會議的講話中安慰與會者說：

> 你們前一段挨了整，受了委屈，不要緊。現在牛鬼蛇神都跳出來了，要一網打盡。[53]

陳再道對未來更加樂觀。他說：

> 當前一股反革命逆流被粉碎，無產階級革命派正在實行大聯合，右派組織正在土崩瓦解，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篡奪的權正在被奪回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54]

造反派的反攻與僵持

陳再道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而沒有注意到北京的政治風向正在逆轉。3月中旬，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開始意識到，運動向秩序和穩定的方向擺動得太遠。為了使運動返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他們對所謂的「二月逆流」發起反攻，並把農業部長譚震林當作「反革命復辟逆流」的樣版。[55]

3月19日，北京紅代會受中央文革小組委托，向武漢派出一個代表團，收集有關當地造反派狀況的材料。[56] 這個代表團寫了100多頁的報告，在此基礎上，《人民日報》於4月2日發表了一個題為《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社論認為，這場逆流的主要特徵是：

> 抓住革命小將的某些缺點、錯誤不放，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全盤否定革命小將的大方向，甚至操縱已垮臺的保守派組織進行翻案活動，把一些革命小將重新打成「反革命」。[57]

這裏指的是誰？看看北京關於安徽、四川、內蒙古、福建和河南形勢的判斷就清楚了。這些地區軍事當局的行動無一例外地受到了批評。4月6日，中央軍委發出一個「十條命令」，嚴格限制了軍隊處理群眾組織的權力。這一命令規定，嚴禁軍隊宣佈群眾組織為「反動組織」、不准解散這些組織、不准報復曾經攻擊戰士的人，除非所涉及的人的確犯罪，否則不准實行逮捕。[58]

《人民日報》社論和中央軍委「十條命令」將武漢造反派從絕境中解救出來。在4月的前半月裏，武漢的形勢甚至是城市外表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寂靜了將近一個月的大街上重新充滿人群；建築物的牆壁上剛被沖刷過，但現在重新貼滿五顏六色的大字報和標語。造反派重新高度振奮起來。

政治上天真的學生造反派喜形於色，而年長一點的造反派則在興奮之餘還保持冷靜。除了那些感到自己一無所失的人以外，大多數老一些的造反派都傾向於採取一種等等看的態度，他們想要等到確實不會有進一步的風險時才行動。有些人從過去兩個月的經驗中認識到，他們參加造反行動損失很大，而收益則甚少。這些造反派決定不再與任何組織有聯繫，而從此時起站在場外觀看運動的演變。[59]

就像文化大革命早期衝鋒在前一樣，學生造反派在反對「二月逆流」的戰鬥中再次打頭陣。4月1日，新華工、新湖大和新華農（又稱「三新」）以及二司分別舉行群眾集會和遊行。當這幾支遊行隊伍在街上相會時，他們就合併為一股，還相互讚揚對方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曾經不分青紅皂白地鎮壓一切造反派的強大共同敵人面前，這些爭奪權力的對手們認識到合作的必要性。他們的第一號敵人就是武漢軍區的陳再道，或者用他們的話說，是「武漢的譚震林」。（把譚作為「二月逆流」的罪魁禍首之一）從那天起，「打倒武老譚」成為聯合所有武漢造反派的口號。為了擺脫軍隊對自己的控制，造反派學生發動了一場將軍區派出的軍訓隊驅逐出去的運動（3月以後軍訓隊一直駐紮在學校裏）。在造反派的壓力下，武漢軍區被迫於4月9日撤出軍訓隊。[60]

軍隊的讓步更加鼓舞了造反派的士氣。在武漢軍區「支左指揮部」辦公室外面，一幫造反派公然打起寫著「向武漢軍區支左指揮部的一小撮混蛋挑戰」的大字標語牌。這一行動在武漢市激起軒然大波。[61]

在保守派看來，形勢再次變得難以捉摸。當「逆流」這一名詞最初在黨報上出現時，他們認為它是指造反派做出的過分行動。他們當然並不同情那種逆流，[62] 後來他們明白了，「逆流」原來是指對造反派的鎮壓。北京號召對逆流進行反攻，使造反派受到鼓舞，變得愈加狂妄與好鬥。保守派則無法理解，北京為什麼再次偏袒造反派。

軍隊對這種變化也同樣毫無思想準備。武漢軍區做出了極大努力

來恢復公共秩序，但在這種秩序尚未鞏固之時，北京的新政策卻使之前功盡棄。

儘管工總領導人還關押在監獄裏，但有跡象表明被解散了的工總正計劃製造動亂。4月8日，以前工總的幾十名成員舉行了火炬遊行。第二天，在武漢兩間最大的工廠裏，工人造反派宣佈恢復工總的分支組織。幾天後，又成立了工總聯絡中心，並且宣佈，它的目標是促使為工總平反和釋放工總領導人。學生造反派的行為更加肆無忌憚，當時每天都有報導說，二司的分支組織攻擊了保守派或溫和派團體在學校裏的辦公室，搶走了他們的廣播器材。4月11日，來自第一中學的一群造反派向市「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提出了過分要求。當他們的要求被拒絕後，這些學生就進行了四天的絕食。在絕食結束的那一天，一幫學生造反派佔領了紅旗大樓。這是《長江日報》和《湖北日報》的辦公樓。[63]

從3月底到4月底，陳再道和鍾漢華都在北京參加中央軍委會議。武漢形勢的逆轉使他們煩惱不已。他們認為，問題的根子在中央文革小組對武漢造反派的支持，而中央文革小組的決定是根據錯誤的信息做出的。在中央軍委的一次會議上，陳抱怨說：

> 中央文革不瞭解情況，不聽軍隊方面的意見，只聽革命小將和派駐各地記者的意見。我們反映的意見和報告，中央文革聽不進去，向中央文革請示一個問題也不及時回覆，弄得我們下面為難。

為了改善不良的信息傳達系統，陳提出了兩種方案：中央文革小組可以派出二十九個直屬機構，分別領導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授權各軍事當局定期向中央文革小組派代表接受具體指示。他希望無論如何也要在中央文革小組與地方軍隊之間建立一個直接信息傳達管道：「只要我們按照中央文革小組所指示的去做，那麼我們就不會犯任何錯誤了。」

中央文革小組對陳的建議再次裝聾作啞。大約在這個時候，武漢的絕食示威活動引起了毛澤東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的注意。她聽說有至少50,000人參加了這一示威行動。4月16日，江青接見

造反派代表時指出，「成都、武漢，那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衝一衝」，以打掉對方的囂張氣焰。在漢語中，「沖」這個字的意思是「批評」或「攻擊」。陳再道可以想像到，如果江青的話傳到武漢造反派那裏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應陳的請求，中央文革小組於4月19日召開了一個會議，專門聽取武漢軍區對武漢形勢的報告。陳在會上說，只有300多名學生參加了絕食示威活動，而且這個行動現在已經過去了。陳的意思是，江青所得到的信息是不確切的。會議做出四個結論：第一，應當允許老紅衛兵存在。第二，工總不應當恢復，因為在4月6日中央軍委「十條命令」下達之前已將其解散了。第三，武漢軍區在3月逮捕500多人並非錯誤行動，但對這些逮捕需要逐一復查，確定無罪的應當釋放。最後，武漢軍區沒有犯「方向或者路線錯誤」。此外，會議還決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將在4月21日會見武漢造反派代表，並將勸告他們不要攻擊武漢軍區。[64]

這些結果使陳再道和鍾漢華喜出望外，他們立即用電話把這些好消息傳達給武漢軍區的其它領導人。他們雖然在會上曾表示要保守秘密，但武漢軍區領導人在造反派日益加大的壓力面前，還是無法抵禦要將好消息與同伴分享的衝動。不久，這些消息就傳遍整個武漢。第二天，即4月20日，保守組織開動全部宣傳機器宣傳和歡呼「來自北京的特大喜訊」；與此同時，造反派卻茫然不知所措。[65]

那天下午，江青從中央文革小組特派聯絡員的報告裏獲悉了這一情況後，對陳和鍾十分憤怒。她認為，陳和鍾正打著中央文革小組的旗號欺壓造反派，因此命令陳和鍾上交4月19日會議記錄的複製件，並警告他們以後不許再提這樁事。原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與武漢造反派代表會見的計劃也被取消。江青甚至威脅說，要取消中央文革小組承諾在未來給予武漢軍區的所有幫助。這一事件發生後，中央文革小組與武漢軍區之間本來已經緊張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武漢軍區請求指示，但中央文革小組故意裝聾作啞。隨後幾個月裏出現了十分動蕩不安的形勢，由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武漢軍區處於更加不利的境地。[66]

這一事件的更直接的結果，就是北京4月19日指示的神秘性。保守派堅定地認為，信息來源很可靠，這些指示不可能是假的；而造反

派則聲稱，所謂「指示」是由軍隊和保守派編造出來的。由於無法證實指示的存在，所以各方都把最符合其利益的說法當作真相，從而又使他們相信北京就站在自己一邊。各持己見就造成了一種危險的平衡。如果北京明白無誤地告訴其中一方說，你們是錯誤的，那麼這不幸的一方只能退出競爭，而兩大陣營間的衝突也就到此結束。但是，如果雙方都堅信北京在支持他們，那麼在他們之間進行殊死對抗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樣，這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遊戲規則，也就是說，只要北京沒有明確否定其參加運動的資格 (例如，宣佈它是反革命或保守團體)，那麼任何團體都不會退出競爭。而官方態度的模稜兩可，就使衝突各方都可以盡情表演，從而更容易導致全面內戰。

第七章

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衝突，1967年5–7月

保守派與造反派大聯合的形成

保守派的聯合

當陳再道和鍾漢華於4月28日回到武漢時，[1] 城裏正在形成兩個大聯合：一個是包括所有保守派組織的大聯合，另一個是包括所有造反派團體的大聯合。這兩種聯合都不是北京所期望的那種「大聯合」。它們只是一種不祥預感的產物，並且很快就會在這兩大陣營之間爆發一場決定性的戰鬥。

「二月逆流」使保守派在過去三個月裏重新獲得力量，建立了很多新組織，並快速擴展實力。紅武兵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1967年1月中旬成立時，它只有幾百個成員。而到4月20日為止，它的成員已經達到24萬人，成為武漢最大的群眾組織之一。比其快速擴張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它具有嚴密的組織結構。紅武兵以過去存在的官方民兵為基礎，像一個准軍事組織，其領導人多為以前的民兵指揮員，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多年間已經建立了廣泛的機構和人員關係網。它的領導人通過兩種機制來管理這個龐大的組織。按照地域劃分，一個行政區的成員組成一個「兵團」；按照行業劃分，一個行政局所屬各單位的成員編為一個「縱隊」，共有十個兵團和二十五個縱隊。在處理日常和潛在問題時，總部可以按其中任何一種方式來操作這個組織。[2] 所以，紅武兵遠遠地勝過組織散漫的造反派團體。

如上所述，聯合會和老紅衛兵瓦解後，它們的成員分散在幾十個新組織以及一些相對溫和的造反派團體之中。而到了1967年4月，老紅衛兵感到沒有必要再寄人籬下了。所以，他們退出造反派組織，重新加入到保守派隊伍中去。[3]

在2–3月份造反派倒霉的時候，保守派並沒有產生建立統一的大聯合的緊迫感，因為只要造反派還分散在各個單位裏，他們就能夠輕易地予以制服。但是，造反派在4月捲土重來，就迫使保守派重新考慮對付造反派的策略。聯合會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層以及有效的運作系統。這一教訓使各個保守組織的領導人認識到團結統一和堅強領導的重要性。保守派團體通過一些有意識的接觸，很快建立了正式和非正式的跨組織聯絡管道。[4] 到了4月底，武漢所有保守派都同意舉行五一勞動節群眾遊行，以顯示他們的鞏固和力量。由於北京禁止遊行示威，這一計劃沒能實施。但是，把所有的保守派聯合起來的觀念卻開始深入人心。一種階級理論也對聯合的必要性作了論證。5月初，一位保守派理論家應邀為各組織團體作報告，題目是《怎樣分析武漢文革的形勢》。最打動聽眾的是他提出的階級理論：

> 首先必須要有一個階級觀點，千萬不要混淆階級鬥爭的觀念，不能把階級關係轉變為「革」和「保」的關係，「造反」和「保守」的關係。造反派不算一個階級，保守派也不算一個階級。階級畢竟就是階級。工人還是工人，貧下中農還是貧下中農，資本家還是資本家，地主還是地主嘛！階級還是一個階級。在這裏不能偷換概念，不能説階級鬥爭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不能説兩條路線的鬥爭就是「革」和「保」的鬥爭；不能説「革」和「報」的鬥爭就是和三字兵〔當時武漢造反派對老紅衛兵的貶稱〕的鬥爭。[5]

實際上，這個理論家是説，文化大革命不應當改變社會（權力）關係的實質。大約在此時散發的一張傳單更加生動地闡述了這個觀點：

> 正如溫度只能使雞蛋變成小雞，而不能使石頭變成小雞一樣，那些地、富、反、壞、右及牛鬼蛇神決不會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放棄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欲望。[6]

這一理論不僅加強了保守派的自信心，而且指明了大聯合形成的共同基礎，從而有助於催生這種大聯合。

最後，聯盟的聯絡中心於5月16日創立。因為聯盟所包含的五十三個組織的成員總數據説超過了一百萬人，所以就把這個包括眾多組織的聯合體稱為「百萬雄師」。[7] 起初，「百萬雄師」只是一個鬆散的聯盟，參與其中的各個組織依然相當獨立自主。每個組織只限於派一個聯絡員到聯絡中心去，這些聯絡員再共同協調與造反派的鬥爭行動。不得到參與組織的許可，聯絡中心就沒有調動力量的權力。在處理緊急問題時，這種領導形式顯然是沒有什麼效率的。因此，當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衝突升級時，人們就呼籲改革「百萬雄師」的組織結構和領導機構。

6月3日，這種改革終於發生。53個參與組織同意放棄它們的獨立性，以共享資源，建立一個徹底統一的組織。與此相適應，總部代替了聯絡中心。[8]

大家認真地選擇總部領導人，他們首先排除了能力不強的候選人。相當一部分新領導人是黨的基層幹部而非普通工人。其次，他們仔細考察候選人的政治背景。人們讓由警察組成的保守組織「武漢公安」來調查每位候選人的家庭出身和過去的政治表現。[9]

總部的核心是常委會。在常委會之下，有一個處理日常事務的辦公室，還設有七個部，分別負責內部安全、聯絡、後勤保障、宣傳、組織工作、戰略規劃和行動協調(作戰)。

參與組織的聯合力量現在接受總部指派的工作任務。為了有效地管理百萬成員，總部在十個行政區(包括郊區)裏建立了次級指揮部，並任命了每個次級指揮部的領導人。次級指揮部的內部結構仿照總部，所以總部的每個部門都可以輕易地找到下級同類部門，並讓它們執行自己的命令。[10]

一般來説，成員組織期望通過結成同盟來獲取比追求獨立策略時更多的綜合收益。這個法則顯然可以用在「百萬雄師」的例子上：在對付造反派方面，結盟會使他們的力量比不結盟時強大得多。但是，「百萬雄師」的例子又似乎與威廉 · 里克 (William Riker) 的「規模原則」相矛盾。按照里克的觀點，雖然理性的同盟建立者具有創設有效統治集團

的動力，但他們卻無意將同盟規模建得盡可能龐大，因為同盟夥伴越多，每個夥伴從同盟勝利中得到的收益就越少。里克認為，理性的同盟創立者將努力建立一個他們覺得恰到好處的、而非最大規模的同盟，只是為了保證能夠取勝——或者乾脆說，建立一個可以取勝的最小同盟。[11] 然而，「百萬雄師」卻是一個包括幾乎武漢所有保守組織的同盟。這一事實是否表明武漢保守派不理性？我認為，情況並不必然如此。

保守派的共同目標是維護現存權力分配結構，在這一結構中他們已經享有一些既得利益。他們是在為防止造反派摧毀自己生活中的機會而鬥爭，除此之外別無它求。由於他們在勝利後並無戰利品可供分配，所以他們也就不必為取勝所建立同盟的規模問題而操心。換句話說，事實上最大化的同盟能夠比最小化的同盟更好地為他們的利益服務。

建立一個最大化的同盟要比建立一個最小化的同盟容易得多。後者的建立者很難確定以什麼來構成最小化同盟，而前者則意味著所包括的數量越多越好，對同盟的規模要求很明確。基於這個原因，保守派組織得以不經過多少爭吵就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同盟。

造反派的聯合

在保守派建立聯盟的同時，造反派也試圖形成自己的聯盟，但他們的聯盟並不像保守派聯盟那樣容易建立。造反派都希望文化大革命將有助於實現他們的利益要求，但他們的目標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人想得到物質利益，另外一些人希望提高其社會政治地位，還有一些人渴望得到權力。即使他們具有共同的目標，如果勝利到來的話，由於資源有限，他們之間也會為戰利品的分配而不得不展開爭奪。1月奪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有的造反派都想建立一個強大到可以確保勝利的同盟，但他們同時又希望使同盟的規模最小化。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如果有太多的組織參與奪權，就會沒有足夠的位置可供分配。基於這種考慮，造反派傾向於建立的只能是一種可以取勝的最小化同盟。[12]

如上所述，建立一個最小化同盟是一個非常微妙的過程。同盟創立者在極力避免自己被排除於遊戲之外的同時，還得經常考慮要把誰納入同盟之中。即使同盟已經建立，在一致對敵的同時，盟友之間也需要互相保持警惕(當作潛在的對手)。相互不信任就會使建立最小化同盟耗時費力，而且建立起來的同盟也不穩定。由於最小化同盟可以最好地服務於造反派的利益，所以秘密的相互爭鬥也就無法避免，而這種爭鬥會使造反派無法創立無所不包的聯盟。

在文化大革命動蕩不定的形勢下，信息既不完善也不充分。創建聯盟的團體也弄不清楚，當危機發生時，參與聯盟者能有幾個會採取行動。(會不會發生因這個或那個入盟團體脱離聯盟而使之面臨失敗的危險？)所以，對他們來說，如果沒有至少留下一些足夠的安全餘地的話，那麼建立聯盟的方式就不明智。當然，聯盟規模比最小化大一些，至少還能有獲勝的機會，但一味追求建立取勝所需要的最小化聯盟，在事實上也許會因為規模太小而根本沒有取勝的機會。

在1967年4、5月的緊張形勢之下，造反派需要某種形式的聯盟，以便在與保守派的對抗中維持生存。在造反派完全被壓制的單位裏，首要的任務就是聚集造反力量。這並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務。經過2、3月份的打擊後，大多數造反派仍然心有餘悸。雖然在4月裏有了工總復活的初步跡象，但只有少數從前的造反派敢於加入重新建立起來的分支組織。在大多數單位裏，直到5月末、6月初，工總的分支組織才正式再次宣佈它們的存在，而在某些單位裏的工總分支機構直到7月底的武漢事件時才這樣做。許多造反派沒有正式重新加入造反組織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再是造反派。所謂的「第八司令部」於5月在武漢出現。八司並不是一個組織，相反，這個詞是指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但熱情支持造反事業的個人。由於他們身分模糊，這些人就成為造反派方面最凶殘的力量。除了參加示威、群眾集會和絕食以外，他們還常常進攻保守派組織，對保守派個人實施人身攻擊。八司主要由工總以前的成員組成。[13]

其它造反工人組織也在這個時候開始恢復活動。保守分子分裂出去後，工造總司就設法恢復實力。在一些大企業裏，造反派建立了新的獨立組織，其中最有實力的有長江流域辦公室的「長辦聯司」、中原

機械廠的「新中原」、武昌造船廠的「新武船」。甚至在造反派勢力比較弱的政府部門，一些造反派的同情者也首次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如「機關紅司」以及「公安聯司」。此外，一些心懷不滿的高級幹部也成立了「革幹聯」，公開表示同情和支持造反派。[14]

儘管非正式的聯絡管道早已開通，但各種造反組織之間的關係仍然十分鬆散。而面對日益強大的保守派勢力，造反派開始以實際行動來建立自己的大聯合。

他們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要求解除監禁，釋放夏幫銀。夏作為工總在漢陽軋鋼廠分支組織的領導人，是3月17日被捕的485人之一。與工總其它很多領導人不同的是，夏的歷史非常清白，他出身於城市貧民家庭，是個黨員，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前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和「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由於軍隊沒有什麼證據支持對夏的指控，所以這個案子可以用來爭取人們對造反派的廣泛同情，並且能夠使軍事當局處於被動地位。4月22日，「三新」和二司在武漢公安局漢陽分局門前組織靜坐示威，因為他們認為夏就被關押在此。很快，全市成千上萬造反派加入到靜坐隊伍中去，以支持這種「革命行動」。這一精心謀劃的策略十分成功。在日益增長的壓力面前，軍隊表示妥協：於5月14日將夏釋放。[15]

靜坐結束之前，造反派又採取了另一個行動。5月10日，公安學校的造反派學生與武漢公安局江漢分局的保守派員警發生衝突，雙方都有受傷者。學生們堅持要公安局軍管會為這個事件負責，並要求軍管會懲罰其「凶手」。5月13日，造反派學生在公安局門口絕食示威，以迫使軍管會答應他們的要求。這一事件很快引起人們極大關注，為造反派顯示其「戰鬥團結」提供了又一次機會。各行各業的造反派都動員起來支持公安學校的學生造反派。幾天之內，武漢軍區就發現，在全市幾乎每一個區裏，特別是在鬧市區裏以及在權力機關所在地外，包括自己的司令部大院外，人們都在舉行絕食示威。據說，參加絕食的總人數超過了40,000。鍾漢華在5月14日被迫與示威者進行談判。經過八小時的激烈磋商，示威者宣佈，鍾已經同意滿足他們的所有要求，於是他們就舉行集會慶祝勝利。但是，武漢軍區否認他們作出讓步。[16] 即使武漢軍區沒有作出任何讓步，造反派也以勝利者自居，因

為這一事件有助於擴大他們的影響，並使造反派力量聯繫得更加緊密。

在這兩個事件發生的過程中，為了進一步加強造反派之間的聯繫，他們又採取了更多的一致行動。5月6日，六大學生組織聯合成立了武漢革命造反學生總司令部。兩天後，15個工人組織建立了與之類似的武漢革命造反工人總司令部。最後，6月1日武漢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正式成立，希望成為武漢所有造反力量的最高指揮中心。[17]

然而，那些龐大組織實際上對其所統轄團體並沒有真正的權力，都是空架子，它們至多是一些半正規的聯絡系統，藉此來協調造反派各團體的策略和行動。但司令部對參與團體的策略和行動，卻無法確保實施控制的權力，所以，造反同盟的有效性也就不能得到保證。當然，建立這種系統總比沒有要好一些。面對強大的敵人，造反派需要這種機制來減少內部爭鬥，從而使自己的力量更加集中。

導致保守派和造反派發生意見分歧的問題

在1967年4月至7月期間，有兩個主要問題使武漢保守派和造反派發生分歧。一個問題是，工總之案應當不應當予以平反，另一個問題是怎樣評價武漢軍區「支左」的功過。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如果你認定工總受到錯誤對待，那就會得出武漢軍區大方向不正確的結論；相反，如果你認為工總是一個「牛鬼蛇神的大雜燴」，那麼你自然就會説武漢軍區的好話。

當然，武漢軍區本身堅持，它關於解散工總的決定是正確的。由於4月19日中央文革小組採取了反對恢復工總的鮮明立場，所以陳再道和鍾漢華認為北京對青海、安徽、四川、內蒙古和福建軍隊的批評不適用於武漢。但是，為謹慎起見，武漢軍區又於4月22日設立了一個特別小組，負責重新審查工總案子。到7月15日為止，特別小組已經列出了不利於這個組織的三卷證據。這些材料再次證實了陳和鍾的結論，即工總「是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操縱的壞組織」，所以，他們無意向造反派妥協。6月4日，武漢軍區發佈一個聲明，重申其一貫立場：「工總不能翻案。」[18]

軍隊在工總問題上的立場越強硬，保守派對它就越尊重。事實上，保守派比軍隊更急於防止工總死灰復燃。他們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零和遊戲中，如果工總死灰復燃的話，那麼他們自己就會被埋葬。更準確點講，保守派所擔憂的是，如果造反派佔了上風，那麼中國的整個權力結構就會被推倒重來。他們無法相信毛澤東會這樣對待自己，因為他們是毛幾十年來所依靠的社會力量。他們確信工總主要由三類人組成：出身不好的人、壞分子和機會主義野心家。在他們看來，把工總稱為「一幫陰險的新老反革命分子」沒有什麼錯。[19] 為防止這種組織得到平反，他們支持武漢軍區，宣佈自己是「擁軍派」。

所有造反派組織都在推動武漢軍區為工總的案子平反，但它們的目的卻各不相同。以前的「香花派」要求將這個被解散了的組織徹底恢復。顯然，只有恢復了工總，這派組織自己的名譽也才能得到恢復。然而，徹底恢復工總並不符合前「毒草派」的最佳利益。工總之案所以有用，就在於它可以使所有的造反派聯合起來。但是，前「毒草派」無意讓強大的對手重新出現。所以，當「香花派」讚美工總是「革命組織」時，「毒草派」僅僅願意否定它是一個反革命組織。換句話說，有必要為這個組織去掉「反革命」的稱號，而沒必要恢復這個組織。由於在工總性質評價上的分歧，就使得在應當如何為「二月逆流」受害者平反的問題上，造反派團體的立場也發生了分歧。「香花派」要求釋放所有被捕的人，而「毒草派」只要求釋放那些經過逐個調查證明無辜的被捕者。這種微妙的分歧成為妨礙造反派團結的一個障礙。[20]

造反派與軍隊和保守派之間的對抗，暫時掩蓋了造反派陣營內部的分歧。不管造反派之間的立場是多麼的不一致，但在軍隊和保守派的強大抵抗面前，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共同對敵。由於他們攻擊的是地方軍隊，所以他們被視為「反軍派」。

無政府與暴力

保守派與造反派在工總和軍隊問題上的觀點具有巨大差異，使它們之間的緊張逐漸加劇。4月29日，一個小型紡織廠的保守派與造反派在一場爭執中發生武鬥。這一事件標誌著武漢大規模暴力衝突的開始。[21]

有三個因素為集體暴力的產生提供了沃土。第一，來自北京的信息十分模棱兩可，就使造反派和保守派都以為自己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一方面，消息靈通人士透露，中央文革小組肯定了造反派批判「武老譚」的鬥爭；另一方面，「一些中央領導同志」指責武漢造反派的消息也在流傳。[22] 由於無法核實這些信息的可靠性，所以人們往往相信適合於他們最大利益的消息，而斷言那些有悖於自己利益的消息是流言蜚語或者純粹的編造。哪一方都不願意退讓，衝突的可能性也因此日益增加。

第二，在充滿敵意的環境裏，各派對敵手的實力、策略和使用武力的意願都不太清楚。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沒有互相溝通的管道，這就使它們無法通過外交手段獲得這些信息。即使具有溝通管道，各派也有強烈的動機促使他們故意誤判對方的武鬥意願。[23] 不確定性導致恐懼。結果，所有派別都面臨著一種安全困境。[24] 因為他們不知道敵手會對自己做什麼，所以就感到有必要武裝自身。而這樣做了以後，他們並不必然會增加自己的安全，因為敵手也會以同樣的方式行動。這種不安全感的相互作用逐步升級，就使所有派別都感到更不安全，因為它提高了各方面臨潛在威脅的程度。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在緩和衝突方面，既不存在規則也沒有規則執行者。軍隊可能成為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鬥爭的調解者。但是，造反派卻不把軍隊視為調解者，反而看作敵手。況且，4月6日中央軍委發佈的十條命令，又嚴重削弱了武漢軍區使用高壓手段的能力。在爭吵各派勸解機制缺失的情況下，口頭挑釁可以輕易地轉化為武力衝突，同時小規模毆鬥能夠輕易地升級為全市規模的派戰。

有些評論者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集體暴力表明了人類的非理性(或者邪惡，或者天生的好戰性)。事實上，暴力是一種既理性又可悲的行動方式。在正常的條件下，當壟斷武力使用權的國家對使用武力反對其它人的團體或個人能夠以懲罰來威脅的話，那麼將有組織的暴力作為策略的可能就會被排除，或者至少使之變得極其危險。然而，在無政府的情況下，社會秩序的供給便成了問題。因為社會秩序也是一種「公益」，所以人們不會自動地克制自己做也許會危害社會秩序的事。在解決爭端的過程中，如果沒有一個確實能夠威脅運用武力予以

嚴懲的權威，那麼甚至善良和理性的人也會在利益衝突時拳腳相加。所以，派別領導人必然始終考慮著暴力策略，即便他們自己並不真正地具有好戰的意圖。[25] 認清了無政府問題，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為什麼經常發生武鬥，即使參與武鬥者既非愚蠢、無知之輩，也非亡命之徒。

5月底出現了發生大規模武鬥的初步跡象。5月21日，「百萬雄師」在城市各處進行示威遊行時，八司對遊行隊伍進行擾亂，於是發生雙方互相混戰。這是兩派之間出現的第一次全市性武鬥事件，並引發了隨後數天暴力衝突的浪潮。5月27日，在第二十中學發生的衝突中導致二司方面有一人死亡，並且是武漢派性鬥爭導致死亡的第一例。這個十七歲死者的同伴們在全市抬屍遊行，以爭取人們的同情和支持。造反派被激怒，並揚言要為烈士報仇。[26] 形勢於是變得更加緊張，大規模的武鬥一觸即發。

為準備最壞的情況出現，雙方都開始加緊調兵遣將。造反派已經在漢口繁華地段佔據了許多公共建築和學校。他們現在調動更多的力量進駐這些據點，以控制重要的交通線。保守派過去沒有著意建立任何據點，現在意識到武裝自身的重要性。「百萬雄師」於6月3日進行重組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強保守派的戰鬥力。重組後的第二天，「百萬雄師」就佔領了武漢市委大樓，並將指揮部設在這裏。不久後，「百萬雄師」完全控制了江岸、礄口、漢陽三個區的大多數工廠，把這些工廠裏的造反派趕到他們在市中心的據點。同時，還成立了不少突擊隊。這些突擊隊仿照軍隊一樣組織，每一隊由二三十個青年人組成，其中很多曾經在部隊當過兵。[27]

6月6日，北京向各省發出命令，嚴禁在派性爭執中動用武力。[28] 但沒人重視這個命令。6月8日，保守派在市中心遊行，聲稱「要促進學校復課」，「宣傳禁止武鬥的重要性」。而在這些冠冕堂皇的號召背後，卻計劃教訓造反派一下。它是這樣設想的：當遊行隊伍經過鬧市時，造反派就會搗亂，接下來就以其搗亂為由來衝擊造反派。事實上，在行動開始前，「百萬雄師」就已經在市中心周圍設下埋伏。他們計劃當造反派露面時進行伏擊。造反派如期落入圈套，精心組織的保守派沒費多少功夫就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29]

這一慘敗使造反派大為震動。過去，保守派一直膽小怕事，軟弱可欺，而6月6日事件卻表明，他們正在變得更加強大而好鬥。保守派性質的變化使造反派大傷腦筋，他們決定用新式防禦和進攻武器來裝備自己。在接下來的數天裏，他們加緊修築堡壘，準備武器。有些人甚至要裝備爆炸用品。經過這些準備，造反派又恢復了信心。他們頭戴安全帽，身負自製武器，在全市舉行武裝示威遊行，以顯示自己的力量。[30]

「百萬雄師」的策略是穩紮穩打。保守派把自己完全控制的漢陽稱為「解放區」，把漢口稱為「遊擊區」，因為漢口的兩個工業地區——江岸、礄口，除了少數工廠和學校外，都處於「百萬雄師」的控制之下，而江漢這個商業地區則主要由造反派控制。造反派掌握了武昌這個武漢的文化區，所以保守派稱之為「敵佔區」。面對這種不平衡的勢力分佈形勢，「百萬雄師」決定採取毛澤東著名的戰術，即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首先，必須解決鞏固後方問題。6月9日，「百萬雄師」佔領了居仁門中學，三天後突襲了武漢汽車配件廠。這兩個單位是造反派在礄口區的最後據點。[31] 接下來，他們又集中力量要把所有造反派從漢口趕出去。

武漢軍區無法制止暴力衝突。6月6日以後，武漢軍區發出了一個措辭強硬的聲明，警告要嚴懲任何進行武鬥的人，但保守派和造反派對此都不予理睬。6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給陳再道打電話，催促他制止武漢的暴力行為。但是，由於沒有實施高壓的權力，陳的雙手已被束縛住。[32]

6月17日，「百萬雄師」發動了「解放」漢口繁華地區的總攻。成千上萬身背長矛大刀的隊員投入戰鬥。他們不僅數量上佔優勢，而且組織性也很強。這一戰鬥的指揮官自豪地說：

> 我們的人裝備很好。在6月12日的戰鬥中，我們發現造反派手持長矛，於是我們就決定也用長矛來保護自己。由於大多數工廠都掌握在我們手裏，所以我們製造這些東西很容易。幾天之內，我們就裝備上比造反派要好的武器。我們的人也有高度的機動能力。武漢的六個汽車運輸公司和五個公共交通公司都掌

> 握在我們手裏。所以，我們可以隨意調用它們。另外，我們還可以從自己控制的其它單位裏調用卡車。不管什麼時候進行戰鬥，總部頭頭只需要幾個電話，就可以調集足夠的隊伍和車輛。每一次戰鬥之後，我們都可以弄到大量好的食品來慰勞參戰者。正因為有這麼一個高效的組織，所以我們在6、7月間與造反派的歷次戰鬥中沒有死掉一個人。[33]

而造反派則處於混亂的被動挨打狀態之中。他們中多數是二十歲上下所謂八司的戰士。他們缺乏指揮系統，戰鬥中既無戰術也無協調。所以，保守派發動進攻時，很容易將他們分割包圍，聚而殲之。[34]

6月17日的戰鬥極為激烈，從當天中午一直持續到次日早晨。造反派稱他們有將近100人死亡，約千人受傷。而「百萬雄師」否認這一指控，只承認他們打死了一個人。傷亡的真實人數也許是介於兩種說法之間。不容置疑的是，至少有12人在這一事件中死亡。[35]

造反派對這些敗績惱羞成怒，在隨後的幾天裏發出了許多道命令，指示各成員組織做好準備，要對「武漢的譚震林」和保守派發起「全力反擊」。「針鋒相對」和「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口號造成了全市的混亂。武昌造反派甚至發出了一個最後通牒，宣佈如果武漢軍區不立即取締「百萬雄師」，他們就要跨過長江，消滅一切保守派。造反派要征服漢口的計劃當然只是一種幻想，因為他們除了宣傳以外，幾乎在各個方面與保守派相比皆處於劣勢。而造反派的戰爭叫囂激起了保守派的強烈反應。

6月23日，「百萬雄師」開始進攻所謂的敵佔區——武昌。第一個目標是兩個造反派堡壘：險峰大樓和第四鐵路設計院。這兩個目標是經過精心選擇後確定的。前者坐落在從漢口和漢陽進入武昌的唯一入口處，後者處於控制武昌和青山之間戰略通道的關鍵位置上。「百萬雄師」企圖通過佔領這兩個關鍵地點，以便於調動兵力，為攻克武昌創造條件。

就在圍攻這兩個堡壘之際，武漢水運學院的造反派偶然捉住「百萬雄師」的七名分支頭頭。他們以這幾人為人質，要求「百萬雄師」立即撤圍。保守派予以拒絕。相反，在佔領險峰大樓和第四鐵路設計院

後，「百萬雄師」又調動兵力圍攻水利學院。兩百名被圍的造反派拼命抵抗，但保守派力量佔了絕對優勢。第二天，水利學院落入「百萬雄師」手中。[36]

6月24日，「百萬雄師」敲響了武漢造反派的喪鐘。在漢口，它對工造總司發動猛攻。在這個過程中，打死二十五人。[37] 為什麼保守派的攻擊會如此殘酷？這場戰鬥的指揮員是這樣來描述的：

> 聯合會時期，我們太老實，總是吃造反派的虧，窩了一肚子火。這時我們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我們的想法是只有把他們所有的據點都拆掉，武漢才能太平。說到工造總司，它的喇叭天天在那兒叫。不拿下這個據點，總叫人不舒服。打工造總司事先開了兩次會。決定用汽車撞大門，武器是長矛。打時一般只戳一下子。只有那個女廣播員罵得很難聽，多戳了她幾矛子。我們以前一直受造反派的壓，這次出了一口氣。[38]

工造總司的陷落，使造反派驚恐萬分。第二天，他們放棄了在漢口的所有據點和武昌的很多據點。一些人退到造反派仍然控制的武昌的學院裏；另外一些人退出組織；還有一些人離開武漢，以避免再次遭難。[39]

武漢造反派的失敗迅速引起北京的注意。6月24日晚，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親自給陳再道打電話，催促他防止武鬥的升級。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和解放軍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共同向武漢軍區發出電報。電報全文如下：

> 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危害革命群眾的凶手應按《六．六通令》嚴肅處理。不久之後，中央將請武漢軍區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彙報。[40]

在受到北京的點名批評之後，「百萬雄師」採取了低調姿態。就在第二天，它將駐紮在武漢市委大樓裏的總部搬到一個軍需工廠，並解散了作戰部。保守派雖然公開聲明，「6月26日通告顯示了中央文革小

組對『百萬雄師』最大的關心」，但他們在私下卻抱怨這封電報「長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滅了無產階級的志氣」。他們希望中央在會見時，會給他們提供一個機會來傾訴造反派對其造成的冤屈，並說明他們自衛行動的正當性。[41]

6月26日的電報使造反派免於滅亡。中央文革小組派的一個特別聯絡員對武漢造反派駐京代表說，中央領導需要有關武漢軍區的情況，催促他們收集這種情況上報給北京。這種姿態表示，北京並不信任武漢軍區。造反派頭頭得到這種暗示後，又開始得意忘形起來。6月28日，武漢軍區命令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所有組織必須從據點中撤出，所有學生和工人必須回到自己的單位裏去，一切武器必須上繳。造反派斷然拒絕遵守這個規定。相反，有些造反派還返回到僅僅幾天前退出的據點裏。[42] 當然，造反派的元氣已經大傷。在血淋淋的暴力驚嚇面前，許多人認為，避開或者至少暫時離開這些危險地點更明智。很多以前人數眾多的據點，現在都平靜下來。敢於回到據點的造反派裏的，多數是未諳世事的中學生。[43]

從6月27日至7月15日，這個城市變得相對平靜，沒有嚴重衝突的消息。[44] 保守派和造反派都在等待即將進行的北京會談。如果他們想要在談判桌上取得在戰場上沒能取得的東西，那麼他們就必須保持克制。雙方都知道，在這個關鍵時刻，他們必須避免做出任何不明智的事情。

武漢軍區也忙於為即將進行的北京會談做準備。在為中央領導準備的一個報告裏，軍區並沒有掩蓋自己對武漢造反派的強烈反感。它指責造反派向解放軍挑釁。在1月6日至6月30日之間，據估計有342名戰士受到攻擊，其中有226人受傷，38人受重傷。武漢發生的每一個事件都是由造反派挑起的。它還把造反組織描繪成「牛鬼蛇神的大雜燴」。它還說，新華工是由一夥教師操縱的，而這些教師多數出身於地主、富農和資本家家庭。

在武漢軍區看來，武漢最好的組織是三司。是個造反團體，在1966年底向湖北省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與其它造反團體不同的是，它很少做出格的事，而且總是站在軍隊一邊。三司的唯一問題就是，在日益動蕩的政治環境中，它的勢力在萎縮。

武漢軍區斷言，武漢絕大多數居民同情「百萬雄師」。「百萬雄師」的成員政治背景「純潔」。據估計，全市85%的黨員參加了這個組織。而且保守派的行為總的來講是溫和的，只有當他們的克制被造反派誤以為是軟弱可欺時，他們才發起反攻。儘管6月8日以後的事件很殘酷，但軍區認為這些戰鬥對於恢復社會秩序是必要的。武漢軍區認為，造反派應對大多數暴力負責。[45]

造反派對暴力行動的解釋與武漢軍區的說法大相徑庭。據造反派統計，從4月29日至6月26日期間，共發生174起暴力衝突，其中有130起發生於6月4日至26日之間。這些事件涉及70,000人；有158人死亡，1,060人受重傷。他們指責保守派挑起了這些衝突。[46]而三司報告說，在上述時期內，共發生107起暴力事件，只有6起由「百萬雄師」挑起。[47]說到誰開的第一槍，三司的說法可能更接近事實真相。無組織無紀律的造反派，特別是所謂八司戰士要比組織嚴密的保守派更加好戰。甚至造反派自身也承認，「八司具有巨大的破壞性，但沒有什麼真正的戰鬥力」。[48]然而，說到大多數傷亡是由哪一方造成的問題時，造反派的說法也許是合乎情理的。由於保守派在數量上、裝備上和組織上均佔優勢，一旦他們決定發起反攻，就能夠輕而易舉地打垮造反派。

武鬥不僅造成傷亡，危及公共安全；它還破壞了生產，擾亂了居民的日常生活。5月份的工業總產值下降了6%，6月則下降了16%。勞動生產率在這一年的上半年下降了6%。生產癱瘓導致很多日常必需品短缺。[49]武漢軍區認為，造反派要為這種經濟困難負責。因為保守派一般在工業企業中佔主導地位，正是他們維持了大多數工廠的生產。但也有例外。在造反派控制或者保守派與造反派對立不嚴重的單位裏，造反派也發揮了維持生產的作用。[50]但是，這些例外並不能改變武漢軍區對造反派的觀點。

武漢事件

7月11日，周恩來通知陳再道說，武漢談判就在這個城市進行，而不在先前計劃的北京。[51]改變談判地點的原因(周沒有告訴陳)，是毛澤東決定視察南方幾個省，而第一站將是武漢。

7月13日，毛澤東到達武漢*。他的隨行人員有周恩來、謝富治(公安部長)和王力(中央文革小組要人之一)。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個人安全，甚至對陳再道和其它地方領導人都沒有通知毛的到達時間。只讓周、謝、王負責處理當地問題，而且只讓後二人在公開場合露面。[52]

大約在7月13日午夜時分，謝和王身穿便衣到造反派的一個據點——湖北大學去收集情況。但是，他們被學生們認了出來，於是北京派代表團來到武漢的消息馬上在造反派組織中傳開。

第二天，造反派舉行了盛大遊行示威表示歡迎「毛主席派來的親人」，而保守派則不知所措。他們不理解，為何沒人通知中央代表團到達的消息。這正是造反派希望達到的效果，也就是要製造一種表示他們與北京有特殊關係的象徵，來壓一壓保守派。造反派故意在「百萬雄師」控制的地區遊行，向後者示威。他們高喊：「取締百匪！」「百萬雄師」則用高音喇叭高呼：「打倒黑工總，鎮壓反革命！」「踏平三新二司！」對罵很快引發了一場衝突。而「百萬雄師」對突然襲擊早有準備，其高度靈活機動的突擊隊對任何攻擊隨時待命，所以造反派又被徹底打敗。結果10人喪命，37人受重傷，80人受輕傷。[53]

最新的武鬥表明，解決這個城市的派性衝突問題迫在眉睫。7月15、16日，毛澤東兩次召見周、謝、王討論如何解決武漢問題。毛澤東提出三條建議：第一，應該給工總平反，釋放被捕的造反派領袖；第二，應當允許「百萬雄師」存在，即使它是一個保守組織；第三，應當停止對造反派的歧視。[54] 從7月15日至18日，周、謝、王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召開了武漢軍隊高級幹部會議。雖說要讓地方軍隊領導人在會上有機會發表他們對武漢形勢的意見，但由於有了毛澤東的指示，所以三位中央領導人根本聽不進地方領導人提出的建議。陳再道拿出了武漢軍區收集的證據，要證明「百萬雄師」是「真正的」革命組織，但毛澤東的特使拒絕聽他的話。相反，三位中央領導人要迫使他承認武漢

---

* 毛澤東於7月13日晚到達武漢。同日早晨，周恩來乘飛機提前抵達，為毛澤東打前站。當天中午謝富治和王力由四川趕到武漢。

軍區在前幾個月犯了錯誤。由於不瞭解毛澤東正在武漢，也不知道正是毛澤東為解決武漢衝突已經定了調子，所以陳拒絕接受這種指責。[55]

7月17日晚，謝和王訪問「百萬雄師」聯絡總站。王指責「百萬雄師」的領導人組織武鬥，並強烈要求「百萬雄師」交出武器、撤出據點。「百萬雄師」的領導人回答說，如果造反派也在同時放下武器的話，那麼他們的組織就願意放下武器。王接著批評他們說：「你們提出這個問題就是錯誤的！你們管你們自己，不要管別人嘛！」他的嚴厲指責激怒了「百萬雄師」的領導人，他們反駁說：「叫我們單方面回去，就等於叫我們投降。舉手投降的事我們不幹！各派群眾組織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團也平等對待。」這次會見不歡而散。

離開「百萬雄師」總部以後，謝和王又去了武漢測繪學院，即二司總部所在地。他們對造反派說，毛主席最近說，不應當拋棄大型群眾組織，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拋棄。雖然謝和王沒有明講中央在解決當地派性糾紛方面的立場，但他們傳遞的信息已十分明確：黨中央支持造反派，但希望他們對保守組織的成員要寬宏大量。

7月18日，周恩來對參加會議的軍隊幹部宣佈了北京的決定：(1)武漢軍區在過去幾個月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陳再道和鍾漢華應當做自我批評；解散工總是錯誤的；要為工總平反，釋放所有在押的造反派領袖。(2)二司、三新、九．一三兵團和工總是真正的革命組織。它們應當形成將來大聯合的核心。(3)不應當取締或解散任何群眾組織，包括保守組織。(4)「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恢復後，其成員可能會報復「百萬雄師」的人；應當努力勸告他們不要這樣做。(5)三司是一個有保守傾向的組織。(6)武漢軍區應當勸告農民不要進城幫助保守派打造反派。(7)武漢軍區應當鼓勵其下屬單位支持造反派。(8)所有群眾組織都要加強整頓，改變自己對解放軍的看法。[56]

陳再道和鍾漢華仍然不服。周恩來不得已只好帶他們去見毛澤東。到了此時，陳和鍾才意識到，正是毛澤東在幕後作出了所有的決定。陳也許敢於同謝、王甚至周對著幹，但他不敢挑戰毛澤東的權威。所以，陳別無選擇，只好同意做公開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接見陳和鍾以後，周恩來離開武漢回北京。由於兩位地方

最高領導人已經接受了毛澤東的決定，所以他認為和平解決武漢問題不會再有什麼障礙了。但他忽視了普通民眾將如何對這些決定做出反應。

第二天凌晨，謝和王在武漢水電工程學院向一些造反派公佈了毛澤東的決定。那些造反派得到好消息後根本沉不住氣，他們開動了手中掌握的一切宣傳機器。消息很快傳遍全市大街小巷，但消息被歪曲了。造反派在宣傳時故意強調毛澤東做出的四條決定，而不提其餘各條。那四條是：武漢軍區的大方向是錯誤的；必須為工總平反；造反派是真正的左派；「百萬雄師」是一個保守組織。所有這些看起來，似乎只有摧毀了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北京才會滿意。

北京支持造反派的消息通過另一個管道——武漢駐軍8201部隊傳到保守派那裏。當武漢軍區於2月1日建立「支左指揮部」時，就指派這個部隊在該市支左。[57]「百萬雄師」成立後，8201部隊與這個保守組織建立了密切的關係。8201部隊十分同情「百萬雄師」，是一個公開的秘密。7月18日晚，該部隊的師長和政委向官兵傳達了周恩來的講話。雖然他們本身也不信服這一中央決定，但兩位領導人還是對迷惑不解的下屬們說：「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8201部隊有一大批幹部戰士在各個工業、交通、商業和政府單位擔任軍代表。毛澤東的決定通過這個網絡傳到了保守派那裏。保守派最初的反應是，這一決定只不過是造反派的最新編造。有趣的是，軍代表透露中央決定時，也強調了造反派所強調的那四條。[58]由此可見，那四條的確對雙方都至關重要。

7月19日，武漢軍區領導人開始執行決定。這天早晨，陳再道和鍾漢華起草了他們的自我批評。下午，召開了軍隊幹部會議，謝富治和王力應邀與會，以幫助那些幹部清理他們的「糊塗思想」。王借機向思想簡單的軍隊幹部大談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義。他從下午4點一直講到晚上11點。對與會者關於當地派性衝突的看法，王的講話是否起了促進轉變的作用，還很難說。但很快就明確的是，即使高級幹部決定轉變看法(那是不太可能的)，隨後幾天發生的事情也難於避免。王力在武漢軍區禮堂講話之時，一場政治風暴正在這個城市醞釀。

正式將「百萬雄師」定為「保守派」的消息激怒了這個組織的成員。

僅僅一周前，老紅衛兵的一個研究小組向「百萬雄師」總部提出了一份報告。報告預測，北京就武漢問題做出的決定將不利於保守派。紅衛兵對北京就其它省份派性衝突所做出的決定進行了觀察和分析，並以這些中央決定所反映類型的觀察和分析為基礎得出上述結論的。報告預測說，北京頂多會給「百萬雄師」一個模棱兩可的定性，即稱之為「群眾組織」，並允許它繼續存在。「百萬雄師」的領導人對這份報告很重視，只是認為它似乎太悲觀了些，所以沒有讓一般成員看到這個報告，以免動搖他們的士氣。

王力7月17日對「百萬雄師」的惡意指責，則成為另一個不祥之兆。但是，「百萬雄師」的大多數領導人和群眾仍然不相信毛澤東會拋棄他們，因為他們長期以來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基礎。他們認為王力的批評只代表了他的個人偏見。

現在，「百萬雄師」的災難終於降臨。造反派當然強調，王到武漢來代表的是北京的中央領導，他的四點意見代表了北京的觀點。但是，保守派對此表示懷疑。此時，除了個別當地最高領導人以外，誰也不知道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武漢進行幕後操縱。只有王和謝在公共場所不斷露面，而且王發表的言論最多。所以，保守派就認為王只代表他本人，所謂的四條指示僅僅是王個人對「百萬雄師」表示的敵意。保守派擔心北京會受王的蒙騙從而認可他在武漢的所作所為。[59] 如果想避免其它省份保守派那樣的悲慘結局，「百萬雄師」就必須做出不尋常的事，以便向北京表明，它的群眾基礎非常深厚，人民對王在武漢的獨斷專行是多麼強烈的不滿。

7月19日，全市陷入一片狂潮之中。連平常表現溫和的保守派也被「王力的決定」所激怒。[60]「百萬雄師」群情激憤，武漢的危機形勢一觸即發。

8201和8199兩支部隊的士兵點燃了抗爭的烈火。傍晚時分，大約60名士兵聚集在武漢軍區司令部大院門口，要求王力解釋提出四點指示究竟想要達到什麼目的。但是，中央的「欽差大臣」與武漢軍區領導對他們的請求不予理睬。於是他們決定尋求廣大群眾的支持，以對王施加更大的壓力。晚上八點左右，幾十名官兵出去聯絡「百萬雄師」和「武漢公檢法」（由武漢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職工構成的保守組

織）。[61]四小時後，幾百輛滿載憤怒的保守派和公安幹警的大卡車和消防車衝到武漢軍區司令部，要尋找謝和王。而謝和王已經離開這裏，去他們下榻的東湖賓館。這些人就質問武漢軍區領導人：「軍隊支左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為什麼陳再道和鍾漢華承認武漢軍區犯了錯誤？」有些人甚至罵陳和鍾是「投降派」。

武漢軍區領導人立即向王彙報了軍區大院發生的事情，建議他見一見這些保守派代表，以免事態失控。但王認為事情並不那麼嚴重。當晚，他和謝沒有做出任何努力來緩和緊張的形勢。

第二天拂曉，約二百名保守派進入東湖賓館，遇到謝富治和陳再道。由於謝與王不同，是個老幹部，並且極少公開批評「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所以他同保守派間的談判進行得相當順利。他們同意，謝和王力將會見保守派團體，而保守派將撤出賓館。但當王力從房間走出來時，正好遇到又有好幾百人（其中大多數是8201部隊和8199部隊的士兵）衝進賓館，局面再次失控。起初，有些人把陳誤以為是王，就用槍托打他。他們發覺認錯人了以後，就開始圍攻王。[62]此時據説鍾漢華跪在地上乞求人們放了王。[63]但局勢太混亂，沒人理他，人們把王力拖到武漢軍區大院，那裏有幾千名「百萬雄師」的人在等待。

就在武昌局勢失控之際，振奮人心的「新聞」開始在全市流傳，其中有：

> 毛主席的四大天才發現：一、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紅衛兵；三、上海的1月風暴；四、「百萬雄師」。
>
> 毛主席對「百萬雄師」的批示：「大、好、純，要愛護它」
>
> 中央軍委的電報（7月20日凌晨4點收到）：一、武漢部隊支左大方向是正確的；二、為了滿足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萬雄師好，陳再道好。
>
> 中央文革來電：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關於武漢問題的表態，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將派周總理和陳伯達同志來武漢解決問題；三、謝副總理和王力是來武漢瞭解情況的，不是來處理武漢問題的。

重要的不是誰編造了這些謠言，而是這些謠言對當地居民產生了什麼影響。只要謠言適合他們的利益，他們就可能接受並傳播這些謠言。當時，保守派之所以不遺餘力地傳播謠言，因為謠言表達了他們的願望。

謠言迅速鼓舞了保守派的士氣。數十萬頭戴安全帽、手持長矛、棍棒和大刀的保守派成員，或乘車、或步行，展開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據估計，示威所徵用的卡車在1,000–1,500輛之間。更多的人沿街聚集，為遊行喝彩。同時，到處貼滿大幅標語和大字報，都是一個內容：「王力的四點指示是大毒草」、「王力從中央文革滾出去」、「王力滾出武漢」、「歡迎毛主席的真正代表周恩來、陳伯達來武漢」。保守派的高音喇叭在全市整天播送一首為毛澤東《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1949年)譜寫的歌曲，因為這首詩中包含「百萬雄師」這個詞。[64]

狂熱的氣氛使許多8201和8199部隊戰士激動不已。他們身背步槍加入了「百萬雄師」和「武漢公檢法」示威大軍之中。[65]雖然執行支左以來，軍隊一直強烈地同情保守派，但還從未公開與他們站在一起。現在他們拉下這層面紗，公開與保守派並肩戰鬥。在那天發出的一份「十萬火急呼籲書」中，8201部隊的官兵宣佈：

> 黑工總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縱的組織。我們要踏平工總，為民除害。百萬雄師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蕩蕩的、硬邦邦的、響噹噹的革命左派組織。他們把鬥爭的鋒芒始終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派。他們旗幟鮮明，是執行和捍衛黨中央指示的模範，是「抓革命促生產」、「擁軍愛民」的模範，是制止武鬥和打擊牛鬼蛇神的英雄。誰敢妄動百萬雄師一根毫毛，我們將毫不留情地殺它個片甲不留。[66]

百萬雄師與之相呼應，於同一天發出了一份「十萬火急聲明」。聲明發出以下誓言：

> 我百萬雄師全體戰士堅決與8201全體指戰員同生死、共存亡。我百萬雄師對黑工總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須鎮壓。「三新」、「二司」大小知識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由我廣大工農兵來鑒別

> 決定，不能由「欽差大臣」來封。我們已經做好犧牲一切的準備，不徹底粉碎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死不瞑目。[67]

三司也發表了一個聲明，但以更加溫和的詞句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它還稱王力為「同志」。它雖然認為王力的四點指示與毛澤東思想相抵觸，但僅僅批評這是「官僚主義辦事方式的後果」。三司之所以也加入抗議活動，主要是因為它認為在談判武漢前途的代表團裏，王力給三司的名額很少，很不公平。[68] 它不知道中央也把三司劃為保守派。否則，它也會如同「百萬雄師」一樣激烈。

武漢處在動亂之中，而毛澤東仍在這個城市裏，住在距王力被揪走的地方不遠的樓裏。但他的安全並沒有受到威脅。應毛澤東的要求，武漢軍區領導人設法營救出王力，並把他安排到一處安全的地方。但是，北京的領導人認為武漢現在太不安全，毛澤東不宜待在武漢。在林彪的勸告下，毛澤東於7月21日清晨離開武漢到上海去。在毛澤東離開武漢前，周恩來飛回武漢。他為了平息武漢的局勢，建議武漢從造反派和保守派組織雙方選出100名代表去參加北京的談判。看到這一提議，陳再道認為北京對武漢的看法可能會軟化。他立即發出一道命令：「不要再提王力的指示。最後的決定將在北京做出。」[69]

7月21日，保守派繼續進行示威遊行，全市仍然動蕩不安。「百萬雄師」遊行所到之處，造反派迅速逃走。遊行遇到抵擋時，「百萬雄師」就將其一舉粉碎。幾十個造反派的據點被拔除。到7月23日為止，全市只剩下四五所大專院校仍被造反派控制。[70]

「百萬雄師」受到勝利的鼓舞，開始考慮奪取省市大權。正當群眾在街上遊行示威之時，其高層領導人召開了一個會議，討論權力過渡問題。保守派同伴在過去兩天裏爆發的無限幹勁，使與會者倍受鼓舞，他們一致認為奪權的時機已經成熟。「百萬雄師」包括了大多數革命群眾，大多數領導幹部也公開表示支持「百萬雄師」，或悄悄地表示同情「百萬雄師」。此外，武漢軍區更願意與「百萬雄師」一起工作，而不願意與難纏的造反派打交道。由於具有三結合的全部成分，所以「百萬雄師」的領導人對不費多少氣力奪權充滿了信心。[71]

在保守派歡呼他們在武漢的勝利之時，北京卻得出這樣結論：武

漢正在發生一場「反革命叛亂」。7月23日，中央廣播電臺反復播送謝富治和王力安全返回北京的消息。[72] 第二天，全國各地都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聲討「武漢的反革命分子」。這些遊行示威於7月25日達到高潮，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群眾集會。7月27日，黨中央向武漢市民發出了一封公開信，號召他們把鬥爭矛頭指向「三個一小撮」——「武漢軍區、『百萬雄師』、『公檢法』一小撮壞頭頭」。[73]

王力在北京機場受到歡迎的消息通過廣播傳到武漢時，保守派大為震驚。在接下來的幾天裏，北京當局公開指責「百萬雄師」、支持武漢造反派的消息就越來越明確。全國各地成千上萬封聲討電報湧入「百萬雄師」總部，給它的主要領導人帶來極大壓力。他們不太關心陳再道的個人命運。但他們不能理解的是，北京對武漢最大的群眾組織「百萬雄師」為何那麼嚴厲。他們可以想到的唯一解釋，就是毛澤東和林彪被蒙騙了。[74]

最初，「百萬雄師」總部決定，只要毛和林沒有公開宣佈他們的立場，他們就不屈服。但林彪7月25日在天安門廣場大會上的出現，打破了他們的幻想。有人繼而猜測毛澤東也許被林彪軟禁起來，他們發誓除非毛澤東親自點名責難「百萬雄師」，否則就戰鬥到底。但大多數人開始認識到，也許毛澤東本人已經認可了這些決定。[75] 多年來，中國人受到反復灌輸的一個信仰，就是毛主席不可能犯錯誤。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多數權力機關都癱瘓了，但只有毛的個人權威得到了加強。除了毛以外，任何人都可以被懷疑、被否定。而毛卻指責「百萬雄師」，還承認工總是「革命組織」，這就使保守派大惑不解。保守派的感情是矛盾的，下面所引「百萬雄師」的一個下屬指揮部召開的會議記錄就反映了這種情緒：

> 有人說：我始終不相信我們貧下中農、工人階級就是劉鄧的人，他們所謂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態，我們也有罪，不表態也跑不脫。如果表了態，可以挽救我們下面的革命同志，不使滑得更遠。現在總站表了態。只有漢陽沒有表態，這就說明我們有分化。因此我們應該支持黨中

央、中央文革，我們應該表態。現在解放軍戰士思想不通，但是也咬著牙齒表了態。我們百萬雄師是個整體，不應該分割，應該保存這個組織。

另一個人說，如果我們明天參加了明天的會議，我們就是承認了7月19日是反革命行動。我們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生，就是砍腦袋，我們也不表態。

還有一人說：一、階級路線問題，工總翻案我也不通。理由，從以前的情況，階級陣線上看不通，但中央定了我只得執行。我認為這個組織不能當權。百萬雄師是純的，沒有做壞事。我認為百萬雄師在反逆流中是有功勞的。二、相信依靠問題怎麼理解，是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這次中央文革是壓制多數、抬高少數。三、關於陳再道、武漢軍區的問題，我們對他們希望很大。他們是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從我們和當時對方來說，為什麼說我們保陳再道？我們是不承認的。〔造反派〕打解放軍戰士，我們覺得痛心。

結論：不管通不通應該立即貫徹中央指示。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76]

林彪最先提出，「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一論調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個流行口號。一方面鼓勵盲目服從，另一方面又要施以威脅，靠這兩手北京就能夠迫使一些不聽話的個人或團體屈服。對於普通人來說，當發現毛的指示與自己的利益相矛盾時，只得避免質疑其合理性和神聖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每當北京的指示過於籠統時，各省的派別組織或者只是嘴上擁護這些指示，而在實際上不去執行，或者是按照自己的利益來解釋這些指示。但如果指示十分具體，特別是當北京決定否定某個團體時，那麼就沒人敢於爭辯這種裁定的正確性了。

7月27日，「百萬雄師」最終解散了。造反派大喜過望。因為保守派曾經揚言，「若想工總翻案，除非公雞下蛋」，所以造反派到處張貼大幅的公雞畫，並配上標語：「天亮了，解放了，武漢的公雞下蛋了。」工總的領導人得到釋放，並像凱旋歸來的將軍那樣受到歡迎。從

7月25日起，他們每天都遊行以慶祝「武漢的第二次解放」。7月31日，北京任命了武漢軍區新的領導人。前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曾思玉擔任武漢軍區司令員；任命武漢空軍原副司令員劉豐為武漢軍區政委。[77]

造反派贏得了城市，但並沒有贏得前保守派的心。雖然保守派組織瓦解了，但保守派作為一種社會力量並沒有消失。[78] 所以，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衝突還可能以新的形式繼續下去。就造反派而言，各個造反派組織在患難中形成的夥伴關係能否維持下去，還是值得懷疑的。但不管怎麼說，由於「百萬雄師」保守派的衰亡，武漢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第八章

造反派之間的衝突，1967年8–12月

天下大亂

由於武漢軍區軍事領導人和「百萬雄師」的支持者都無意對抗中央領導，所以武漢事件很快得到控制。但是，武漢事件卻觸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運動。[1]

1967年8月初在武漢發表的一篇文章闡述了武漢造反派獲勝的戰略意義：

> 武漢偉大的「7月革命」以豐富的革命實踐告訴我們這樣一條經驗：要奪黨內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權、沒收他們的大印，還得奪取軍內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竊取的一部分軍權。繳他們的槍杆子。否則，前者就會變成一句空話。[2]

在與「軍內一小撮」鬥爭的過程中，造反派意識到需要把自己武裝起來。在全國許多地方，首次出現了武鬥的群眾組織搶奪解放軍武器的事件。軍委頒佈了十條不許使用武力對付民眾的限制，令軍隊因此無法抵抗。在7月底8月初，幾乎所有群眾組織都企圖武裝自身。全國範圍內，有數千座部隊倉庫和軍營遭到攻擊。[3]群眾自發的軍事化現象驚動了北京，為維持最低程度的公共秩序而採取了雙重方針。一方面，奉勸群眾不要搶奪部隊的武器；另一方面，又答應有序地向左派發放槍支。[4]在武漢，武漢軍區新領導於8月中旬開始安排向造反派發放武器。[5]造反派歡呼北京關於武裝左派的決定，但與此同時，他們

卻不理睬黨要其終止自發從軍隊奪取武器的呼籲。由於北京沒有也不可能具體指明哪些團體是左派，哪些團體不是左派，所以它關於武裝左派的決定只能加速群眾組織之間的軍備競賽。

許多組織建立了準軍事團體，開始進行軍事訓練。但在多數情況下，造反派是通過搶劫軍火倉庫來裝備自己，而這種行為並不會受到處罰。當時持槍出現在公開場合成為一種時尚，而且學生和年青工人熱衷於朝天開槍，向空地投擲手榴彈。不受管束的造反派擁有火器，使對立派別之間發生武鬥的可能性大增。[6]

同其它很多城市相比，8月的武漢還是相對平靜的。兩方面原因導致了這種狀況的出現。第一，武漢軍區領導層剛經過全盤改組，曾經壓制造反派的地方部隊也換成了其它部隊。第二，造反派近期為同強大的保守派鬥爭被迫形成了統一戰線。即使其共同敵人不再存在，它們之間的潛在矛盾也需要一段時間才會激化到公開衝突的程度。所以，武漢的軍隊沒有遇到廣州、福州、南京、瀋陽及其它地方軍區所面對的嚴重挑戰，這個城市在7月25日後也沒有傳出有關大規模武鬥的消息。[7]而中國的其它地方仍然處於大動亂之中。在幾乎所有省份裏，都傳出裝備有重型武器的兩派發生武鬥的消息。甚至在北京也經歷了史無前例的暴力活動浪潮。[8]在1967年夏季，中國處在了內戰的邊緣。

8月底，北京開始意識到，在霍布斯「自然狀態」裏，交戰各派不大可能坐下來商談如何擺脱「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除非重新建立公共權威。所以，它採取一系列嚴厲措施來恢復秩序，比如強烈批評造反派在7月底和8月的大方向，終止「武裝左派」計劃，並對造反派的行為做出各種限制。更重要的是，命令造反派把武器還給軍隊。[9]

像往常那樣，當北京明確禁止某件事時，其指示會相當有效。9月初，武漢造反派開始向軍隊歸還武器。但這決不是一種政治緩和。在多數情況下，造反派還給軍隊的只是不易隱藏的陳舊的重型武器。常常留下比如手槍、手榴彈之類新的小型武器。所以，造反派與軍隊之間以及競爭派別之間的休戰就可能是短命的。但由於北京的加倍努力，運動還是安然渡過暴風驟雨，於秋季進入了更為比較平靜的階段。

尋找新的身分

武漢事件使參加武漢文化大革命的人有了新的身分，並因而改變了他們對集體行動價值的期望和計算。

不思悔改的保守派

武漢事件以後，人們要求保守派承認錯誤，站到造反派一邊去。[10] 毛澤東認為，他們過去是由於受到蒙蔽才成為保守派，只要他們認識到這一點，就會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裏去。但正如前面所表明的那樣，人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站在哪一邊並不是隨機決定的，因此轉變立場就不會像毛所期望得那麼容易。讓保守派相信陳再道是個「壞人」並不困難。因為他們對陳瞭解很少。然而，讓他們相信造反派是真正的「革命派」卻非常困難。[11] 所以，雖然可以不費氣力地使「百萬雄師」瓦解，但大多數保守派在武漢事件後仍然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性，拒絕與他們單位的造反派合作。

如果保守派想在這種普遍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他們有三種選擇。第一種是「身體逃逸」。相當一部分保守派由於害怕造反派的報復，當聽到北京公開譴責武漢事件後，就離開城市，逃到家鄉或其它安全的地方。因此，武漢事件後造反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發出數千份通緝令。「百萬雄師」和「武漢公檢法」的30名頭頭是主要的通緝對象。經過大力搜查，他們於8月中旬落入法網。一名被俘者在1967年8月造反派舉行的公開批鬥會上被打死，另一名因病死於監獄，其餘的人在監獄裏一直被關到1972年3月。[12]

由於造反派威脅停發工資甚至開除工作，那些離開城市的保守派逃亡者陸續回到原單位裏。但是，一般來説學生不太怕被學校開除，所以不少學生到1967年底才返回他們的學校。[13]

第二種選擇是「組織逃逸」。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有所謂「逍遙派」。很多保守派現在決定不加入造反組織，從而成為一種新型的非自願「逍遙派」。這種選擇表明他們不願意與勝利了的造反派合作。雖然那些從前的保守派不再有自己的組織，但他們仍然公開或秘密地聯合起來，互相交換信息和意見。這些頑強的保守分子使造反派很頭疼。[14]

保守派的第三種選擇是「改換門庭」。大批保守派特意參加了造反組織，為的是繼續與他們單位裏的造反派作鬥爭。例如，許多保守派加入了九．一三兵團。這是一種蓄意的明智選擇。以青山區武漢鋼鐵公司為基地的九．一三兵團，直至1967年7月中仍然是一個小組織。但由於它與工總聯合，所以在武漢政治中具有一些影響力。保守派加入九．一三兵團有兩個好處：它們既能保障安全，又可以對本單位「真正的」造反派保持獨立姿態，因為後者難於對前者採取行動，否則會冒犯整個九．一三兵團。[15]

九．一三兵團並不是保守派的唯一選擇。在許多情況下，前保守派會選擇加入本單位最弱的造反團體，以圖改變那些團體的成分甚至領導層。[16] 例如，在一個醫院裏有兩個造反組織：一個附屬於工總，主要由臨時工組成；另一個附屬於紅色造反司令部，主要由醫務工作者組成。武漢事件後，這兩個組織都試圖通過吸收前保守派分子來擴充自己的力量。大多數保守派最終加入了工總。這對於不瞭解內情的人來説，似乎不可思議，因為在武漢政治鬥爭中，工總比多數造反組織更激進。保守派選擇參加工總，是因為在這所醫院裏工總的分支比紅色造反司令部弱得多。後來，工總的這個分支儘管領導人沒變，但卻受到以前保守派的控制。在保守派組織瓦解之後，這種類型的重新組合在很多單位發生。[17]

當然，有極少數機會主義者真正改變了派別，把命運押在勝利者一方。也有一些人參加造反組織是希望藉此來免遭造反派的個人報復。轉變派別後，機會主義者常常比真正的造反派還激進，因為他們要表現其誠意。而那些膽小的人則通常對造反事業不感興趣。

桀驁不馴的造反派：報復行為

報復也許是人類的天性。在正常情況下，這種本能受到社會規範和法律約束。但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一切社會規範和法律，摧毀了公共權力。所以，報復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北京預見到造反派在勝利後，會報復「百萬雄師」成員，所以在武漢事件後，中央反復規勸武漢造反派不要報復從前的保守派。[18] 而北京卻沒有採取任何

具體措施來阻止造反派這樣做。在7月末和8月間的無政府狀態之中，報復成為「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的一部分。

武漢事件後，造反派開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害他們單位裏的前保守派。由於他們吃過許多苦頭，受過難堪的羞辱，這時就抓住機會，大力實施報復行動。從7月末至8月間，每個單位都召開批鬥會，給成千上萬人被戴上高帽遊街。這種情形與「破四舊」期間很相像，只是人們的角色被顛倒過來。以前運動的許多受害者，現在是好戰的「革命造反派」，他們可以隨意懲罰一年前虐待過自己的人。他們懲罰的不僅是「百萬雄師」總部的頭頭，還有它的分支頭頭，甚至普通群眾。造反派對僅僅以牙還牙不感興趣。為了發泄積壓已久的仇恨，他們常常要加倍地實行無情的報復。很多保守派受到殘酷折磨，家被抄，家庭成員被虐待。[19] 據不完全統計，武漢事件後，僅在武漢就有超過600人被毆打致死，6,600多人被打傷或致殘。[20] 一派對另一派的報復，看來比兩派之間的武鬥更加嚴酷，造成更多的死亡，給人們帶來更大的苦難。

在不同單位裏，報復有著不同的形式。學生們一般在政治上不太成熟，但他們知道畢業後大夥將各奔東西，所以，他們在毒打同學時不存一絲擔憂。[21] 成年人的報復行為要比學生之間更加頻繁。但是，工廠工人和辦公室職員就不得不更加小心一些。在中國的體制中，一個人一旦得到工作，就很可能會一輩子待在這個單位裏，所以，毒打同事要冒政治上的風險。雖然這種擔心並不會阻止造反派報復保守派的同事，但他們常常叫別單位的造反派同夥，特別是中學生和青年工人，來做這種骯髒的事情，以使受害者無法識別隱藏在後面的教唆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策略還真起作用，很多受到報復的人的確無法說出迫害自己的人的姓名。但從另一種意義上講，這種策略則是完全失敗的。因為這個策略受到廣泛運用，所以受害者並不會認為外人對其傷害是偶然的。相反，受害者認為他們單位的造反派策劃了這些事，應當為傷害別人承擔責任，所以，他們對攻擊者和教唆者一概不予寬恕。結果，他們對本單位造反派的敵意不僅沒有減少，還擴大到社會上，其它造反派也都成了他們敵視的對象。他們會暫時掩藏自己的仇恨，但到了適當的時候，如果機會來臨，他們就會報復造反派。[22]

雖然復仇和報復在團體的背景下展開，但它們主要是個人行為。這些輕率的暴力行動是為了滿足個人願望，但會導致一些事與願違的後果，造成「公害」，以致於損害整個造反運動。當然，如果造反派個人沒有取得集體事業的成功的話，他們就無法打擊其個人敵手。但此時報復行動的盛行似乎表明，在戰勝保守派之後，造反派對集體行動價值的個人考慮已經發生了變化。很多造反派認為，進一步合作的邊際效用正在減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集體行動的成功反而減少了自身的價值。

桀驁不馴的造反派：新逍遙派

報復高潮持續了大約兩個月。當公共秩序於9月中旬逐漸恢復時，造反派的過分行為開始收斂。大批造反派突然感到，他們對今後幹什麼卻茫然不知。一位前造反派理論家在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作用時指出，造反派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他們具有擾亂和摧毀現存體制的巨大能力，但極少去考慮如何改革這種體制。為了使自己從各種各樣的壓迫和限制中解放出來，造反派把頂頭上司和保守派同事當作打擊對象。對許多造反派來說，報復即使不是促使他們積極參與政治的唯一動力，也是一種主要動力。一旦他們作為勝利者發泄了對所仇恨者的私憤，在集體行動中，他們個人就不再有什麼收益了。由於明確的鬥爭對象已不存在，大批造反派，特別是從前的落後分子，就失去了參加集體行動的興趣。他們開始退出政治，成為「新逍遙派」。[23]

由於學校停課，工廠也受到嚴重影響，新逍遙派的問題就是如何打發時間。初中學生發現，與鄰里朋友在一起玩要比與學校造反組織的同伴在一起活動更有趣。他們在街上遊蕩，從孩提遊戲如鬥雞、養信鴿中尋找樂趣。高中生和大學生有自己取樂的更高級方式。一些人打牌下棋，另一些人讀古今中外小說。他們一年前熱衷於焚書，現在書籍卻成了他們的喜愛之物。還有一些人開始談起戀愛，沉溺在羅曼蒂克之中，以使自己超脫於周圍的亂糟糟的環境。有些人開始學習外語或者數學、物理等等。其它人則更加實際，開始做針線活，或者學烹調，或者學習修理收音機，或者演奏樂器，或者提高其它技能。[24]

工人更加實際，他們花時間來改善日常生活的品質。許多人釣魚、打獵、做木工或家庭修理活。1967年末，在武漢流傳一個說法，即定期注射雞血可以延年益壽，在一段時間裏，這成了武漢的一個熱門話題。有些人去試，而更多的人只是熱衷於談論它。[25]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派性鬥爭中傷亡了成百上千人，而另外的人卻在尋找長壽之方。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被當成「毒草」的電影卻又開始放映，而放映這些影片的理由堂而皇之：因為造反派需要批判它們，所以就得先觀看或審查這些電影。事實上，人們對為數不多的內容單調乏味的「革命」影片已經厭煩，想要看更多的電影。有些造反派試圖通過放映老電影而向觀眾收費來牟利，據說一些組織甚至互相偷竊電影拷貝。[26]

桀驁不馴的造反派：兑現經濟收益

造反派於7月獲勝後，一股新的經濟主義浪潮又在武漢掀起。一些造反派提出了一個蠱惑人心的口號，即「我們不僅要在政治上翻身，而且也要在經濟上翻身」。在經濟上處於不利地位的集團利用公共權力缺失之機，企圖迫使已經驚恐萬狀的前當權派滿足其經濟要求。

大批下放農村的知識青年返回武漢，要求在城裏得到永久居住權和工作機會。對所分配工作不滿意的復員軍人要求得到更好的工作。1966和1967年的中專或中技學校畢業生對其職位和工資不滿意，要求得到更高的職位和工資。

國有企業的臨時工和合同工要求轉為正式工，或者至少要享受正式工的工資待遇和其它福利。國有企業的一些正式工要求得到職務提升、薪水提高、更多的福利補貼和獎金。

經濟主義在集體所有制企業最為盛行。這些企業的工人不僅僅是提出要求，而且開始擅自進行改革。有些人把小企業合併為大企業，並宣佈他們是「國有企業」，然後，他們就給自己發放與國有企業正式工一樣的工資和福利。有些人則把所在的企業改成若干更小的機構，並宣佈每個小機構都是獨立的核算單位，有權決定如何分配其利潤及分配多少。一些人儘管沒有進行機構改革，但也照樣提高自己的薪水。據說，在一個擁有58名職工的小工廠裏，其中51人的工資提高

了22.5%。除努力提高月工資以外，許多集體企業的工人以各種藉口用企業積累下的資金為自己牟利，而按照國家規定，這些公積金只能用於再投資。而此時，將這些資金分給職工，以及作為「獎金」，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有些極端的情況下，公積金很快被用光。一些工人甚至將其企業轉變為「地下工廠或商店」，用來進行投機倒把、牟取暴利、逃稅及其它非法活動，以坐收巨額利潤。

雖然這些經濟要求幾乎毫無例外地是由造反派提出的，但主要造反組織並不予以支持。主要造反組織領導人更關心政治權力的再分配，所以，來自不同組織而在經濟生活的某個方面具有相似利益的人，便常常感到有必要成立一個臨時的「單一問題」聯盟，以便推進他們的利益。而這種聯盟極少採用新組織的形式，只是在需要行動時，有關的人才在一起行動。

社會心理學家和集體行為理論家觀察到，偶而聚合的人群要比組織完善的團體更有可能進行暴力活動。那些抓住文化大革命提供的機會來推進自己經濟利益的案例，可以支持這個觀察。當時不斷報導，有暴徒搶劫企業的財會部門、省市金融機構、稅務局和銀行。暴徒攻擊的對象，並不局限於以前的當權派。不管什麼人妨礙了他們的行動，這些人就幾乎必然會遭到攻擊。他們甚至經常與所搶劫機構的造反派發生衝突。[27]

桀驁不馴的造反派：兑現政治收益

對保守派的7月勝利，使很多造反派大受鼓舞，並企圖消除過去戴在他們頭上的帽子。一些從前的資本家、地主、富農和壞分子抱怨說，「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迫使他們戴上這些屈辱的帽子。一些右派聲稱，1957年反右運動是由劉少奇和鄧小平發動的，所以他們號召取消劃分「右派」的做法，要求為「錯案」平反，還要求發還「破四舊」運動中被沒收的物品。[28]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被當作打擊對象的幹部也出來要求平反。武漢大學「三家村」之首李達已經死去，但此案所牽連的教授和行政幹部並不想了結此事。武漢事件之後，他們成立了一個強大的組織來做平反此案的工作。[29] 武漢「文學藝術界黑幫」之首程雲曾在1966年7月受到當地官方

報紙的公開批判，隨後即被關進監獄。此時，他要求還其清白。[30]前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曾淳一直被批判為「李達和程雲的後臺老闆」，此時也為自己申辯。他聲稱，王任重為保護自己而把他當作替罪羊。[31]

1967年秋還有人自發成立了一個「甄別平反委員會」，要接受人們的請求，重新審理過去審判不公的案件，推倒不公正的判決。短時間內，這個委員會吸引了大批人來求助。這個組織日益增長的影響，又鼓舞了那些相信自己受到錯誤對待的人。[32]這種「翻案歪風」顯然偏離了北京為鬥爭規定的大方向。

權力分配的政治鬥爭

造反派的骨幹並沒有墮落成新逍遙派、經濟利益追逐者或個人自由鬥士，但他們也沒有遵循毛澤東的指示。事實上，他們才更使北京頭痛。

儘管黨的領導人反復要求造反派形成大聯合，但在武漢事件後各種造反組織之間的關係很快就惡化了。形成大聯合，是建立未來權力結構的先決條件。顯然，這是一個權力分配過程。1967年1月奪權的經驗使派別領導人相信，在未來將要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中保證他們自己佔有好位置的唯一辦法，就是在形成大聯合時佔上風。

造反派領導人想要掌權，並不是因為他們需要權力來實現諸如改革現存體制之類的高尚目標，而是因為他們喜歡的就是擁有權力本身。最初，他們只想利用文化大革命來泄私憤，而毛澤東關於奪權的號召激發了他們的權力野心。他們開始把這個運動視為替代老當權派的有利可圖機會。沒有人去問，新領導者能否對舊制度結構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也沒有人去思考，如何建立新的機構來克服中國的社會弊端。他們只想做新的當權派。[33]

如果沒有一整套調節競爭者行為的規則或實施規則，權力就不可能在競爭者中間分配。這些規則至少應包含三個要素：從上千渴望權力的野心男女中篩選候選人的標準；從候選人中選擇當權派的程序；在所選當權派中分配權力的原則。1967年1月號召造反派奪權時，卻沒有提出任何規則，所以，奪權導致造反派別之間的複雜鬥爭，也就

不足為奇了。而在此時，北京想避免那種災難性後果。但它仍然沒有規定遊戲規則，只是提出了進行這個遊戲的先決條件：在分配權力之前，造反派必須形成大聯合。

形成大聯合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造反派與保守派戰鬥時，他們為了取勝而相互需要。但現在他們玩的是一個新遊戲，也就是要在自己人之間分配權力。以前他們玩過這個遊戲(在1月奪權期間)，但只是時間太短。現在遊戲又重新開場。在這場遊戲中，參與者需要形成聯盟以取得對新的權力機關的控制，但出於兩種緣由他們想使這個聯盟盡量小一些。第一，為了取得成功而每增加一個聯盟夥伴，都意味著增加參與權力分配的派別數量，從而降低每個參與派別的相對收益。[34] 第二，與造反派同保守派之間的生死鬥爭不同，權力分配不被視為零和遊戲，至少此時不是。即使聯盟比實際需要顯得更小一些，其成員仍然會期望在新的權力機關中取得一些席位。因此，與適宜的規模相比，他們也可以承受得起形成過小聯盟所包含的風險。由於各派都希望建立剛好滿足取勝需要的、盡可能小的聯盟，自發形成大聯合就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武漢事件後不久，掌握從省到基層權力的前景，再次按「香花派」和「毒草派」(現在分別被稱為「鋼派」和「新派」)的舊陣線將武漢造反派分裂開來。[35] 每一方都試圖主導大聯合，並以削弱對方為代價。

起初，「鋼派」聲稱，只有7月27日北京《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中點名的七個組織(工總、二司、九．一三兵團、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和三司革聯〔從三司分化出來的一個激進派別〕)才有資格參與省市級大聯合的組建。其它組織只有一個選擇，就是自行解散，然後加入到這七個組織之一中去。這個提議顯然是為了把權力競爭者的數量減少到最低程度。然而，它沒有得到這個單子裏所包括的三個「新派」組織的支持。在「新派」看來，這個提議是「鋼派」為保證其在討價還價過程中居支配地位的一種策略。武漢造反力量是這樣分佈的：上面所列的頭三個「鋼派」組織幾乎涵蓋了屬於此派的所有學生和工人，而三個「新派」組織只包括單子所列的三個學院。三司革聯在兩派衝突中採取了某種中立姿態。如果「鋼派」的提議被採納，那麼「新派」在其它學院、中學和工廠的力量就會被排斥於未來大聯合的協

商過程之外。工造總司作為武漢第二大工人造反組織和「新派」的支柱，更是被這個提議所激怒。8月8日，當一些中央領導人會見武漢主要造反組織負責人時，「新派」的代表對這個計劃表示強烈反感。中央領導人為了安撫「新派」，就宣佈所有現存造反組織都有在大聯合的形成中發揮作用的權利。[36]

「鋼派」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這一次它提議，大聯合需要一個「核心領導」，工總就應當是那個核心。事情很快就更清楚了，「鋼派」通過提倡核心理論，希望吞併整個「新派」。首先，它建議，所有的其它工人組織都應自行解散，其成員加入工總。如果工總中有空缺的領導崗位，而且工總領導人認為「合適」，那麼那些組織的頭頭就可以在工總中再被任命擔當某個職務。

第二，「鋼派」提倡以「武漢道路」形成大聯合。在北京，學生運動超過了工人運動；而在上海，工人運動勝過學生運動。「鋼派」提倡「武漢道路」，意味著把學生和工人運動整合起來，以工總為核心。因此，它提出，不僅所有工人組織要合併到工總裏面，而且所有的學生組織也應當併入工總中去。[37]

第三，工總要求成為省市級大聯合的核心，而它的分支不顧自己在具體單位裏的相對力量狀況，在基層也提出類似的要求。例如，在中原機械廠裏，新中原有幾千名成員，是佔主導地位的造反組織，而工總的分支只有幾十名成員，是個很小的派別。但後者主張，作為本市最革命組織的代表，它有資格掌握本廠的權力。在很多單位裏也有類似的例子。[38]

當然，「新派」並不想向「鋼派」低頭。它反對「鋼派」的計劃，並提出了一個不同的大聯合組成模式，即「革司聯司道路」。按照這一模式，每個單位的各種群眾組織首先應當合併，然後再成立一個沒有預先規定核心的聯合司令部。省市級的大聯合應當以成千上萬這樣的「聯司」為基礎，而不是以幾個大型全市性組織為基礎。這是一個經過精打細算的方案。如上所述，「鋼派」集中於幾個大型企業裏，而「新派」的力量卻分散於數量巨大的中小企業中。「聯司」模式可以保證，在總體上弱於「鋼派」的新派力量，在基層以及省市級大聯合中至少可以得到公平的代表席位。

此時的政治活動基本上是一場力量的競賽。「新派」知道，要不顯示出自己有力量與「鋼派」抗衡的話，那麼「鋼派」就會排斥它的提議。8月17日，「新派」的五十七個組織宣佈，它們正在合併為一個大聯盟，即「新武漢」。「新派」希望這種合併會極大地增強自己在同「鋼派」的權力鬥爭中的討價還價地位。[39]

8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是〈革命大聯合的核心是在群眾鬥爭的中形成的〉。社論明確批評了種種「以我為核心」論。[40] 這就為「新派」攻擊「鋼派」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新派」的所有主要出版物都把《人民日報》社論放在了最顯要的位置上。但是，社論並沒有嚇倒「鋼派」。它以詭辯的方式堅持說，工總就是在群眾鬥爭過程中產生的大聯合的領導核心。它還進一步反擊說，那些拒絕承認工總領導的人恰恰自己想得到這種領導地位。[41]

到了8月底，事情已經很清楚，即「鋼派」和「新派」在權力分配問題上都不會妥協。為了取得更好的討價還價地位，雙方就加速擴張各自的勢力。在爭取新成員的競爭中，前保守派和那些沒有參加組織的人都成了爭奪的對象。[42] 基於上面所討論的理由，相當一大批前保守派參加了造反組織。幾乎所有造反組織登記的成員數目都在急劇增加——事實上，由於增加得太快，使袖標製作和印刷業務都變得一片繁忙，而當時的整個生產卻處於停滯狀態之中。例如，一個組織據說在8月末訂購了20萬個袖標。[43] 造反組織的急速擴張，也是因為許多人同時加入多個組織。據武漢鍋爐廠四個組織提供的統計，它們的總人數超過了6,000名。但此廠實際只有4,000名職工。[44] 加入兩個或者更多相互競爭組織的策略，可以幫助人們在動蕩不定的政治環境裏生存下來，但可以想見，那些具有雙重組織身分的人不可能忠實於任何一個組織的事業。

兩大派別看來都不關心其新成員的忠誠，它們所關心的是只是其組織的規模。它們故意誇大在冊成員的人數。工總聲稱它有60、70萬成員，九．一三兵團說它有10至20萬成員，而工造總司說它有36萬成員。[45] 工造總司的前負責人後來承認，當時其組織頂多有6、7萬人。他還說，這些組織之所以誇大成員數字，是因為人們相信，權力分配大致是按照每個組織的相對力量來進行的。誇大數字正如不負責任地

招兵買馬一樣，是為實現在未來權力機關中爭得更多席位而採取的一種策略。[46]

9月初，兩大派間的緊張關係更加嚴重。9月4日，「鋼派」勢力聯合成立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總司令部」。[47] 這是針對「新武漢」的對抗行動。兩個巨人互相對抗，就增加了衝突的危險。幸運的是，北京於9月中旬加緊推動各省的大聯合，這才暫時遏制了這一危險傾向的發展。

北京創造大聯合「高潮」的方法，就是宣傳一些虛假的例子。[48] 而各省造反派對此的反應，則是建立虛假的聯合以取悅北京。

在武漢，9月22至24日出現了大聯合的「高潮」。9月22日，礄口和江岸區的造反派宣佈，他們達成了在區級建立聯合的協議。9月24日，江漢區的造反派發了類似的聲明。[49] 與此同時，上千人到武漢軍區和新設立的武漢警備區「報喜」，說他們單位已經實現了大聯合。接著，各大群眾組織競相表示要「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工總和九．一三兵團宣佈，他們正在合併成一個「工人聯合司令部」，並邀請工造總司加入。而工造總司則放出煙幕彈，似乎它正準備解散，以與其它工人組織組成聯盟。二司打出一個口號：「解散鋼二司，實現大聯合」。新華工作為新派的一個主要力量，則提出「不要新派，不要鋼派，要無產階級革命派」。[50]

對於外面的不知情者來說，省市級的大聯合看起來已經近在咫尺。但是，參與者卻知道，所有這些僅僅是在做戲。北京對武漢傳來的「好消息」還未來得及高興，這些所謂的聯合就開始解體。很快，各派間重新展開的互相指責又代替了紛紛表示緊跟的虛情假意。到9月的最後一周時，派戰又開始醞釀。[51]

但幸運之神再次降臨，這些危險的傾向又被遏制住，或者更準確地講，周恩來於10月8日陪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訪問武漢延緩了這個危險的進程。周恩來一到達就獲悉，來歡迎的造反派在機場剛打了一仗，雙方均有傷亡。[52] 這一事件使周意識到，武漢造反派組織間具有根深蒂固的分裂傾向。在接下來的一周裏，周每天都會見造反派負責人，迫使他們儘快完成大聯合。[53] 他對造反派頭頭們說，按照「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必須1968年2月之前完成在所有29個省市建立新政府（革命委員會）的任務。武漢不應該成為例外。他還說，造反派領導

人都不會成為未來省市革命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不管他們過去擔當過多麼顯要的角色，這些職位要留給軍隊或地方的老幹部。他進而宣佈，工人的大聯合應當採取工人代表大會（工代會）的形式，學生應當採取紅衛兵代表大會（紅代會）的形式，而且在準備過程中不應當排除任何群眾組織。[54] 周通過設定期限、降低造反派領導人在新政府機構中得到機會的期望值以及指明聯合的形式和合法參與者，希望造反派實現團結的過程會順利一些。

表面上，所有組織都熱烈擁護周的講話。[55] 但在背地裏，派別鬥爭依舊激烈。唯一的區別是，戰場從街頭轉移到會議室裏。

10月13日，開始商談在市一級建立工代會和紅代會。工代會和紅代會商談的兩個關鍵問題是，哪個組織應當在這兩個代表大會中取得領導席位，有多少席位，以及哪個組織的負責人應當擔任最高職位。在討論這些問題前，還必須首先決定哪個組織有資格在兩個代表大會的籌備委員會中擁有代表。顯然，在籌備過程中哪一派有更多的發言權，就可能在代表大會中獲得更多的權力。在紅代會方面，周恩來通過指定六個主要學生團體作為成員，從而避免了在哪個組織應當在委員會中擁有席位問題上發生爭吵。因此，紅代會的籌備委員會於10月14日宣告成立。[56]

周沒有認識到武漢的形勢與北京的形勢大不相同。在北京，工人造反組織從一開始就不發達，所以只要學生造反派得到控制，那裏的形勢就基本穩定下來。但在武漢，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之間不相上下，而且有相當的融合。由於武漢形勢的這種複雜性，僅僅把注意力集中於學生組織上就不足以解決問題了。周卻未能指定工代會籌備委員會的成員組織，結果商討成立工代會時，在籌備委員會的組成問題上就出現了僵局。

工總和九．一三兵團堅持，籌備委員會只應當包括它們兩個組織，再加上工造總司，這三個組織應分別給予七個、五個與三個席位。工造總司斷然拒絕了這個提議，它提出兩個建議回應「鋼派」。第一，在籌委會中三大組織應當擁有平等的代表席位。第二，籌委會還應當包括其它工人組織的代表。經過10月13日至15日的激烈爭吵，工總和九．一三兵團最終接受了第一個要求：三大組織各派三個商談代

表參與籌備工作。但他們斷然拒絕考慮讓其它組織的代表參與籌備工作。談判因而出現相持不下的局面。[57]

10月17日，北京發出一個簡短而重要的通知。通知說：「各工廠、各學校、各部門、各企業單位，都必須在革命原則下，按照系統，按照行業，按照班級，實行革命的大聯合……一切跨行業的組織，都應該在自願的原則下，按行業進行必要的調整。」[58] 這個通告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過將大型群眾組織分解成更容易控制的小團體，以便重新實現對運動方向的把握。

武漢各派系照例表示擁護北京的最新指示，10月18日又重啟中斷數日的商談。但各方都無意執行北京關於解散大型群眾組織的指示，他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籌委會的組成問題上。工造總司聲稱，通知裏用了「一切組織」的說法，所以，它的有關要在籌委會中包括小組織代表的提議，是與北京的指示精神相符合的。工總和九．一三兵團卻不同意。他們指出，工造總司所建議包括的組織成員主要來自各個單位(如中原機械廠、長江流域辦公室等)。那些組織也許有資格籌備其本行業的大聯合，但不應當被包括在市級工代會籌委會裏。雙方都不願意讓步，因此，10月20日商談再次陷入僵局。

此時，武漢軍區和武漢警備區進行了干預。經過三天緊張的幕後活動，10月24日工造總司發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聲明：「經過武漢軍區領導的教育」，它表示願意與工總和九．一三兵團妥協。它同意，工代會籌委會只包括三大工人組織的代表。據說，在軍隊的壓力下，工造總司才做出這樣的讓步。軍隊之所以迫使工造總司妥協，不是因為它袒護「鋼派」，而是因為它認為監督競爭者少的談判要比監督競爭者多的談判更加容易些。

10月25日，工代會籌委會正式成立。但這個籌委會隨即就陷入激烈交鋒之中。10月29日，當它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下一步如何辦的問題時，一大群人出乎意料地闖進會議室。他們代表著被排除在外的組織，來此表示自己對「鋼派」要獨攬大權企圖的憤怒。更重要的是，他們來要求派代表參與籌委會。有些人在紛亂的氣氛中得意忘形，而暴露了自己的真實動機。例如，有一個人說：「對，我是有野心，我想參加籌委會。你們可能說我自私。我認為在這一點上你我之間沒有多大

的差別。差別在於，我敢於公開承認這點，而你們卻不敢。」主持會議的工總負責人朱鴻霞宣佈休會，以使自己和其它與會者擺脱困境。但衝進來的人被激怒，開始動手。朱本人遭到毆打。[59] 由於注意到工造總司的負責人沒有到會，「鋼派」就斷定這一事件是由「新派」蓄意挑起的。作為報復，他們立即派人搗毀「新派」一百五十五個據點，打傷數百人。[60] 兩派間的談判再次破裂，已經取得的一切都前功盡棄。

雖然紅代會籌委會的組成問題已經解決，但它的籌備工作也遇到麻煩。它的麻煩是，在如何選出未來紅代會領導人問題上，二司與其它五個組織發生分歧。二司建議，要用三個步驟選出領導人。第一步，各校不同的造反組織應當形成大聯合；然後各校派代表參加紅代會；最後，由各校代表選出紅代會領導人。[61] 這一計劃正是「新派」工人組織所説的「革司聯司道路」。初看起來，它似乎令人困惑：為什麼「鋼派」學生提倡其工人同伴所激烈反對的計劃？但只要對二司的相對力量作個分析，我們就可以回答這一問題。二司是武漢最大的學生造反組織，其成員人數超過所有其它學生組織的總和，而且除了少數例外，它的勢力控制了大多數學校。但在紅代會籌委會中，二司卻是少數。其它五個成員組織皆屬於「新派」。如果紅代會的領導人通過籌委會的六個成員組織選出，二司就極可能在紅代會中處於劣勢地位。所以，避免在這場遊戲中輸掉的唯一途徑，就是採用一套有利於自己的規則。[62]

為了進一步增大獲勝的機會，二司建議，只有那些實現大聯合的學校才應當賦予派代表參加紅代會的權利。此時，武漢已有六所大專院校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其中有五所由二司控制。華中工學院是唯一的例外。湖北大學正要宣佈成立革命委員會，但二司拒絕承認其合法性，因為這個革委會把「鋼派」小團體排除在外。在三新之一的華中農學院，二司在那裏的一個小支部正企圖阻撓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如果二司的提議被採納，即使新湖大和新華農是籌委會的成員組織，也無權派代表參加紅代會，因此他們的人也就沒有機會擔任領導職務了。

當然，籌委會中的「新派」成員組織並不想失去其在籌委會中的優勢地位。他們堅持主張：籌委會的成員也應是未來紅代會的領導層的成員。[63]

雙方無法找到解決分歧的辦法。就在「鋼派」和「新派」工人組織之間的關係不斷惡化之時，學生組織之間的談判也於11月初形成僵局。[64]

與前幾個月相比，1967年11月的武漢以及中國地區似乎單調乏味。既沒有發生武鬥，沒有出現陰謀事件，沒有進行激烈的辯論，也沒有讓全國人民興奮的事情。談論大聯合的人也不多。一些觀察者在形容這一時期的形勢時認為，文化大革命這條航船已經安全渡過驚濤駭浪的海域，正進入更加平靜的水面。[65] 但是，僵持不應當被誤認為平靜。在武漢建立工代會和紅代會的談判破裂後，「鋼派」與「新派」之間的矛盾繼續加大。[66] 用當地出版物的話說，「兩派之間的對立急轉直下」。[67] 各方都開始向對方領導人發起人身攻擊，[68] 兩派都翻出以前關係中的陳年老賬。「鋼派」指責「新派」是「二八聲明」發表後陳再道打倒「香花派」的幫凶，而「新派」則譏笑「鋼派」在工總3月被取締時卑躬屈膝地向陳再道請求寬恕。揭舊瘡疤的行為加劇了兩派的緊張關係，而雙方都擔心這種緊張關係會觸發武鬥。為準備最壞的情況出現，他們開始組織自己的半專業性的武裝力量。[69] 工總設立了「江城前哨」；九·一三兵團建立了「敢死隊」；而工造總司成立了「鐵軍」。此時北京正在全國宣傳「秩序」和「團結」，使兩派沒有重新點燃武鬥烈火的藉口。他們都想置對方於死地，但這時又不得不自我克制。他們所等待的是採取行動的時機。但是，那種時機不知何時才會到來。

第九章

造反派之間的衝突，1968年

強制性的「聯合」

1967年9月，毛澤東要求全國二十九個省市都應在1968年春節之前建立革命委員會。[1] 儘管北京做出了種種努力，但到1967年12月初為止，只有九個省成立了新的權力機關。速度之慢令中央領導非常失望，於是他們開始意識到，如果讓造反派通過協商達成在他們之間分配權力的一致意見，那麼大聯合的目標就難以實現。這種估計也許是正確的。

對立派別正在玩的事實上是一種「囚徒困境」遊戲。在這種遊戲裏，如果衝突雙方同意合作，那麼他們的情況就會好一些，但不合作卻是遊戲每一方的主導性策略。「主導性」的意義是，遵循這一策略，不管對方做什麼，每位遊戲者的處境都會更好一些。例如，如果一方選擇合作，那麼不合作就會給另一方提供比合作更高的收益。同樣，如果一方選擇不合作，那麼對另一方來說不合作仍然不失為比讓步更好的選擇。但是，如果遊戲雙方都選擇不合作策略，他們就會得到比雙方合作更糟糕的結果。儘管如此，在缺乏外力迫使合作的環境裏，只要不是重複性遊戲，雙方玩家的自主選擇都傾向於採取不合作策略。在這種情況下，促使人們採取合作態度的一種辦法，就是引入外部干預。通過增大不合作的代價，這種外部干預可以消除雙方選擇不合作策略的吸引力，從而迫使他們互相合作。[2] 毛澤東也許不懂這種博弈理論，但他於1968年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要想按計劃實現他建立新興權力機構的目標，解決各省權力分配僵局的辦法只能是：從上面強制性地向下實施。

北京企圖通過嘗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新方案，來加速大聯合的形成和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各省的地方代表被召集到北京，並被安置在各個軍營裏，在中央的監督下商談有關本省權力分配的每一個問題。只有在經過詳細討論達成該省革命委員會安排的協定後，此省的學習班才結束。[3]

就武漢來說，這種學習班沒有在北京舉行，而是由武漢軍區和武漢警備區主持在武漢進行。學習班於12月初舉辦，要求所有主要群眾組織的負責人都參加。在北京的支持下，軍隊在對付造反派方面採取了「大棒加胡蘿蔔」政策。一方面，它威脅造反派說，形成大聯合是毛主席戰略部署的最重要組成部分；誰在談判過程中故意製造麻煩，就將誰清除出工代會或紅代會領導小組。另一方面，軍隊又試圖制定能滿足兩派最低期望的權力分配方案。[4] 軍隊設計的方案，就是讓「鋼派」控制工代會，讓「新派」控制紅代會。在北京和地方軍事當局日益加大的壓力下，兩派別無選擇，只好接受了這個安排。[5] 新華社於12月17日興高采烈地宣佈，「武漢造反派已經實現了革命大聯合」。[6] 一個月後，武漢紅代會和工代會正式成立。

聯合僅僅是名義上的。無論是「鋼派」還是「新派」都對這個結果不滿意。[7]「鋼派」方面的學生組織（如二司）和「新派」方面的工人組織（如工造總司），對於自己在相應的代表大會中處於少數地位很不高興。但他們暫時無計可施，因為政治氣候正向有利於軍隊的方向轉變。1967年12月，北京指示軍隊「支左不支派」。[8] 誰是左派？在文化大革命的這個新階段中，據說左派的主要標準，就是在實現和鞏固大聯合過程中願意與軍隊合作。[9] 而1968年元旦就展開了一場反對派性的全國運動。《人民日報》元旦社論說：「能不能自覺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勢下願不願意做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重要標誌。」[10] 在這種嚴峻氣氛中，造反派不得不有所收斂。

黨的幹部問題

然而，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先決條件並不只是形成大聯合。革命委員會要以三結合為基礎。軍隊在革命委員會的代表不會成為問題，因

為北京禁止造反派插手軍隊內部事務。[11] 但幹部代表則是一個熱點問題。

毛澤東從沒有打算大規模地把黨的幹部趕下臺，特別是對於較低級的幹部更是如此。在每個鞏固階段中，他都明確要求造反派「正確對待幹部」。但造反派不願意讓他們批鬥過的幹部恢復職位。他們一方面憂慮的是，如果從前的幹部恢復職務，那麼維護這些幹部的保守派就會重新得勢。另一方面，造反派害怕被平反的幹部有朝一日會報復他們。此外，很明顯的是，分配給幹部的席位越多，造反派在革命委員會中的席位就越少。基於這些考慮，造反派一般傾向於讓盡可能多的幹部繼續帶著「走資派」的帽子。[12]

但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幹部的行政管理經驗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新的政府機關——革命委員會必須給他們保留職位。1967年11月7日，黨中央下發的一個通知中規定，革命委員會中如果沒有相當數量的幹部代表，就不能形成具有無產階級權威的權力機構。[13] 通知向造反派傳遞了一個明確無誤的信息，即他們必須與一些幹部分享權力。現在，造反派鬥士面臨的重大問題，就是在革命委員會裏，他們同意與誰在一起工作。

在選擇未來合作夥伴時，造反派的第一選擇就是那些他們認為容易打交道的幹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明顯現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全心全意執行國家政策的黨的忠誠幹部，要比那些以「老好人」著稱的幹部一般會受到群眾更猛烈的批判。「老好人」幹部的特點是怕擔責任，對原則問題冷淡，但會討好每個人。由於這些幹部極少得罪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們就不找他們算賬。結果，他們常常被認為是「可以教育好的幹部」，而其它幹部則被劃為走資派。造反派通過推薦這類幹部作為革命委員會中的合適夥伴，就能既把這些「老好人」當作他們的傀儡，同時也執行了北京的方針。[14]

造反派其次的選擇是那些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才轉入其單位的幹部。由於那些幹部來單位不久，也就沒有時間積累對他們不利的怨恨，所以，當其它幹部受折磨之時，他們常常被從輕處理。造反派喜歡與這些剛來的幹部在一起工作，而不願與在單位裏已經工作很長時

間的幹部打交道。新來的幹部也許不比「老好人」更容易操縱，但他們至少比其它幹部對造反派的反感更少。[15]

通常，所有造反派都歡迎「老好人」和新來者，因為他們不太可能損害造反派的利益。而對於其它類型的幹部，甚至那些支持造反事業的幹部來說，情況就更加複雜了。

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有站在造反派一邊的幹部，造反派稱他們為「革命幹部」。他們的組織——「革幹聯」成立於1967年5月。[16] 那些幹部把自己與造反派聯繫在一起的原因有許多。正如下面有關這個聯合會四十九位著名成員簡介所示，可以把他們大致分為四類：甲、文化大革命前受過處分的幹部；乙、受到上級壓制的幹部；丙、他們自認為應當受提升而未得到提拔的幹部；丁、把自己的未來押在造反派身上的幹部(參見表9.1)。下面將討論四個有代表性的案例，每一個例子都來自四類中的一類。

(1) 王盛榮於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1960年代湖北最老的黨員之一。1930年代在蘇聯學習時，成為王明「二十八個半」中的一個成員。[17] 由於王明在黨內失勢，王盛榮在延安整風期間受到批評。1952年，他被撤銷中南局工業部副部長職務，並因所謂泄露國家機密和受賄而被判處一年監禁。服刑後，他在一個省局裏擔任副處長。[18]

表9.1　49位「革命幹部」簡介

姓名		入黨時間	1966年時擔任的職務	説明
甲				
1	王盛榮	1926	一個省局的副處長	1943年和1952年受處分
2	卜盛光	1933	省政協副主席	1950年代初受處分
3	李守憲	1927	省科委副主任	1957年受處分
4	梅　白		《湖北日報》駐黃岡地區主任記者	1957年受處分
5	屠公博		市文化局副局長	1957年受處分
6	崇國權		洪山區副區長	1957年受處分
7	朱涵珠	1932	武昌區副區長	1936年脱黨

姓名		入黨時間	1966年時擔任的職務	說明
8	李　明	1929	省水文總站主任	1954年受處分
9	趙明珍		省外貿廳副廳長	王盛榮的妻子
10	劉佑彪	1929	市人口管理辦公室副主任	1951年受處分
11	丁　力	1939	省經委副主任	1952年受處分
乙				
12	謝景節	1938	漢陽區委第一書記	1959年後與武漢主要領導關係緊張
13	楊光華	1927	省政協副主席	1935–1956年在蘇聯坐牢
14	楊友山	1937	武漢電信局局長	與該局黨委書記關係緊張
15	許金彪		省政協副主席	
16	謝甫生		省政協副主席	
17	柳德熙		湖北醫學院黨委書記	在文革初期被打成「黑幫成員」
18	崔放民		市統計局副局長	
19	陳　剛		武漢汽車配件廠副廠長	
20	戚換苗		武漢建材機械廠黨委副書記	
21	趙憲章		國棉一廠黨委副書記	
22	吳允功	1941	漢陽軋鋼廠副廠長	與工廠主要領導關係緊張
23	馮一英	1941	武漢統戰部秘書長	與部主要領導關係緊張
24	李振興	1938	市農委監察委員	與農委主任關係緊張
25	魏庭槐	1929	副市長	長期受到市主要領導的排擠
26	宋匪石	1937	市監委副書記	與監委書記關係緊張
27	張　彬	1938	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與市主要領導關係緊張
28	張連啟	1941	市農管局副局長	與農管局長關係緊張
29	趙學光	1938	市人委視察室副主任	長期受排擠
30	任愛生	1935	省委農村政工部主任	1958年得罪了王任重

姓名		入黨時間	1966年時擔任的職務	説明
丙				
31	劉　真	1938	湖北省委副秘書長	
32	毛遠躍	1929	武漢測繪學院黨委書記	
33	程芳秋		省工業廳副處長	
34	張　琤	1931	市人委秘書長	
35	李鏡如	1935	省糧食廳副局長	
36	李周仕	1933	省氣象廳局長	
37	王　舜	1937	省地質廳處長	
丁				
38	薛樸若		副市長	
39	張　華		湖北省委秘書長	
40	孟夫唐		副省長	
41	蘇　平		青山區區長	
42	楊春亭	1942	宜昌地區黨委第一書記	
43	張如屏		武漢水運學院黨委書記	
44	張雨航		省教育廳副局長	
45	劉　昂		市外語學校黨委書記	
46	張肇翼		武漢測繪學院黨委副書記	
47	劉宿賢		武漢大學副校長	
48	趙文華	1938	恩施地區黨委第一書記	
49	孫德書		黃石市市委第一書記	

資料來源：《武漢市三結合幹部簡介》，1968年1月20日；《省市革命三結合幹部簡介》，1968年2月；《新華工》，1968年6月26日。

(2) 謝景節在1950年代初被視為武漢非常有前途的一位年輕幹部。1956年他剛32歲就被任命為漢陽區委第一書記。在大躍進的狂熱氣氛中，武漢市委制定了一個工業發展計劃，提出要在未來幾年內在武漢建成200家大型企業。謝批評這個計劃脱離實際，認為原材料不足，運輸設施也跟不上，結果他被打成「右傾分子」，他的級別也從

11級降為15級。1962年，他的「右傾分子」帽子被摘掉，但他繼續與王任重和宋侃夫有矛盾。在漢陽區他只是名義上的領導人，而沒有實權。[19]

(3) 劉真於1938年入黨。1951年他由於包庇被劃為惡霸地主的弟弟而受到處分。此後，他一直極少受到提拔重用。許多同事甚至下屬紛紛成為自己的上級，他尤其不滿。1966年，他擔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對於一個1938年入黨的人也算是高位了。但他對省裏的領導人仍然心懷不滿，用他的話說：「我假裝對自己的職位滿意，但其實並不滿。所以，只要我有機會，我的不滿就會表現出來。」[20]

(4) 薛樸若於1964年被提拔為武漢市副市長。1967年春，他被武漢軍區任命為武漢市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副主任，但在5月15日，他辭去此職，並發表公開聲明支持造反派。他為什麼變節了呢？在1967年12月寫的坦白中，他承認想自我保護是此舉的主要動機。當大多數幹部認為跟隨軍隊安全時，薛卻感到運動正向有利於造反派的方向發展，所以，他決定把自己的命運押在造反派身上。他承認，「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覺悟並不足以促使我採取那個決定性的步驟」。[21]

武漢事件後，當造反派群眾組織公開分裂為兩派時，革幹聯也從內部瓦解。多數幹部投靠「鋼派」，稱自己為革幹聯的「左翼」；其它幹部則投靠了「新派」。[22]

到了1967年11月，北京顯然想要革命委員會變成這樣的機構：即軍隊代表擔當監護人的角色，造反派代表起監督的作用，而日常決策權力則主要由幹部代表掌握。某一派在革委會中的勢力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革委會裏有多少它所滿意的幹部。因此，在1967年最後幾天，派別政治的焦點迅速轉移到幹部問題上來。武漢的兩派在各個級別上對各自提名的幹部展開了激烈攻擊。

最激烈的戰鬥發生在省市級。兩派都調動其全部資源，哪一派能夠控制這兩級的革命委員會，那麼就可能在較低級別革命委員會中佔據影響那裏政治的有利地位。

省級的形勢有利於「鋼派」。湖北省委裏支持造反派的前領導幹部如孟夫唐、張華、劉真和任愛生，也支持「鋼派」。這些領導幹部支持「鋼派」的一個原因，也許是由於此派的三個主要組織發源於武昌，而

武昌是省政府所在地。但在市一級，兩派的力量大體上勢均力敵。如果市革命委員會落入「新派」的手中，那麼在武漢就會存在兩個相互對抗的政權。由於看起來無法控制市革命委員會，「鋼派」就擔心它對省革命委員會的控制僅僅是名義上的，因為它(在這方面「新派」也一樣)對武漢以外的本省七十二個縣沒什麼影響力。為此，「鋼派」決定不惜一切代價來控制市革命委員會。

以武漢市委前領導者中只有極少數人同情造反派為藉口，「鋼派」提出，市革委會候選人範圍應當擴大，武漢市委前領導幹部以外的幹部(包括省委、省政、大專院校、工礦企業)也可以作為候選人。[23]「新派」對打破不同來源幹部地域限制的提議並不反對，但它堅持，薛樸若是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職位的最佳人選。至於省級革委會，「新派」則必須從別處尋找幹部候選人。其中一個選擇就是武漢之外的幹部。另一個選擇，就是湖北省委中被認為不同情造反派的前主要領導人，比如前省長張體學。[24]在「新派」看來，雖然那些幹部一旦被結合進省革委會，他們如何表現並不好預測，但他們仍然要比其對手所推薦的幹部更好一些，因為後者肯定會在未來的政治鬥爭中幫助「鋼派」。

12月20日，武漢軍區領導人暗示，他們想要張體學作為擔任未來省革委會主要職位的候選人。這一消息引起「鋼派」的強烈憤慨。但不久後「鋼派」十分震驚地獲悉，張是由毛主席親自提的名。沒有人敢對抗毛的權威。但毛對張的提名使「鋼派」很不安。如果北京可以接受張的話，那麼它也會接受「新派」推薦的其它前省委領導人。如果事實這樣發展下去，「鋼派」就不太可能如所期望的那樣，在省革委會中取得優勢地位。形勢非常複雜，「鋼派」決心全力以赴地投入選舉省市革委會的戰鬥。受到毛對己有利指示的鼓舞，「新派」也不甘示弱。雙方都準備在這場權力競爭中進行決戰。

1968年1月中旬，武漢軍區加速推動革委會的成立。對於省市革委會幹部候選人的商談正式開始，十三個主要群眾組織的頭頭都應邀參加。對於市革委會，「新派」提出了19個候選人，「鋼派」提出了21個；對於省革委會，「新派」提出了14個候選人，「鋼派」提出了18個。在市革委會提的兩份名單中，只有3人重合，而在省革委會兩份名單中有6人重合。對於其它候選人的討論進行得非常艱難。在對方作出讓步

之前，哪一方都不願意妥協。造反派頭頭在緊閉的門後較量的同時，它們的支持者則在街上進行宣傳戰，以便從外面對談判施加壓力。[25]兩派各自發出大量宣傳品，美化自己提名的候選人而貶低對方提名的候選人。如果被提名的人正符合自己的需要，那麼就會用如下的理由來證明他（所有被提名者都是男性）是可以接受的：林彪曾經強調，即使這個幹部在過去犯過嚴重錯誤，但只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擁護毛主席的政治路線，那麼他就是一個好幹部。[26]而如果不想要某個被提名者，就會誇大和不斷揭露他過去犯的錯誤，以便把他的名聲搞臭。[27]一份地方報紙正確地指出：

> （對那些執迷於派性的人來說）結合幹部，不看十七年（1949–1966年）只看五十天（1966年6、7月），甚至十七年、五十天都不看，只看你現在是不是站在我這一邊。[28]

兩派都在進行談判的大樓附近建立了五、六個廣播站，日夜不停地用猛烈攻擊的語言來對各方的談判者進行心理戰。

革命委員會

儘管軍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經過一周的磋商以後，在省市革命委員會組成問題上面都沒有達成一致。在過去，磋商的失敗就會導致革委會成立時間的推遲。但是，北京非常焦急，並放低了自己的期望值，它不再堅持革委會成立前必須先解決對立派別之間的分歧這一要求。相反，北京不情願地認為，先成立革命委員會也許更好一些，因為可以利用這個新的政府機關來解決派別鬥爭問題。但為了加速這一進程，當群眾組織不能在自發的基礎上就革委會組成達成一致時，它就有必要從上面來強制性地解決這個問題了。[29]

在武漢，由於「鋼派」和「新派」無法達成協議，軍隊就承擔了決定省市革委會組成的任務，形勢開始發生急劇變化。幾天內，武漢軍區不僅拿出了省、市革委會的最後候選人名單，而且北京也批准了這些方案。[30]武漢市革命委員會於1月20日正式成立；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也宣告成立。[31]

兩個革委會的負責人都由軍隊幹部擔任。武漢市革委會主任和第一副主任分別由武漢警備區司令和政委擔任；湖北省革委會主任和第一副主任則由武漢軍區司令和政委分別擔任。這兩個革委會的其它職位則在兩派間均衡地分配。在這兩個革委會中，主要群眾組織的頭頭幾乎都被安排進去。軍隊做出這種安排，顯然是有意討好這些幫派鬥士。兩派都有大致相等的幹部代表數量，每一方都成功地將其提名的一些幹部安排到兩個革委會中，但都不能保證它們提名的另外一些幹部被安排進去。[32]有趣的是，幾乎所有在湖北省革委會中留給造反派代表的位子都分配給了武漢地區的人，只有幾個位子留給了來自本省七十二個縣的人。為了安撫武漢這個「會哭的嬰兒」，軍隊顯然忘記了餵湖北其它地區比較「安靜的嬰兒」，而武漢人只佔全省人口的不到10%。[33]

隨著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的成立，這個城市出現了難得的休戰時期。基層也紛紛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但並沒有發生大的武鬥的報導。然而，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並沒有結束派性對抗，派性活動正在暗地裏慢慢地展開。長期摩擦的根源在於：無論哪一派都對自己在武漢市革委會和湖北省革委會中的權力分配比例不滿。就造反派代表而言，「新派」認為「鋼派」在湖北省革委會中佔有的位子太多，而「鋼派」則抱怨說，「新派」實際上控制了武漢市革委會。「鋼派」尤其對兩個革委會中幹部代表的成分感到不安。在它為湖北省革委會推薦的21個幹部中，只有5個被接受；在它為武漢市革委會推薦的18個幹部中，只有10人被接受。同「新派」相比，「鋼派」顯然處於不利地位：「新派」為湖北省革委會推薦的19個幹部中，有13人被接受；「新派」為武漢市革委會推薦的14個幹部中，有11人被使用。使「鋼派」特別憤憤不平的是，它最看重的三個幹部，即孟夫唐、張華和劉真都沒有被吸收進其中一個革委會裏。[34]武漢軍區也許想，它最好盡量均衡地切分這個蛋糕，而兩派則想使自己的那一份最大化，甚至連五十對五十的結果也不會使任何一方滿意。況且，每一派都懷疑其對手從軍隊那裏得到了比自己更多的同情和支持。許多人認為，武漢軍區是「新派」的後臺，而武漢警備區則是「鋼派」的後臺。[35]這種推測影響了兩派對武漢權力分配的估量。

毛澤東希望革命委員會可以成為一個公正的政府權力機關，但革委會成員卻要繼續作為自己那一派的代表，所以，派別對抗又進入了革命委員會內部。由於武漢軍區佔有主導地位，其內部也很團結，所以武漢的派別活動沒有走得太遠，沒有像山西那樣在省市都出現了雙重權力機關。[36]但是，在較低的層次上，倉促成立的革委會不久就遇到麻煩，卻是司空見慣的事。與高級層次不同的是，在基層單位裏，經常存在一派對另一派佔據絕對優勢的情況。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佔據優勢地位的一派常常不顧另一派的反對，而單方面成立革委會。[37]但不佔優勢的那一派並不甘示弱，它往往通過向本派的跨單位組織求援，從而給佔優勢的一派製造麻煩，破壞革委會。許多單位的革委會被批為「派委會」，並因而癱瘓。甚至在兩派分享權力的單位裏，革委會也往往名存實亡。由於派別的存在，這些革委會常常難於通過決議；即使決議得到通過，革委會也很難執行。[38]

但在一段時間裏，派性鬥爭不得不採取隱蔽的形式，因為北京發動的反對極左思潮運動還在進行。事實上，新成立的武漢市革委會和湖北省革委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武漢開展反對極左思潮運動。在武漢軍區的精心策劃下，這兩個革委會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裏，為批判派性而通過了一系列決議，舉行了許多群眾集會。當地報紙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要求每個人都參加其單位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並開展自我批評。對派性和無政府主義的猛烈批判，給造反派造成了巨大壓力。造反派頭頭尤其受到了嚴厲批評，指責他們爭權奪利，並向追隨者灌輸派性和無政府主義思潮。這種嚴峻形勢迫使造反派謹其言而慎其行。[39]因此，在1968年2月和3月初，群眾組織普遍處於死氣沉沉的狀態之中。

激進主義的反彈

這一溫和時期卻於3月底結束，因為此時北京突然終止了反對極左思潮運動。毛澤東認為反對極左思潮運動走得太遠，把文化大革命引到了右的方向。他又對右傾發起了反攻。

對右傾的反攻重新點燃了武漢造反派正在熄滅的火焰。[40]武漢兩

派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對這個政策轉變的意義進行評估。有趣的是，「鋼派」和「新派」都不約而同地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文化大革命正在進入決戰階段。[41]

為準備即將來到的戰鬥，造反派組織必須聚集力量，但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在1967年末1968年初，很多造反派積極分子開始遠離政治鬥爭。在經歷了與當權派和保守派鬥爭的興奮以後，他們發現造反派組織之間的內鬥不會給自己帶來真正的利益。作為派別核心的領導人可以從內鬥中得到革委會的權力地位，而普通群眾會得到什麼呢？由於從進一步的集體行動中得不到多少益處，所以很多人做出了不再積極參與行動的抉擇。這些新逍遙派對新的反右傾運動沒有什麼熱情。[42]

為了激勵其成員行動起來，兩個造反派別都竭力地鼓吹「百萬雄師」正準備復辟，以引起他們的驚慌。在批判極左思潮時，的確有些前保守派積極分子借機表示他們對造反派的怨恨。但在多數情況下，他們只敢表示對其單位裏個別造反派進行人身侮辱的不滿。只有很少的前保守派暗地計劃重組「百萬雄師」，以挑戰造反派的統治地位。但這個團體還沒有來得及採取具體行動，其陰謀就於1968年1月初被揭露。造反派報紙稱這個團體為「百萬雄師的地下司令部」。事實上，只有十二人參與了這個陰謀，他們中也沒人曾在「百萬雄師」總部中工作過。[43]

這一小事件被視為保守派威脅日益增長的跡象。造反派出版物聲稱，「地下司令部」已經在全市建立了廣泛的組織，正準備發動「政變」。[44]造反派除了號召提高革命警惕以外，還攻擊保守派，特別是那些曾經擔任過「百萬雄師」各級領導的人。武漢再次陷入恐怖統治之中。開會公開批鬥成千上萬的保守派，並讓他們遊街，還將幾千人投入監獄。工總新建立的「江城前哨」在新的鎮壓浪潮中發揮了特殊作用。這個自封的群眾專政團體將武漢體育館變成了一個大監獄。一接到某個單位造反派準備的黑名單，「江城前哨」就派人來到這個單位，上了黑名單的人不是受到當場毆打，就是被帶回到體育場。那些被鎖在體育館的人遭到了殘酷的折磨。有些人被毒打致死。[45]

一個前造反派理論家承認：

> 說「百萬雄師」將要進行復辟行動只是一個計策。事實上，當時「百萬雄師」對造反派根本沒有什麼威脅。通過誇大這種威脅，造反派頭頭是想嚇唬不積極的成員再次積極起來。通過犧牲以前的保守派，兩派都企圖互相壓倒對方。方法就是顯示自己沒有受到「右傾」的影響，因為在當時，人們一般認為「溫和」就等於「右」。為證明自己是革命的，造反組織就必須殘忍地行動；而且為了證明自己比其它人更加革命，它就要格外地殘忍。[46]

「狼來了」的策略並不太成功。在多數單位裏，只有少數死心塌地的造反派響應其頭頭的號召；而在有些單位裏，根本沒有人參加新的運動。許多造反派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復無常日益不當回事。這時他們中流傳的一個格言是：「中央表態我表態，運動後期當左派。」「中央表態我表態」意味著什麼也不聽，什麼也不做，只在口頭上敷衍中央而已。[47]

只有個別基層的造反派頭頭仍然很積極，因為繼續參加行動與他們的利益密切相關——這種行動提供了他們在革委會裏的職位和提升的機會。此外，由於他們以前深深捲入運動之中，在某種意義上講他們已經成為這種社會組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其不可能退出，至少也沒有必要退出。即使他們對投身的事業大失所望，也會發現代價和收益大致相當，所以做出停止參與運動的決定是非常痛苦的事。[48]

由於缺乏群眾的支持，兩個對立的派別只得依賴特種力量。這些特種力量是在以前對抗時期大型組織建立的半專業化的突擊部隊，其中最強的有工總的「江城前哨」、九．一三兵團的「敢死隊」、工造總司的「鐵軍」。[49] 在過去，這些特種力量在派性鬥爭中至多發揮輔助的作用；而現在，它們卻有望發揮主要作用。這些團體之所以能打仗，不是因為其成員與頭頭目標一致，而是因為他們熱衷於行動。這些團體裏的很大一部分成員是20多歲的小年青，這些人喜歡打架鬥毆，而討厭約束。其中一些人是從街上的地痞流氓中招徠的。這幫人把自己的命運押在造反派身上，以便借派別鬥爭來泄私憤。[50]

4月，「鋼派」與「新派」之間的爭鬥重新爆發，兩派都積極響應當時的一個流行口號，堅持武漢「必須重新分配權力」。對他們來說，「權

力再分配」就意味著把另一派的代表從各級革委會中清除出去，然後再把他們自己的人放進權力機關裏。為了論證自己的要求有道理，「鋼派」指責「新派」造反派為「老右傾機會主義者」，要求從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中把這些「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清除出去。「新派」則咒罵「鋼派」團體為「由一批流氓阿飛組成的右傾分裂主義組織」，並堅決地主張：「只有消滅了『鋼派』，武漢才會有和平。」[51]

幹部問題又被重新提出來。「鋼派」説，「把劉真和張華排除在湖北省革委會之外是右傾的表現」。他們把張體學攻擊為「右傾翻案的元兇」，企圖打倒張等由「新派」提名安排在省市革委會中的一切幹部。而「新派」則開始攻擊由王任重培植的所謂影子政府，即由「鋼派」推薦的所有安排在湖北省和武漢市革委會裏的幹部。[52]

到了4月底，兩派間關係十分緊張，導致工代會和紅代會瓦解。[53]湖北省和武漢市革委會的存在也處於危險邊緣。由於造反派頭頭整天忙於派別鬥爭，他們就根本沒時間處理這兩個機構的日常事務。[54]

與此同時，兩派又開始收集武器，包括造反派組織在前一年秋天藏起來的步槍和手槍。據估計，1967年夏季事件以後約有十萬件武器流入各個造反派組織手中。他們還派人到四川、廣西、山西及其它地區購買武器。他們帶走當時寶貴的物品如新聞紙、香煙、豬肉和卡車，換回手榴彈、半自動步槍和機槍。兩派都急於獲得更多的武器，因為他們相信將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場流血的決戰。[55]

5月3日事件證實了他們的焦慮。用簡單的語言就可以概述一下這個事件。4月，「新派」的一個組織「新中原」指控幾個人有流氓行為，於是把他們關押起來。那些人是中原機械廠「鋼派」團體的成員。「江城前哨」為了進行報復，劫持了「新派」組織的一個頭頭。接下來談判交換人質，但相持不下。「江城前哨」就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在5月3日前釋放「鋼派」的人。新中原機械廠並不讓步。5月3日下午，「江城前哨」包圍了此廠，並用幾千人排成戰鬥隊形封鎖了所有通往那裏的道路。不久就發動了全面進攻。戰鬥造成三人死亡，五十七人受傷，財產損失達數百萬元之多。武漢警備區派二十三個連的士兵趕到現場進行干預，這場戰鬥才被制止。[56]

這個事件使兩派都堅信，決戰一觸即發，而要想獲得最後勝利，

他們就必須加快準備的步伐。「鋼派」首先舉行了高層會議分析緊迫的形勢。接著，又從湖北各地把主要「鋼派」組織的頭頭召到武漢，商討如何迎接全省「新派」的挑戰。最後，在5月11日的大型集會上，此派領導人向成千分支組織頭頭傳達了他們已經決定採取的策略。此外，還告訴與會者說，「新派」正策劃謀殺「鋼派」領導人和積極分子。他們不加掩飾地企圖激起普通成員對「新派」的憤恨。[57]

這些舉動使「新派」警覺起來。它從5月15日至18日召開了高層會議，來自全省各地的該派約一百名頭頭出席此會。面對「鋼派」日益增長的威脅，高層會議決定，「新派」必須加緊準備以擺脱危險。為迎接「鋼派」的挑戰，會議決定，應當特別注意加強宣傳、組織和武裝。會後，「新派」向普通成員進行了動員運動。「新派」的一個出版物告訴普通成員說：「過去，我們新派與鋼派打交道時太心慈手軟，別人打我們，我們還不忍打別人。今天我們再也不應該學馬丁．路德．金，非暴力抵抗在這兒行不通。」[58]

在煽動派性狂熱的同時，兩派開始加緊戰鬥準備。他們佔據了十幾座高樓作為指揮所。當時到處傳言，兩派正對計劃搶劫的軍械庫進行偵察。[59] 在這種氣氛中，兩派間的小衝突時常發生。[60] 最後，兩個事件把已經處於危急關頭的形勢推到了大戰的邊緣。5月18日，「鋼派」所欣賞的造反理論家魯禮安被「新派」劫持。「鋼派」為了迫使「新派」釋放魯禮安，組織了「營救魯禮安聯合代表團」，並在「新派」的幾個據點周圍舉行武裝示威。在抗議還沒有產生任何結果之時，又發生了另一事件。5月26日，工總的兩個頭頭開車經過工造總司控制的一個地區時，「鐵軍」突然向他們開火。雖然兩人都沒有受傷，但事件似乎為「鋼派」說「新派」打算謀殺它的領導人的預言做了證明。第二天，「鋼派」在全市各地舉行群眾集會譴責「新派」。[61] 工造總司認為「鋼派」肯定會進行報復性打擊，於是在當天對各個據點發了一個秘密命令：「你們必須立即處於戒備狀態。今晚（5月27日）凡來我大樓附近從事騷擾和挑釁者，先朝天鳴槍示警。如執意不聽，或有反抗行為者，可開槍還擊。」[62]

5月27日，並沒有兩派摩擦的報導，原因是他們忙於搶武器。5月26至28日，兩派在武漢進行了瘋狂的搶劫武器競賽。城裏及附近縣裏

幾乎所有的軍械倉庫都遭到搶劫，有人甚至直接從戰士手中搶武器。據估計，僅僅5月27日一天，就有約8萬支槍被盜。三天總共搶奪了10萬多支槍和1,000多萬發子彈。據林彪講，就搶劫軍火倉庫而言，武漢在全國城市中數第一。[63]

5月28日，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向武漢兩派發來一封電報：「中央要求他們立即停止搶槍，堅決制止這個違反中央命令的犯法行為，並請他們準備派代表來京商談。」[64]

像以往那樣，兩派又公開表示，願意全心全意地貫徹北京的指示。當晚，所有主要組織都發出了緊急命令，禁止其成員搶劫武器。但大家都知道，這只是擺擺樣子而已；私下裏，沒有人把電報當回事。[65]

為了顯示其「衷心擁護中央指示」，很多組織於第二天開始歸還武器。但正如同他們一年前所做的那樣，歸還的只是破損和陳舊的步槍，而這只是他們搶奪的一小部分武器。這種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用工總的一個頭頭的話來說，「我們必須做最壞的打算」。[66]

對許多造反派來說，步槍、手槍和手榴彈是好玩的東西，甚至不願參與真正戰鬥的中立造反派也喜歡玩槍。一時間，向天空開槍或在空地裏投擲手榴彈成為時尚的遊戲。5月底6月初，發射步槍的聲響在城裏到處可以聽到。當有些造反派玩夠了向空中開槍的遊戲，又開始用比賽射擊來作樂。電線杆和電線成了射擊的靶子。數天裏就發生了十幾起事故，其中包括軍用電纜和連接漢口和武昌的電纜都被射中。那些槍法不好的人開始向大的目標如天上的飛機射擊。僅僅6月3日一天，就有五架飛機受到槍擊。雖然極少以人為靶了，但到6月中有57人遭流彈打死，327人被流彈擊傷。[67]

武器還成為一種商品。由於武漢的許多組織現在已經有了多餘的武器，而在北京、廣州和河南等地武器短缺，所以出現了長途販賣武器的行當。很多外省人帶著火腿、肥皂、香煙、火柴或現金來到武漢，又帶著步槍、手槍和手榴彈返回。雙方進行的這個買賣利潤可觀，因為他們投入的只是花在搶劫國家商品倉庫和軍火庫的時間。[68]

然而，武器卻主要用於武鬥和嚇唬敵人。造反派擁有了現代化火器後，武裝衝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5月30日，為了支持二司在武漢

鋼鐵學院的分支組織，「江城前哨」包圍了這個學院，並炮轟了「新派」用壕溝防護的大樓。在這場戰鬥中死傷約三十人。6月5日，工總和二司出動四十卡車兵力，強佔了「新派」的據點第一冶金公司，打死一人。三天後，九．一三兵團的敢死隊又圍攻了「新派」的另一個據點。[69] 所有事件都發生在青山區。「新派」懷疑「鋼派」已經制訂了逐區消滅對手的宏大計劃。「新派」聲稱，有證據表明「鋼派」正準備「（與『新派』）進行一場決戰」來「取得（統治全省和本市）的最後勝利」的綱領。「鋼派」反過來攻擊說，「新派」正極力提倡武漢「走四川道路」（以武力奪權），並正在為此做準備。雙方的指責似乎都是可以成立的，因為哪一方都沒有否認對它的指責。兩派都引了毛澤東的一句名言作為他們的座右銘：「丟掉幻想，準備鬥爭。」[70]

隨著氣氛變得越來越緊張，武漢居民陷入了恐慌狀態之中。沒人敢離開家，因為害怕會被流彈擊中。許多人離開城市到鄉下的親戚那裏避難。[71] 甚至那些住在碉堡裏的忠實造反派也焦急起來。如果預期中的全面大戰爆發的話，他們也許不能得到正常的糧食供應。為了準備最壞的情景出現，他們搶劫國家倉庫以搞到食物、豬肉、蔬菜、煤球，以及其它日常必需品；有些人甚至到銀行搶現金。[72] 形勢變得比一年前與「百萬雄師」對峙時更加緊張和混亂。

非激進化

武漢形勢惡化之時，武漢軍區最高領導人曾思玉（兼湖北省革委會主任）和劉豐（兼湖北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正在北京。[73] 在一定程度是因為他們不在的緣故，湖北省革委會其它領導人不敢對造反派的過分行為採取嚴厲措施。[74] 離開北京前，曾和劉見到了林彪、周恩來和其它中央領導人。中央領導人給予他們以恢復武漢秩序的自主決策權力。6月15日他們回到武漢後，便立即採取一系列果斷措施恢復秩序。在6月的後半月裏，他們召集所有主要群眾組織的頭頭參加由湖北省和武漢市革委會舉行的無數會議。會議指責造反派犯了嚴重錯誤，奉勸造反派組織交出他們搶劫去的一切武器，解散他們建立的一切突擊隊，更重要的是同時將這些造反派組織一塊解散。[75]

起初，造反派頭頭們不把這些批評和警告當回事。除了做點象徵性的自我批評以外，他們的行為並沒有多少收斂。在6月下旬，他們進行了無數次武裝遊行來紀念造反派戰勝「百萬雄師」一周年。但是，這些活動卻於6月舉行而不是在7月舉行，就表明他們的真實目的是通過炫耀武力來恐嚇對手。全市仍能聽到槍聲，偶而還能聽到密集的射擊聲，表明兩大敵對派別在城裏某處正進行一場流血戰鬥。形勢十分嚴峻，有些組織認為槍支和手榴彈的威力太小，不足以用來進行防禦和進攻。有些工廠和院校的造反派就開始製造「新式」武器，如坦克、化學武器、高能炸藥包和地雷。兩個對立派別間的緊張關係日益惡化。[76]

北京號召進行反右傾運動所重新引發的武鬥決不只是在武漢發生，其它很多省在1968年4月至7月間都變成了戰場。[77]

面對日益不可收拾的全國性混亂，北京別無選擇只有叫停反右傾運動，轉而恢復公共秩序。它於7月3日發出了一個嚴厲的佈告，要求廣西停止武鬥，另一道針對陝西的佈告於7月24日發佈。[78]

這兩個佈告標誌著文化大革命又發生了一個轉折，因為在此之後，「革命大民主」的烈焰逐漸熄滅。北京的新方針受到大多數人的響應，因為他們想結束武鬥。[79] 而各省軍事當局予以更加熱情的響應，因為他們對造反派的殘忍行為一直很憤慨，但又必須做出同情的樣子來，或者至少對這些搗亂分子不表示敵對。現在他們可以壓一壓造反派的囂張氣焰了。

武漢軍事當局對7月3日通知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盡量讓大家都知道這個指示。7月7日，湖北省革委會發出自己的一個緊急命令，其措辭比北京的通知更加強硬，因為後者只敦促群眾組織歸還武器。而省裏的命令則授權當地部隊強行從造反派手中收回武器，並警告說，任何隱藏武器者都要受到嚴厲懲處。[80] 軍隊領導人對造反派的態度很快變得更加強硬。在7月13日由湖北省和武漢市革委會召開的聯席會議上，曾思玉指名批評湖北省革委會的三個副主任朱鴻霞、楊道遠和張立國。這三人代表了造反派，曾以前從來不敢冒犯他們。7月18日，毛澤東指示要進一步宣傳「七三佈告」。北京隨後決定發動一場群眾性的宣傳運動，[81] 這一決定進一步鼓舞了各省軍事當局。7月22日晚，武漢部隊對118家旅店和招待所進行了徹底搜查，尋找來自外省的武器交易

者。通過這一行動，把2,700多人驅逐出省，逮捕了270人。北京發出「七二四佈告」後，湖北省革委會又舉行了大型群眾集會，敦促造反派交出他們手中仍然保留的所有武器。

造反派對新政策不滿，但不能進行反擊。他們所敢做的，就是私下攻擊北京發的兩個通知是「毒草」，並偷偷摸摸地撕掉公佈這兩個佈告的大字報。[82]

在1968年餘下的幾個月裏，造反派的日子就更加難過了。8月，《人民日報》發表了強烈反對所謂多中心論的社論。[83]「多中心」這個詞只是表述「派性」的另一種説法，因為毛澤東不久前曾要求人們「對派性進行階級分析」，所以北京就發明了這個新詞來避免表面上的自我矛盾。這樣就恢復了對派性的批判，而北京在四個月前曾使對派性的批判半途而廢。

為了消除派性的影響，湖北省革委會召集全省尤其武漢各主要群眾組織的頭頭們參加8月中旬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學習班上，曾經不可一世的造反派頭頭們受到譴責。大約在這個時候，武漢軍區的主要軍事領導人又被召到北京。毛澤東接見了他們，林彪聽了他們有關武漢形勢的彙報。離開北京時，他們信心十足，因為不必再對造反派太客氣了。

回到武漢後，軍事當局就著手完成三項任務。第一，派工宣隊進駐所有學校。起初，派工宣隊只是毛澤東的權宜之計，是為了制止北京尤其是清華大學裏不老實的學生造反派的武鬥行為。但是到了8月底，毛澤東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如果要長期消除動亂的根源，就應當把派工宣隊作為制度固定下來。[84]因此，8月25日北京向各省發出了一個通知，規定要建立工宣隊，並要把它們派到所有學校，特別是派到大學裏去。[85]兩天後，武漢第一支工宣隊被派到武漢鋼鐵學院。這間學院由兩派所分別控制，並在各自的領地裏修築了碉堡，還經常相互交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所有學校落入了工宣隊的手中。工宣隊在學校的任務，首先是解除造反派的武裝，其次是解散造反派組織。但是，對造反派更毀滅性的打擊是工宣隊實際上切斷了他們與其它學校和其它部門同伴的聯繫。這種聯繫一旦被切斷，孤立的造反派就處於非常狼狽的被動挨打地位。[86]

對造反派學生的最後打擊，是號召他們「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87] 到了年終時節，武漢的大學和高中校園幾乎空無一人。除了1969年畢業的初三學生外，所有學生都被送到農村。由於年紀大到關心政治的學生現在都被送走，就永久地消除了調皮搗蛋的學生造反派造成的威脅。

軍事當局要執行的第二個任務，就是逐步解散群眾組織。9月6日，在武漢各級革委會主任、副主任出席的一次會議上，曾思玉宣讀了一個由湖北省革委會通過的關於「徹底解散一切群眾組織」的決議。決議使一切群眾組織都處於非法地位，並宣佈不允許「陽奉陰違」。[88] 迫於壓力，工總於9月11日舉行了告別集會。三天後，工造總司也停止活動。最後於9月20日，九．一三兵團停止了所有活動。其它小組織也紛紛宣佈解散。隨著群眾組織的解散，它們的出版物被禁止出版發行，廣播器材也被沒收。[89] 經過兩年的存在以後，除了語言以外，文化大革命「大民主」的所有痕跡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軍隊當局的第三項任務，是「捅馬蜂窩」。8月25日，《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馬蜂窩就是要捅〉的文章。「馬蜂窩」是指派性勢力強大的單位。文章說，為了克服這些單位的派性，權力機關必須運用強制措施。[90] 在武漢，這個口號有了新的含義。很多造反派個人被當成「馬蜂窩」，成為特殊「學習班」的對象。例如，工總第二號頭目及湖北省革委會常委胡厚民，就被指控指揮了許多次工總的武鬥，把他批為「陰謀家」和「野心家」。對胡進行公開批判以後，很多單位的造反派頭頭被批為「小胡厚民」，日子也很難過。甚至把有些人關進監獄。例如，工造總司第二號頭目彭祖龍被武漢衛戍區關了七個月，在關押期間他在名義上仍是湖北省革委會成員。[91]

派工宣隊、解散造反派組織以及「捅掉馬蜂窩」等行動，對造反派的囂張氣焰給予了毀滅性打擊。對造反派的打壓持續進行，並在1968年最後兩個月裏有所強化。

10月，「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武漢展開。從性質上看，這個運動有利於以前的保守派。官方把運動的打擊對象規定為「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和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92] 實際上，運動打擊的範圍更加寬泛。[93] 除了走資派以外，運動打擊對象

可以說都是保守派所說的「牛鬼蛇神」那類人。運動的公開目的，就是挖出所有單位裏的「不純潔」的階級分子，而不管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前面幾個階段裏參加的是哪一派。但是，這一運動對造反派尤其不利，因為他們中許多人或者其家庭成員都有不好的階級背景或不光彩的歷史記錄。走資派就不同了，在處理時通常極為謹慎。事實上，成千上萬在文革前兩年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打成「走資派」的幹部，在這個運動中都開始得到「解放」。[94]

為了向前推進這一運動，武漢軍區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其成員被稱為「軍代表」)派進各個單位。就像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一樣，軍宣隊到了哪裏，就對那個單位進行全面的控制，而把革委會拋在一邊。工宣隊和軍宣隊成員都是遵照北京提出的標準嚴格挑選出來的。[95] 第一條標準，就是他們必須具有好的階級背景。因此，他們很可能是保守派或者是保守派的同情者。在再度開展的打擊「牛鬼蛇神」的運動中，兩個宣傳隊很自然地都傾向於把以前的保守派當成運動的依靠對象。所以，從前的保守派又有了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但大多數保守派最初都不太想公開表示自己對造反派的反感。他們在過去的兩年裏不止一次地觀察到，造反派的勢力暫時衰落下去後，緊接著又捲土重來了。所以，報復造反派對他們來說風險太大。而造反派則相信，這種不利局面不會持續太久，他們經常或明或暗地警告想進行報復的前保守派。[96]

為了加快運動步伐，軍宣隊努力打消前保守派的顧慮。這麼做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運用大眾傳媒把造反派搞臭。在整個10月和11月裏，《長江日報》發表大量報導，說已經揭露出有些單位的造反組織是由「暗藏的階級敵人」所操縱的，甚至把有些機構說成是「壞人當道，好人受氣」。由於軍宣隊不懈的努力，前保守派逐漸打消顧慮，開始積極地幫助解放軍開展運動。當然，運動對象首先是其單位裏的造反派頭頭和造反派骨幹。他們對這些造反派進行了調查。如果找出造反派本人或其家庭在歷史上有不良的記錄，那些造反派就被劃為「階級異己分子」。在多數情況下，這些調查是不必要的，因為保守派通常瞭解他們單位造反派的背景。那些「不良」記錄無法逃過人們雪亮的眼睛。加給

他們的罪名是五花八門的。但當時最常用的罪名，一般是說那些階級敵人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機對革命幹群進行「階級報復」。

他們還逼階級成份好的造反派揭露造反組織內的「不純分子」。這些人的對付策略就是，揭露以前屬於對立造反組織的人。由於他們不願傷害本派的同志，所以人們常常把這些人稱為批判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的「障礙」或「絆腳石」。

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一些前保守派又得意起來，開始彈起他們在運動過程中一直唱的老調：所有造反組織都是「壞人的防空洞」或「罪惡的淵藪」。[97] 因此，他們聲稱，「永遠不能讓造反派掌權」。[98]

到1969年初，造反派已經喪失了他們在武漢從基層到省各級革委會中的多數權力。最初，是將被認為是階級成份不純分子的造反派撤職。接下來，又藉口鞏固和調整革委會，而對許多單位的權力機關進行大換班。有些單位完全中止了革委會的工作，由「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或「鬥批改領導小組」，或簡單地說「革命領導小組」取而代之。不管這些變革的形式如何，結果都是同樣的：由前保守派替代了造反派，由不支持造反派的幹部替代支持造反派的幹部。[99]

那些仍在革委會任職的造反派也感到了威脅。1968年11月，湖北省革委會召開了一個為期21天的縣以上革委會代表會議，會議狠狠地批評了任愛生（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和楊春亭（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任和楊都是黨的老幹部，但他們從1967年初以後一直支持造反派。會議現在批評他們「無原則地」支持造反派，說他們是「黑手」和「老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較低層革委會中曾支持造反派的幹部也受到了猛烈批評。這次會議之後，造反派在湖北省和武漢市革委會中的作用一落千丈，頂多只能維持個「三結合」的外觀。[100] 有些造反派完全被這兩個革委會清除出去。工代會和紅代會也只在名義上存在。[101]

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兩年半以後，似乎從1969年開始，歷史的鐘擺正明顯地蕩回到1965年的狀態。

第十章

1969–1973年間的派別鬥爭

1969年派性再度復蘇

到1969年初，作為一場喧囂的、革命的、暴烈的劇變，文化大革命似乎已在武漢終結。難以駕馭的令人頭疼的學生們已被下放到農村。自發的群眾組織已被解散，各單位都已建立了革委會。按照《人民日報》的提法，文化大革命正在進入「鬥批改階段」。[1] 然而，在平靜的表面之下，另一場風暴正在醞釀。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武漢興起不久，造反派就開始指責運動代表了一種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被稱為「保守隊」，而軍代表則被叫做「保守派的同情者」。他們被控準備幫助前保守派捲土重來。然而，這種少數人的怨言並不能逆轉看似不可抗的運動的方向。

一些造反派設法在不同的前造反派組織之間克服交流障礙。1969年1月初，他們試圖恢復造反派之間的跨組織聯繫。不久，許多地下組織系統建成，同時，令人振奮的謠言也開始在武漢流傳。其中一條謠言說，新的中央指示已經對清理階級隊伍進行批評，指出其大方向的錯誤。據稱，北京已下令對在此次運動中被錯誤打擊的造反派予以平反。還有一種傳言說上海沒有軍代表，而且上海的造反派正在煽動武漢的造反派起來反對「復舊活動」。這種看似鼓舞人心的消息使一些造反派膽量大增，而採取更多的實際行動。一些仍在革委會中佔有權位的造反派開始在單位裏對軍代表公開挑釁。另一些人走的更遠，他們

公開宣稱，「儘管我們的組織已經被解散了，但工代會仍在。它是我們的領導核心。你們軍代表算老幾？你們傀儡革委會算老幾？」[2]

1969年1月下旬和2月初，許多已經下鄉的高中畢業生為過春節返回武漢與家人團聚。他們當中的死硬造反派很快就和工人造反派設立的秘密組織系統重新建立了聯繫。那些學生造反派真是無畏且好鬥，他們在街上張貼大字報，宣佈春節後他們要找保守派算帳。這種舉動再次顯示了造反派的力量。學生們的行動鼓舞了其它部門造反派的士氣。在一些單位中，他們開始公開要求撤銷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期間軍代表對他們或他們的同伴所下的結論。當時甚至有重建造反派組織的嘗試。[3] 但直到4月，他們的抗議活動才得以公開進行。

4月初，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團結」是九大的口號。[4] 許多中國人認為九大將成為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的標誌。

正當毛在北京盡力製造團結氣氛的時候，一場新的動亂在武漢爆發了。這場風暴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4月，就在當地領導人到北京參加九大的時候，它終於到來。

在毛努力創造穩定局面的同時，一些被削弱的造反派準備再次造反奪權。有以下四個因素使他們敢於鋌而走險。首先，如果說他們在過去的三年中學到了什麼東西，那就是倒霉決不會持續太長時間。1967年4月和1968年4月造反派曾兩次僥倖逃脫，並隨後上演了強勢的捲土重來。他們相信1969年4月將是他們的另一個幸運月。其次，公開的派別鬥爭已在幾個省持續進行。[5] 其它省份的派別鬥爭使武漢的造反派確信再多一個暴動不會讓他們付出太多代價。

第三，從其它地方傳來的消息是令造反派們振奮的。有一種謠傳稱，張春橋已經號召上海造反派對所謂的「復舊」進行反擊。[6] 北京傳來的一份報告也譴責了復舊趨勢。[7] 胡厚民從山東帶回了最鼓舞人心的消息。胡曾在1968年9月受到公開的嚴厲批評，並且他一直都在尋找合適的方法捲土重來。正是為了這個目的，他在1969年初去了山東。和武漢的同道一樣，山東的造反派也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遭到鎮壓。山東省革委會的主任王效禹給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發起了一場反復舊鬥爭。[8] 胡所講述的發生在山東的事情，提高了武漢造反派的士氣。

第四，造反派仍擁有一些能使他們重新崛起的政治資源。儘管一些造反派已經挨了整，但大多數造反派只是受到抑制而沒有遭到正式迫害。一些造反派在革委會仍然保有職位，哪怕僅在名義上。在一些單位，造反派仍佔上風。[9] 由於許多從前並肩戰鬥的同伴被打成「牛鬼蛇神」，他們害怕否定所有造反派的傾向將毀掉自己的政治前途。對他們來説有兩個選擇：要麼進行最後的戰鬥，要麼辭職後銷聲匿跡。因此，許多造反派感到他們不能坐視自己僅存的政治資源被奪走。此外，市一級的工代會和紅代會儘管受到削弱，卻依然存在，並且仍然能夠提供必要的領導以動員那些心懷不滿的人。

動亂開始於某些無組織的行動。4月中旬，在九大仍在進行之際，武漢的工代會就活躍起來。為了將不成熟的抵抗活動轉變成有組織的抗議運動，武漢工代會於4月18日發佈了一個聲明，它對城裏未經工代會批准而聲勢日益擴大的罷工表示支持。此外，它還號召基層的工代會來領導針對復舊活動的鬥爭，並督促造反派在原處重建那些已被解散的工代會。之所以強調工代會的作用，是因為它與革委會不同（造反派充其量是與軍人和黨政幹部分享權力），工代會是造反派的獨有領域。為確保沒有其它力量介入這一領域，4月18日聲明進一步指出，「基層工代會必須接受來自同級革委會和上級工代會的雙重領導。」[10] 這是對毛提出的原則的大膽修正，這一原則發表於《人民日報》、《紅旗》、和《解放軍日報》1969年元旦社論中：「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11] 事實上，「雙重領導」只是個幌子，聲明作者真正想要的也是「一元化領導」，但必須由工代會來實行。

在4月餘下的日子和5月間，武漢再次陷入混亂。《武漢工人》（武漢市工代會的喉舌），在1月1日到4月23日的四個月內僅發行了八期，而在4月23日到5月25日的一個月內卻發行了九期。不僅出版頻率得以增加，其內容也經歷了重大的轉變。從1968年9月26日起，《武漢工人》除了跟著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的調子走，自身則無所作為。然而在1969年4月中旬以後，《武漢工人》變得吹毛求疵和激進起來，直接對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以及它們背後的軍事當局進行攻擊。例如，4月23日出版的那期上刊載了一篇題為〈復舊傾向的十種表現〉的文章，認為復舊有如下主要表現：

(1) 所有群眾組織被解散，致使省、市革委會中的造反派代表的權力基礎被嚴重削弱。

(2) 兩級革委會中一大批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幹部」(即那些始終支持造反派的幹部)，被打成「罪惡的幕後操縱者」或「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被趕出了決策層。

(3) 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期間，許多造反派被打成「陰謀家」、「野心家」、「反革命分子」或「牛鬼蛇神」，而且許多造反派被說成運動中的「絆腳石」和「障礙」。

(4) 以「防止派性腐蝕新生的紅色政權」為藉口，許多單位的造反派被禁止在革委會中擔任職務。

(5) 打著「現在是改組時期」的幌子，前保守派份子得以保留下來，而前當權派也被重新解放。

(6) 那些造反派有廣泛影響的革委會常常受到懷疑，而且被「抓革命促生產的領導小組」或「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領導小組」所取代。

文章總結說，當時的形勢是：

> 造反派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昨日的革命闖將，今日的罪魁禍首。兩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老地方。

為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文章宣稱造反派必須團結一致，奪回被「資產階級」(也就是前保守派、前當權派和軍人) 篡奪的權力。[12]

在近幾個月遭受了相同的痛苦經歷之後，不同派系的造反派聯合了起來。胡厚民解釋了造反派團結一致的必要性：

> 從很多方面來看，現在的情況都和1967年初「二八聲明」發表之後的情況很類似。我們都是造反派，不管從前屬於哪一派，我們的命運都是相同的。如果我們不消除派別成見，聯合起來與共同的敵人作鬥爭，我們都會被消滅。[13]

朱鴻霞、李湘玉和吳焱金分別是工總、九・一三兵團和工造總司

的頭頭，他們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號召造反派「反復舊，反倒退、反復辟，徹底粉碎新老二月逆流」。[14]

聯合聲明印成大字報和傳單在武漢張貼散發，一夜之間家喻戶曉，成了造反派的總動員令。4月27日，當武漢工代會在漢口舉行大型群眾集會的時候，據報導有五十萬人參加。當然，不是每個在場的人都是造反派，也不是每個造反派都在場。不過，如此多的參加人數表明三大造反派頭頭的努力已經起了作用。集會在「慶祝九大勝利閉幕」的主題之下舉行，但是「團結」的主題僅限於造反派內部，這很顯然與毛澤東所指的「團結」意義不合。集會的真正目的是將造反派召集在一起來證明他們的力量、團結以及贏回他們已經失去的權力和威信的決心。在演講中，朱鴻霞稱：「有〔周〕總理、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張〕春橋（後五人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核心成員）等中央首長支持我們，我們是有力量」贏得這場戰鬥的。[15] 然而，這其實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朱和他的聽眾不知道在九大的一次會議中，曾思玉向毛彙報了武漢的造反派們正意欲何為之後，主席指示他穩定形勢，對造反派不要心慈手軟。[16]

自1968年末，從大多數大學生和高中生不是分配了工作就是被送去下鄉之後，紅代會除名稱外已不復存在。比方說，紅代會的大多數常委已經離開了武漢。[17] 然而，其組織仍在4月30日召開了一個常委會擴大會議，並發表了一個「會議紀要」，紀要的題目是「反復辟、反復舊，為爭取更大勝利而戰鬥」。按照這個決議，「復舊」體現在舊權力結構的恢復和重新實行舊的工作方式上面。為了反復舊，紀要宣稱應對以下的「謬論」進行批駁：

(1) 路線鬥爭熄滅論：說「現在不存在路線鬥爭了，也根本不存在革與保，只有公與私的鬥爭，大家都是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了」。

(2) 反動血統論：清隊中說「造反派內的牛鬼蛇神多，清理階級隊伍首先就要從造反派中開刀」。在這些輿論鼓動下，對老造反派的頭頭和一般的群眾進行內查外調，查他的祖宗八代的歷史。只要找到與他有一點關係的東西，就說是階級異己分子，趕出革委會。

(3) 秋後算賬論：說「造反派造反動機不純，是私字的膨脹，是由個人野心的」；「什麼造反派，光搞打、砸、搶」；「造反派不行了，運動後期都搶了槍，現在該要算你們的賬了」。
(4) 不見得論：說「造反派掌權不行，運動後期掌權不是犯了錯誤嗎？以前要你們上臺是革命的需要，不見得總是你們在臺上。現在下臺是革命形勢的發展」。

工宣隊是學生造反派在校園中煽動造反行動的主要障礙，因此決議強調反對個別工宣隊不應解釋為是反對工人階級。[18]

5月7日，工代會和紅代會共同舉行集會以慶祝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四周年。據報導，集會吸引了大約二十萬人參加。事實上，這次集會與五．七指示毫無關係，它其實是鼓動群眾支持造反派事業的誓師大會。[19] 就在同一天，工代會和紅代會發表了致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措詞強硬的公開信。公開信中稱，從1968年秋開始，兩個權力機構中的「一些主要領導」已經犯了一系列重大錯誤。

首先，這兩個革委會已經變成少數幾個最高領導的玩物。造反派代表和「革命幹部」只不過是傀儡而已，基本上已被排除在決策之外。在重大事項上的決策，不經過兩個革委會的大多數成員，就由一個領導小組自行決定。舉出的事例包括：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指導方針、派遣工宣隊進駐學校的計劃、對任愛生的批評、對胡厚民的公開批評，以及對彭祖龍的羈押。

其次，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都在相當程度上進行了擴大和改組。市革委會原定工作人員96人，這時已達1,100人；省革委會原定98人，這時已突破千字大關，若加上臨時工作人員和秘書之類，數目還要大。更糟糕的是，這些新增加的工作人員絕大多數是前保守派。

第三，省、市革委會通過當地的官方報紙《長江日報》和《湖北日報》，以批判「多中心論」為名，污蔑和詆毀造反派。

基於以上指責，公開信提出了七項要求：

(1) 抓緊對各方面幹部的兩條路線鬥爭教育，特別是讓工人階級〔造反派〕對犯走資派錯誤的幹部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再教育。

(2) 徹底批判「秋後算賬論」、「不見得論」、「反動的血統論」、「造反派裏牛鬼蛇神多論」。

(3) 省、市革委會中個別負責人對前一段的錯誤，不僅要允許群眾講，而且要自己主動講，作出公開的、認真嚴肅的自我檢查，把來龍去脈交待清楚，並採取措施徹底改正之。

(4) 健全三代會(工代會、紅代會、貧代會)、首先是工代會各級組織；發揮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的革命作用；支持三代會的工作。

(5) 徹底改變「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的復舊局面，對於整錯了的造反派和革命群眾應立即公開平反，恢復名譽，恢復應用的權力和工作。

(6) 省、市革委會必須站在這一場反復舊鬥爭的前面。

(7) 派出以產業工人為主體、以工人造反派和貧下中農造反派戰士為骨幹的工宣隊和貧宣隊，並將工宣隊、貧宣隊各級指揮部置於武漢地區革命工代會、貧代會的監督之下。[20]

總而言之，這些要求徹底否定了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在前半年所做的一切。公開信發佈四天後，造反派用行動表明了他們對省市當局的輕蔑：超過一百輛卡車的造反派衝擊了省、市革委會的辦公大樓。[21]

造反派的反復舊鬥爭使武漢再次陷入混亂。但造反派已不再是一支仍在發展壯大的力量，它正在走向衰落。幾乎所有大學和高中的學生都已從城市下放到農村，這就消除了造反派最具活力的部分。而留在學校的中學生由於年齡太小而對政治興趣不大。同時，在毛的支持下，在教育文化機構的工宣隊和軍宣隊的高壓政策已經有效地打擊了學校教師和其它類型知識分子中造反派的士氣。因而在4月和5月的騷亂中，社會上其它的部門被煽動起來的時候，先前已被造反派所主導的教育、文化和科研機構卻表現得相當平靜。[22] 黨政機關一般也較為平靜，這不僅是因為造反派從未控制過這些機構，還因為這些機構的大多數領導，尤其是造反派，已經被送到農村「執行鬥批改任務」。[23]

即使在工商業領域，大多數前造反派對反復舊運動也無動於衷。

有些人是因為厭惡政治而採取了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有些人是因有歷史問題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挨整而被嚇壞了。儘管造反派整體上在最近幾個月受到壓制，但也有例外。在一些單位，特別是在文革初期造反派反對工作組而非當權派的單位裏，造反派還保持優勢。因為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沒有成為運動對象，在這些單位的造反派沒什麼理由為別人的利益而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險。因此，他們往往不參與以前的同伴正在進行的戰鬥，儘管他們可能也對自己的一派持同情態度。只有那些根正苗紅、且相信參加新的造反行動代價少受益多的造反派，才會積極主動地參加運動。那些在革委會中有正式職位卻沒什麼實權的人也屬於這類人，他們希望運動可以對提高自己的權力地位起到決定性的推動作用。[24]

在反復舊的鬥爭中，有四個單位的作用特別顯著，即「三局一行」(郵局、電信局、供電局和銀行)。儘管這四個單位都帶有沉悶的「局」或「行」的字樣，但它們並不屬於行政機關，其職員也不是政府官員。但是由於軍事當局對地方事務不太瞭解，這四個單位被錯誤劃入行政機關一類，結果，這四個單位的大批職員，包括郵遞員、接線員、供電系統的維修工和銀行出納都被送到鄉下進行「鬥批改」。這些人與家人分離，還在鄉下受苦，都希望盡快回城。反復舊運動為他們回城提供了機會。供電局的造反派發表了一個聲明，斷言「強迫工人在農村進行鬥批改是反毛澤東思想的」；[25] 郵局和電信局的造反派則宣稱，因為城市中缺少郵遞員和接線員，本已品質低下的郵遞和電信服務將會變得更糟。許多人打著參加反復舊鬥爭的招牌回到了武漢。有意思的是，四個單位中一些前保守派此時也加入了造反派對手的行列。和造反派一樣，這些前保守派並不關心反復舊運動，他們真正關心的是與家人團聚。在這四個單位中，還是那些害怕被踢出權力機構的造反派頭頭才真正熱心地支持運動。[26]

總之，所有那些在1969年春仍積極活躍的造反派，都依賴曼庫爾·奧爾森所說的「選擇性激勵」來使他們繼續戰鬥。[27] 因為他們估計，繼續保持激進的個人獲益仍大於可能付出的代價。他們確信，繼續從事過去兩年半來一直為之戰鬥的事業是值得的。然而，大多數的前造反派已經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心灰意冷了。儘管造反派的群

眾基礎已經萎縮，但他們的成員卻更加精幹、更加執著、更具有戰鬥力。因此，儘管他們在數量上減少了，他們機動能力卻提高了，在4月末和5月間，他們仍然能夠在武漢興風作浪。總共有736個造反派組織在城市中再度出現；而且，它們奪取了180個單位革委會的權力。造反派的行動在5月17日達到頂點，當天一個所謂的工人調查團強行進入武漢市革委會大樓。工代會組建了這個代表團，其任務是確定武漢市革委會搞了多少復舊。[28] 這對武漢市革委會而言是莫大的恥辱。如果容許任何反市政府的民眾團體凌駕於這個政府之上，那裏將既沒有權威也沒有秩序。造反派本可以在文革早期這樣做，因為毛那時支持他們。在決定派出代表團進入武漢市革委會時，武漢工代會必定認為自己能再次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或者至少能得到他的容忍。但是，毛現在的想法已不同於往日了。

反復舊鬥爭偏離了毛所設想的軌道。在九大會議上，他號召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但在武漢和其它幾個地方，派性卻再度出現。派性損害了地方權力機構，擾亂了公共秩序，使生產癱瘓。[29] 文化大革命過去兩年半的歷程已經表明，派性是一種難以治癒卻易於傳播的傳染性社會疾病。因此，一經發現就將其扼殺在萌芽狀態非常關鍵。5月中旬，北京將一批造反派頭頭召到首都，並且命令他們停止行動，希望以此來阻止武漢的派性向其它地方蔓延。[30] 北京方面於5月27日發佈了一項特別針對武漢形勢的指示，即「五二七指示」。指示宣佈，反復舊鬥爭的大方向是錯誤的。[31] 造反派頭頭被迫在中央領導和地方軍隊領導面前做出自我批評。這樣一來，他們在武漢的追隨者除了撤退別無選擇。繼續進行一場必輸無疑的戰鬥毫無意義。到了6月初，曾在4–5月間顯而易見的緊張氣氛開始鬆弛下來。工代會和紅代會的報紙被查封，有組織的造反派力量被解散，街上又恢復了平靜。因此，反復舊的短暫鬥爭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鎮壓造反派

1969年下半年，北京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來宣揚團結這個主題。6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日報》聯合發表社論，宣佈造

反派和保守派之間已不再存在任何區別。這樣就剝奪了造反派所擁有的最重要的政治資本。[32] 在7月和8月間，北京頒佈了兩條命令，授權地方軍隊可以用武力鎮壓任何頑固地繼續進行派性活動的個人和組織。與此同時，所有宣傳機器都開動起來，對「團結」、「權威」和「紀律」等新觀念進行大力宣傳。[33]

但派性很難根除，至少在武漢是這樣的。儘管所有公開的派別組織已經消失，但是無形的聯繫依然存在。一些頑固的造反派為使其秘密系統繼續運轉而轉入了地下。[34] 然而，當北京在1969年9月27日發佈了一個關於武漢的「北斗星學會」、「決派」[35] 和《揚子江論壇》(通常被簡寫為「北決揚」，即每個名稱的第一個字)的指示，它最終宣告了武漢造反派的末日。「北斗星學會」和「決派」兩個名稱實為一個團體，《揚子江論壇》是其喉舌。這個小團體只有二十多人，主要由大學生和高中生組成，其中有這個城市裏最傑出的造反派理論家*。這一指示的公佈對當地政治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但到9月27日指示發佈時，這個團體的兩個頭頭已被監禁一年多。因此，「北決揚」並沒有影響武漢形勢的穩定。9月27日指示將「北決揚」選作首要的打擊目標，是因為北京別有企圖(後面我們將會看到)。9月27日指示認為，「北決揚」是個「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和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大雜燴」，所以應該對其頭頭和積極分子進行無情打擊。指示所傳遞出來的另一個重要信息是北京將很快召集武漢「有關各方」到首都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36]

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事先就知道北京要發佈這項指示。因此在指示發佈前一周，指示中所提到的「北決揚」的頭頭及骨幹分子共十二人就被逮捕了。[37]

9月27日指示不僅敲響了「北決揚」的喪鐘，也敲響了整個武漢造反派的喪鐘。一周後，湖北省革委會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持續了大約一個月。與會者包括湖北省革委會與武漢市革委會委員和候補委員，工代會和紅代會成員，以及某些大型企事業單位和大學的革委會成員。這次會議標誌著一個為期兩年的批判造反派運動的開始。當地

---

* 關於「北決揚」及其興衰史，請參閱魯禮安：《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的造反派頭頭成為眾矢之的。重壓之下，一些造反派頭頭屈服了。他們盡力讓人們相信他們願意與當局合作。例如，朱鴻霞就交代了他的同伴胡厚民曾鼓吹的所謂「三個長期鬥爭」論，即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長期鬥爭、革委會內部新老同志之間的長期鬥爭、「新派」和「鋼派」之間的長期鬥爭。然而，即便是這樣一種合作姿態也無法使朱免遭嚴厲的批判，當局警告他和其它造反派頭頭不要妄圖耍什麼花招，還告訴他們「誰也不許在這時候找藉口蒙混過關」。工代會和紅代會也受到批評，指責這兩個機構一直保護「北決揚」反動分子。

會議結束時，曾思玉宣佈：

> 從揭發的大量事實看，有的單位領導班子是不純的。權掌握在什麼人手上，值得研究。有的就是壞人掌權，好人受氣。我們要遵照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中共中央關於增補、調動、撤換各級革命委員會成員的通知》，逐步地解決這個問題。[38]

湖北省革委會擴大會議結束一周之後，湖北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北京舉辦。來自武漢的大約六百個知名造反派被召來參加這個學習班。雖然叫「湖北班」，但它並不包括湖北省其它地區的造反派。學員被分為五個「連」，每個連再分成「排」和「班」。一個連只包括大學生；其它四個連由來自其它部門的人組成。武漢警備區政委張昭劍為首的黨委領導學習班。學員的行動受到嚴格的限制。例如，儘管所有的學員都住在空軍學院，但禁止不同連隊的人互相接觸。這個措施是為了防止學員共謀串供。事實上，這個學習班的真正目的是迫使這些學員承認自己的罪行並揭發他人。然而，幾乎沒有學員自願上鈎。當調查到他們自己的錯誤時，他們往往避重就輕；當被問及他人的錯誤時他們也總是支吾搪塞，給出的回答模棱兩可。為克服學員們的消極抵抗，黨委會採取了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他們挑動「鋼派」和「新派」成員彼此揭發。一些造反派將此看成一個算舊帳的機會，很快就中計了。他們彼此指責對方挑起武鬥，參與「打砸搶」以及支持「北決揚」。黨委會用這種方法逐漸搜集到針對每個學員的「證據」。

最初，學習班缺乏連貫的主題。任何對造反派個人和造反派整體不利的東西都是受歡迎的。但是，並不清楚對收集到的情況做出何種

解釋，也不知道對相關的人應採取什麼樣的措施。1970年1月，北京提供了一個主題，即清查「五．一六兵團」成員。[39]

「五．一六兵團」是北京一個很小的激進組織，在1967年秋冒頭時已經被取締了。嚴懲一個早已銷聲匿跡、名不見經傳的小組織，此決定可以被解釋成北京需要一個藉口來除掉頑固而且難以控制的造反派。通過發動一場全國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成員的運動，北京製造了一個假象：「五．一六兵團」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而且在全國各省內都有大批的個人和組織與其有秘密聯繫。以造反派是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的秘密成員為理由，就能順理成章地大規模整肅造反派了。沒有這樣一種標準，只能批評造反派，但不能使其脫離組織，因為批判派性還不足以從政治上清算他們。

從1970年1月開始，「深挖五．一六分子」已經變成湖北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主題。據稱「北決揚」是「五．一六」集團的分支機構，擁有大批成員。為了找出當地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成員，在北京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團與其在武漢的附屬機構之間建立假定的關聯是必要的。武漢測繪學院學生李立曾經是二司的情報組長，他被確定為這兩個組織的聯絡人，因為他近幾年來在北京和武漢之間頻繁往來。李斷然拒絕承認這項指控。然而，在逐漸增強的壓力下，武漢水電學院學生雷志茂和李蘇民(兩個曾任二司駐京聯絡辦負責人的年輕人)做了偽供，他們承認曾經幫助「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和武漢的一些知名造反派，如胡厚民和楊道遠等人牽線搭橋。[40]雷和李的口供不僅證實了黨委會關於「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已經滲透到武漢的假設，同時還為尋找這個秘密團體在當地的其它成員提供了線索。

第一批少數幾個嫌疑人被迫提供了一個他們虛構的被發展人員的名單。因此，嫌疑人的名單像滚雪球一樣擴大了。許多嫌疑人承認他們曾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或者其外圍組織「北決揚」。他們之所以屈服，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起了作用，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發現，認罪可能是免受無休止審訊的唯一出路。然而，有些人無論承受多大的壓力，都不肯屈服。但是，堅稱自己無罪並沒有幫助他們洗脱嫌疑。相反，比起那些相對懦弱的同伴，他們被當成死硬分子而經常遭受更多的折磨。[41]

正當那些知名的造反派在京受審的時候，他們在武漢的下級也被置於高壓之下。幾個運動同時展開。在所有的運動中，前造反派最容易成為目標。[42] 除了那些很久之前就完全脱離政治的前造反派，沒幾個造反派能逃脱這樣或那樣的嚴重指控。

與文革早期混亂和隨心所欲的運動不同，1969年末和1970年的運動在軍宣隊和工宣隊的領導之下始終按照北京專門制定的指導方針有序進行。

這些指導方針體現在由毛澤東的8341警衛部隊所制定「六廠二校經驗」中。在1969和1970年，8341部隊至少將43個報導編纂成小冊子在全國分發，而這些小冊子被當成是指導廣大基層群眾運動的指南。大部分報導是關於如何挖出潛藏的階級敵人的方法。[43] 湖北省革委會仿效北京的做法，也挑了幾個單位作為當地的典型，被稱為湖北的「六廠一校」。[44]

有中央和當地樹立的榜樣做指導，武漢的每個單位都設立了專案組對單位的所有嫌疑人進行審查。受審對象一般被關押在「學習班」或者「牛棚」裏，他們不得離開大院，不能見來訪者，不能寫信或者打電話。除了他們被監禁在自己的單位而不是國家監獄這一點外，怎麼看他們都是囚犯。[45]

體罰是被禁止的。大多數情況下，這一禁令得到了很好的遵守。同樣被禁止使用的方法還有逼供和誘供，但實際上這是常見的做法。各種方法都會被用到。其中，最常用的是車輪戰(為使其筋疲力盡，幾個人輪流審訊一個嫌疑人)和精神戰(通過暗示他已經被其它人尤其是最親密的人揭發而使嫌疑人招認)。許多人承認了他們從未犯過的罪行，因為他們再也不能承受巨大的壓力，也可能他們被「胡蘿蔔加大棒」的口號，即「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所吸引。[46]

任何一個認罪的人，尤其被懷疑是「五．一六集團」成員或「北決揚」分子的人，都得交代同謀的名字。軍代表認為這兩個秘密組織有一個成員花名冊。重壓之下，有些人開始提供憑空捏造的名單，因而被冤枉的人數迅速增加。

或許在1970年和1971年兩年，被控有罪的人的數量之多，超過了武漢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僅僅一打三反運動就在城市中指控

35,461人有罪，其中一大批人都是前造反派。此外，33,659人要麼被戴上了「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要麼被劃為「北決揚」成員。[47] 武漢市電信局是一個職員不超過1,000人的單位，卻有136名男女被說成是這兩個秘密組織的成員。武漢歌舞劇院的情況更糟，400個演員中就有200人被檢舉。所有被懷疑為「五．一六」和「北決揚」的人都是造反派。事實上，在武漢沒有一個單位的人可以倖免。[48] 造成這種過火行為的因素可能有兩個。第一，軍代表們明白，如果他們必須做出選擇，對他們來說冤枉一個無辜的人要比允許一個可能的階級敵人逃脫要安全得多。第二，許多保守派和幹部正在抓緊機會向造反派報復。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造成了一大批前造反派的悲慘境遇。[49]

1970年6月初，湖北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終於結束。經中央批准，工總的靈魂人物胡厚民、二司的第一號人物楊道遠和九．一三的主要負責人李湘玉，均被免去他們在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的職務並被收監。此外，任愛生這位惟一的曾支持過造反派的副主任（共有八個副主任），被扣上「『北決揚』的主要後臺老闆」的帽子，並被軟禁起來。[50]

北京學習班的其它參加者被分成兩類：那些在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任職的人立刻被轉到由湖北省革委會在武漢開辦的學習班，而其餘的人被分派到許多由下級革委會舉辦的學習班。一大批基層造反派頭頭加入了後者。當地的學習班與北京的不同。其中，每個造反派都有幾個來自他本單位的同事做「動力」。「動力」無一例外地都是前保守派，其作用就是確定造反派的錯誤，對其進行批評，強迫其坦白交代以及監視他的一舉一動。由湖北省革委會開辦的學習班持續了大約一年，其它的學習班為期從兩個月到六個月不等。當那些學習班結束後，參加者被送回本單位或被重新分配到其它單位。不論是哪種情況，他們通常都是被迫在群眾的監督下做繁重的體力勞動。據後來有關材料披露，作為結束那些學習班的計劃的一部分，軍方曾考慮對84個知名的造反派宣判死刑。然而，因為某種不明原因，這個計劃沒有被執行。[51] 直到1971年末，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才宣告結束。那時，林彪成了新的群眾運動的批判對象。

舊權力關係的恢復

1969年末到1972年間的政治發展，從內容上而非形式上改變了中國省級及省級以下（包括武漢）的權力結構。大多數造反派從革委會的領導位置上被趕下去。有些造反派幸運的保住了位子，如前工總頭頭朱鴻霞、前工造總司頭頭吳焱金和新華工頭頭張立國，但他們喪失了實權。例如，沒人宣佈免去他們在湖北省革委會或武漢市革委會裏的職務，但禁止他們進入這兩個革委會的大樓。[52] 僅在有限的幾個單位裏，造反派能夠保住他們的位子，這是因為在文革初期，為對付工作組，造反派與這些單位的當權者曾經結成過同盟。[53]

造反派不僅被剝奪了權力，在日常生活當中也受到歧視。那些被劃為「機要部門」的單位開始驅逐造反派。例如，在1970年電信局招入了800個復員軍人，同時將相同數目的造反派職工轉調到了其它單位。[54] 已經下鄉的造反派學生也發現他們被當成二等公民。1970年，工廠和軍隊開始在農村對知青招工、徵兵，但對前造反派通常不予考慮。甚至造反派的家屬和親戚通常也失去了改善處境的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說，在1970年代初，「造反派」像「右派」以及「壞分子」一樣使人惟恐避之不及。[55]

就在造反派銷聲匿跡之時，新的社會秩序形成了。黨組織逐漸在廣大群眾當中恢復了威信。[56] 在1971年初，新的武漢市委和湖北省委出現了。[57]

通過為原黨員幹部恢復名譽，黨組織的重建呈現出一派新氣象。到1972年末，武漢大約95%的老黨員幹部已經得到「平反」，他們當中90%以上的人官復原職。[58] 文革前的權力分配模式基本上得到恢復。換句話說，在武漢，運動的組織基礎基本上被瓦解了。

1971年末，林彪之死對武漢地方政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59] 首先，經查證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一號和二號人物都與林彪集團的陰謀有牽連。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劉豐，作為林彪的「死黨」被打倒。武漢市委第二書記張昭劍受到懲罰。儘管湖北省第一書記曾思玉和武漢市委第一書記方鳴，還能夠保住位子，但要接受省委和市委成員的批評。因而，他們的權力地位和威信也受到了極大的削弱。

以上四個人都是軍隊領導。隨著他們勢力的削弱，這兩個決策機構裏地方官員的勢力大增。林彪之死也為提拔基層地方幹部鋪平了道路。[60] 在1972年末，軍代表終於奉命從所有地方機關撤出，地方幹部因此又恢復了他們失去已久的威信。

其次，前保守派認為林彪和劉豐應對利用武漢事件迫害「百萬雄獅」負責。儘管從1969年起，前保守派就取得了對前造反派的勝利，但是，1967年的武漢事件一直沒有被正式翻案。只要這個案子得不到糾正，它就始終是前保守派在政治鬥爭中的軟肋。林、劉之死，為他們推動給武漢事件翻案提供了機會。

1972年3月，八位「百萬雄獅」的領導人被釋放出獄，他們從1967年8月起就被監禁。他們被釋放後不久，一個非正式的聯絡系統在「百萬雄獅」不同級別的頭頭之間建立。1972年中，武漢事件的兩個「首犯」：陳再道將軍和鍾漢華將軍，再次出現在公眾場合，並且在別的省擔任要職。對前保守派來說，這無疑表明了北京承認武漢事件是一個冤案。因此，他們開始為這個事件的正式翻案對當地政府施加壓力。[61]

第三，在過去兩年來一直遭受迫害的前造反派從林彪之死看到了一線曙光：情況可能會發生對他們有利的轉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的突然停止，就是一個好兆頭。很快，湖北省革委會領導的「北決揚」專案組被解散。同時，還有傳言說，有些省份釋放了一直被羈押的造反派。這些表面看來的孤立事件，在一些絕望的造反派眼裏，卻看作形勢可能發生逆轉的徵兆。[62]

事實上，毛澤東已經批評了曾思玉，說在他的領導下，武漢的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錯誤地迫害了許多無辜者。因此，要求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對武漢所有關於五．一六集團和「北決揚」嫌疑人的案件進行復查。復查從1972年3月持續到1973年2月，並且最終得出結論：在33,659名嫌疑人當中僅有177人被證實曾經加入過「北決揚」，也就是說，大約有95%的案子是毫無根據的。[63] 在復查的過程中，一些前造反派密切關注每一個新動向，並且為交換信息開始重建跨單位的聯繫。[64]

第十一章

1974–1976年間的派別鬥爭

1974年派性的興衰

復查運動正要結束之時，對林彪的批判突然變得對造反派有利起來。在林彪死後的第一年裏，他被當作極左分子加以批判。但是在反對極左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感到持續地批判極左思潮可能會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1972年12月，毛澤東得出結論，對極左思潮的批判太過頭了。因此，林彪罪行被重新定性為極右。[1] 當時，毛確信右傾思潮盛行，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就需要一股能夠對右翼勢力形成制衡的社會力量。他又想起了運動的擁護者——前造反派。於是各省開始接到指示，允許那些原先在當地革委會擔任領導職務的造反派復職，並且任命另外一些人到正在被重新組建的官方群眾組織中任職，例如工會、共青團和婦聯。此外，最近被調到中央任職的上海著名造反派頭頭王洪文被派到一些省份視察，目的是會見當地的前造反派頭頭。[2]

最初，北京調門的改變在武漢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在1973年1月，當地居民注意到一些前造反派頭頭再次出現在公共場所。首先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夏幫銀和董明會再次出現。這兩個人在1969年4月曾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但之後就從公眾生活中消失了。[3]

當造反派們從各自的消息管道得知王洪文的巡視之後，他們意識到對林彪問題重新定性的重要意義。2月末，對五．一六集團和「北決揚」嫌疑人案件復查的結論剛一做出，朱鴻霞和吳焱金領導的一群前造

反派就計劃在漢口市區舉行一次集會，要求讓造反派頭頭在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內恢復原職。當地政府獲悉了這個計劃並設法阻止其施行，但是也做出了一些讓步。[4] 武漢居民於5月1日驚奇地發現，朱鴻霞及其它一些前造反派頭頭被邀請參加了官方的勞動節慶祝活動，並把他們在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中的職務頭銜介紹給公眾。這是他們自1969年中期以來，在公眾場合的第一次露面。[5] 前造反派在5月中旬又看到了一個振奮人心的跡象：新成立的湖北省共青團委的六個書記當中，有兩個是前學生造反派的頭頭。[6]

前造反派要人的高調復職引起了一些基層造反派的注意。他們將地方當局對前造反派領導人態度的轉變，理解成形勢正在朝著有利於他們的方向發展的標誌。為了重整旗鼓，秘密的造反派系統計劃在5月26日舉行集會。5月26日是個星期六，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在同一天召開。造反派精心挑選了這天，就是為了和這次會議趕在一起。通常，本市周六的交通異常繁忙，因此集會將引起廣泛的關注。此外，在這一天舉行集會將向地方當局傳達出一條明確的信息：造反派想在未來的市工會委員會中佔有一席之地。然而，計劃外泄了，5月26日那天，街上部署了大約2,000名警察，集會的計劃沒有實現。[7] 雖然如此，但是造反派還是有所斬獲，武漢在5月31日成立工會委員會時，董明會被任命為工會主席，吳焱金成為六名副主席當中的一個。[8]

湖北省工會委員會於6月28日成立。前造反派領導佔據了十位副主席當中的四個席位：他們是董明會、夏幫銀、朱鴻霞、平毅。[9] 湖北省婦聯於7月11日成立。二司前領導人王彩珠被選中，成為九位副主席當中的一個。

總之，在1973年中期，地方當局迫於北京方面的壓力，再次讓武漢的一些前造反派頭頭擔任了領導職位。與過去數年的情勢相比，這是一個重大的改變。但是，造反派在省市級所取得的勝利還沒有蔓延到基層。在工廠、學校、政府機關和其它機構，造反派仍普遍被排除在官方的群眾組織領導層之外。那些已經從革委會領導位置上被免職的前造反派，仍然被拒絕予以復職。

就在此時，清查五．一六集團和「北決揚」分子運動 (通常被稱為雙清運動) 的大多數受害者已經接到通知，說不再將他們視為嫌疑人了。

儘管沒有收到任何形式的道歉，許多人對於摘掉了嫌犯的帽子還是感到非常滿意。畢竟沒有這種受人歧視帽子的生活會好過得多。然而，對另一些人而言，僅僅摘帽是遠遠不夠的。「北決揚分子」的帽子實際上已經毀了他們的事業和生活。一些人被降級，一些人失去了工作，還有些人連同其家屬一起被送到農村。所以他們覺得他們有資格得到一些補償。那些在遠離武漢的地方已經分配了工作的大學生也想返回城市，但是這些向單位領導申請補償的要求基本上都被拒絕了。因此，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成了湖北省委或武漢市委信訪中心的常客(信訪中心的職責就是處理當地居民對上級領導的舉報事宜)。

在信訪中心，這些來自不同單位的前造反派很快就彼此熟悉起來。此刻，他們不再追求任何泛泛的所謂「公益」。相反，現在他們的目標是個人自由。但是，他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一起行動：首先，一個人努力的結果可能會對其他人產生積極的影響。例如，如果一個前造反派因為他過去遭受的痛苦而給予了補償，他的案例可能被其它人在提出自己申請的時候引為先例。此外，一致行動使他們對當地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壓力，這樣做比他們各自為戰的勝算要大。誰是第一個受到補償的人並不重要，因為所有的人都會從最初的勝利當中獲益。

其次，共同行動也會減少個人行為的風險，從而提高他們努力的有效性。那些不怕冒險的人首先是因為反正他們已經幾乎失去了一切，再次造反也沒什麼可以再失去的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他們是「狗急了還會跳牆」。不管怎麼說，一致行動好過單獨行動。沒有協同動作，那些前造反派可能選擇不同的日子分別到信訪中心：如果信訪中心每天只有幾個造反派，可能沒人去理他們或者他們很容易就被打發了。相反，如果中心每天都出現一大批人，政府只扣留一個或幾個造反派就起不了什麼作用了。因此，如果相當數量的人加入到這支力量當中，參與者個人可能面對的風險就會相應地減少，而且他們的努力也沒那麼容易被置之不理了。[10]

再次，對他們至關重要的信息少之又少而且零零星星，因此，如果他們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某種形式的信息交換。信息具有一種特性：當它的所有者和別人共享之後，對於原有者來說，信息的價值不會必然降低。因此，當人們彼此交換信息時，每個人都帶著更多

的信息走開了。當然，信息交換不是沒有代價的。對於那些對交換信息感興趣的人來說，降低交易成本的一個方法就是聯合起來。不管是通過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方式，這種聯合促進了信息的傳播並且使成本內化。此外，比較有能力的組織成員能夠幫助能力較弱的成員更好地理解他們彙集到一起的信息，還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它們。或許出於這三個方面的考慮，造反派們逐漸建立了幾個非正式的信息交流系統，由前造反派幾位小名人負責。這些信息交流系統之間也有聯繫，總共有大約一百人在其中積極活動。

其中一個信息交流系統特別值得一提，因為它在下邊要提到的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個系統的領導者是聶年生、劉漢武、方保林、謝妙福和王華珍。聶、劉和方在文革的巔峰時期是知名的大學生造反派組織的領導人，而王和謝只是普通工人造反派，過去在造反派陣營裏默默無聞。他們五個人組成了一個很好的團隊。大學生們對政府路線方針的微妙變化很敏感，具有豐富的策略思想，也很擅長宣傳和煽動，更不用說他們在市裏造反派名人中有廣泛的關係網了。儘管王和謝都頭腦簡單，行事魯莽，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天不怕地不怕，具有旺盛的精力，並且一旦認準方向就會一股勁兒做到底。[11]

1973年8月28日，幾個造反派秘密系統的積極組織者被捕，同日，中共十大在北京閉幕。整個會議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由毛澤東提出的口號：「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這使造反派想起了毛的另一句名言：「造反有理。」一些造反派決定把這個口號化為實際行動。9月5日，一張題為〈為什麼我們要重新造反〉的大字報出現在漢口街頭。這是自1969年中以來，這個城市裏第一次見到的造反派的大字報。針對這種行為，政府的反應是逮捕謝妙福。儘管一連串的逮捕使造反派抗議者的活動又轉入了地下，但並沒有嚇倒他們。他們貼出了更多的大字報，要求釋放謝和其它被拘留的人，這又在市裏引起了混亂。[12]

這些自詡的「反潮流戰士」仍然佔少數。當他們在9月中旬發動第一次遊行時，只有大約一百人參加。[13] 然而，他們決心已定，無所畏懼。在1973的最後三個月裏，包括聶年生在內的更多造反者被逮捕。但是他們繼續進行宣傳和煽動，希望因此而得到更多的支持。他們的

堅決努力有了成效，武漢的氣氛逐漸變得狂熱起來。在1966到1968年間，各類派別用來展示大字報和交換信息的那些場所再次變得人頭攢動。每天都有大量的大字報出現。[14]

然而，儘管這些「反潮流戰士」的影響日漸擴大，但由他們所發動的抵抗活動在1974年之前大部分仍處於秘密狀態。白天，他們通常按兵不動。一旦夜幕降臨，他們有的單獨行動，有的成群而出，到處張貼大字報。有時，他們會舉行一個集會或組織一次遊行，當警察接到報告趕到現場時，他們就溜之大吉。為了避免被一網打盡，秘密系統組織的核心成員通常分散在幾個隊伍裏。他們希望，即使再有幾個核心成員被捕，也始終還會有另外幾個人能夠發揮領導作用。

經過相對平靜的四年之後，大部分人已經習慣於服從政府的命令，看到少數前造反派再次起來挑戰省市政府的權威，他們感到很震驚。當然，前保守派痛恨這些造反者的行為，因此希望能儘快把他們鎮壓下去。前造反派可能和新造反者一樣懷有怨恨之情，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覺得參加到戰鬥中過於冒險。尤其是那些最近在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中已經恢復職務和在官方群眾組織中得到任命的造反派頭頭，他們害怕危及自己的政治前途因而非常謹慎。他們的最佳策略是小心駛得萬年船。例如，朱鴻霞和夏幫銀都儘量同街頭造反者保持距離。朱和夏與大多數秘密系統的領導人都是舊相識，他們私下裏甚至力勸他們不要再生事端。然而，這些努力都白費了。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對於形勢的估計過於保守了。[15]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有兩個原因促使政治氣氛發生改變。首先，一個新的群眾運動——批林批孔運動於1973年秋在中國全面展開。這個新運動是由北京激進的中央領導人所發動的一次進攻，攻擊對象是北京的對手。但是大多數中國人沒能洞悉批判這兩個死者的現實意義何在。武漢的「反潮流戰士」們也不例外。直到1973年底，這一運動仍被普遍認為是一次理論辯爭，或者頂多是一次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

激進的中央領導人要想點燃群眾對這個運動的熱情，就必須使運動本身與其未來支持者所關心的問題聯繫起來。1974年1月，他們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動員運動。他們現在告訴群眾，目前運動的真正

目標不是林彪和孔夫子，而是任何敵視文化大革命的人。他們敦促群眾廢除所有舊的規章制度，並全身心地投入到運動中去。此外，還警告各級官員不要去打擊廣大群眾參加運動的熱情。[16]從許多方面看，1974年1月的事件都讓人想起1966年10月所發生的那些事情。事實上，王洪文也宣稱，「批林批孔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17]

促使政治氣候發生變化的第二個原因是當時武漢領導層的大改組。1972年以來一直擔任湖北省委第二書記的張體學，於1973年9月死於癌症。[18]三個月後，毛決定對八大軍區的領導人進行重新改組，改組結果之一是楊得志取代曾思玉成為武漢軍區司令。曾思玉在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的位置則由來自北京的高級幹部趙辛初所取代。[19]

面對日益激進的環境，新上任的省領導在1974年新年的第一個舉動就是釋放被捕的「反潮流戰士」。這給那些造反派們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即形勢正在變得對他們有利。1月6日，聶年生在漢口的一個群眾集會上重新露面。聶聲稱，曾思玉的調任證明他已經犯了嚴重的錯誤。聶指出，如果一直負責武漢雙清工作的兩位省領導，即曾思玉和劉豐都犯了錯誤，那麼雙清運動的方向就不可能是正確的。[20]聶的這一詭辯對其追隨者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因此「反潮流戰士」們立刻發動了一輪更猛烈的攻勢，要求省政府和市政府處理他們的案子。

1月末，董明會在北京參加完一個由王洪文主持的中央學習班之後返回武漢。回來後，他首先會見了幾個有領導職位的前造反派，並向他們傳達了王洪文在中央學習班上的講話。其中，王洪文強調了兩點。首先，王譴責了許多省對造反派的鎮壓行為。其次，王建議應該有更多的「年輕幹部」，即那些嶄露頭角的造反派成員，被提拔到更重要的職位上去。過去，那些造反派本可以滿足於他們基本上只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官職。現在，他們突然意識到，他們能夠贏得更重要的、可以讓他們掌握實權的職位。在不久前的十大上，王洪文被任命為黨的副主席，這被造反派視為有這種可能性的一個實例。最近幾個月，那些造反派人物曾對「反潮流」有些猶豫。現在，有黨的副主席的支持，他們可以指望從一個新的造反運動中得到更多好處而不必擔心其代價了。他們對從各種各樣的行為選擇中能獲得的好處重新進行了估算，結果使他們拋開顧慮，又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新的派性鬥爭中去。[21]

就在前造反派領袖們決定轉而支持「反潮流戰士」們的時候，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收到了來自北京的指示，命令他們停止對造反派的迫害。來自上面和下面的雙重壓力迫使湖北省委對造反派作出了一些讓步。在1974年春節長假期間，湖北省委邀請了許多造反派要人參加一個座談會，並請他們就政府工作提出建議和看法。除了現在掌權的造反派外，湖北省委也邀請了一些在1966–1968年間在主要造反派組織中擔任領導職務、但1969年之後就默默無聞的前造反派頭頭，以及從1973年夏天以來領導「反潮流」運動的一些造反派（如聶年生和王華珍）。在座談會上，他們都借機表達了在過去四年當中積聚的不平之情。[22] 座談會之後，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召開了一系列的動員大會，號召人們參加到批林批孔運動中來。[23] 同時，工會、共青團和婦聯的省市級領導都發起了無數的群眾集會來推進武漢的運動。通過做出這種姿態，當地政府想要達到一石三鳥的目的。首先是要向北京表示他們正在緊跟中央的路線。其次，是要對當地潛在的挑戰者表明，他們願意與之做交易。第三個目的更重要，就是要使正在展開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處於他們的控制之下。他們相信，如果他們能夠贏得北京的信任並討得當地潛在的挑戰者的歡心，第三個目標也是可以達到的。

有兩個原因決定了第三個目標是不可能達到的。首先，前造反派所提出的要求太高，當地政府是不願意或者不能夠予以滿足的。第二，即使當地政府願意也有能力滿足造反派的要求，他們對造反派的姑息政策也會激起前保守派的巨大憤怒。

前造反派的目標是要改變在過去四年中已經固定下來的權力關係。他們的最小目標是要證明，他們是無辜的，近年來所有加諸於他們的指控都是沒有根據的。這樣做的話，他們就要全面否認雙清運動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而不是如「反潮流戰士」所做的那樣，僅僅試圖糾正個案。如果他們能夠達到這個最小目標，他們就可以結束二等公民的生活了。但是有些前造反派不滿足於這個最小目標，他們有一個中級目標，那就是報復那些曾經使他們遭受痛苦的人。還有一小部分連這個中級目標也不能滿足的造反派，他們主要是各個級別的前造反派領導人，他們的最大目標是重新獲得失去的權力。

對於前保守派，尤其是那些在清查五·一六集團和「北決揚」分子

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而言，造反派的這些目標他們一個都不能接受。前造反派和前保守派的利益是完全對立的。結果，在前造反派開始恢復力量不久之後，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舊的派性仇恨再次浮出水面。2月初，兩個基本陣營冠以新名號重新露面。前造反派自稱是「革命群眾」，前保守派則自稱為「工農兵」。兩派之間的衝突使武漢陷入新的混亂之中。城市的每個角落都貼滿再次出現的大字報，每天都有喧鬧的群眾集會，城市的公共秩序變得岌岌可危。[24]

2月中旬，「革命群眾」組織了一次遊行，並且在武漢市公安局辦公樓前靜坐示威，要求從監獄中釋放胡厚民、李湘玉、楊道遠和任愛生。1967年4月為工總平反而鬥爭時，造反派曾成功地運用了這個策略。在武漢的雙清運動中，這四人是最為人熟知的受害者。如果能推翻對他們的判決，那麼整個雙清運動的正確性就可能受到否定；而否定了整個雙清運動的正確性，那麼運動中所有受害者的名譽就應該得到恢復。這個策略顯然要比逐一糾正個案的方法要高明。如果造反派個人要求為其平反，假如他失敗的話，他就有受到懲罰的危險。然而，如果他參加的是全市範圍的行動，那麼他的身分是隱蔽的。即使行動失敗，他個人也不會冒風險。這個策略很合那些行事謹慎的造反派的胃口，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在本單位內都很低調，但出了他們保守派同事的視線，他們就會積極地投入到造反派的活動中。在此以前，已經有幾個省釋放了若干從1969年起就被逮捕的造反派頭頭，並給其恢復了名譽。[25]既然已經有了先例，武漢的造反派當然有理由相信他們也能贏得這場戰役。

3月2日，胡厚民和李湘玉獲得釋放。[26]他們出獄後，受到了「革命群眾」的熱烈歡迎。造反派初戰告捷，迫使當地政府作出了讓步，這證明了兩件事：他們自身強大的發展能力和政府的軟弱無能，這些都增加了未來集體行動將會戰果纍纍的可能性。第一次集體行動的成功極大地提升了那些不那麼熱心的造反派的士氣，他們當中有些人本來一直都不願公開站到「革命群眾」的隊伍裏來，而在行動成功後，這些人都丟掉了顧慮。因此，「革命群眾」在3月3日能夠舉行一場空前規模的大遊行：遊行隊伍包括滿載支持者的幾百輛卡車。然而，當時大部分恢復活力的造反派只在單位外活動，他們不想讓自己的上司和保守派

同事知道自己的派別身分。因為他們對造反派的事業將取得最終的勝利仍持懷疑態度，萬一造反派的事業失敗了，他們不想給人留下於己不利的把柄。如果他們參加到由「革命群眾」組織的行動中來，可以對迫使省政府否定雙清運動有所助益，以後他們就可以找本單位的對手算總帳了。

3月4日，湖北省委發佈了「七條」，其中湖北省委第一次正式承認雙清運動確實冤枉了很多無辜的人。它同時也作出保證，要恢復所有受害者的名譽。至於應由誰來對這麼多人所遭受的痛苦負責，「七條」的說法是：

> 使這麼多清白無辜的人受到冤枉的罪魁禍首是劉豐。那些在運動中辦過案的人對此沒有責任，更不用說那些參加過運動的群眾了。[27]

很顯然，這一方面是在試圖安撫日益囂張的造反派，另一方面則試圖使焦慮的保守派平靜下來。事實證明，這種試圖取悅兩方的如意算盤是打錯了。

造反派認為，「七條」是「一株大毒草」，他們不同意劉豐應獨自為他們的不幸負責的說法。相反，造反派堅持所有那些曾經迫害過造反派的人都必須付出代價。只有這樣，他們才有藉口，合法地向保守派及黨內幹部復仇。為了給自己追逐權力找個合適的理由，造反派需要表明那些當權者曾經犯過嚴重的政治錯誤。造反派認為，如果他們能夠使黨的幹部和保守派背上誤導清查五．一六集團和「北決揚」分子運動的罪名，未來他們要求掌握權力時就可以佔據有利地位。出於這些考慮，在「七條」公佈後，「革命群眾」加大了對當地政府的壓力。

釋放胡厚民和李湘玉已經在前保守派當中引起極大的敵意和怨恨。「七條」進一步激怒了他們。在他們看來，雙清運動沒什麼錯誤。鎮壓潛藏在造反派隊伍中的「牛鬼蛇神」是正確的，也是合理的。錯的是1967年7月的武漢事件還沒有得到正式平反，這件事使前保守派和幹部動不動就受到批評，即使自1969年之後他們的地位日益上升也概不能免。面對當地政府在應對造反派時的軟弱姿態，保守派尤其被激怒了。他們認為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對造反派如此順從，是因為造反

派的好戰和強硬。為了努力防止當地政府對造反派作出更多的讓步，「工農兵」決定自己也要變得更加好戰和強硬起來。這樣一來，武漢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開始腹背受敵。

在對造反派有利的政治大氣候中，當地政府發現抵擋造反派的壓力，要比抵住來自其它方向的壓力更加困難。在3月的前半月，當地政府對「革命群眾」作出了更多的讓步。政府在人事安排中，任命了更多的造反派擔任政府官員，後來這被稱為「補台」。例如，有四位造反派被增補為省工會委員會的副主席，同時有五個造反派到市工會委員會擔任同樣的職務。[28] 幾乎所有在1969年被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罷免的造反派都官復原職，包括剛剛出獄的胡厚民和李湘玉。恢復了胡在湖北省革委會裏的常委職務，而李仍然擔任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29] 一些造反派也開始因為他們在雙清運動中所遭受到的損失而得到補償。[30]

3月16日，湖北省委修改了「七條」，而代之以「六條」，刪掉的就是免除那些在雙清運動中案件處理人的責任這一條款。[31] 省委做出這一修改有兩層含義。其直接含義是，造反派可能會對他們的上級或保守派同事以牙還牙。而間接含義則是，某一派對當地政府施加的壓力越大，他們得到的讓步就越多。

「六條」進一步助長了造反派的氣焰。隨著市裏造反派的士氣普遍高漲，一些前造反派最後決定，應當在他們本單位給對手點顏色看看了。造反派在很多單位開始貼大字報，點名攻擊他們的上級領導和保守派同事。在一些單位裏，造反派甚至企圖強迫他們的領導和保守派同事向他們正式道歉。[32]

基層的主要問題也是權力。當時的一個流行口號是，「一切權力歸造反派」。[33] 對那些曾經在革委會任職的造反派來說，事情要相對容易些，他們所要做的就是要求復職。但是對那些以前從未擔任過官方職務的人來說，就要多一點想像力了。這一時期造反派的一個創意，就是設立所謂「批林批孔辦公室」。3月，這類辦公室在武漢的工廠、學校、行政機關等單位遍地開花，造反派還強迫各單位黨委承認這些辦公室在當前運動中的領導作用。在很多單位裏，這些「辦公室」幾乎取代了黨委的領導。[34]

當然，保守派被這些事態的發展激怒了。如果造反派可以因為他們的個人損失受到補償，並且造反派要人能夠得到官方機構領導職務的任命，他們覺得自己至少也應得到相同的待遇。因此，「工農兵」開始要求政府為武漢事件平反，對他們在武漢事件之後遭受的損失進行補償，並任命保守派要人到省市級政府機關的重要崗位上擔任領導職務。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省領導和「工農兵」主要頭頭之間進行了一個為期兩天的談判。但是，保守派從省領導那裏除了得到嚴厲批評之外一無所獲。[35] 3月19日，當兩個省領導趙辛初和趙修正在武漢鋼鐵廠參加會議的時候，一群氣急敗壞的保守派綁架了他們，並且要求他們作出解釋：為什麼省政府對造反派作出那麼多讓步，保守派卻什麼都得不到。儘管二趙沒受什麼罪，並且在幾個小時後就得到了釋放，這個事件還是被一位新華社駐漢特派記者上報給北京。3月2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了關於武漢局勢的三點指示，宣佈：「綁架趙辛初和趙修同志是錯誤的，不許為1967年7月武漢事件翻案。」

工農兵對三點指示失望之極。然而，他們除了防守之外別無選擇。[36] 相反，造反派認為三點指示是北京支持他們為自由而戰的一個明確的信號。結果，他們變得更加桀驁不馴了。

3月23日，一群剛從農村回到武漢的學生造反派在沿武漢主要街道的牆壁上貼出大字報，要求從獄中釋放二司的原領導人楊道遠。省政府拒絕釋放楊道遠，理由是與胡厚民和李湘玉的案件不同，楊被判監禁是由周恩來親自批准的。[37] 兩天後，一群工人造反派封鎖一個十字路口長達三小時，京廣鐵路和武漢的一條繁忙道路在此交匯。造反派這一激烈的舉動是為了對當地政府施加壓力，以迫使當局釋放因刑事罪被判刑的年輕工人造反派羅小毛。事件使京廣線這條國家經濟大動脈中斷了多日。[38]

3月26日，革命群眾襲擊了武漢軍區司令部大院裏的武漢軍區第三辦公室（簡稱「三辦」）。他們得到內部消息說，這個辦公室裏有大量對造反派不利的黑材料。他們搶走了有關雙清運動的大量個人檔案、會議記錄和文件。的確，在眾多的材料當中，襲擊者被其中一個有84個造反派頭頭的名單震驚了，省領導曾經計劃將這些人判處死刑。這個發現令造反派尤其是那些列在名單上的造反派得出結論，現在的戰

鬥是真正的生死之戰，他們除了拼到底之外別無它選。佔領三辦引發了一輪對軍隊的攻擊，許多造反派強行將前軍代表帶回本單位，迫他們在那裏接受質問、批評和侮辱。[39]

在躁動不安的氣氛中，武漢市委再次失去了對其機關報《長江日報》的控制。《長江日報》刊載了敵視省市政府的報導，並且發表了大量的社論和文章攻擊「工農兵」。因此報紙實際上變成了造反派的獨家論壇。[40]

當地政府甚至開始失去對其本機構的控制權。在3月的最後幾天裏，省和市政府幾乎各個部委都天天舉行群眾集會，但主導這些集會的是造反派的頭頭而不是這些機構的領導人。儘管所有的集會都叫「批林批孔大會」，但對林孔幾乎隻字不提。相反，所有講話者的矛頭都指向當地政府。省市領導經常被請去參加這種其實是造反派借機侮辱他們的會議。4月1日，湖北省委自己舉行了一個批林批孔的群眾大會。然而，會議又受到造反派的襲擾。接下來的那個星期裏，造反派以兩個早在1969年就不復存在的團體——工代會和紅代會的名義，舉行了幾個大型的示威活動。造反派表現得就像他們已經贏得了勝利。

甚至一些省領導也開始考慮加入造反派。例如，湖北省委的一個書記趙修，開始變成湖北省委內部人所共知的造反派的同情者。由於趙是在武漢雙清運動後才擔任目前的職務的，所以他並不擔心造反派攻擊湖北省委。這樣的攻擊不但不會對他造成任何損失，反而會通過整掉他的一些對手而增加他升官的機會。3月末，他在第一冶金公司發表了一個強烈支持造反派的講話。這個講話強迫公司黨委做出特別的姿態來證明其對造反派的支持：公司宣佈它要成為一個「造反黨委」。沒人知道「造反黨委」到底是什麼意思，也沒人關心這個問題。但是，其它單位困惑而焦慮的領導幹部則把這件事看成一個不祥之兆。他們對1966年發生的事仍然記憶猶新。如果他們不表現出支持造反派的姿態，就可能在第二次文革當中再次被打倒。他們認為，要想平安渡過危機，除了仿效第一冶金公司之外別無他法。因此，4月的第一個星期裏，幾百個單位的黨委紛紛發表「造反宣言」。因為這些事不過是象徵性的表態，所以那些政府組織都極力擴大其影響。接連幾天，武漢的主要街道擠滿了他們的遊行卡車。生產和交通陷入癱瘓狀態。

沒有人真正相信這些黨組織會真心支持造反派，但是，他們的行為確實起到了提升造反派士氣、打擊保守派精神的作用。儘管造反派知道黨員幹部對他們的敵意並沒有真正減少，他們對這一事態還是興高采烈。只要那些當權者認輸並聽從他們的指揮，他們的行為是不是自願沒有多大關係。另一方面，保守派則抵制這種發展態勢。為了盡量減少損失，「工農兵」命令它的成員去秘密訪問盡可能多的領導幹部，他們建議黨員幹部避免做出任何支持造反派的舉動。這一策略僅起到有限的作用。很多幹部稱病沒有出席政治集會，但是他們到不到場並沒有什麼區別。武漢的整體氣氛變得越來越有利於造反派。[41]

在這種勝利的氣氛當中，4月5日，一群造反派綁架了武漢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個副院長和五個法官。同時，法院收到了一個要求釋放所有在押造反派的最後通牒，其中包括那些犯有謀殺、縱火、搶劫、強姦和其它罪行的造反派。[42] 1974年前三個月裏，隨著公共機構逐漸陷入癱瘓，流氓行為在武漢變得非常猖獗。據報導，在公共場合已經發生了32起性強姦、103起鬥毆和28起搶劫事件。[43] 一天晚上，當「革命群眾」在漢口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舉行一個大型群眾集會時，一群流氓突然襲擊了一些婦女並當眾強姦了一個女孩。這是自1949年以來這個城市所見證過的最惡劣的犯罪。[44] 如果公共機構對造反派的要求屈服而釋放了那些罪犯，這個城市將陷入全面的混亂。

無政府狀態絕不是武漢的獨有狀態。到4月初為止，浙江、河北、河南、江蘇、四川、江西、廣東、山西和山東都陷入混亂之中。[45] 其它省也都或多或少地處於動蕩不安的狀態之中。其它各省的動蕩與武漢動蕩的原因一樣，都根源於派性的死灰復燃。全國的工業生產受到嚴重的干擾。這種混亂狀態一定令毛回想起1967年夏和1968年夏的混亂，那時局面已經完全失控。允許這種災難再次上演，肯定不符合毛澤東的最佳利益。要想讓公共權力避免崩潰的命運，北京必須採取行動遏制各省重現的自發派性。[46]

武漢是北京態度轉變所影響的第一個城市。4月7日，湖北省委接到了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在過去兩周內，幾乎造反派所做的和所支持的每一件事都遭到了批評。造反派被勒令釋放中院的副院長和五位法官、從武漢軍區司令部撤出，並歸還所有從三辦搶走的材料。指示列

舉的錯誤還有：試圖推翻對楊道遠的判決、佔領辦公樓以建立宣傳站、搶奪卡車、舉行示威和攻擊前軍代表等。這些指示使造反派感到迷惑，卻使很久以來垂頭喪氣的保守派再次高興起來。[47] 幾天後，當瞭解到北京最新的十二號文件的內容之後，造反派變得更加困惑起來。發佈於1974年4月11日的第十二號文件指出，批林批孔運動的貫徹執行在一些省影響了工業生產。為了阻止這一危險的趨勢，文件規定：

> 批林批孔運動必須在各級黨委的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准建立戰鬥隊，不准進行跨單位跨地區的串聯。[48]

和前些年裏曾見到的情況一樣，黨的最高領導地位的重新確立，通常已經成為北京打算從混亂中恢復正常秩序的第一個標誌。十二號文件使武漢政府免於政治上的慘敗。有了北京的支持，當地政府準備結束已經失控的運動，拉住這匹脫繮的野馬。[49] 政府敦促各級領導幹部更加關注生產和加強黨的領導；告誡「革命群眾」和「工農兵」解散「聯絡站」、「上訪團」、「廣播站」和其它有形的組織，並返回其原單位；勸告已經由農村返回武漢的前學生造反派返回農村。那些抓住運動提供的機會而提出經濟要求的人受到了批評，並被迫歸還了他們已經得到的補償。文件同時下令警察對過去幾個月中猖獗的歹徒採取強硬手段。[50]

「工農兵」和保守派群眾熱烈歡呼十二號文件，都鬆了口氣。他們在全市範圍內張貼了無數的大字報表示擁護這個文件，這種行為與毫無反應的造反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保守派很肯定地認為，文件將會確立他們對造反派的優勢地位，因此他們召開群眾集會慶祝勝利。[51] 然而，對於一些在一周或一周前被迫聲明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而言，這個轉變好得他們都有點不敢相信了。回想起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總是反復無常，他們非常謹慎，沒有因為看到最初的有利信號就對未來的發展過於自信。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4月餘下的時間裏，許多領導幹部發表文章為造反派歌功頌德，並且許諾要比過去提拔更多的「新生力量」到領導崗位上來。「工農兵」指責《長江日報》發表了這些文章。為了表示抗議，他們於5月5日衝擊了報社的辦公室並拿走了那天的印刷版，致使報社停印了兩天的報紙。[52]

造反派被十二號文件所帶來的變化驚得瞠目結舌，他們不能理解形勢怎麼會急轉直下。找出變化的原因和應對方法的惟一辦法是派些代表去北京，在那兒可以瞭解到更多的情況。然而，還有一件事對要前往首都的造反派來說也是個不小的刺激。4月，北京已針對河南和山東的派性衝突作出了一些決定。[53] 接著又傳出謠言，說北京很快要對武漢動手。4月中旬，為了嘗試影響北京對武漢的決定，朱鴻霞、胡厚民和其它一些造反派頭頭離開武漢前往北京。[54]

這些造反派要人的離開引起人們的猜測，說北京正在考慮將一些造反派領導放到更重要的領導崗位上。這一猜測使「工農兵」和一些不知名的造反派都感到不安。前者感到不安是因為他們不願意看到造反派身居官位；而後者則是害怕到瓜分戰利品的時候，他們會被撇下。結果，更多的人湧向北京。[55]

這些代表在北京一直待到5月初或5月中旬。4月末，一些湖北省和武漢市的領導人也到了北京。但是，在中央和湖北的領導人討論武漢未來的時候，居然不准任何派別的代表參加。[56]

與1974年前四個月相比，武漢的5月相對平靜。其實，此時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各方都在等待北京的裁決。在這種關鍵時刻，沒有一個派別會魯莽行事，因為任何不謹慎的行為都可能毀掉他們的政治前途。自從批林批孔運動開始以來，相互爭鬥的派別第一次開始張貼批林批孔的大字報。[57] 一個有影響的造反派頭頭後來證實：「那時沒人對批林批孔感興趣。我們的確出了大字報批判他們，但所有的大字報都是從那時鋪天蓋地的政府報紙和刊物上抄的。我們有時這麼幹是為了糊弄北京，好像我們真的堅定地響應她的號召。」[58] 文化大革命的參與者使用毛澤東詞語為自己的目的服務，這又是一個有說服力的例證。

5月24日，湖北省和武漢市的領導人終於從首都返回武漢。北京的決定對造反派極為不利，北京方面決定：

1. 清查「五．一六」和「北決揚」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2. 曾思玉與其他省級主要領導可能確實犯過某些小錯誤，但總的來說還是好幹部。

3. 可能有必要補充領導，但不能在犧牲老幹部的前途下進行。而且，不能過於草率地處理這件事。
4. 所有非正式的群眾組織必須立即解散。[59]

5月26日，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舉行了一次規模空前的集會，會議同時通過有線廣播網被轉播到市裏的每一個單位。在集會上宣讀了北京的決議之後，湖北省委第一書記趙辛初，武漢軍區司令楊得志和政委王六生都作了措詞嚴厲的發言，他們警告説，不應該把舊的怨恨帶到目前的運動中。換句話説，不容許反對雙清運動。[60] 5月28日，政府又召集了另一個群眾集會。有二十一個人因為在最近幾個多事之月犯罪而被宣判死刑或被捕入獄。這一事件也通過有線廣播做了現場直播。所有事件傳遞出來的信息非常清楚：公共秩序必須得到恢復。

但是，那些要求還沒有得到滿足的造反派們害怕一旦形勢恢復正常，他們可能永遠沒有機會使自己的冤案得到平反了。因此，他們不願結束運動，儘管他們當中的所有人都公開表示服從決議，但在私下裏，「革命群眾」感到失望和沮喪。焦慮的下屬要求彭祖龍(工造總司前二號人物)對決議作出評論時，他指出：「這個決議本身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現在重要的是我們和我們的對手如何解釋它。」[61] 此外，一些造反派懷疑決議有多大的權威性，因為它不是由毛本人親自簽署的。

6月，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為恢復公共秩序共同作出了努力。他們召開了許多會議，強調生產、團結、紀律和秩序的重要性。當地的官方報紙發表了一系列社論，呼籲廣大幹群堅決貫徹北京的指示。[62] 然而，派性活動並沒有平息。6月中旬，狂熱的氣氛在武漢又開始形成，到了6月底，城市再次陷入混亂。繁華市區又建立了宣傳站，宣傳車重新出現在街頭。對立派別又開始張貼大字報彼此進行攻擊。幾乎每天都有群眾遊行和集會。更糟的是，「革命群眾」和「工農兵」開始訴諸暴力。例如，6月的最後一天就發生了兩起流血衝突事件。[63] 看來，如果不採取堅決措施，形勢可能進一步惡化。

正當武漢當局徒勞地與來勢洶洶的派性做鬥爭的時候，對於國民經濟持續不斷惡化的狀況，中央領導層也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國家計委於6月18日提交給政治局的一份報告顯示，與1973年同期相比，

二十九個省市中有十一個省在1974年前五個月的工業產值大幅度下降。

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號召廣大群眾結束派性動亂，專心生產，遵守紀律。通知特別強調，凡是不遵循北京指示的人，都將受到嚴肅的處理。武漢作為全國最不安定的地區之一受到點名，這促使當地政府下決心竭其所能，盡快恢復秩序。[64]

在北京發出通知的同一天，謝妙福帶領三十多個造反派衝擊了湖北省委辦公大樓。襲擊者當即被逮捕。為了表示抗議，7月3日謝手下的另外一批人更猛烈地攻擊了省委領導經常召開重要會議的場所——省委第一招待所。政府向武漢居民傳達北京7月1日通知的時候，這兩件事被當成反面教材。[65]通知的貫徹比傳達關於武漢問題的5月通知要順利得多，因為沒人敢挑戰由毛澤東親自簽發的中央指示的權威。

7月13日，「工農兵」舉行了一個盛大的集會宣佈該組織解散。這個政治姿態既表示「工農兵」正在響應北京的號召，同時也是對戰勝「革命群眾」的一個慶祝儀式。集會的主席團包括幾乎所有前「百萬雄師」的市、區和部門各級頭頭。由此所傳遞出來的信息很明確：儘管「工農兵」現在自動解散了，但一旦有需要的話，組織可以隨時建立起來。事實上，集會之後，保守派勢力之間非正式的聯繫依然存在。[66]

「革命群眾」從未正式宣佈其組織解散，因為它是一個鬆散的聯盟，沒有統一的領導。不過，到了7月末，武漢的派性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有效控制。

在8、9月份之際，「團結」成了《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一系列社論的中心話題。[67]同年10月，毛澤東提議讓曾經被戴上「中國第二大走資派」帽子的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由於周恩來自6月以後一直住院治病，鄧小平擔負起整頓批林批孔運動導致的混亂局面的任務。為了使鄧的工作能夠順利進行，毛澤東又進一步發佈了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68]這個講話說出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心聲，因為他們對無政府和混亂感到疲憊，渴望安定和團結。所以，這一時期大眾媒體的主題，就是安定和團結。

安定的局面在武漢產生了明顯的影響。武漢市的工業產值在1974

年下半年大幅度增長：從7月到12月，每月總產值增長率分別達到2.1%、10.4%、21.1%、11.9%、14.9%和5.9%。[69] 但是，由於上半年的工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全年總產量與上年相比下降了24.3%，這次下滑比1967年的下滑還要嚴重，僅比1968年的情況稍好一點。不過，穩定政策的成功還是不容否認。除了發生極少數的派性衝突事件以外，城市又恢復了正常秩序。被任命了官方職務的造反派要人們仍然保有他們的職位。但是，他們目前在決策過程中不僅沒有實際的影響力，而且還必須想方設法保住至少是名義上的官銜。[70] 在1974年即將過去的時候，武漢的批林批孔也悄悄地劃上了句號。

舊派性的新特色

1973到1974年所發生的派性鬥爭，源於1966–1969年間發生的事件。但是，舊的派性活動表現出了新的特色。

最顯著的區別，就是1973–1974年參加派性鬥爭的人數比1966–1969年要少得多。造反派陣營就是一個實例。1966年，學生對於推動造反派的事業起到了先鋒作用，而在1974年，大學生和高中生一般都對政治漠不關心。在1974年3–4月間新的激進主義達到頂峰的時候，許多前造反派回到他們的母校，想要説服他們的低年級校友為造反派的事業而戰。令他們感到極度失望的是，這些低年級校友對他們的呼籲置若罔聞。[71] 這些人對政治冷漠的原因很簡單：在1960年代中期使學生們分化的問題如今已不復存在，而當前所爭論的問題與這些學生卻毫不相關。

在1966–1969年間，諸如學校、醫院、科研機構和文藝部門這種擁有大批知識分子職工的單位，基本上都是造反派的基地。然而，到了1974年，這些單位卻表現得相當平靜，並不是因為知識分子們改變了看法，而是因為他們不敢表達他們對「革命群眾」的同情。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比其它人更加老練。因此，在政治運動出現的時候，他們往往更加謹慎地反復權衡利弊。經歷了1966–1968年的起起落落以及之後的艱難困苦，他們再也不想捲進派性鬥爭中去了。

此外，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家庭出身不是中等就是很差。如果説他

們從文化大革命當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任何和他們一樣的人想要發泄自己對社會的不滿之情，最終必然會引火燒身。在他們的記憶當中，「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仍然恍如隔日，因此對他們而言，在政治運動中還是小心為妙。更重要的是，造反派知識分子對文革和文革當中產生的一些「新生事物」(例如，工宣隊、五七幹校、教育改革、赤腳醫生、樣板戲等等) 的態度越來越矛盾。一方面，他們有興趣與其它造反派一起同1969年之後出現的「復辟逆流」作鬥爭，但作為造反派，他們也因此經歷了很多磨難。但他們又意識到，扭轉復辟逆流會進一步催生「新生事物」，而這些「新生事物」似乎都違背他們自己的利益。[72]

在其它部門裏，人們身上也缺乏激進主義。而在文革早期尤其是1966–1967年間，激進主義在絕大多數人身上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在1967年底1968年初就退出政治舞臺的造反派們，往往疏離於當前的政治運動。那些在雙清運動中未受多少苦或批判過造反派頭頭的前造反派們，也可能與「革命群眾」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他們實在看不出新的造反運動會給他們帶來什麼好處。[73]

只有那些將批林批孔運動當作向上爬機會的造反派，才表現積極、敢說敢做。如前所述，那些迅速採取造反行動的人，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些絕望的造反派。他們已經處於社會底層，沒什麼可以再失去的了。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像王華珍這樣的人才會迅速搭上「反潮流」的戰車。之後，更多的造反派投身到這場戰鬥中。他們大多是各級前造反派頭頭，曾在1967–1968年間嘗到了權力的甜頭。他們正努力爭取在「補台」時被補進去，或者得到另外的官方任命。這些「憤憤不平者」和「向上爬者」加起來，也只佔前造反派中很小的一部分，更不必說在城市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了。例如，武漢牛羊加工廠有500多名工人，其中只有約20人參加了「反潮流」運動。[74] 大多數單位的情況也大致如此。[75]

「工農兵」陣營也主要由「百萬雄師」各級前頭頭們構成。[76] 這並不是說，那些不積極參加派系政治鬥爭的人對此漠不關心，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已經在心裏選擇了自己支持的陣營。一般說來，前造反派對「革命群眾」予以同情，而前保守派則同情「工農兵」，但是，他們從沒想過為派別鬥爭再次獻身。[77]

儘管派別鬥士的群眾基礎比以往薄弱得多，但他們以高昂的士氣、堅強的個性和高超的技巧，給城市政治施加了與其人數極不相稱的影響力。在大約四個月的時間裏，他們製造了緊張而變幻莫測的政治氣氛，使武漢市領導實際上顯得軟弱無能。

儘管造反的「革命群眾」高喊著許多由中央激進領導人在這個時期提出的激進口號，但他們決不是後者盲目的追隨者。除了少數幾個造反派頭頭如胡厚民以外，多數「革命群眾」既沒有意識到中央的穩健派領導人才是激進派領導人想要給予狠狠打擊的真正目標，也沒有意識到其中根本無利可圖。[78] 他們鼠目寸光，只看到了眼前利益。一個「革命群眾」的積極分子後來證實：「如果說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兩年裏，我們造反派還一直下意識地用激進的中央領導人提出的口號為我們自己的利益服務的話，那麼在1974年我們完全意識到，我們所反復高喊的激進口號只是些陳詞濫調，它們的唯一作用就是掩蓋我們自己的利益。」[79]

造反派對私利的追求不僅破壞了武漢造反派與其北京支持者之間表面上的從屬關係，也分化了造反派的陣營。「革命群眾」分成了八個小圈子，歸屬兩大派：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主流派在夏幫銀、朱鴻霞、胡厚民這樣的前造反派頭頭帶領下，關注補台的名額，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給當地政府施壓，使一些著名的造反派得到官方任命，掌握實權。非主流派由那些對官位無所求的造反派構成，他們對個人物質損失補償的關注程度超過對補台名額的關注。[80]

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內部又按照另外兩個因素進行細分：偏好的策略和前派系從屬關係。兩個派別中都有喜歡與當地政府做策略性周旋的人，也有喜歡直接採取街頭行動的人。前者被稱為「策略派」，而後者被稱為「街頭派」。此外，「鋼派」和「新派」之間的傳統差別仍然是造反派內部團結的障礙。例如，前工業總司頭頭吳焱金創建了一個寫作班子，名為「杜則進」(在武漢方言裏，這個名字聽起來很像當時的一個流行口號：「鬥則進」)。它成為前「新派」造反派的代言人。但另一個有影響的寫作班子叫做「邵正茂」(與孔子的政治對手「少正卯」的名字諧音，這成了造反派的象徵)，這個班子由朱鴻霞、胡厚民和其它工總的前領導人控制。[81]

所有這八個小圈子的利益具有共同之處。然而，他們之間利益、策略和前派系歸屬的區別卻令他們經常彼此猜疑。[82] 由於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因此「革命群眾」充其量是一個鬆散的聯盟，環境比較有利時，這種形式可能會使他們顯得很強大，但是當政治氣候改變時，要想渡過難關就沒那麼容易了。

「工農兵」也不是鐵板一塊。保守派陣營內部分為兩個派別：正統派和行動派。正統派由前「百萬雄師」的領導人負責指揮，規模巨大、組織良好，其高效的聯絡網遍及全市每個角落。一個正統派頭頭說，只要一聲令下，就可以通過聯絡網立刻動員起「一支強大的保守派力量」。但是，行動派卻經常與其領導層發生爭執。由一小撮年輕的好戰分子組成的行動派喜歡採取極端行動。行動派認為，「百萬雄師」的前領導人在處理與當地政府和造反派的關係時，往往過於謹慎。而在正統派看來，行動派則行事過於幼稚，沒有策略，且不計後果。到7月中旬「工農兵」宣佈解散時，兩派仍不能就其分歧達成妥協。[83]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説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説都出現兩次。但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喜劇出現的。」[84] 儘管所謂的第二次文革確實給人以這是1966–1969年那一時期翻版的印象，實際上，1974年的派別鬥爭與從前的派別鬥爭有著本質的不同。有了在1966–1969年動亂歲月裏鍛煉出來的動員和組織才能，1974年間派性鬥士在政治技巧上普遍地更加成熟。但與從前相比，新派別鬥爭的群眾基礎大幅縮水、更加世俗化並且支離破碎。鑒於新派性鬥爭的特質，造反派們對北京的指示往往置之不理，或用與指示意圖完全相反的思路對其加以闡述，就毫不令人感到吃驚。毛澤東將這個激進主義運動發動數月後就使其草草結束，這或許就是原因之一。

1975年鎮壓派系鬥爭

鄧小平於1974年初開始整頓工作之時，武漢還沒有安靜下來。儘管7月之後武漢的派性暴力衝突逐漸消失，但「革命群眾」和「工農兵」行

動派的街頭隊伍仍隨時可見。在1974年最後的四個月裏，他們仍偶爾聚集在街上，但沒有製造什麼麻煩。[85] 而在1975年初，造反派的街頭派試圖煽風點火，製造新的混亂。1月13日，第四屆全國人大在北京召開，一個自稱「革造民兵」的組織當天在武漢成立。「革造民兵」的成員不超過一百人，其中大多數人都是謝妙福的嫡系，後來據他們自己交待，他們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有犯罪記錄或者被處分過。「革造民兵」把這樣的人招至旗下，只能使他們更加肆無忌憚，更具破壞性。

1月15日，「革造民兵」僅成立兩天後，他們就無視北京安定團結的號召，在漢口舉行了誓師大會，引起了六個月以來的第一次交通堵塞。1月18日，第四屆全國人大閉幕。如果說這次會議有什麼地方吸引了「革造民兵」的注意力，那肯定不是周恩來關於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計劃，而是大會通過並寫入新憲法的公民罷工權力。「革造民兵」想率先使用一下這個權力。

然而，大約就在此時，政府向當地居民傳達了某些中央領導與朱鴻霞、張立國、馬學禮和楊道安 (後兩人在文革前是有名的模範工人，在前一年與「工農兵」組織掛上了鉤) 的談話記錄。中央領導們 (主要是副總理李先念) 譴責了造反派在1974年的所作所為，並嚴厲批評了那些仍在市裏繼續鬧事的造反派。[86] 當然，這個消息激怒了「革造民兵」。他們把談話記錄稱作「便談紀要」，企圖極力貶低中央領導人談話的重要性，並且抗議當地政府企圖從中撈取好處。然而，他們的抗議被省市政府對這個文件緊鑼密鼓的宣傳給淹沒了。

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他們的觀點，「革造民兵」決定在漢口建立一個宣傳站。2月13日，他們佔領了位於一個交叉路口的中南旅館，其地理位置與曼哈頓的時代廣場類似。他們把旅館的職員和客人都趕了出來，公然無視公安局的警告裝了八個擴音器並開始廣播。在接下來的三天裏，地方政府一直在勸說「革造民兵」撤出旅館，都無功而返。2月17日淩晨，派去強迫他們離開的警察不僅沒有成功，最終雙方展開了近身肉搏。「革造民兵」對警察的介入感到非常憤怒，他們把一個廢棄卡車堵在旅館前面的十字路口長達11天。結果漢口三分之一的主要道路堵塞，大部分交通系統陷於癱瘓，城市的生產和日常生活受到極大的影響。2月份武漢的工業產值與上個月相比，下降了28.7%。

在交通阻塞的十一天裏，省市政府再三命令「革造民兵」清除路障，但他們卻置若罔聞。他們堅持，要想讓他們清除路障，除非省市政府做出公開道歉。此外，他們還威脅說要封鎖連接漢口、漢陽、武昌三地的漢水大橋。他們預計，一旦整個城市堵死了，北京可能會出面命令當地政府和他們進行談判，就像1966–1968年間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當然，「策略派」非常願意見到省市政府陷入這樣一個進退維谷的局面。但是，盡管他們和街頭派一樣敵視7月以來的發展狀態，卻始終保持沉默。例如，朱鴻霞曾私下裏對朋友說：「中南旅館事件是個好事。不管他們(革造民兵)能不能達到目的，我們(策略派)都是絕對的勝利者。」朱鴻霞的意思是，如果北京下令讓當地政府屈服，街頭派可以從政府對造反派的妥協中受益，策略派同樣可以從中受益。但如果中央對街頭派進行了批判，那麼街頭派的無法無天反倒能襯托出策略派的遵紀守法。

「革造民兵」對形勢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2月26日，北京下發了一道指示，命令湖北省委「嚴厲處置堵塞漢口重要交通樞紐的肇事者」。當地政府一旦得到了北京的堅決支持，立刻就擺脫了往日的優柔寡斷。第二天，湖北省委下達了一個命令，要求「革造民兵」立即清除路障。隨後幾天，幾乎所有「革造民兵」的積極分子都被逮捕，共有大約100名男女被收監。[87] 這個行動完全清除了造反派的街頭派勢力。這一事件之後，派別鬥爭在武漢銷聲匿跡了。

策略派造反派也打錯了算盤。3月，朱鴻霞、夏幫銀、張立國和其它一些在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任職的造反派要人被送往農村。[88] 他們被告知將在那兒接受「鍛煉」，作為最終提拔的前提條件。但是沒人知道這個過程要進行多長時間。當地政府完全可以藉口說他們不合格，從而將其永遠留在農村。由於策略派造反派的領導不是被收監就是被送往別處，其組織也分崩離析了。

同時，鄧小平3月5日的講話和中央《關於整頓鐵路工作的決定》，引發了全國範圍內對「資產階級派性」的猛攻。4月，包括萬里和谷牧在內的鄧小平的幾個副手頻繁發表講話，譴責頑固的派性分子和派性的惡劣影響。北京對派性日益堅決的反對，使派性好戰分子陷入恐慌甚至絕望之中。許多造反派害怕，在1969–1972年間發生在他們身上的

事情會再次重演。謝妙福的一個最親密的戰友武齊驊，因中南旅館事件被捕，並於4月24日在獄中畏罪自殺。[89]

5月，謝妙福成為武漢的重點批判對象。政府收集整理了他的犯罪證據並且下發到各單位。6月，謝被判七年監禁，他的許多「革造民兵」同夥被判五年監禁到一年勞改不等。審判公開進行，市裏每個單位都被要求派一名代表觀看。這種安排的目的很明顯：當地領導想讓公眾知道，那些膽敢與政府對抗的人最終不會有好下場。[90]

對派性的批判到6月發展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並在隨後的三個月裏達到高潮。從1973年下半年表現得多少有點軟弱無能的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再次開始變得積極、堅決和高效起來。[91] 地方政府的積極領導，使對派性的批判活動得以有序展開。從6月到9月的四個月裏，所有的宣傳機器都被動員起來圍攻派性，並宣佈運動的目的是要鏟除派性滋生發育的土壤，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92]

較之1969–1971年的同類運動，1975年的反派性運動在範圍和方法上都有很大不同。確實，一些造反派（例如謝妙福）被收監，另一些（如朱鴻霞）被調到其它地方；但運動沒有對所有的造反派積極分子搞人人過關。正當那些在1974年再次表現積極的造反派憂心忡忡的時候，政府沒有建立專案組對「革命群眾」的基層積極分子提出指控，也幾乎沒有舉行任何鬥爭他們的批判大會。

到1975年秋，武漢的局面似乎已基本穩定。隨著生活恢復正常，經濟再次繁榮起來。例如，從3月到11月武漢的工業生產以11%到17%的速度增長。[93]

文化大革命派性終結的開端

1975年11月，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一個激進的中央領導集團（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即後來的「四人幫」發動了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到1976年2月，它又演變成「批鄧」的運動。然而，到1976年2月為止，這個運動並未在武漢掀起多大風浪，[94] 只有一小部分當地居民回應了北京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戰鬥口號。但是，大多數人開始覺察到，政治氣氛再次變得沉悶起來。1975年鄧小平注重實

效的工作路線所帶來的穩定，與1966–1968以及1973–1974年間中央激進派領導的煽動性政策所引起的混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現在甚至很多前造反派對鄧小平的看法也很好。人們普遍擔心，對鄧小平的攻擊將會再次把國家拖入混亂之中。尤其是廣大幹部都處於焦慮之中。「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這種提法通過官方媒體再次流行起來，這讓他們感到緊張無比，因為「走資派」的帽子曾讓他們在文革前三年吃盡苦頭，他們害怕悲劇可能再次上演。一些人決定提前申請退休；另一些人決定保持安靜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煩。所有的人都對運動只表示口頭上的擁護，而不採取實際行動響應官方號召。[95]

大多數前造反派的普通成員現在都變得對政治毫不關心。[96] 在各省的運動中，四人幫惟一可以倚重的人，就是那些認為這個激進運動的結果和他們自己的政治前途休戚相關而準備孤注一擲的人。他們大多是前造反派頭頭，但這些人只佔人口比例的很小一部分，至少武漢的情況如此。他們熱切地希望與激進的中央領導共命運，並不是因為他們欣賞四人幫所鼓吹的激進政策，而是因為過去的經驗教訓使他們懂得，有北京的江青和張春橋等實權人物的支持，是他們主導當地政治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武漢最精明的造反派軍師胡厚民一針見血地道出了這件事的實質：「我們臉上已經打上了造反派的烙印，不管我們幹什麼，別人都把我們看成造反派，並這樣對待我們。或是在戰鬥中得勝或是被打死，我們沒有第三種選擇。」[97]

為了增加獲勝的可能性，那些造反派必須支持中央的激進派領導。由於周恩來在這年的1月8日逝世，而毛澤東也隨時都有去世的可能，因此1976年北京激進的文革領導人和穩健派領導人間的權力鬥爭，通常被看成是最後的決戰。如果中央的激進派領導人最終失敗，那麼武漢的前造反派頭頭也將最終被清出政治舞臺。出於這些原因，儘管造反派的力量已嚴重萎縮，他們還是準備背水一戰。大約就在這一時期，吳焱金揚言：「這次看準了，不能失去機會」，「大鬧才能大翻身」。[98]

1976年2月，朱鴻霞、夏幫銀和張立國覺察到政治風向正在發生變化，於是從農村返回武漢。他們著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舊部。為此，他們舉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會議。其中一個會議之後，據説夏幫

銀發誓將「要脫了膀子鬥」。張立國說得更加直截了當：「這一次我們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戰。要麼贏盡，要麼輸光，撈到了就做大官，撈不到就坐大牢。」[99]

2月23日，在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後，十七位在湖北省革委會或在武漢市革委會任職的造反派名人發表了一封致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公開信。公開信批評了武漢從省到基層的各級黨委，指責他們未能緊跟中央的戰略部署。公開信特別指出，許多幹部對文革前三年裏別人對他們的批判耿耿於懷，長期以來伺機報復。公開信稱那些幹部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並且號召將所有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趕下臺。[100]

公開信發表之後不久，造反派建立了一個「核心小組」，來承擔起武漢所有造反派力量領導中心的職責。他的七名成員夏幫銀、謝望春、朱鴻霞、胡厚民、顧建棠(原「長辦聯司」頭目)、李湘玉和吳焱金實際上都是武漢最有影響的造反派頭頭。前兩人是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中間三人和最後兩人分別在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市革委會擔任要職。「核心小組」由一個寫作班子和六個部門支持運轉，它們分別負責策略謀劃、宣傳、後勤、聯絡、行政和保衛事務。此外，「核心小組」還試圖在武漢每個市級行政局和每個區建立分部。七位核心小組成員自認為是個「影子內閣」，萬一發生危急情況，它能夠代替市領導中心行使權力。[101]

3月2日，江青和王洪文在北京會見了包括湖北省在內的12個省的軍政領導人。當江青問湖北省委的書記董明會，作為一個前造反派在武漢是否一直受到壓制，董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利用董明會的回答，江青申斥了湖北省委的第一書記趙辛初和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指責他們對造反派施行暴政。隨後王洪文質問趙和楊，為什麼湖北政府在未經北京允許的情況下於1975年將夏幫銀、朱鴻霞和張立國下放到農村。最後，他得出結論，之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是因為「湖北領導班子的構成沒有體現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就」。趙和楊被責令回到武漢後向造反派道歉。[102]

江青和王洪文對省領導做出批評的消息很快在武漢傳播開來。就在第二天，武漢市的造反派要人發表了另外一封公開信，催促省市兩級政府調整領導班子。[103] 幾天後，當湖北省委召開常委會擴大會議

時，一群造反派在朱鴻霞和吳焱金的帶領下對會議進行了兩次干擾。正在參加會議的夏幫銀則與干擾者裏應外合。3月19日，同一夥人襲擊了湖北省委辦公廳和組織部，在場的幾個幹部受到了人身攻擊。第二天，這批人強行佔領了湖北省委的第一招待所並且發佈了一個最後通牒，威脅說，如果省市兩級政府不作出讓步，就將製造更多的暴力事件。[104]

用胡厚民的話說，勝敗攸關的問題是權力。他宣稱：「從政治上講，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但從組織上而言，這個運動遠遠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目的，現在必須解決組織問題。」[105] 夏幫銀講得更加露骨。他說：「是的，我們正在想方設法奪權。為什麼不？如果我們手中有權，世上還有誰敢對我們說半個『不』字？」[106]「核心小組」甚至起草了一個計劃，準備從省級到基層對現有權力分配模式進行根本變革，其變革的重點在高層。按照這個計劃，將有八個造反派進入湖北省委常委會，其中四個成為書記。儘管省工會委員會已經有其111個成員，但「核心小組」計劃再塞入120個造反派。「核心小組」同時還企圖安插九個人到工會下設的各個部門擔任副職。湖北共青團省委是造反派想要控制的另一個機構。有人提議除了已經被造反派佔據的一個書記和六個副書記的職位外，應該有更多的造反派擔任副書記。這個主張荒謬可笑，因為由造反派推薦的七個候選人當中有四個既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共青團員，並且年紀都太大，不符合加入共青團的條件。造反派在市級政府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107]

此外，造反派頭面人物還提出了個人要求。例如，每次湖北省委常委會開會時，夏幫銀都會催促老幹部任命他當省委書記。[108] 儘管董明會已經是擔任了武漢市委的一個書記，仍然渴望成為湖北省委的書記之一。[109] 張立國認為自己是一個「足智多謀」的人。表面上，他與其它的知名造反派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但他與那些魯莽的同夥一樣對權力懷有強烈的渴望，他也希望成為湖北省委的書記之一。他與其它知名造反派之間最顯著的區別是，他寧願與老幹部在會議桌前討價還價，而不採取直接行動對政府施壓。朱鴻霞的例子更加有趣。他不是黨員，卻渴望成為湖北省委書記。根據中國共產黨黨章，他要想加入中國共產黨，必須得到他所在工作單位黨支部的批准。他本人很清

楚，申請不會得到本單位的批准，於是他通過直接給王洪文寫信，請求這位中共副主席授予他一個黨員身分，從而繞開這個程序障礙。[110]

不那麼出名的造反派效仿頭頭們，也在低一級政府鬧著要官。[111]如果造反派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滿足的話，不但老幹部們要受到排擠，還將動搖整個政權的基礎。

然而，儘管造反派極具攻擊性，但力量並不太強大。1976年春，武漢頂多有幾千名造反派仍在積極活動。造反派陣營裏最具暴力傾向的人物，比如謝妙福及其同夥仍在監獄中。儘管造反派要求把他們釋放出來，但沒有採取行動。而且，即使把他們從獄中釋放出來，人們也有理由懷疑他們是否還會捲入新的造反行動中，因為他們在監獄外的大多數同夥們已經對政治感到疲憊了。這種冷漠是可以理解的。1976年的政治運動與那些在文革之前、文革初期、雙清運動或者1975年的反對派性運動中挨過整的人的命運無關。階級背景不好的人已經意識到，得到與那些出身良好的人同等社會地位對他們來說是不可企及的目標。對從前的落後分子來說，不服從管教已經使他們享受到一些短期回報，但這並不能改變不斷複製積極分子和落後分子之間的鴻溝的政權結構。[112]此外，還有一點已經很清楚，不管是先進分子還是落後分子，只要他們努力推動解決自己的問題，其行為就會招致巨大的反作用力。既然「反抗」(voice) 已被證明無效且代價高昂，「急流勇退」(exit) 就變成一個越來越有吸引力的選擇。[113]因此，到1976年為止，大約有90%的前造反派已經喪失了鬥志，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1976年的激進主義氣氛沒能在武漢或在全國其它地區掀起真正的政治激進主義狂潮。雖然街上還貼著大字報，偶爾也舉行一些集會，但已經沒什麼人去注意它們了。這與1974年和1966–1968年間發生的情況形成了強烈的對比。[114]在長期以來充當造反派據點的許多單位裏，造反派的活動根本召集不起來。許多前造反派積極分子現在都傾向於退出派別政治爭奪。[115]

4月初，一場群眾運動突然爆發，並迅速蔓延到包括武漢的全國各地，[116]並在北京天安門事件時達到頂峰。然而，群眾運動的目標所指不是鄧小平而是四人幫，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是針對毛澤東本人。[117]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毛澤東的政權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直接的

挑戰。儘管反抗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這一事件標誌著毛澤東時代終結的開端。

對天安門事件的鎮壓，雖然令大多數中國人感到壓抑，卻使武漢的造反派們歡呼雀躍。當地政府未能制止武漢的反對四人幫活動，這就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以迫使政府作出更多的讓步。

4月8日，湖北省委勉強組織了一個群眾集會來做出譴責天安門事件的姿態。集會結束前，一群造反派在朱鴻霞和吳焱金的帶領下衝進會場，並綁架了幾個省領導。隨後帶他們遊街，並押到由造反派召集的另一個群眾集會上，強迫他們向造反派公開保證，將徹底改變態度並且與文革中興起的新生力量並肩作戰。[118]

令造反派吃驚的是，北京第二天就譴責了他們的這一行為。造反派領導很快就從他們的信息管道瞭解到，他們之所以被批評不是因為他們的要求不合理，而是因為他們行動方式與當前四人幫提倡的策略不協調。四人幫更願意選擇一個「內緊外鬆」的策略，也就是說要製造一種既可以讓各省造反派對保守的當地政權不斷施壓又可以避免擾亂公共秩序的局面。四人幫之所以採取這一策略，是因為他們已經從過去的經驗中認識到，只要國家由於激進運動而陷入混亂，毛就會讓穩健派領導人來收拾爛攤子。四人幫希望這個新策略能帶來在他們看來沒有任何副作用的積極效果。[119]

1976年4月中旬，武漢的造反派開始運用這一策略。於是他們作出了一些相應的調整。首先，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兩個委員夏幫銀和謝望春退居幕後，而朱鴻霞和其它幾個「核心小組」成員出任造反派總指揮。其次，他們決定造反派應盡量避免給人留下派性鬥士的形象。用吳焱金的話說：「我們現在不需要為自己的力量拉大旗，也不需要樹招牌。」再次，由「核心小組」直接控制、自從1976年2月以來定期在漢口鬧市區出現的大字報〔所謂《水塔版》〕將不再辦下去。造反派領導層建議過去負責大字報的寫作班子給《長江日報》寫稿。夏幫銀對班子成員說，「形勢在發展，鬥爭在繼續，要求鬥爭的手法也要隨著形勢的發展而轉變。《水塔版》暫時停下來，收一下，由街頭轉向《長江日報》」，「《長江日報》比《水塔版》作用更大，每天十萬份，全市都能看到」。[120]

此後，街頭行動大大減少。但是造反派暗中加強了他們對當地政府施加的壓力，以期得到更多的權力。

面對來自北京和武漢的雙重壓力，省市兩級政府在5月末對造反派做出讓步：胡厚民和其它四個造反派成為湖北省革委會或武漢市革委會的專職官員，成為脫產幹部。對當地政府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讓步。允許五個造反派進入這兩個權力機構，不僅改變了他們的個人社會地位，使他們從一個普通的體力勞動者變成一個高級幹部；而且極大地增強了造反派干預省市政府決策的能力。然而，對造反派來說，這僅僅是初步的勝利。胡厚民對他的同伴們說，他們的下個目標是得到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專職委員，那才是具有真正核心權力的職位。他說：「先省市，後地縣，上面做個樣子，下面照著辦。要由五個到五百、五千、到五萬。」[121]

值得重視的是，大約在此時，王洪文又給武漢造反派一個有力的鼓舞。6月初，在一個湖北省主要領導參加的會議上，王洪文宣佈，按照造反派在各級領導中所佔的名額來看，湖北省在29個省當中排名最後。他再次督促湖北省的主要領導做出徹底的自我批評，扭轉其對造反派的態度。6月19日，趙辛初代表湖北省委勉強作出自我批評。但是造反派不為所動，指責其不夠真誠。在王洪文親自干預武漢事務的激勵下，造反派認為，現在應對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以迫使其做出更多妥協。此後，「核心小組」擬訂了一個十六字戰略：「上下夾擊，軟硬兼施，腳踏實地，獨立自主」。從此，這些策略變成了造反派的行動指南。

造反派在省級和市級層面提出了四點要求：

(1) 湖北的所有中央委員（指夏幫銀、董明會和謝望春）必須被任命為省委書記。
(2) 另外一大批造反派必須被安置到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中去，或是擔任書記，或是擔任常委。
(3) 省委和市委下屬的組織部、宣傳部和辦公廳必須由造反派負責。
(4) 省委和市委中的工作人員必須包括很大一部分造反派分子。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造反派對省市主要領導軟硬兼施。一方面，造反派反復警告在職領導說，任何歧視「文革中崛起的新生力量」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試圖以此脅迫在職領導將他們作為「新鮮血液」吸納進權力機關。另一方面，他們列舉出所謂的「上海經驗」。據說在上海，一大批自願提前退休的老同志現在過著安逸而舒適的生活。造反派鼓勵當地的老同志也這麼做。造反派保證，一旦他們將位子讓給「新幹部」，造反派將停止騷擾他們。

在較低級層面，造反派的行為比他們在省市級的同夥更加激進。「核心小組」認為，要想迫使省市政府向他們屈服，必須自下而上地顛覆現有的權力結構。在那些可以集合起足夠多數量造反派的單位，則鼓動造反派奪取權力，而不是僅僅與老同志分享權力。從6月開始，造反派宣佈要在三十一個大中型企事業單位和十四個行政局恢復「真正的革委會」，他們說的是在1967–1968年間短暫存在過的革委會。造反派宣佈現在的革委會非法。因此，在那些單位當中，每個單位都有了兩個革委會，兩個都聲稱自己是本單位惟一的權力機構。結果，這些單位的生產即使沒有完全停頓也受到了嚴重干擾。在其它一些單位，儘管造反派沒有足夠的力量恢復所謂真正的革委會，他們也採取造反行動，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現存權力機構。[122]

但是無論在哪個單位，造反派試圖奪權的企圖都無一例外地受到了抵制。佔絕對多數的廣大群眾對造反派感到非常厭惡，不僅省市領導討厭他們，基層幹部也對他們極度不滿。在這些人當中，通常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們從前的戰友，而現在這些人也對他們的行為採取敵視的態度，更不用說前保守派了。[123] 據說一個造反派哀嘆道，「看來現在至少有80%的人是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的社會基礎。」[124]

由於造反派失去了群眾的普遍支持，他們選擇將未來的賭注押在四人幫在北京的篡黨奪權之上。他們把所有拒絕與他們合作的人看成是他們追逐權力的障礙。那時，鄧小平被中央宣傳部門批判為所謂資產階級還鄉團的總頭目。武漢造反派積極分子也接過這個貶損的比喻，說「還鄉團」不僅有「團長」，還有「營長」、「連長」和「還鄉團員」。他們這樣說，實際上是為想攻擊誰就攻擊誰製造藉口。在一些單位裏，造反派開始整那些他們所定的「鄧小平還鄉團的營連長和團員」。

他們警告與他們有私怨的人，一旦他們掌握了權力，他們將會殺一批、關一批、清查一批、下放一批、並給一批人戴上「走資派」或「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125] 甚至一些已經遠離政治的前造反派積極分子也受到恐嚇，造反派警告他們說，除非他們再次投身到戰鬥中，否則造反派最終獲勝之後會將他們當成「投降分子」而嚴懲。[126]

造反派對不合作者的威脅確實嚇到了一些人，但是也使更多的人感到憤怒。6月中旬，保守派的力量再次集結起來，這次是打著「革命工人」的旗號。這個組織實際上是由1974–1975年的「工農兵」組織的同一批人構成。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革命工人」對省市政府的批評一點都不比造反派少。造反派批評這兩級政府一直不讓造反派掌握權力，而「革命工人」則譴責他們對造反派諂媚拍馬。「革命工人」的目的是防止政府對他們的造反派對手作出更多的讓步。為了顯示他們對城市生活的影響力和對省市政府施加壓力，「革命工人」在許多工廠進行消極怠工：尤其是在那些造反派已提出領導權要求的工廠。[127] 結果，武漢的生產在夏天又陷入停頓。[128]

「革命工人」的另一個目標是《長江日報》。他們批評這個報紙「完全是一份派性傳單」。這是實情。從4月中旬開始，武漢市委的官方喉舌《長江日報》就變成造反派發表他們觀點的重要工具。一些造反派要人，例如夏幫銀和朱鴻霞在報紙上發表了不少文章；還有更多的文章正在寫作過程中。但是保守派卻得不到這個特權。為了表示抗議，「革命工人」在6月26日衝進了報紙的辦公大樓，並且要求武漢市委立刻對其編輯部進行改組。早就失去對其喉舌控制能力的武漢市委當然沒有異議。相反，武漢市委還暗中希望這一事件能給激進的編輯施加足夠的壓力，限制一下他們的激進主義。後來，武漢市委做出了一個中立的姿態，並說，「工農兵評報是一個新事物」。

看起來還是造反派在政治鬥爭中技高一籌，他們發現可以利用這個事件來反擊政府及保守派的「革命工人」。6月27日清晨，夏幫銀通過電話向王洪文匯報了這個事件。他指責說，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內部的「一小撮走資派」策劃了這一事件。同時，造反派頭頭舉行了一個秘密會議，會議決定，《長江日報》應暫時停止發行，以使這件事引起北京的關注。儘管省市政府作出了干預，但從6月27日到30日，報紙還

是完全停刊。正像造反派所期望的那樣，北京干預了此事並偏袒了造反派。「革命工人」的五名積極分子被拘留了十五天。更重要的是，省市政府行政管理的信譽又遭到了破壞。這個事件使造反派有了很大的收穫。[129]

1976年7月和8月，武漢的造反派變得更加積極活躍和盛氣淩人。《長江日報》也不必在派性鬥爭中假裝中立了。7月22日，為了慶祝1967年武漢事件九周年，《長江日報》用了四分之一的版面重印了造反派於1967年寫作並流傳的「抗暴詩篇」。這種煽動性的「抗暴詩篇」再次激起了保守派群眾對《長江日報》和整個造反派的憤怒。不久，抗議該報紙派性傾向的大字報再次出現在全市。然而，《長江日報》卻對群眾的憤怒視若無睹。8月，它繼續刊載了更多的由胡厚民等造反派頭頭所寫的煽動性文章。[130]

同時，造反派繼續向省市政府施壓，要求給予他們更多的權力。7月，造反派頭頭兩次秘密會面，討論在市裏奪權的可能性。會上，最足智多謀的造反派戰略家胡厚民提出了一個初步計劃，這一計劃得到其它與會者的認可，而定為造反派的行動綱領。之後，造反派開始竭力實施這一綱領。7月和8月間，為了避免被武漢造反派所騷擾，湖北省委在湖北西北部兩個偏遠的縣裏舉行了兩次會議。會議原本計劃討論工業生產問題，但夏幫銀、董明會、朱鴻霞和其它造反派與會者不斷提出權力再分配問題。他們抗議說，出席會議的造反派人數太少。他們還進一步抱怨說，在所有權力機關任職的造反派遠遠少於他們應該達到的人數。造反派強烈要求湖北省委率先將更多的造反派提拔到領導崗位上，這樣就能為下面的各級老幹部樹立一個學習的榜樣。到1976年初秋時分，武漢的造反派似乎終於踏上了通向權力的坦途。[131]

然而，在國家動蕩不定的氛圍裏，毛澤東於1976年9月9日去世了，享年83歲。毛死後不到一個月，北京發生了一次政變，四人幫被逮捕。這個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橫行十年的激進幫派，終於走到了它們的末日。

消息很快傳到了武漢。一夜之間，大街小巷的牆上貼滿了成千上萬張聲討四人幫的大字報。人們長期被壓抑的感情、激動和不滿，像

憤怒的火山一樣迸發出來。在整個10月裏，武漢和全國其它地方一樣，充滿了歡樂的氣氛。許多人已經很多年沒有這樣高興過了。[132]

但是，有少數人因為四人幫的倒臺而感到灰心喪氣。直到10月8日，武漢的造反派雖然人數不多，卻還是如日中天。[133] 現在，隨著他們後臺老闆的倒臺，他們在武漢掌權的希望就徹底破滅了。儘管有些人計劃撤退到山裏打遊擊，但大多數人認為這種想法太不現實。胡厚民的建議是，要假裝支持新政權。在他看來，造反派在年齡上比當權的老幹部有優勢。「讓我們與那些老朽比一比，看誰會在二十年內取得最後的勝利」。[134]

然而，此時此刻，他們不得不準備好吃苦頭。11月初，朱鴻霞、夏幫銀、胡厚民和其它造反派頭頭被勒令參加一個學習班。[135] 從12月起，作為全國批判「四人幫在各省幫派體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成了群眾的批判對象。群眾批判持續了整整一年，其間舉行了無數聲討他們的公開批鬥大會。當地報紙發表了無數的文章，控訴他們在過去的十年間所犯下的「罪行」。1977年末，夏幫銀、朱鴻霞、胡厚民、張立國、董明會、李湘玉、吳焱金及其它一大批造反派頭頭被正式逮捕，並且被判處兩到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136]

1977年8月12日，毛澤東的接班人華國鋒擔任中國共產黨主席，他在黨的第十一屆代表大會上做的報告中宣佈，「『四人幫』的垮臺標誌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結束」。1978年11月2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推翻了關於1967年7月武漢事件的「不公正判決」。[137] 對於武漢的老幹部和前保守派來說，文化大革命終於落下了帷幕。[138] 但是，對那些已經因為他們在過去十年的行為而被判刑，要在鐵窗後面渡過多年的造反派來說，運動還遠遠沒有結束。

第十二章

超凡領袖的挫敗

文化大革命的失敗

毛澤東在1966年6月8日杭州會議時告訴與會者，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將持續大約三個月。那時，他並沒有預見到這個運動會拖上十年之久，並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事實上，到1966年7月末，情況已經很清楚，三個月的時間對運動而言根本不夠。毛澤東對那時運動的狀態非常不滿(見第三章)。因此，他認為再增加三個月是十分必要的，[1] 於是，通知在校的中學生和大學生暫時停課半年，這樣他們就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運動中去。直到10月初，周恩來仍然堅決主張，應按照毛澤東的原計劃，學校在來年2月重新開課。然而，10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毛澤東發現大多數黨的領導人仍然不理解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因此，他提出將運動再延長幾個月。不過，那時他的計劃仍然是到1967年2月是結束「運動的第一階段」。[2] 在1966年的最後兩個月裏，公共權力迅速瓦解，派別鬥爭趁勢興起。在這樣一種不穩定的形勢下，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大可能在未來兩個月內就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見第四、五章) 因此，毛澤東在1966年底得出結論：文化大革命運動可能需要再花上一年的時間，才能夠取得他所期望的決定性勝利。[3]

1967年2月初，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來訪者時説，決定性的戰役還沒有結束，但到了5月，哪一方會勝利就很清楚了。然而，在隨後的三個月裏，出現了兩個突發事件。首先，在計劃不周的一月奪權之

後，毛澤東試圖使用軍隊來穩定混亂局面，結果軍隊卻在各省鎮壓造反派。其次，當他試圖通過限制人民解放軍的權力來恢復文革的發展勢頭時，這一社會秩序的最後支柱卻開始坍塌。1967年夏，中國幾乎處於完全無政府的邊緣(見第六、七章)。

1967年秋，儘管為調整文革運動做了大量工作，其結果依然遠不能令人滿意。首先，另建一個新的權力結構要比毛澤東原本的預計要慢得多。10月，毛澤東將來年2月設為二十九個省市成立革委會的最後期限，但是到1967年底，只有十一個省成立了革委會(見第八章)。[4]緩慢的發展速度令毛感到失望，他不得不再次修正時間表。1968年，「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和《解放軍報》)元旦社論預計還需要1968年一整年的時間，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完全的勝利。1968年，更多的革委會成立了，但這並不是毛澤東支持奪權時設想的新政權形式。由軍人主導的革委會只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形式，而非進行革命變革的工具。1968年春，毛澤東試圖通過發動對「右傾思潮」的新一輪戰役，來促使新的權力機構重新激進化，結果導致派別之間發生更大範圍的武鬥，使社會秩序混亂不堪，生產陷入癱瘓。1968年夏，中國幾乎再次陷入全面內戰之中。目睹了自己激進計劃的災難性後果之後，毛澤東不得不做出調整。當他將整個中國置於軍隊的控制之下後，全國的形勢才終於開始穩定。(見第九章)

毛在1968年10月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向與會者保證，文化大革命將在1969年夏天勝利告終。但在1969年4月黨的九大召開的時候，毛又調整了計劃，聲稱要取得完全的勝利仍需一年的時間。然而到了1970年，他看到的卻是林彪、江青兩大集團之間激烈的奪權鬥爭，並最終導致1971年9月林彪的外逃墜機事件。那時，對毛而言情況已經很明顯，對他所發起的運動何時終止的問題，根本無從作出準確預測。1970年，他不再對文化大革命的終結日期做出任何估計。

在1969–1973年間，文革前的權力分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復。運動開始以來所改變的，僅僅是政治的形式和詞藻，而不是政治的本質和內容，當時還存在一股否定1966–1968年間發生的一切的傾向。(見第十章) 毛有理由懷疑在他死後，他的激進政策能否繼續下去。為了使文革免於失敗的命運，毛在1973年末再次掀起運動浪潮，

以期扭轉文革的頹勢。然而，所有這些努力在1974年春天混亂的局勢中草草收場，毛被迫接受了這樣一個方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1976年初，在臨終的病床上，毛還制定了繼續推進激進路線的全新行動方案。(見第十一章) 但是，他也越來越無法確定，文革最終會以勝利告終，還是會以失敗收場。在人生最後的時刻，他感嘆道：「我死後會發生什麼事，只有天知道。」[5] 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如何結束的問題，留給了他的繼任者。

參與者的理性行為

一個原本計劃持續三個月的運動卻持續了十年之久，這一事實強有力地證明，毛作為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其個人作用其實是很有限的。這一研究表明，對毛的權力最有效的限制是人民大眾的行為。儘管毛獨具超凡魅力，而且中國人民對他忠心耿耿，但是，參與到運動中的人絕不是他的盲目追隨者。恰恰相反，他們是理性的政治行為者。在前面的章節中，有大量的證據支持這一結論。

進入

在人們的習慣印象中，只要毛一發出號召，所有的中國人都會狂熱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去。但事實恰恰相反，中國的成年人對投入政治運動其實是極其謹慎的。政治上幼稚的學生率先採取了行動，因為一方面他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判斷他們行為的潛在危險性，另一方面，在當時濃重的革命氛圍當中，他們對自己將要獲得的好處寄予厚望，因此他們常常忽視了集體行動所要付出的潛在代價。然而，每當面對可能會遭到鎮壓或報復的情況時，成年人往往會站在一邊袖手旁觀。正因為如此，直到毛澤東及其激進的中央領導人已經使當地政府的社會管理功能基本癱瘓後，武漢才出現了真正的自發群眾性組織。此外，直到政治企業家幫助人們克服免費搭車的心理後，眾多對運動不太熱心的人才最終受到激勵而參與集體行動。(見第三、四章)。因此，中國人狂熱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不僅不是對毛盲目信仰的證明，相反，它是千百萬參加者仔細衡量風險和代價的結果。

對立團體的形成

自發群眾組織形成之時，造反派組織主要從那些對現政權心懷不滿的社會群體中招募成員，而保守派主要吸收那些從維持現狀中能得到很大利益的人，因此，二者的攻擊對象截然不同。造反派通常都不會去注意那些黨外的行政管理者和專家，他們的矛頭直指自己工作和生活地區及單位的黨的核心領導機構。而保守派則往往將矛頭指向專業幹部，尤其是那些階級背景和個人歷史可疑的人。如果他們批鬥的黨內幹部曾經是他們的領導，批鬥通常會以比較溫和禮貌的方式進行，這一分歧也是文革前社會衝突結構的直接後果。(見第二、五章)

即便是逍遙派也很有理由袖手旁觀。對那些階級出身極差的人來說，站到派別鬥爭的任何一邊都是極其冒險的事；而對那些中不溜秋的工人來說，參加那些看起來無原則的武鬥就更加無利可圖。

運動中不同派別參加者的這種分佈，表明他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不同的利益所在。

行為模式

由於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相對權力位置不同，因此，兩派的行為表現也就大相徑庭了。在大多數情況下，作為少數，造反派喜歡在他們的工作單位以外行動，遍佈全市範圍的組織使他們在單位內部同保守派的鬥爭中顯得比實際上要強大。相反，保守派則更願意同造反派在單位內部爭鬥，因為他們不僅在單位裏是主流，而且還擁有征服政敵的現成手段(例如，階級成分標籤)。理性的權衡能夠最好地解釋這種行為差異。

組織的團結程度

曼庫爾·奧爾森認為，人們只是在得到選擇性激勵時才參加集體行動，這一觀點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文革中不同的對立派別間，團結程度各不相同這一現象。

造反派組織總是比保守派組織更加團結，原因很簡單，在努力推翻當權派(二元性公害)的過程中，造反派力圖得到社會的認可，並躋

身於社會的更高階層當中。僅僅通過個人的努力去改變強加給他們的不良的政治標籤，希望就十分渺茫。同時對他們來說，不付出任何個人努力也不能改變自己的政治劣勢。由於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沒有什麼差別，可以說造反派都具有參加集體行動的選擇性激勵。

儘管相對來說保守派組織規模很大，但總是表現得相當遲鈍和軟弱，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一直在試圖捍衛一種公益——現存的權力分配模式。[6] 只要這種公益在起作用，那麼，不管他們是否為這項公益貢獻力量，每一個保守派都能從中受益。因此，保守派總是希望由別人去做貢獻，其結果就是其組織遠不如造反派組織士氣高昂。然而，每當造反派的挑戰成為嚴重威脅，足以打破權力結構平衡的時候，保守派的成員們總是能夠克服免費搭車的心理誘惑。造反派的挑戰帶來的壓力越大，保守派就變得越團結，因為現在要緊的不僅僅是現有權力結構的生存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這種結構中個人既得利益能否延續的問題。(見第六、七章)

因此，個人對集體行為價值的權衡，看來是組織團結程度的決定因素。

聯盟的凝聚力

雖然保守派成員不像造反派成員那樣喜歡參加集體行動，但保守派組織的聯盟總是比造反派組織的聯盟更有凝聚力。正如第六章至第九章已經表明的那樣，聯盟的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聯盟夥伴正在追求的目標。保守派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個更有凝聚力的聯盟，是因為他們的共同目標僅僅是維持現狀，他們並不擔心聯盟會變得太大，是因為即使勝利了，也沒什麼戰利品可以瓜分。因此，他們的利益訴求可以通過一個最大化的取勝聯盟來滿足。[7]

造反派的聯盟就不像保守派那麼容易產生了，因為除了摧毀現政權以外，造反派還希望能從文革當中獲得一些實實在在的個人利益，包括獲取物質性利益和更高的社會政治地位，也包括掌握權力。由於資源有限不允許他們進行利益均分，造反派要想獲得優勢地位，就不得不在分配任何有可能得到的戰利品時，進行相互爭奪。因此，他們雖然完全知道組建一個有效的取勝聯盟十分必要，但會刻意使聯盟的

規模最小化。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造反派組織總是彼此防範，將其它造反派組織視為潛在的競爭者，甚至在並肩對保守派作戰時也不例外。這一切都削弱了造反派聯盟的凝聚力。(見第六至九章)

策略

第三章至第十章所闡述的是，為實現預期目標，個人和組織的行動要有策略。在1967年1、2月以及1967年9月至1968年1月兩個關鍵時期裏，由各類造反組織所進行的政治博弈，是說明這一觀點的最好例證。在這兩個時期裏，武漢的中心問題是，如何在兩個主要造反派別之間分配未來權力機關中的席位。兩派都想主導未來的權力機構，因此，在政治博弈的每一步，他們都想表現得比對方高明。正如第六、第八和第九章所描述的那樣，兩派幾乎對每一次行動和反擊都進行了周密的計劃。如果我們假設那些參加者的行為是無目標、非理性的，就會無法理解那些政治博弈了。

由於在這兩個時期裏武漢兩派玩的正是囚徒困境遊戲，而理性行為者都會如此，所以兩派都選擇不合作作為主要策略(見第八、九章)。中央領導者千方百計地進行了多方努力，希望能使兩派修好。儘管兩派都自以為忠誠於毛主席，但他們還是令偉大舵手失望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人們理性的精打細算，使其對超凡魅力領袖的忠誠黯然失色。

武鬥

鑒於一個派別運用集體暴力無論是贏是輸，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所以人們通常用人類的非理性來解釋為什麼文革參與者有時會訴諸暴力。然而第七、第十章表明，只有在公共權力缺失或即使存在也微弱到不足以維持社會秩序的時候，武鬥才會出現。(例如，在1967年5月至7月以及1968年5月至6月就出現了這種情況) 這些情況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在政治參與者當中，不存在利益的自動調節。在正常情況下，有組織的暴力行為一般不會被當作策略來考慮，因為壟斷暴力的國家機器會懲罰那些未經授權而對他人使用暴力的組織和個人。然而，在無政府的狀態下，當法律與執法者缺位時，以武力解決衝突的

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換句話説，在社會衝突中，人們是否會訴諸暴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將選擇暴力策略的邊際收益與選擇其它策略的收穫進行精心的比較。因此，暴力行為應被理解成一種應受譴責、卻仍具理性特徵的行為方式。

退出

人們對其組織事業所做出的奉獻是隨著他們對進一步集體行動所帶來的預期利益的大小而不斷變化的。成功達到既定共同目標之後，這種奉獻會相應減弱。因為組織的要求大體上得到滿足之後，其餘的要求也就變得沒那麼重要了。結果，許多積極分子可能會褪去狂熱轉而退出，成為新的逍遙派。[8] 然而，對各級派別頭頭而言，還有一些選擇性的激勵：如果他們獲得勝利，其個人地位還有上升的可能，諸如個人事業進步 (例如在革委會中獲得領導位置)。 因此，繼續參與集體行動對他們是合算的 (見第八、九章)。

與此相反，遭遇失利也可能阻止人們積極參與政治運動。失敗之所以會降低集體行動的價值，是因為失敗令很多人覺得他們的目標是達不到的；即使能達到，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既然「抗議」(voice) 不能帶來預期的後果，許多人就會選擇「急流勇退」(exit)。然而，因為先前在集體的事業中投入太多，派別頭頭們從某種程度上説已被困在這種運動結構之中，成為其中的一部分，要他們從中脱離，不僅是不情願的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對自己曾盡力投入過的事業幻想破滅，這些派別的頭頭們仍常常發現，由於付出和回報是平衡的，讓他們很難做出終止參與運動的決定 (見第六、七、十、十一章)。[9]

無論如何，當進一步的合作和集體行動的邊際效用開始減少時，人們往往會選擇退出。這個結論可以用來解釋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激進主義的逐漸衰落。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在不斷起伏中進行的運動。激進主義的爆發期過後，隨之而來的總是相對平靜的保守期。由於勝利和失敗都會減弱進一步集體行動的意義，運動的起起落落往往會使積極的參與者越來越少。因此，對派別的頭頭們而言，如何在每次運動轉折關頭重新召集潰敗的前激進分子歸隊，則是一個周期性的挑戰。正如第六章至第

十一章所表明的那樣，這是一個難度很大的任務。這些政治冒險家們有可能讓一些前激進分子再萌鬥志，但大多數已選擇退出的人去意已定，再也無法重新凝聚他們的派性激進主義了。經歷了理想的幻滅後，這些人基本上對從集體行動中獲取回報的可能性嗤之以鼻。因此，很難讓他們相信，進一步參與行動是有利可圖的，其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人任憑運動怎麼發展都選擇退出。到文革漸入尾聲的時候，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的數目僅佔武漢人口的極小一部分了。

基層造反派和北京激進領導人之間的關係

與許多精英和大眾互相對抗的社會運動不同的是，文革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即在精英和大眾各自的內部都處於分裂狀態，而激進派和保守派的分歧則消弭了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界限。如果認為基層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是因為聽從中央召喚而投身於運動，就把複雜的運動過分簡單化了。以造反派為例，儘管造反的群眾高喊著由激進的中央領導人創造出來的口號，但他們的目標與中央激進領導有著本質的不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基本目標是使上層建築革命化、把中國人改造成「新人」，並清除他的政敵；而其他激進中央領導人的目的則是打敗對手以提高他們在黨中央領導層的權力地位。但大多數投身運動的造反派是為了情感發泄和提升自己的社會政治地位，他們都攻擊現政權，但原因卻各不相同。實際上，他們攻擊的是現政權的不同部分。在某種意義上，激進的中央領導和基層的造反派都在為權力的重新分配而戰，但即使從這個角度講，二者的目標也不同：前者專注於最高層的權力分配，而後者則沉迷於當地權力的再分配。中央的激進派領袖之所以關注各省的政治情況，很大程度上是想獲得來自基層的支持，以便給在中央領導層的對手施加壓力。對造反派來說，他們並不關心造成中央分歧的問題，這就是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和林彪極少激起他們熱情的緣由。

喬治・勒菲伯 (Georges Lefebvre) 在其對法國大革命著名的研究中，提出了「並行的革命」的概念。與此相同，我們也可以說文化大革命不是單一的運動，而是一系列平行的運動。中央和地方激進派的利益是平行的，也就是說方向一致但不會交叉。

現在看來，這一點應該很清楚了，即文化大革命的參加者是理性的政治行為者。正是由於他們在個人和集體行動中追求獨立的目標，才最終導致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敗。

然而，為了解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為什麼會屢屢受挫，還需要解開兩個小小的疑問。一、超凡魅力領袖的真正信徒怎麼可能會理性地採取行動呢？二、為什麼大多數當年文革參與者至今仍然堅持說，他們在文革時期是非理性的？[10] 前面的章節已經表明，文革期間武漢的毛澤東真正信徒的行為是理性的。以下的段落則試圖解釋，為什麼對毛的崇拜沒能影響毛的追隨者理性地採取行動。首先我要討論的是被馬克斯．韋伯所忽視的超凡魅力關係中的理性方面，然後再來探究為什麼理性行為者並不總是能夠理解自身的行為和動機。

超凡魅力和理性的真正信徒

超凡魅力關係應該從情感和認知兩個層面來檢視。毫無疑問，一個獨具魅力的領袖能夠使他的追隨者產生諸如忠誠、敬畏和崇敬的情感。按照這個界定，在超凡魅力關係中，由於對領袖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所以追隨者在不同程度上會喪失做出理性決定的能力。然而，超凡魅力關係絕不僅僅是情感投入那麼簡單。情感方面可能的確很重要，但永遠不能取代或超越認知方面。認知層面所涉及的是，追隨者們必須理解他們從領袖處獲得的信息，並用這種的理解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在這裏，領袖成為其追隨者觀察和理解的對象。韋伯式的超凡魅力概念可能過度強調情感層面，因而沒能對認知層面的重要性做出適當的評價，而這恰恰是這種魅力關係的基礎。

個人崇拜關係的兩個層面對追隨者的行為有著不同的影響：情感層面更多地影響領袖與其追隨者的關係，而認知層面更多地影響追隨者之間、以及追隨者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儘管追隨者們可能對共同的領袖有同樣的、情感上的依戀，但他們對各種事物的看法卻未必相同，行為表現也因此會千差萬別。關鍵的是，追隨者對領袖情感上的忠誠並不必然能幫助他們準確理解來自偶像的信息，所以，在領袖與其追隨者之間出現誤解幾乎是難以避免的。

在超凡魅力關係當中，追隨者總是想從領袖那裏找到與自身生活相關的信息。然而，信息不是一種孤立自在的客體，它不可能對每一位信息接受者顯露相同的面目。實際上，毋寧說信息是一種事件，發生在信息接受者身上，同時也將信息接收者捲入其中的事件。換言之，信息是需要解釋的。

解釋在超凡魅力關係中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在普通的面對面互動中，關係雙方可以互相提問，以確定自己的理解是否偏離了對方的本意。與此不同，一個魅力型領袖有千千萬萬個追隨者，他不可能與每一位追隨者近距離接觸。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在運動開始的頭半年裏，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1,100多萬紅衛兵，但其後他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也從未發表公開講話。他與紅衛兵個人面對面的談話也僅有一次，那是在1968年夏，也就是他做出遣散紅衛兵組織決定之後，與北京所謂「五大領袖」的會面。[11] 毛澤東與其追隨者之間的遙遠距離，使他的追隨者不可能要求他清楚闡明自己每句話的微言大義，他也沒有為此做過任何努力。詹姆斯．戴維斯 (James Davies) 曾經說過「距離產生美」，誠哉斯言，因為實際上「至交眼中無完人」。[12]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超凡領袖與追隨者之間距離使解釋變得極其必要。

既然在超凡魅力關係中，追隨者面對的所有抉擇皆有賴於對領袖指示的解釋，所以有些行為方案 (如明顯與領袖指示相抵觸的行為) 必須被排除在外。顯然，如果人們不被領袖魅力所迷惑，追求其自身利益來也許更加有效。在這個意義上，超凡魅力關係中的追隨者的確有點非理性。此外，在超凡魅力關係中，還要一層限制，即在解釋領袖的信息時，追隨者對信息內容的引申程度也會有個限度，不可能無限引申。然而基於兩個原因，超凡領袖所發出的信息含義通常是模棱兩可的。其一，信息的正確性可以由事實來證明或證偽。顯然，一個信息越清晰具體，就越容易被推翻。因此，超凡領袖們往往會故意發出意義含糊的信息。其二，追隨者形形色色，使超凡領袖很難發出對所有人都密切相關的信息。因此，高高在上的超凡領袖所發出的信息必定帶有某種程度的模糊性。這樣，儘管存在前邊提到的限制，魅力型領袖發出的模糊信息還是為解釋提供了很大的空間，這就使追隨者可以在很大範圍內做出理性的選擇。

例如，在文革期間，毛澤東所謂的「最高指示」往往非常零碎，並且模棱兩可。例如，毛澤東將運動界定為「階級鬥爭」，但他沒有界定「階級」的概念。[13] 同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官方確定的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對象，但從來沒有人對這個概念給出一個清晰的定義。兩個關鍵概念的意義如此含糊不清造成這樣一種局面，即一種解釋可能與另一種解釋意義絕然相反，在運動過程中造成極大的混亂。

解釋並不完全是被動的行為；恰恰相反，它往往是一個建設性的行為。當人們對領袖的指示作出解釋時，他們所做的實際上不是發現信息所蘊藏的真實含義，而是按照自我理解來重新構建「指示」的意義。[14] 追隨者們的自身經歷和其它各種特質 (包括能力) 都會影響意義的重建。既然如此，我們可以預期，追隨者們會找到一些對所獲信息的解讀方法，使之與追求自身利益不僅不矛盾，反倒成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正當理由。因此，超凡領袖和追隨者之間的關係，就不僅僅是追隨者被動接受領袖信息的單向過程；相反，這是一種動態關係，其中追隨者總是使用對他們而言最有利的方式來解釋收到的信息，並以此與領袖進行積極的雙向互動。

當追隨者以一貫的方式來解釋領袖的信息時，他就創造了領袖的某種形象 (image)。在與超凡領袖互動的過程中，人們往往把自己創造出來的領袖形象與領袖本人混為一談。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應該把客體的形象等同於這個客體本身。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當追隨者自認為他們正在追隨一位領袖時，他們實際上追隨的可能是這位領袖的形象。這個形象正是追隨者自己的作品，而且在作品中寄予了他們自己的希望。

魅力型領袖的形象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產品，因為人們關於領袖的形象是在一定的環境裏形成的。人們是作為特定社會群體的成員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中的，因此，如果一個魅力型領袖擁有來自不同社會群體的追隨者，那麼每個群體都可能有一個相對一致的領袖形象，並且不同的社會群體可能有不同的領袖形象。

在文化大革命中，當來自於不同社會群體的人們變成了毛澤東的信徒時，他們之間彼此衝突的利益和願望並沒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在潛意識中，他們將自己的願望融入各自塑造的毛的形象中。換言

之，一個追隨者自願遵循毛澤東的指示，這不僅僅是對毛盲目崇拜的結果；也是他對毛的指示理解的產物。他認為毛澤東的指示將提供解決其個人問題的方法。當然，追隨者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

領袖形象的追隨者總是會構想出一種情景，在這種情景中，他所塑造的形象會讓他去做他本來就想做的事。正如前面的章節中所展現的那樣，在文革中，一些中國人將毛澤東視為國家政權的象徵，但被另一些人視為攻擊國家政權的、造反派的最高統帥。在很大程度上，一個人在文革前社會中的地位決定了他在運動中會選擇毛澤東的哪一種形象。相互衝突形象的同時存在表明，毛澤東的追隨者們最終在他們的偶像身上找到了他們自己注入這個形象那些東西。他們追隨毛，因為他們相信毛在代言他們的憤怒、希望，以及他們對社會的構想。說得更明白些，他們認為自己正在追隨毛本人，但實際上他們追隨的是自己心目中的毛的形象，否則，很難想像社會背景不同、並加入了相互對立派別的人們會擁護同一個毛澤東。他們所擁護的只能是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毛的形象。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的參加者不是毛澤東的真正信徒，而是他們自己心目中毛的形象的真正信徒。儘管他們都聽從毛澤東的教導，呼喊相同的流行口號，但實際上他們表達的是不同的、甚至有時是對立的情緒。這樣的行為可以被稱為意識層面的非理性和下意識的理性，也就是說，在意識層面上，參與者對毛有著盲目的信仰；但在潛意識層面上，他們正在追求自我利益。這樣一來，毛的真正信徒就可以在派別衝突中非常理性地行動了。

形象一經建立，就獨立於領袖本人了，也具有自己的生命了。所以，一群追隨者有可能會發現，他們敬愛領袖發出的某些信息與他們心目中的領袖形象背道而馳，這種偶爾出現的矛盾可能會使他們感到迷惑和不安。然而，如果這種分歧持續存在，可能會導致追隨者們質疑他們心目中的領袖，其結果就會削弱他們對領袖本人的支持，並使他們表現出來的熱情越來越像一種表演。文革期間，武漢的保守派在四個時期裏感到非常困惑，即1966年和1967年相交的那個冬季、1967年七．二〇事件之後、1974年春，以及1976年的前三個季度，因為他們無法理解，作為「勞動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什麼會支持「牛鬼蛇

神」。而造反派則在三個不同的時期不知所措，即1967年的「二月逆流」、從1968年下半年到1973年，以及1975年，因為毛主席這位「造反派的紅司令」的立場似乎站到了現政權一邊。在這些時段裏，毛的一些追隨者發現，當時的官方路線與他們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理解背道而馳。官方路線的左右搖擺逐漸削弱了毛澤東的權威，使他的領袖魅力在文革後期的幾年裏慢慢失去了神聖性。

如果上述關於個人崇拜關係的分析是合理的，我們或許應該將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參加者稱為「理性的真正信徒」，原因是他們確實將毛澤東視為「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天生奇人，或者至少是天賦稟異的人」，[15] 他們願意全身心投入到毛的事業中，而不管這個事業是什麼樣的事業。至少在運動早期，他們處於這種狀態之中。說他們「理性」，則是因為在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中，他們都對自己想要達到的目標孜孜以求。他們接過毛澤東宣導的口號，但改變了這些口號的內容，使之比毛口號的原意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正是參加者行為中的理性因素，常常使毛澤東感到縱虎容易控虎難，不能做到收放自如。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毛原本希望利用群眾對他的個人崇拜，可以有效地操縱運動。但即使有他的領袖魅力存在，毛澤東和他自己設定的目標之間永遠橫亙著人們對自身利益的狂熱追逐。顯然，毛誤讀了群眾表現出來的熱情。

如果文化大革命的參加者果真是「理性的真正信徒」，而不僅僅是最高領袖的被動工具，那麼韋伯關於領袖魅力的概念一定在什麼地方出了錯。以上對超凡魅力關係的詳細檢視表明，韋伯的魅力理論有其致命的缺陷，他忽視了魅力型領袖及其信徒之間的認知層面。

理性的行為者和合理化

剩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大多數文革的參加者仍然堅持說，他們是受到毛澤東的愚弄才參加運動的？他們到底是為毛澤東而戰，還是為他們自己而戰？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那些文革的參與者不願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今天，中國人有一個共識，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每一個文

革參與者，不管是幹部、保守派、造反派，還是逍遙派，都聲稱自己是這場持久運動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沒有贏家的遊戲，這是事實。人們都覺得自己是犧牲品，因為在十年文革中，他們都在不斷「翻燒餅」的過程中有這樣那樣的遭遇。然而，大多數受到過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在某個時期不公正地對待過別人，這也是事實。對他們來說，將罪名推給他們的上級，並最終推給毛，實在是件很方便的事。

然而，這個解釋仍不能令人信服的，因為多數堅持說自己被愚弄的人真誠地相信自己的判斷。為什麼理性的行為者堅持聲稱自己是不理性的呢？

這是因為參加者未必瞭解促成自己行為的全部要素。在文革那種特定的環境下，人們必須將自己的行為與流行的意識形態口號掛鈎，並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披上高尚的外衣。社會衝突各方用具有正當性的理想和價值來包裝自己的目標、計劃和行動，這在當時是很常見的現象。[16] 當他們的願望與社會可接受的規範發生強烈衝突時，這樣做就顯得尤為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通過某種形式的合理化，他們才能將那些低俗的願望加以粉飾，使之看起來是合理的，甚至是高尚的。[17] 在傳統的中國，公眾利益一直佔據絕對優先地位；個人利益和小團體利益只有穿上公眾利益的外衣才不會遭遇被棄之如敝屣的下場。文化大革命強化了中國的公眾利益概念。個人利益和小團體利益被批判為資產階級思想，大公無私得到提倡並被當成普世的價值觀。「鬥私批修」的口號典型地反映了當時的輿論環境。當然，即使在那個年代裏，個人和小團體利益並未消失。人們只是將他們的目標略作包裝，然後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繼續追逐之。毛澤東語義的曖昧，使文革參與者得以在利他主義的旗幟下追求他們的自身利益。[18] 正如前面章節所示，運動的參加者正是用這種方式追求他們的個人和小團體利益。但在潛意識中，他們卻往往將自己的真實動機與對這些動機的合理化混淆在一起，使得他們最終確信自己是在無私地為偉大領袖而戰。

然而，參加者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真實動機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這種動機。即使他們認為自己是真誠的，但他們仍可能沒有意識到真相或者歪曲了真相，因為在他們意識層面發生的事並不是真相的全部。

在這裏，理性存在於潛意識層面，而很少存在於意識層面。參加者可能否認對他們行為和動機的解釋，他們甚至可能認為自己遭到誣衊。有這種反應十分正常，正如拉薩爾·哈丁 (Russell Hardin) 曾正確地指出的那樣，「很可能每一種值得思考的理論都違反了參與者對自己行為和動機的理解」。[19] 對於那些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自己行為的人來說，拒絕理解或者不能夠理解這裏所提供的關於他們行為的理性解釋，是毫不令人驚奇的。不管文革參與者是否意識到了自己真實的動機，他們都是理性的戰士，而不是被人愚弄的炮灰或機器人。從1966–1976年的整整十年中，他們一直在互相爭奪有限的政治資源和影響力，正是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追逐干擾了毛澤東對運動的部署，因而最終導致這位偉大舵手的最後社會變革試驗功敗垂成。

附錄

受訪者情況

(性別、出生年份、家庭階級成分、政治面貌、職業和級別、教育程度、月工資、文化大革命中參加的政治派別*)

1. 男，1930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國營工廠幹部(22級)，小學教育，51.26元，「保守派」。
2. 男，1923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國營工廠幹部(17級)，小學教育，92元，「保守派」。
3. 女，1932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國營工廠工人，初中教育，37.44元，「保守派」。
4. 男，1937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政府機關幹部(27級)，高中教育，28元，「保守派」。
5. 男，1939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青年團員，政府機關幹部(24級)，高中教育，41元，「造反派」。
6. 男，1926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黨員，政府機關幹部(20級)，初中教育，66.5元，「造反派」。
7. 女，1938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國營工廠工人，初中教育，46元，「保守派」。

---

* 國家職工在1964–1971年間工資水準沒有變化；這裏提供的數字反映了這一期間的收入水準。

8. 男，1940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國營工廠技術員，大學教育，53元，「造反派」。
9. 男，1936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大學的幹部(20級)，大學教育，66.5元，「保守派」。
10. 男，1944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中學教師，大專教育，36元，「保守派」。
11. 男，1942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中學教師，大學教育，51元，「保守派」。
12. 男，1944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國營工廠工人，小學教育，43.81元，「造反派」。
13. 男，1946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青年團員，民辦學校教師，高中教育，36元，「造反派」。
14. 男，1946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民辦中學教師，高中教育，36元，「造反派」。
15. 男，1943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青年團員，中學教師，大學教育，51元，「造反派」。
16. 男，1928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郵政局幹部(17級)，高中教育，96元，「保守派」。
17. 男，1922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國營工廠幹部(16級)，小學教育，110元，「保守派」。
18. 男，1948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專科學校學生，17元，「保守派」。
19. 男，1923年出生，階級成分「好」，國營工廠工人，初中教育，64.6元，「造反派」。
20. 男，1935年出生，階級成分「好」，國營工廠技術幹部(24級)，初中教育，41元，「造反派」。
21. 男，1928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黨員，政府機關幹部(19級)，高中教育，74元，「保守派」。
22. 女，1931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中學教師，高中教育，59元，「保守派」。

23. 男，1949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集體工廠工人，初中教育，27元，「造反派」。
24. 男，1942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國營工廠工人，初中教育，38.4元，「造反派」。
25. 女，1942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國營工廠工人，初中教育，32.5元，「保守派」。
26. 男，1935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黨員，醫院幹部(23級)，初中教育，47元，「保守派」。
27. 男，1936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黨員，政府機關幹部(21級)，初中教育，59元，「造反派」。
28. 男，1924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國營工廠幹部(17級)，小學教育，92.6元，「保守派」。
29. 男，1939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青年團員，中學教師，大學教育，59元，「造反派」。
30. 女，1943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青年團員，中學教師，大學教育，51元，「造反派」。
31. 男，1927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黨員，政府機關幹部(16級)，高中教育，104.5元，「保守派」。
32. 男，1926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國營劇團藝術家，高中教育，79.5元，「造反派」。
33. 男，1928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專科學校幹部(17級)，小學教育，93.5元，「保守派」。
34. 女，1932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專科學校幹部(24級)，小學教育，41元，「保守派」。
35. 男，1942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郵局工人，初中教育，46元，「造反派」。
36. 男，1948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青年團員，高中學生，「保守派」。
37. 男，1948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高中學生，「保守派」。
38. 男，1951年出生，階級成分「好」，初中學生，「保守派」。

39. 男，1936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科學研究機構的技術人員，大學教育，59元，「造反派」。
40. 女，1940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青年團員，科學研究機構的技術人員，大學教育，51元，「造反派」。
41. 男，1934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國營工廠工人，初中教育，45.3元，「保守派」。
42. 男，1931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政府機關幹部（19級），初中教育，74元，「保守派」。
43. 男，1950年出生，階級成分「好」，專科學校學生，「造反派」。
44. 男，1947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青年團員，大學學生，「造反派」。
45. 男，1936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政府機關幹部（21級），初中教育，59元，「保守派」。
46. 女，1950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高中學生，「造反派」。
47. 男，1947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專科學校學生，「造反派」。
48. 男，1948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專科學校學生，「造反派」。
49. 男，1949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高中學生，「造反派」。
50. 男，1943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大學學生，「造反派」。
51. 男，1947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高中學生，「造反派」。
52. 男，1938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國營工廠工人，初中教育，45.3元，「保守派」。
53. 男，1946年出生，階級成分「好」，大學學生，「造反派」。
54. 男，1934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大學教師，大學教育，59元，「造反派」。
55. 男，1919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黨員，政府機關幹部（10級），高中教育，199元，「造反派同情者」。
56. 男，1947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高中學生，「保守派」。

57. 男，1949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高中學生，「造反派」。
58. 男，1950年出生，階級成分「好」，武漢郊區的初中學生，沒有參加派別組織。
59. 男，1947年出生，階級成分「好」，國營工廠工人，小學教育，32.5元，「造反派」。
60. 男，1940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業餘學校教師，高中教育，45.5元，「造反派」。
61. 男，1948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高中學生，「造反派」。
62. 男，1949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青年團員，高中學生，「造反派同情者」。
63. 男，1946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青年團員，高中學生，「造反派」。
64. 女，1947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青年團員，高中學生，「造反派」。
65. 男，1930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醫院幹部（19級），初中教育，74元，「保守派」。
66. 男，1934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醫院幹部（22級），初中教育，53元，「保守派」。
67. 男，1942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青年團員，中專教師，大學教育，51元，「造反派」。
68. 男，1940年出生，階級成分「好」，民辦中學教師，高中教育，36元，「造反派」。
69. 男，1948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高中學生，「造反派」。
70. 男，1930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集體工廠幹部（21級），未受過正規教育，59元，「保守派」。
71. 女，1945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大學學生，「造反派」。
72. 男，1933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集體工廠幹部（22級），小學教育，53元，「保守派」。
73. 男，1933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國營工廠工人，未受過正規教育，53.5元，「保守派」。

74. 男，1936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政府機關幹部(18級)，初中教育，83元，「造反派」。
75. 女，1938年出生，階級成分「好」，工廠醫務室護士，初中教育，32.5元，「造反派」。
76. 女，1948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高中學生，「造反派」。
77. 男，1943年出生，階級成分「好」，大學學生，「造反派」。
78. 男，1942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青年團員，大學學生，「造反派」。
79. 男，1949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高中學生，「保守派」。
80. 女，1930年出生，階級成分「中等」，黨員，政府機關工人，小學教育，53元，「保守派」。
81. 男，1927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政府機關幹部(17級)，小學教育，92.6元，「保守派」。
82. 女，1932年出生，階級成分「不好」，黨員，政府機關幹部(21級)，初中教育，59元，「保守派」。
83. 男，1928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政府機關幹部(13級)，小學教育，145.5元，「保守派」。
84. 女，1931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黨員，國營工廠幹部(23級)，小學教育，47元，「保守派」。
85. 男，1944年出生，階級成分「好」，青年團員，大學學生，「造反派」。

注 釋

第一章

1.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and 1983), vols. 1 and 2; Paul L. Hiniker, *Revolutionary Ideology and Chinese Real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7); K. S. Karol, *The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4); Lowell Dittmer,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Jean Daubi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William Hinton, *Turning Point in China: 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hina! 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2); Stanley Karnow, *Mao and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1972); Edward E. Rice, *Mao'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Byung-joon Ahn,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Dynamics of Policy Proces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
2. 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3.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359. 另見 Ann Ruth Willner, *Charismatic Political Leadership: A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4–6；以及 James V. Downton, Jun., *Rebel Leadership: Commitment and Charisma in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3), pp. 209–210.
4. 早期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中國普通大眾的激情、活動和經歷。這種情況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那個時期學者們很難訪問中國。他們不得不集中精力研究公開出版物。

5. 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Jonathan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及 Marc J. Blecher and Gordon White, *Micro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Technical Unit during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te Plains, NY: M. E. Sharpe, 1979);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David M. Raddock, *Politic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Kwangchow*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及 Gordon White, *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Class Origin: The C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1976).
6.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除了Forster的書以外，還有Sherry Gray, *Bombard the Headquarters: Local Politics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1989 Movement in Shenyang*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enver, 1992); Lynn T. White, III,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及Constance Squires Meaney,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Berkeley: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8).
7. Mancur Olson, Ju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8. Russell Hardin, "Theory on the Prowl," unpublished paper, 1992.
9. 事實上，這些著作都沒有參考Olson的書。
10. 對這個問題的早期研究來自Deborah Davis 所著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一文，參見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No. 42 (1971).
11. 陳佩華 (Anita Chan) 認為，文化大革命結束於1969年召開的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因為各派之間的戰爭已經結束。見她的"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 No. 1 (1992)。我不同意陳的觀點，因為派仗並沒有於1969年結束。正如我將在本書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說明的那樣，在中共九大會議期間武漢就重開派仗，在1973年至1976年又多次打過派仗。實際上，繼續打派仗並不是武漢獨有的現象。在1970年代初期，河南、山西、河北和浙江等許多省份的派性又開始復發。關於浙江的案例，參見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12. Anne F. Thurston,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87), pp. 284–285.
13. Ann Ruth Willner, *Charismatic Political Leadership: A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4–6；以及Downton, *Rebel Leadership*, pp. 209–210.
14. Thomas C. Schelling,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New York: Norton, 1978).
15. Michael Taylor, "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Action," in Michael Taylor (ed.), *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3–97.
16. Karl-Dieter Opp, *The Rationality of Political Protes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pp. 19–20.
17. Herbert Simon, "From Substantive to Procedural Rationality," in Frank Hahn and Martin Hollis (eds.), *Philosophy and Economic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8. Neil J. Smelser, "The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A Theoretical Assessment,"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 4, No. 4 (1992), p. 399.
19. Russell Hardin, "The Normative Core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unpublished paper, 1992.
20. Hardin, "Theory on the Prowl," pp. 16–20.
21. Kristen Renwick Monroe, "The Theory of Rational Action: Its Origins and Usefulness for Political Science," in Kristen Renwick Monroe (ed.),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Politics: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of the Theory of Rational Ac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pp. 14–15.
22. Steven J. Brams, "The Study of Rational Politics," in Bernard Susser (ed.),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92), p. 315.
23. Daniel Little, "Rational-Choice Models and Asian Stud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0, No. 1 (1991).
24. Stanley I. Benn, "Rationalit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S. I. Benn and G. W. Mortimore (eds.), *Rationalit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Contributions to 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6), p. 247.
25. Jon Elster指出，準則與結果沒有關聯，通常表述簡單，受到社會公認並以

制裁措施為後盾。參見其著 *The Cement of Society: A Study of Soci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6. Albert O. Hirschman, "Against Parsimony: Three Easy Ways of Complicating Some Categories of Economic Discourse,"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1 (1985), pp. 7–21.
27. Tibor Scitovsky, *The Joyless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8. 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01–124；及 Hardin, "Acting Together, Contributing Together,"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 3, No. 3 (1991), pp. 365–380.
29. 趙鼎新 (Dennis Chong),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75–76.
30. Smelser, "The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pp. 381–410.
31. Jon Elster, *Sour Grapes: Stud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32. Elster, *The Cement of Society*, pp. 35–36.
33. George Tsebelis, *Nested Games: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92–96.
34. Chong,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 11.
35. Sidney Tarrow, "National Politics and Collective Action: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8*, pp. 429–430；及Tarrow, *Struggling to Reform: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cy Change during Cycles of Protest*, Western Societies Program Occasional Paper No. 15,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983), pp. 3, 28.
36.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an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6); 及Crane Brinton,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37.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pp. 50–51.
38. 前揭書，頁121。
39. 前揭書，頁67。
40. Chong,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 148.
41. 前揭書，頁132。
42.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pp. 31–35.
43.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p. 43–65.

44. Taylor, "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Action," p. 84.
45. Chong,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 129.
46. Michael Taylor,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5.
47. Michael Taylor, *Community, Anarchy and Lib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0.
48. Samuel L. Popkin, "Political Entrepreneurs and Peasant Movements in Vietnam," in Taylor, *Rationality*, pp. 20–21.
49.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pp. 35–37.
50. Taylor, *Community, Anarchy and Liberty*, pp. 12–13; Taylor, *The Possibiltiy of Cooperation*, pp. 17–18；及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pp. 101–124.
51. Elster, *The Cement of Society*, p. 37.
52. Chong,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 197.
53. Gustav Le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New York: Viking, 1960 [1909]).
54.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7).
55. Gudmund Hernes, "We Are Smarter Than We Think,"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 4, No. 4 (1992), pp. 421–436.
56. Elster, *The Cement of Society*, p. 250.
57. Smelser, "The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p. 387.
58. Brian Barry, *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 16.
59. Debra Friedman and Michael Hechter, "The Contribution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o Macrosociologic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Theory*, 8 (1988), p. 202.
60. James B. Rule,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Limits of Theoretical Generalit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 4, No. 4 (1992), pp. 451–469.
61. Hardin, "Theory on the Prowl," pp. 21–22.
62. 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 xx–xxi.
63.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pp. 229–230.
64. Clifford Geertz, "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 in Chandra Mukerji and Michael Schudson (eds.), *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Stu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239–277.
65. Richard J. Ellis, "Explaining the Occurrence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3, No. 3 (1991), pp. 305–319.

第二章

1. 居住在四個城郊區的人口沒有包括進來。武漢統計局編：《武漢四十年：1949–1989》(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249。
2.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1957).
3. 《中國工人》，1957年第17期，頁4。
4. 勞動部：《關於1963年工資工作安排》，1963年7月21日。
5. Richard Lowenthal, "Development v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3–117.
6.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地方黨史》，頁3。
7. 前揭書，頁13。
8. 《長江日報》，1957年11月22日。
9. 《人民教育》，1957年第10期，頁14–21。
10. 《新華月刊》，1955年第7期，頁175；及《人民教育》，1958年第5期，頁3–4。
11. Constance Squires Meaney,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8), pp. 9–16.
12. 《新華月刊》，1950年第6期，頁1350。
13. 《中共武漢地方黨史》，頁3、80–89。
14. 中央工商管理局：《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大事記》，1957年出版，頁88。
15. 《長江日報》，1957年11月16日。
16. 武漢教育局：《普通中學綜合報表1965–1966》，《全日制小學綜合報表1965–1966》和《全日制技工職業學校綜合報表1965–1966》。
17. 中央黨校：《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卷8，頁204–231。
18. 前揭書，頁639。
19. 《黨史通訊》，1983年第18期。
20. Frank Parkin, "Strategies of Social Closure in Class Formation," in Frank Parkin (ed.), *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London: Tavistock, 1974)；及*The Marxist Theory of Class: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Tavistock, 1979).
21. Parkin, *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p. 3.
22. Richard 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39.
23. 《湖北日報》，1957年6月3日；及《上海工商》，1958年第1期，頁6。
24. 《長江日報》，1957年10月9日。

25. 同上，1957年8月27日。
26. 《湖北日報》，1957年6月4日。
27. 《中共武漢地方黨史》，頁106–108。
28. 在肅反運動期間，有130萬人被認為有「歷史問題」，有81,000人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湖北日報》，1957年7月19日。
29. 在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有約80萬人被定為資本家。《黨史研究》，1981年第3期，頁6。
30. 在1957和1958年間，總共有552,877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一半是知識分子，有24,500人是資本家。參見郝夢筆和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卷2，頁491。雖然反右運動沒有涉及工廠，但並沒有放過工人。許多工人被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或「壞分子」。見《人民日報》社論：〈對壞分子必須實行專政〉，1957年8月19日。
31. 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1956年3月11日。
32. 《新華月刊》，1956年第21期，頁112。
33. 中共武漢市委：1956年《支部生活》第23期。
34. 《湖北日報》，1957年6月3–8日。
35. 鄧小平在其整風報告中總結說：「右派分子一般是剝削階級出身的。」中央黨校：《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冊8，頁640。在武漢的一個科學研究機構，超過80%的右派家庭出身不好。見《長江日報》，1957年12月2日。
36. 《新華月刊》，1958年第2期，頁41–42。
37. Frank Parkin,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Praeger, 1975).
38. Mao Zedong, *Selected Works*, 4 vol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6), p. 112.
39. 《新華月刊》，1956年第8期。
40. 《中國青年報》，1963年5月25日。
41. 《支部生活》，1958年第22期。
42. 《工人日報》，1962年9月15日。
43. 《人民日報》，1956年5月15日。
44. 同上。
45. 《工人日報》，1962年3月23日及1964年7月1日、8月6日、9月23日和10月14日。
46. 《工人日報》，1964年3月1日–4月12日和11月14日；及《中國青年報》，1964年9月11日。
47. 《工人日報》，1964年6月20日和10月14日；及1965年1月9日和4月14日。
48. 《人民日報》，1956年5月15日。

49. David Lane, *Soviet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62.
50. 《人民日報》，1955年12月19日；及《中國工人》，1956年第18期，頁3–4。
51. 《長江日報》，1957年10月9日；及《中國工人》，1957年第15期。
52. 《長江日報》社論：〈保護積極分子〉，1957年8月5日；及〈彙報制度及其作用〉，《中國工人》，1957年第15期，頁7。
53. 《工人日報》，1964年7月5日。
54. 《人民日報》社論：〈企業中的黨組織必須接近群眾〉，1955年12月19日；〈正確地對待落後工人〉，1956年5月15日；及〈充分發揮青年的社會主義積極性〉，1965年5月4日。《工人日報》社論：〈以滿腔的熱忱幫助落後的階級兄弟〉，1964年2月8日；〈幫助落後的重大意義〉，1964年6月26日；〈正確對待後進〉，1964年7月3日；〈正確的觀點〉，1964年7月24日；〈幫助同志沒有見效，怎麼辦？〉，1964年8月12日；〈怎樣對待思想落後的朋友〉，1965年4月9日；及〈幫助落後是先進職工義不容辭的責任〉，1965年11月20日。《中國青年報》社論：〈如何對待少數與落後〉，1962年4月19日；及〈用活眼光看人〉，1965年7月3日。
55. 《文匯報》，1957年5月20日；及《工人日報》，1962年5月26日和1965年2月26日、3月11日和4月22日。
56. 《工人日報》，1963年11月16日；及《中國青年報》，1964年9月11日。
57. 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 63.
58. William L. Parish,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ames L. Wats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9, 99。
59. 曹志：《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制度概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267。
60. 國務院：《關於降低國家機關10級以上幹部的工資標準的決定》，195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關於降低國家機關3級以上黨員幹部工資標準的決定》，1959年2月7日；國家計委和勞動部：《關於當前勞動力安排和職工工資問題的報告》，1960年9月26日；及勞動部：《關於1963年工資工作安排》，1963年7月21日。
61.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中國資料研究中心), *Red Guard Publications: Supplement I* (《紅衛兵出版物：補遺1》), 20 vols. (Washington, DC, 1980), Vol. 4, p. 334.
62. 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p. 149.
63. 《政治扒手——王任重》，1967年10月。
64. 《打倒宋侃夫》，冊1，1967年10月。

65.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355–356。
66. 我的所有受訪者都承認，在他們的單位裏，收入不平等現象並不嚴重。
67. 王任重和他的妻子兩人的工資收入，每月合計為507.3元，有7位家庭成員。宋侃夫也有7位家庭成員，但他和妻子兩人的收入只有420.50元。見《政治扒手——王任重》；《打倒宋侃夫》，冊1。
68. 相比較而言，在20世紀60年代非常富裕的美國，收入最高者與平均收入者之間的差距比率為7000：1。見David Lane, *End of Social Inequality*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1), p. 59.
69. 第2、9、16、17、31、65和67位受訪者。
70. 李仲英：〈社會主義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黨史研究》，1981年第3期。
71. 同上。
72. 1956年，劉少奇視察武漢第四紡織廠。這個工廠以前的所有者一年得到的利息是10,000元，每月的薪水為130元。但他對此並不滿意，因為這個廠的黨員書記由於是位老革命幹部，每月工資為160元，比他還多一些。此後不久，他的薪水也增加到160元。湖北廣播電臺，1967年9月21日。
73. 《紅衛兵出版物：補遺1》，卷4，頁1865。
74. 《長江日報》，1958年6月9日。
75. 《劉輝龍三反言行》，1968年3月11日。
76. Feng Jicai (馮驥才),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p. 160.
77. 《紅衛兵出版物：補遺1》，卷4，頁1882。
78. 湖北勞動局：《工資標準選編》(武漢：1973年)，頁1–60。
79. 《紅衛兵出版物：補遺1》，卷1，頁36；卷4，頁1871。
80. 《打倒陳伯達》，1968年2月。
81.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毒草選編》，冊1 (1967年12月)，頁70。
82. 《堅決把劉少奇揪回北京建工學院鬥倒鬥臭》，1967年5月20日。
83. 《勞動》，1964年第10期 (1964)，頁14–15。
84. Christopher Howe, *Wage Patterns and Wage Policy in Modern China, 1919–1972*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85. 第8位受訪者。
86. Lane, *Soviet Economy and Society*, p. 193.
87. 儘管在20世紀50年代初作了巨大努力來消滅文盲，但到1956年仍有78%的人口處於文盲狀態。見《新華月刊》，1956年第14期，頁11–19。
88. 《文教參考資料》，1951年第10期，頁343。
89. 《人民教育》，1957年第8期，頁13；該刊1957年第10期，頁14–15；及《新華月刊》，1958年第1期，頁139。

90. 《新華月刊》，1957年第21期；及《長江日報》，1958年1月6日。
91. 《新華月刊》，1958年第1期；及《人民日報》，1958年7月3日。
92. 《新華月刊》，1959年第20期。
93. 武漢教育局檔案。
94. 《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現存三種不同版本中的)第2種版本，頁270–277。
95. 教育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5》(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頁338。
96. 中共中央：《關於高等學校錄取新生的政治審查標準》，1962年版。
97. 中共中央：《對1962年「高等學校錄取新生的政治審查標準」的幾點解釋意見》，1964年。
98. 武漢教育局和武漢公安局：《關於進一步密切配合做好高等中等學校招生的政治審查工作的幾點意見》，1964年4月27日。
99. 武漢教育局檔案，1964年7月。
100. 北京教育局：《關於對初中畢業生家庭情況進行調查的請示》，1964年1月14日。
101. 武漢教育局：《關於實行重點中學吸收保送生免試入學辦法的通知》，1964年7月26日。
102. 武漢教育局：《高等學校年初報表1964–1965》。
103. 武漢教育局：《武漢市中小學學生家庭出身典型調查1965–1966》。
104. Parish,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pp. 100–101.
105. 《人民教育》，1957年第9期。
106. 第37和38位受訪者。
107. 例如，王任重的兒子1966年仍在讀初中。受訪者第37和51位。
108. 很多出身於中等或不好家庭的學生認為，儘管他們學習成績好，但階級保送體制改變了社會地位的流動遊戲，對他們很不利。出身於良好家庭的學生也認為，這種升遷競爭制度有內在的不公平性。參見武漢教育局：《關於1961年未錄取中小學畢業生的安排》和《關於畢業生思想情況的反映》，1965年5月。
109. 引自Hong Yung Le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 64 (1975), p. 654.
110. 《中國工人》，1957年第12期，頁8；及《新華月刊》，1956年第15期，頁34。
111. 《中國工人》，1956年第19期，頁3–4。
112. 《紅衛兵出版物：補遺1》，卷4，頁1868、1874–1875。
113. 《中國工人》，1957年第13期，頁13。
114. 《中共武漢地方黨史》，頁2–3、72、80–81、98–103、113；《長江日報》，1957年11月17日；及武漢統計局：《武漢1949–1984》(武漢，1985年)，頁38。

115. 《七月風暴》，1968年6月25日。
116.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頁215。
117. 前揭書，頁219。
118. 前揭書，頁246、281。
119. 前揭書，頁260、392–393。
120. 前揭書，頁280、297；及《打倒宋侃夫》，冊11(1968年7月)。
121.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頁309–315。
122. 武漢中級人民法院：《武漢法院志》(未出版)，1992年。

第三章

1.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共3冊(武漢，1967年)，冊1，頁2、193。
2. 《人民日報》宣佈，如果黨的領導人被判定有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那麼不管他們的地位有多高、黨齡有多長，反對他們都是合法的。《人民日報》，1966年6月2日。
3. Kurt Lewin, "Group Decis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Guy E. Swanson, Theodore Newcomb, and Eugene L. Hartley (ed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1952).
4. 在6月初召開的一個會議上，劉少奇説：「當前的運動同1957年的運動很像。」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罪行錄》，1967年9月。
5. 《長江日報》，1968年4月24日。
6. 《武大三家村案》，1967年9月。
7. 金春明：《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講》(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頁8–9。
8. 《湖北日報》和《武漢晚報》，1966年5月。
9.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罪行錄》；《徹底批判湖北省委資料彙編》，1966年10月29日；及第29、30、31、42、57位受訪者。
10.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年8月。
11. 前揭書。
12. 《武漢赫魯曉夫》，1967年10月。
13. 第13位受訪者。
14. 《湖北省委書記處常委會議記錄》，1967年2月。
15.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宋侃夫罪行錄》，1967年2月11日；及《徹底批判湖北省委資料彙編》。
16.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年8月。
17.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3，頁3。
18.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罪行錄》。

19. 《王任重罪行錄》，1967年2月1日。
20. 《王任重三反言論錄》，1967年9月；及《批陶戰報》，1967年3月14日。
21.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年8月。
22. 《打倒武漢的赫魯曉夫》，1967年10月。
23. 《長江日報》，1968年4月26日。5天後，毛澤東在他給江青的信中用了這樣的話：「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和「現在的任務是要……打倒右派」。這種話在許多方面同王的用語是相似的。參見國際關係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文件分類選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78年)，頁54–57。
24. 《新水運》，1967年10月。
25.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年8月。
26. 《王任重三反言論錄》，1967年9月。「懷疑一切」的口號也在北京流行起來。直到1966年12月，林彪還在使用這個說法。參見《林彪文選》(武漢，1968年)，頁276。
27. 《支部生活》，1966年第12–13期；及第51位受訪者。
28. Liu Guokai (劉國基),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1987), p. 20.
29. 《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1966年1月11日。
30. 第60位受訪者。
31. 武漢教育局：《普通中學綜合報表1965–1966》；《全日制小學綜合報表1965–1966》；及《全日制技工職業學校綜合報表1965–1966》。
32. 第14位受訪者。
33. 第10、13、15、30、31、46、51位受訪者。
34. 第13位受訪者。
35. 第10、13、15位受訪者。
36. 第13位受訪者。
37. 第10、69位受訪者。
38. 第10位受訪者。
39. 第53位受訪者。
40. 教育部：《中國教育大事記》(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頁401。
41. 《湖北日報》，1966年6月20日；及《武漢晚報》，1966年6月20日。
42. 《鄧壘在武漢市中學畢業生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7月19日。
43. 第51位受訪者。
44. 在許多重點學校裏，將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與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學生同等對待。例如，出身好的同學沒有推薦同班女生上高中，就是因為這位女生的父親是總工程師，母親是總會計師。她的同學振振有詞地說：「解放前，她家過得很好。現在她家還有一個保姆，所以最好送她到農村去。」參見武漢高中招生委員會：《初中畢業生推薦工作的情況反映》，1966年9月。

45. 第52、77、78位受訪者。
46. 《王任重何許人也》，1966年12月。
47. 《赤衛軍》，1967年4月14日。
48. 例如，武漢水電工程學院工作隊只點名批評4個學生，但有200多名學生主動接受了批評：參見《王任重何許人也》，1966年12月。
49. 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系的1962年級和1964年級都有150名學生。雖然1962年級只有11人(7.3%)被批判，但1964年級卻有43人(28.7%)受到攻擊。華中工學院全校只有不到5%的學生受到批判。然而，在這個學院動力工程系一個班的31名學生裏，卻有24名學生受到批判，達到77%的極高比率。

    在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1964年級，幾乎有一半出身良好的學生遭到攻擊，他們被視為落後分子。參見《徹底批判湖北省委資料彙編》。
50. 《王任重三反言論錄》。
51.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隊被稱作「工作隊」，而文化革命工作隊被稱作「工作組」。
52. 第8、12、17、19位受訪者。
53. 第26、32、65、66位受訪者；及《新華工》，1967年6月1日。
54. 第2、70位受訪者。
55.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平青反黨言論彙編》，1967年10月26日；《打倒武漢頭號走資派宋侃夫》，冊2，1968年7月；及第20、24、31、35位受訪者。
56. 第31、72位受訪者。6月18日，武漢市委發出一個指示，要求在所有單位都進行這種分類。《王任重三反言論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宋侃夫的罪行錄》；及《打倒武漢頭號走資派宋侃夫》，冊3。
57. 《新華工》，1967年3月1日和3月24日；及第35位受訪者。
58. 第26、27、31位受訪者。
59. 第12、17、19位受訪者。
60. 第31位受訪者。
61. 第8、12、19位受訪者。
62. 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共3冊(武漢，1968年)，冊1，頁142。
63. 第1、6、23、25、27、70、80、81、84位受訪者。
64. 第11位受訪者。

第四章

1. 《湖北省委書記處常委會議記錄》，1967年2月。
2.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26–63.

3. 《湖北日報》，1966年8月3日。
4. 《湖北日報》，1966年8月21日。
5. 第3、16、28、80、81位受訪者。
6. 《人民日報》，1966年8月19日。
7.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年8月。
8. 《湖北日報》，1966年8月20–30日。
9. 《湖北省委書記處常委會議記錄》，1967年2月。
10. Crane Brinton,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pp. 178–180。
11. 《湖北日報》，1966年8月24–30日。
12. 第13、14、63、64位受訪者。
13.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324。
14. 前揭書，頁324。
15. 《人民日報》，1966年8月23日。
16. 《湖北省委書記處常委會議記錄》，1967年2月。
17. 第49位受訪者。
18. 《人民日報》發表了幾篇社論，勸告青少年「向解放軍學習」，遵守紀律，要文鬥不要武鬥。參見《人民日報》，1966年8月28日和9月5日。
19. 《人民日報》，1966年8月26日。
20. 第36、37、51位受訪者。
21. 第69位受訪者。
22. 《兵團戰報》，1967年3月25日。
23.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共3冊(武漢，1967年)，冊1，頁127、164、167、202。
24. 《紅旗》，1966年第10期。
25. 《徹底批判湖北省委資料彙編》，1966年10月29日。
26.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和《湖北省委書記處常委會議記錄》。
27.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28. 《湖北省委書記處常委會議記錄》和《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29. 《湖北省委書記處常委會議記錄》；及《徹底批判湖北省委資料彙編》。
30. 《徹底批判湖北省委資料彙編》；《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及《湖北省委書記處常委會議記錄》。
31. 卜大華是北京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的創始人；8月18日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時，宋要武是為毛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幾個學生之一，並為此而出名。
32. 亮亮：〈一個紅衛兵發起者的自述〉，《中國青年》，1986年第8期；及《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3，頁119。

33. 《徹底批判湖北省委資料彙編》。
34. 《張體學同志的講話》，1966年9月5日。
35. 《徹底批判湖北省委資料彙編》。
36. 《湖北省委書記處常委會議記錄》。
37.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略》，共4卷(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1978)，卷1，頁309–311。
38.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罪行錄》，1967年9月。
39. 例如，「張體學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貧下中農的親密朋友」，及「攻擊張體學就是攻擊我們貧下中農」。張是一個很受湖北省農民歡迎的領導人。參見《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40. 《湖北省委書記處常委會議記錄》。
41. 《徹底批判湖北省委資料彙編》。
42. 同上。
43.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44. 《徹底批判湖北省委資料彙編》。
45. 《批陶戰報》，1967年3月14日。
46.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1，頁118、129。
47. 《徹底批判湖北省委資料彙編》；及第69、77位受訪者。
48.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1，頁225、268。
49. 一些從北京來的學生是在武漢長大的，他們帶領其它人到母校來動員當地學生。第51位受訪者。
50. 第50、51位受訪者。
51. 例如，武漢水運學院文化革命委員會組織了該院2,800名學生中的2,000人於9月底去北京。第50位受訪者。
52. 例如，華中工學院於9月27日成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但在當時這所擁有10,000多名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學校裏只有700人加入這個組織。《新華工》，1967年8月11日。
53. 第一批造反的學生的家庭出身一般都是良好或中等的。在這個時候，階級出身不好的學生是進不了造反組織的。
54. 正如我的一位受訪者所說：「在武漢，我是『牛鬼蛇神』的兒子。但在北京我被當作毛主席的客人。所以我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價值。」第49位受訪者。
55.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1，頁193、197。
56. 《林彪文選》(武漢，1968年)，頁256–258。
57.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3，頁263；及《七月風暴》，1968年2月13日。
58.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3，頁139；及《批陶戰報》，1967年3月14日。
59. 《湖北省委書記處常委會議記錄》。
60. 《湖北日報》，1966年10月11日。

61. 湖北省委於10月19日作了集體自我批評。兩天後，張體學和王樹成作了個人自我批評。在接下來的幾天裏，當地官員甚至在各個學院開自我批評會。《徹底批判湖北省委資料彙編》。
62.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63. 《湖北日報》，1966年9月13日。
64.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65. 第36、37、46、49、50、51、69位受訪者。
66. 第24、27、50位受訪者。
67.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68. 《在險峰》，1967年10月30日；及第50、77位受訪者。
69.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1，頁261；及冊2，頁86、89、225、289。
70. Mario Von Cranach, "Leadership as a Function of Group Action," in Carl F. Graumann and Serge Moscovici (eds.), *Changing Conception of Leadership*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6), pp. 117–118。
71.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2，頁96。
72. 第1、2、3、7、9、16、25、26、28、65、70、72、73、80、81、84位受訪者。
73. 第8、12、19位受訪者。
74. 其中有武漢重型機床廠的朱洪霞和武昌造船廠的胡厚明。第19位受訪者。
75. 第12、19、77位受訪者。
76. 《關於鋼工總問題調查報告》，1967年7月。
77. 同上；及金春明：〈關於上海1月風暴的前前後後〉，《黨史研究》，1983年第18期。
78.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2，頁63。
79. 第19、77位受訪者。
80. 《新湖大》，1967年9月16日。
81.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82. 第24位受訪者。
83. 林彪把1966年底的情況說成是，「少數人感到解氣，而多數人受欺負」。《林彪文選》，頁269。
84. 第2、3、25、26、33、34、52、72、73、80、81、84位受訪者。
85. 《兩條路線的大搏鬥》，1966年11月。
86. 上海的《解放日報》11月31日被停辦；《湖南日報》12月3日被停辦；廣州的《南方日報》9月更名為《紅衛報》，但在12月13日也被停辦。
87.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88. 第52位受訪者。北京的保守派工人組織捍衛團於11月19日成立，有30萬成員。上海的保守派工人組織赤衛隊建立於11月26日，有40萬成員。參見《井岡山》，1966年12月22日；及《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2，頁210。

89.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90.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1，頁254。
91. 周恩來指示說，對「真正的反革命活動」不利的證據不應當公佈，不管它是在1966年5月16日以前找到的還是在此以後找到的。《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2，頁254。
92. 周恩來後來承認，「所謂的『黑材料』問題真正使我們頭痛」。《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3，頁291。
93.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80、81位受訪者。
94. 第7、25、52位受訪者。
95. 第52位受訪者。
96. 《新湖大》，1967年3月2日；《新華工》，1967年3月24日。

第五章

1.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1，頁102。
2. 《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第2種版本，頁346。
3. 陳佩華 (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p. 139.
4. 第69位受訪者。
5. 第13、14、57、69位受訪者。另見劉國凱 (Liu Guokai),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1987); 李洪雲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Marc J. Blecher and Gordon White, *Micro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Technical Unit during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te Plains, NY: M.E. Sharpe, 1979); 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6. 《揚子江評論》，1968年6月20日；第61、62位受訪者。
7. 《文革評論》，1968年1月。
8. 《關於鋼工總問題調查報告》，1967年7月；《新華工》，1967年3月24日；《侯連成何罪之有？》，1968年3月；《長江日報》，1977年12月1–2日；第35、59位受訪者。
9. 《武漢工人》，1969年5月10日；第19、23位受訪者。
10. 第16、20、24、35、51、71、78位受訪者。

11. 第24位受訪者。
12. 第6、8、12、15、19、20、35位受訪者。劉國凱還強調，不能把那些只在本單位裏活躍的「造反派」或「保守派」跟那些在更廣的社會範圍裏活動的「造反派」或「保守派」等同起來。Liu,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81–82。
13. 第10、24位受訪者。
14. 《王任重罪行記》，1967年3月。
15.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年8月。
16. 《揚子江評論》，1968年6月20日。
17. 第2、6、35、58、60、62位受訪者。
18. 馮驥才 (Feng Jicai) ,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pp. 149–150。
19. 第15、49位受訪者。
20. Dennis Chong,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147.
21. Hardin, "Acting Together, Contributing Together,"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 3, No. 3 (1991), pp. 366–368.
22. 第25、70、73、74、80、81、84位受訪者。
23. 第9、10、11、13、14、15、26、29、30、32、33、34、49、50、60、65、67位受訪者。
24. 第1、2、3、5、6、7、8、12、16、17、18、19、20、21、23、24、27、28、31、35、42、52、59、67、72、75位受者。
25. 第51位受訪者。
26. 第15、29、30位受訪者。
27. 第65、66位受訪者。
28. 第31位受訪者。
29. 我的兩位受訪者在同一時間進入二司的領導層，他們說：「群眾組織根本沒有任何內部約束力。每個組織都想招集更多的成員，所以就不能對其成員進行任何紀律約束。二司也只是一個鬆散的聯盟。由於它的分支不必遵循總部制定的指導方針，所以總部對其分支組織行動的控制就很弱。在總部內部並沒有共同遵循的決策程序。因此，做決定就總是一場激烈的爭吵過程。甚至當一項決定已經形成時，也無法保證其分支組織能否去執行這個決定。更糟糕的是，分支組織會一邊誇耀二司的旗號，一邊追求他們自己的狹隘利益。」第50、51位受訪者。
30. Andrew G. Walker, "Communist Social Structure and Workers' Politics in China," in Victor C. Falkenheim (ed.), *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7), p. 84.

31. 第24、49、57位受訪者。
32. 第1、26、41、45、52、72、73位受訪者。
33. James G. March and Herbert A. Simon, *Organiz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8), pp. 2–4。
34. 例如，在10月和11月間廣泛流傳著一篇文章，據說這是「毛主席的第二張大字報」。見《紅衛兵》，1966年11月16日。

第六章

1. Michael Taylor, *Community, Anarchy and Lib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9–58.
2. 對經濟主義現象的深入分析，見Evelyn Anderson, "Shanghai: The Masses Unleashed," *Problems of Communism*, 17 (1968).
3.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有些作者誇大了合同工和臨時工在造反派別中的作用。參見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實際上，職業差別在文革派別鬥爭中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合同工和臨時工根本不代表造反運動的主流，大多數造反者是受政治因素所驅動的，而不僅僅是受短期經濟利益所驅動。
4. 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1，頁178、233–235、241–243；《長江日報》，1967年2月21日；《八二戰報》，1968年4月28日。
5. 第14位受訪者；《長江日報》，1967年1月22日、24日、30日和2月1日。
6. 這一節主要使用四方面的材料：《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新湖大》，1967年3月2日；《長江日報》，1967年2月22日；《徹底埋葬武漢地區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冊2，1967年12月。關於武漢奪權的第二手資料，參見Deborah Davi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No. 42, pp. 147–170.
7. 張春橋在一次講話中透露了這個秘密：「奪權的主要目的就是使經濟運行起來，防止經濟主義泛濫。」《廣印紅旗》，1967年11月23日。
8.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新湖大》，1967年3月2日；《長江日報》，1967年2月5日；《湖北日報》，1967年2月6日。《長江日報》就是以前的《武漢晚報》，當時它被造反組織紅樓聯盟所控制。《湖北日報》被非紅樓聯盟的造反組織所控制。
9. 《長江日報》1967年2月8日、9日、12日；第8、11、49、50、51位受訪者。
10. 第46、47、49、50、67位受訪者；《長江日報》，1967年2月10日；《紅八月造反報》，1967年2月27日。

11. 《長江日報》，1967年2月21日；《新華工》，1967年2月23日。
12. 例如，1月在武漢重型機床廠有20名黨員被開除。見《關於鋼工總問題調查報告》，1967年7月。後來中共中央發了一個通知，禁止非黨群眾決定黨組織的事情。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1，頁222–223。
13. 《東方紅》，1967年3月22日；《進軍報》，1967年3月5日；《井岡山》，1967年2月8日。
14. 光是1月20日一天，武漢造反派就給6,000多人戴高帽在街上遊行。《新華工》，1967年2月8日、23日、24日。
15. 《奪權戰報》，1967年2月12日。
16. 《新華工》，1967年2月4日。
17. 《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第2種版本，頁341；《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3，頁139、166、168。
18.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1，頁256–259。
19. 前揭書，頁219–221、264、282。
20. 《人民日報》，1967年1月31日。
21.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冊3，頁283；《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報告會上的講話》，1967年6月3日。
22. 《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第3種版本，頁667。
23.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載《革命史資料》(北京：黨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12輯。
24.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陳再道與支保》，1967年8月。
25.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略》，卷2，頁640、686–689、700–701、904。
26.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
27. 《陳再道與支保》。
28. 《新華工》，1967年2月11日、23日；《紅八月造反報》，1967年2月2日、21日。
29.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30.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31.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江城風暴》，1967年8月。
32.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陳再道支保罪行錄》，1967年5月。
33. 《陳再道鍾漢華之流反革命罪行》，1967年11月；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第19、53位受訪者。
34. 《千刀萬剮陳再道》，1967年8月；第51位受訪者。
35. 第46、47、49、50、51位受訪者。
36. 《千刀萬剮陳再道》，1967年8月。
37. 第51、54、77位受訪者。

38. 《湖北日報》，1967年3月4日；《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陳再道支保罪行錄》；《徹底揭開省委抓辦的黑幕》，1967年9月14日。
39.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54、77位受訪者。
40. 《千刀萬剮陳再道》。
41. 前揭書。
42. 《陳再道鍾漢華的罪證》，1967年9月1日；《斬斷陳再道伸向街道的魔爪》，1967年11月28日；第26、42、52、72、73位受訪者。
43. 《陳再道與支保》；第24、47、48、52位受訪者。
44. 《九．一三戰報》，1967年7月21日。
45. 《陳再道鍾漢華之流反革命罪行》；《千刀萬剮陳再道》；《湖北新華印刷廠革委會》，1967年12月26日；第35、67位受訪者。
46. 湖北廣播電臺，1967年2月28日，3月8日和11日。
47. 《徹底揭開省委抓辦的黑幕》。
48. 湖北廣播電臺，1967年3月15日。
49. 《七月風暴》，1967年9月；《陳再道與支保》；《陳再道支保罪行錄》，1967年5月。
50. 《徹底揭開省委抓辦的黑幕》。
51. 湖北廣播電臺，1967年3月2日、5日、11日、13日、15日、19日；第26、35、67位受訪者。
52. 湖北廣播電臺，1967年3月15及30日。
53.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惠農罪行大事記》，1968年3月11日。
54. 中國研究資料中心：《紅衛兵出版物：補遺1》，卷4，頁1721–1722。
55. 《政法公社》，1967年3月22日；《井岡山》，1967年3月15日；《進軍報》，1967年3月15日；《新北大》，1967年3月16日。
56.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新湖大》，1967年4月11日；《揚子江評論》，1967年9月7日；《陳再道罪行錄》。
57. 項金紅：〈韓愛晶的龍袍夢〉，《中國青年》，1986年第8期；《人民日報》，1967年4月2日。
58.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1，頁314–321、326–330、332–343、354–363、413–414。
59. 《關於鋼工總問題調查報告》；第24、35位受訪者。
60.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新華工》，1968年6月15日；《陳再道支保罪行錄》。
61. 《揚子江評論》，1967年9月7日。
62. 湖北廣播電臺，1967年4月1日。
63.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關於鋼工總問題調查報告》。
64.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

65.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1967年9月。
66.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

第七章

1.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
2. 《打倒反革命分子陳再道》，1967年8月；《陳再道鍾漢華的罪證》，1967年9月1日。
3. 《陳再道支保罪行錄》，1967年5月；《陳再道與支保》，1967年8月；第24、48位受訪者。
4. 第26、37位受訪者。
5. 《新華工》，1967年9月8日。
6. 《論革與保》，1967年5月11日。
7. 這個數字也包括郊區的成員。第26、52位受訪者。
8. 《七月風暴》，1967年9月25日；第26、52、72位受訪者。
9. 《武漢公安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的滔天罪行》，無日期；第26、52位受訪者。不要把武漢公安與武漢公安局相混淆。前者是由警察組成的一個群眾組織，是百萬雄師的緊密同盟，但並沒有真正加入百萬雄師。
10. 《七月風暴》，1967年8月28日和10月28日；《武漢百萬雄師754兵團罪行錄》，1968年7月。
11. William H.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12. 前揭書。
13. 《新華工》，1967年5月18日；《揚子江評論》，1967年9月7日；第48、50、67位受訪者。
14. 《新華工》，1967年8月1日；第53、74位受訪者。
15. 《新湖大》，1967年4月25日；《公檢法一小撮壞頭頭反動罪行錄》，1967年9月20日；第53位受訪者。
16. 《揚子江評論》，1967年9月7日；第53位受訪者。
17. 《新湖大》，1967年9月16日。
18.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1967年9月。
19. 第2、3、16、25、33、52、80位受訪者。
20. 《揚子江評論》，1967年9月7日；第24、77位受訪者。
21.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22.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
23. James D. Fearon, "War, Relative Power,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9–11 April 1992, Palmer House Hilton, Chicago.

24. 這個概念是從一種國際關係理論借用來的。參見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1978, pp. 167–214.
25.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26. 《打倒反革命分子陳再道》；《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27. 第23、26、72位受訪者。
28. 湖北革命委員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1，頁387。
29. 第26、37、52位受訪者。
30.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31. 《七月江城戰旗紅》，1967年8月。
32.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33. 第26位受訪者。
34. 第23位受訪者。
35. 《抗暴》，無日期；第26、52位受訪者。
36. 《七月江城戰旗紅》，1967年8月；第26、50、52位受訪者。
37. 《不忘624》，1968年6月24日。
38. 第72位受訪者。
39. 《工造總司》，1967年8月24日；《武漢鋼二司》，1967年8月30日；第8、23、43、46、51位受訪者。
40. 《江城風暴》，1967年8月。
41. 《武漢公檢法赴京彙報團罪惡之行》，1968年12月。
42.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43. 《新華工》，1967年7月12日；第43、46、50位受訪者。
44. 《陳再道與支保》，1967年8月。
45. 《七月風暴》，1967年9月；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
46.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江城壯歌》，1967年10月。
47. 《武漢公檢法赴京彙報團罪惡之行》。
48.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49. 《陳再道支保罪行錄》；《徹底揭開省委抓辦的黑幕》，1967年9月4日。
50. 第1、8、16、20、25、26、41、52、67、70位受訪者。
51. 關於武漢事件的第二手資料，參見Thomas W. Robinson, "The Wuhan Incident," *China Quarterly*, No. 47 (1971), pp. 413–438；另參Yu-shen Chien (秦玉申), *China's Fading Revolution: Army Dissent and Military Divisions, 1967–1968* (Hong Kong: Centr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1969).
52.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
53. 《新華工》，1967年9月16日；第26、52位受訪者。
54.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

55.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在京鬥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大會記實》，1967年9月。
56.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
57. 《七月風暴》，1967年9月。
58. 《徹底埋葬武漢地區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冊2，1967年12月；第26、37位受訪者。
59.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第26、37位受訪者。
60. 《武漢公安江漢分部罪行材料》，冊4，1967年12月。
61.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第26、37、53位受訪者。
62. 《武漢鋼二司》，1967年9月8日；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
63. 《陳再道、鍾漢華之流反革命罪行》。
64. 《七月兵變的破產》，1967年8月；《陳再道與支保》。
65. 《武漢鋼二司》，1967年9月8日。
66. 《長江日報》，1967年9月7日。
67. 《七月兵變的破產》。
68. 《陳再道與支保》；《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69.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
70. 《新湖大》，1967年7月28日；第46、54、57、78位受訪者。
71. 《武漢公安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的滔天罪行》。
72. 《人民日報》，1967年7月23日。
73. 《文化大革命學習文選》，冊12(1967年)，頁35–40。
74. 《烈火》，1967年9月。
75. 第37位受訪者。
76. 《公檢法一小撮壞頭頭反動罪行錄》。
77. 《震驚全國的720反革命暴亂》，1967年8月。
78. 第2、3、33、37、73位受訪者。

第八章

1. 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 123.
2. 《新華工》，1967年8月11日。
3. Hai Feng, *An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anton Area*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71), pp. 176, 213.
4. 湖北革命委員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2，頁426–433。
5.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頁331。
6. 第46、48、51、54、69、72位受訪者；《新湖大通訊》，1967年8月24日。

7. 《紅武測》，1967年9月5日。
8.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略》，卷4，頁214–218、411。
9. 《紅武測》，1967年9月5日、18日；《文革運動歷程述略》，卷3，頁288–308。
10. 《人民日報》，1967年7月24–31日。
11. 第1、2、16、33、34、65、66位受訪者。
12. 第1、2、10、11、26、37、42、52、53、67、70位受訪者。
13. 第10、52、72位受訪者。
14. 《新華工》，1968年2月12日；《長江日報》，1967年8月14日，9月3日。
15. 《新中原》，1967年10月17日；第7、8、25、84位受訪者。
16. 《新12中》，1967年8月24日。
17. 第31、55、65、66、74位受訪者。
18. 《新華工》，1967年8月5日。
19. 《新華工》，1967年8月5日、10日；第1、6、20、23、25、50、52位受訪者。
20. 陳再道：《七二〇事件始末》，頁42。
21. 《新華工》，1967年8月5日；第46、50位受訪者。
22. 第1、2、3、4、9、18、33、34、43、52、67、72位受訪者。
23. 第12、24、60、69位受訪者；《長江日報》，1967年11月20日。
24. 《長江日報》，1967年9月19日、1968年2月26日；《新華工》，1967年8月20日、9月2日、11月13日；《新水運》，1967年10月；《武漢鋼二司》，1967年8月30日；《七月風暴》，1967年9月25日；第46、61、62位受訪者。
25. 《長江日報》，1968年1月4日；《揚子江評論》，1968年7月16日；《武漢工人》，1968年2月24日。
26.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2，頁692–694、868–869。
27. 《長江日報》，1967年9月21日、12月21日，1968年1月10日、11日，3月6日、22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2，頁787–788；第14位受訪者。
28. 《武漢紅代會》，1968年5月18日；《長江日報》，1967年12月22日，1968年3月21日、27日，4月13日。
29. 《武漢三家村案》，1967年9月；第49位受訪者。
30.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程雲反動言論彙編》，冊3，1968年1月；第32位受訪者。
31. 《長江日報》，1968年3月27日；第55、74位受訪者。
32. 《新華工》，1968年8月；《長江日報》，1967年12月22日，1968年3月21日、27日，4月13日。
33. 第51、60、69位受訪者。

34. William H.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35.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工總、二司和九．一三兵團經常在它們的組織名稱前加上形容詞「鋼」(意思是「堅強」)；而「毒草派」幾個主要組織的名稱則包含「新」字。
36. 《武漢事件》，1967年8月。
37. 《揚子江評論》，1967年9月7日；《新華工》，1967年9月28日；《武漢鋼二司》，1967年10月31日；《長江日報》，1967年8月18日。
38. 第8、35位受訪者。
39. 《新華工》，1967年8月5日、20日；《新湖大》，1967年9月16日。
40. 《人民日報》，1967年8月19日。
41. 《武漢鋼二司》，1967年8月20日；《揚子江評論》，1967年9月7日。
42. 《新華工》，1967年9月14日。
43. 《人大三紅》，1967年8月31日；《新12中》，1967年8月24日。
44. 《武漢鋼二司》，1967年8月31日。
45. 《武漢市革命工代會籌備小組會談紀要》，1967年11月5日。
46. 第24位受訪者。
47. 《新華工》，1968年8月。
48. 《人民日報》，1967年9月18日、22日。
49. 《長江日報》，1967年9月24日。
50. 《武漢鋼二司》，1967年10月1日；《工造總司》，1967年9月27日、10月20日。
51. 《新華工》，1967年9月28日。
52. 《武漢市革命工代會籌備小組會談紀要》。
53. 《長江日報》，1967年10月8–13日。
54. 《新東中》，1967年10月15日。
55. 《長江日報》，1967年10月12–23日。
56. 這六個組織是二司、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三司革聯和中學紅聯。《新華工》，1967年11月17日；《武漢鋼二司》，1967年10月14日。
57. 《武漢市革命工代會籌備小組會談紀要》。
58.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2，頁565–566。
59. 《武漢市革命工代會籌備小組會談紀要》。
60. 《新華工》，1967年11月17日；《新湖大》，1968年6月26日。
61. 《武漢鋼二司》，1967年11月15日。
62. 《武漢鋼二司》，1967年10月23日、11月5日、12月14日；《紅八月公社》，1967年10月26日、11月14日、20日；第50位受訪者。
63. 《新湖大》，1967年11月2日。

64. 《紅八月公社》，1967年11月14日、20日。
65. Jean Esme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3), p. 221；K. S. Karol,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Hill & Wang, 1968), p. 314.
66. 《武漢鋼二司》，1967年11月6日、11日。
67. 《紅八月公社》，1967年11月14日。
68. 《武漢鋼二司》，1967年11月11日；《不忘624》，1967年11月24日。
69. 《新華工》，1967年11月17日；《武漢鋼二司》，1967年10月31日；《紅八月公社》，1967年11月14日。

第九章

1. 《中央首長講話》，1967年10月，第14頁。
2. Robert Axelrod, "The Emergence of Cooperation Among Egois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 (1981), pp. 306–318.
3. 〈北京福建幫內幕〉，《觀察家》，1979年第1期。
4. 《新肉聯》，1967年12月8日；第24、69位受訪者。
5. 《武漢紅代會》，1967年12月23日；《武漢工人》，1968年1月1日。
6. 《長江日報》，1967年12月17日。
7. 《武漢工人》，1968年1月22日；《武漢紅代會》，1967年12月23日。
8. 《周總理重要講話》，1968年2月。
9. 《解放軍報》，1968年1月28日。
10. 《人民日報》，1968年1月1日。
11. 湖北革命委員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2，頁630。
12. 《武漢工人》，1968年1月18日；《解放軍報》，1968年2月13日；《長江日報》，1967年11月17日，1968年1月16日、2月13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2，頁661。
13.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1，頁9–11，冊2，頁586；《人民日報》，1967年10月27日。
14. 《武漢工人》，1968年1月15日、18日；第4、5、15、22位受訪者。
15. 第2、3、6、8、9、33、34位受訪者；《長江日報》，1967年9月15日。
16. 第12、21、74位受訪者。
17. 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中，王明是斯大林的追隨者。在延安整風期間(1942–1944)，他受到清洗。
18. 《新華工》，1968年8月。
19. 《武漢市三結合幹部簡介》，1968年1月20日。
20. 《新華工》，1968年8月；《反革命分子劉真的自白》，1967年6月。

21. 《關於薛樸若的材料》，1968年1月15日。
22. 《革幹聯》，1968年1月5日。
23. 《新華工》，1968年8月。
24. 《新華工》，1968年10月21日；《新湖大》，1968年1月11日、6月26日；《新湖大通訊》，1968年1月14日。
25. 《新華工》，1968年8月；《新湖大》，1968年1月11日、26日；《新湖大通訊》，1968年1月14日、6月26日。
26. 《林彪文選》，頁244–245。
27. 《關於薛樸若的材料》；《武漢市三結合幹部簡介》；《關於楊春亭同志的調查報告》，1967年9月；《省市革命三結合幹部簡介》，1968年2月。
28. 《新華工》，1968年8月11日。
29. 《中央首長最新重要講話彙集》，1968年4月。
30.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2，頁795–810。
31. 《長江日報》，1968年1月20日、2月7日。
32. 《新湖大通訊》，1968年1月24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2，頁808。
33.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2，頁796。
34. 《新湖大》，1968年6月26日；《新華工》，1968年6月26日；第54、60位受訪者。
35. 《江城前哨》，1968年6月1日、26日。
36. 趙瑜：〈李順達在文化革命中〉，《黃河》，1986年第4期，頁185–200。
37. 第8、20、50、54、76、78位受訪者。
38. 《長江日報》，1968年2月22日、24日，3月17日。
39. 《長江日報》，1968年2月4日–3月11日；《武漢工人》，1968年2月24日；《武漢紅代會》，1968年3月29日；《七月風暴》，1968年6月。
40. 《長江日報》，1968年3月25日、28日；《武漢紅代會》，1968年3月29日，4月5日、11日、18日，5月1日；《武漢工人》，1968年3月29日、4月5日。
41. 《江城前哨》，1968年7月22日；《揚子江評論》，1968年6月20日。
42. 《長江日報》，1968年4月12日。
43. 《長江日報》，1968年4月16日、23日；第26、52、72位受訪者。
44. 《長江日報》，1968年3月28日。
45. 《長江日報》，1977年11月29日。
46. 第51位受訪者。
47. 第20、23、27、57、65、66、67位受訪者。
48. James V. Downton, Jun., *Rebel Leadership: Commitment and Charisma in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3), pp. 61–72.
49. 《新華工》，1968年6月22日。

50. 《不忘624》，1968年8月7日；第23、59位受訪者。
51. 《江城前哨》，1968年6月1日；《新華工》，1968年5月29日。
52. 《新湖大》，1968年5月23日和6月26日；《新湖大通訊》，1968年6月17日。
53. 《新湖大通訊》，1968年6月9日、17日；《新湖大》，1968年6月1日、22日；第69位受訪者。
54. 《新湖大》，1968年7月22日。
55. 《江城前哨》，1968年5月15日，7月22日。
56. 《新中原》，1968年5月15日、25日；《長江日報》，1977年11月29日；第8位受訪者。
57. 《新華工》，1968年6月19日；《江城前哨》，1968年5月17日，7月22日。
58. 《江城前哨》，1968年6月1日。
59. 《江城前哨》，1968年5月17日；《新華工》，1968年5月29日；《新中原》，1968年6月8日。
60. 《工藝大樓血案》，1968年5月23日。
61. 《揚子江評論》，1968年6月12日；《江城前哨》，1968年6月1日。
62. 《不忘624》，1968年9月。
63. 《江城前哨》，1968年6月9日；《新中原》，1968年6月22日；《新湖大》，1968年6月22日；《新華工》，1968年6月26日，7月29日和8月25日。
64.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3，頁1008。
65. 《江城前哨》，1968年6月1日。
66. 《江城前哨》，1968年6月9日；《新中原》，1968年6月8日。
67. 《新湖大》，1968年6月19日、7月22日。
68. 《江城前哨》，1968年6月1日。
69. 《新湖大通訊》，1968年6月17日。
70. 《新華工》，1968年6月19日。
71. 第8位受訪者。
72. 《江城前哨》，1968年6月1日。
73. 《新湖大》，1968年6月19日。
74. 《資料專輯》，1968年7月。
75. 《新華工》，1968年6月20日；《新湖大》，1968年6月19日、22日，7月19日。
76. 《江城前哨》，1968年7月8日；《不忘624》，1968年7月11日。
77. 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 154; Hai Feng, *An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anton Area*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1971), pp. 370–382.
78.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3，頁1037–1041、1054–1057。
79. 《新湖大》，1968年7月22日、9月18日。

80. 《鋼工總》，1968年7月12日；《新湖大》，1968年7月11日、29日。
81.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3，頁1044–1048。
82. 《新湖大》，1968年7月29日，8月22日、25日。
83. 《人民日報》，1968年8月5日、13日。
84. 《新湖大》，1968年8月11日、25日。
85.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3，頁1095–1098。
86. 《長江日報》，1968年9月9日、12日、24日、28日，11月19日，12月22日。
87. 《人民日報》，1968年12月22日。
88. 《新湖大》，1968年9月16日。
89. 《武漢工人》，1968年9月26日；《長江日報》，1968年9月15日、24日。
90. 《紅旗》，1968年第2期。
91. 《武漢工人》，1969年4月23日，5月9–11日；《武漢紅代會》，1969年5月6日、16日。
92.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3，頁1204。
93. 《武漢紅代會》，1968年11月5日；第13、14、29位受訪者。
94. 《武漢紅代會》，1969年5月6日；《武漢工人》，1969年5月9日、19日。
95.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冊3，頁1116–1120。
96. 《長江日報》，1968年10月10–13日、21日，11月1日、8日，12月11日。
97. 第1、11、15、65、66、67、72位受訪者；《長江日報》，1968年10月20日，11月8日、14日。
98. 《長江日報》，1968年10月12日、13日、12日、23日、31日，11月1日、6日、7日、12日、14日、21日、26日，12月10日、19日；《武漢紅代會》，1968年4月23日，1969年5月6日。
99. 《長江日報》，1968年10月31日，11月1日、6日、21日，12月5日、10日、16日；《武漢工人》，1969年4月23日，5月9日、25日；《武漢紅代會》，1969年4月23日，5月6日。但是，發展並不平衡。在有些造反力量佔支配地位的單位，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矛頭指向以前的保守派。第72位受訪者。
100. 《武漢紅代會》，1969年5月16日；《武漢工人》，1969年4月23日，5月9日、19日。
101. 《武漢工人》，1969年4月23日；第5、24、27位受訪者。

第十章

1. 《人民日報》，1968年9月7日。
2. 《長江日報》，1969年1月12日、21日、22日、23日，2月1日。
3. 《長江日報》，1969年2月2日、3日、6日、14日。
4. 毛澤東1969年4月5日、11日、13日、14日、23日和29日的講話 (我的個人手抄本)。

5. 山西省是個例子。山西省地方志編輯部：《山西大事記》，太原：1986。
6. 第8位受訪者。
7. 北京衛戍區司令部：《8341部隊支左先進經驗》，共3冊，北京：1968，冊1，頁90。
8. 《武漢工人》，1969年5月5日、25日。
9. 第5、8、10、11、20、27、28、35、51、69、73位受訪者。
10. 《武漢工人》，1969年4月23日。
11. 《人民日報》，1969年1月1日。
12. 《武漢工人》，1969年4月23日。
13. 第24位受訪者。
14. 《武漢紅代會》，1969年5月6日。
15. 《武漢工人》，1969年4月30日。
16. 毛澤東1969年4月30日的講話。
17. 第51、69位受訪者。
18. 《武漢紅代會》，1969年5月6日。
19. 《武漢工人》，1969年5月10日。
20. 《武漢紅代會》，1969年5月6日；《武漢工人》，1969年5月10日。
21. 《長江日報》，1977年11月29日。
22. 第15、29、49、50、67位受訪者。
23. 第5、21、42、55、74、80、81、82、83位受訪者。
24. 第8、12、15、19、20、23、24、27、43、66、67、69位受訪者。
25. 《武漢工人》，1969年5月25日。
26. 第3、5、16、28、35位受訪者。
27. Mancur Olse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8.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頁339–340。
29. 據後來報導，這個運動在武漢造成的經濟損失合計起來至少為15億元。《長江日報》，1977年11月5日。
30. 第20、69位受訪者；《大批判》，1969年8月23日。
31. 《長江日報》，1977年11月29日。
32. 《人民日報》，1969年6月8日。
33. 《人民日報》，1969年8月16日、25日；《紅旗》，1969年第9期。
34. 《長江日報》，1969年8月10日、18日、30日，9月9–13日。
35. 「決派」是叫做「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辦公室的團體名稱的第一個和最後一個中國字。
36. 我的個人手抄本。
37. 第60、78位受訪者。

38. 我的個人手抄本。
39. 第20、35、69、75位受訪者。
40. 第69、71位受訪者。
41. 第35、71位受訪者。
42. 除了「清理階級隊伍」和「深挖五．一六分子」運動以外，還有「一打三反」運動和「整黨建黨」運動。
43. 北京衛戍區司令部：《8341部隊支左先進經驗》，冊2，頁90–91。
44. 曾思玉1971年3月27日的講話，我的個人手抄本。
45. 第2、4、20、23、27、35、49、52、59、61、66、67位受訪者。
46. 第16、33、34、49、51、52、61位受訪者。
47.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頁343、355。
48. 第28、30位受訪者。
49. 第28、31、66位受訪者。
50. 第35、51、69、74位受訪者；《長江日報》，1970年6月6日、10日。
51. 第5、18、20、35、50、51、69位受訪者。
52. 第24、50、51位受訪者。
53. 第8、20位受訪者。
54. 第3、5、6、27、28位受訪者。
55. 第35、46、49、50、51、57、69、75位受訪者。
56. 《長江日報》，1969年12月1日。
57. 《長江日報》，1971年2月25日，4月1日。
58.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第355–356頁。
59. 關於林彪事件更詳細的情況，參見Philip Bridgham, "The Fall of Lin Biao," *China Quarterly*, No. 55 (July–September 1973), pp. 427–449.
60. 第28、50、80、81、82、83位受訪者。
61. 第26、52、88位受訪者。
62. 第78位受訪者。
63.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第353–355頁。
64. 第50、75位受訪者。

第十一章

1. 郝夢筆和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頁626–627。
2. Keith Forster, "The Politics of Destabilization and Confrontation: The Campaign against Lin Biao and Confucius in Zhejiang Province, 1974," *China Quarterly*, No. 107 (1986), pp. 442–443.
3. 《長江日報》，1973年1月8日。

4.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頁353–354。
5. 《長江日報》，1973年5月1日。
6. 《長江日報》，1973年5月11日。
7. 我1973年6月6日寫的日記。當時，我剛20歲，在武漢的一所中學教書。由於對當地政治極感興趣，所以我從不遺漏這個城市發生的像群眾集會、遊行、靜坐或示威等重要事件。同時，我與一些朋友組成了一個學習小組。我們至少一周討論一次當地和全國的政治。在我此後的日記裏，習慣於記下我目睹和從朋友那裏聽到的每一件事。
8. 《長江日報》，1973年6月1日。
9. 《長江日報》，1973年6月29日。
10. Russell Hardin, "Acting Together, Contributing Together,"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 3, No. 3 (1991), pp. 365–380.
11. 第50、75位受訪者。
12. 我1973年9月7日的日記；第50、75位受訪者。
13. 第75位受訪者。
14. 我在1973年10月14日、21日、23日，11月25日的日記。
15. 第75位受訪者。
16. 《解放軍報》，1974年1月30–31日。
17.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497。
18. 《長江日報》，1973年9月5日。
19. 《人民日報》，1974年1月12日。
20. 我1974年1月6日的日記；第50位受訪者。
21. 《長江日報》，1977年1月26日，11月24日。
22. 第50、69、75位受訪者。
23. 《長江日報》，1974年2月11日；我1974年2月2日的日記。
24. 我1974年2月8日、11日、17日的日記；第26位受訪者。
25. Stanley Rosen, "Guangzhou's Democracy Movem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spective," *China Quarterly*, No. 101 (1985); Forster, *The Politics of Destabilization and Confrontation.*
26. 我1974年3月2日的日記。
27. 我1974年3月9日、12日的日記。
28. 《長江日報》，1976年12月11日、14日。
29. 《長江日報》，1974年10月2日。
30. 第50、75位受訪者。
31. 我1974年3月16日的日記；《長江日報》，1974年3月17日。
32. 我1974年3月21日的日記。

33. 我1974年3月6日的日記。
34. 《長江日報》，1977年7月10日，11月29日，12月24日。
35. 第52位受訪者；我1974年3月13日的日記。
36. 我1974年3月22日、23日、27日的日記；第52位受訪者。
37. 我1974年3月24日的日記；第51位受訪者。
38. 我1974年3月27日，4月7日的日記；第50、51、69位受訪者。
39. 第1974年3月27日，4月7日的日記；第50、51、69位受訪者。大約於1969年前後在中央和省一級建立的「第三辦」系統，負責從最高層到基層深挖「階級敵人」。參見譚宗級：〈關於幾個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載浙江省委黨校：《文化大革命時期資料選編》(杭州：1984年)，頁59。
40. 《長江日報》，1974年3月21–4月2日。
41. 《長江日報》，1974年4月2–6日的日記；第26、50、52位受訪者。
42. 我1974年4月7日的日記；《長江日報》，1977年12月3日。
43.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頁364。
44. 我1974年2月8日、11日、17日的日記。
45. Forster, *The Politics of Destabilization and Confrontation*；趙瑜：〈李順達在文化革命中〉，頁203–208；《人民日報》，1977年1月5日。
46. 《人民日報》，1974年2月21日，3月7日。
47. 我1974年4月7–8日的日記。
48. 《中國共產黨六十年》，頁636–637；我1974年4月14日的日記。
49. 《長江日報》，1974年4月12日。
50. 《長江日報》，1974年4月11–20日。
51. 我1974年4月9–16日的日記。
52. 《長江日報》，1974年4月13日、17日、21日、29日。
53. 我1974年4月23、30日的日記。
54. 《長江日報》，1977年4月29日。
55. 我1974年4月23日、5月2日的日記；第50、58、59位受訪者。
56. 我1974年4月30日的日記；第50、75位受訪者。
57. 我1974年5月2、4、6、11、13、22日的日記。
58. 第50位受訪者。
59. 我1974年5月24–27日的日記。
60. 《長江日報》，1974年5月27日；我1974年4月26日的日記。
61. 我1974年5月25日、6月16日的日記。
62. 《長江日報》，1974年6月12日、14日、15日、22日、24日。
63. 我1974年6月12日–7月3日的日記。
64. 《中國共產黨六十年》，頁636。
65. 我1974年7月2、5日的日記。

66. 我1974年7月13日的日記；第26、52位受訪者。
67. 《紅旗》，1974年第8–9期。
68. 《中國共產黨六十年》，頁637。
69. 《長江日報》，1974年10月11日、14日，11月7日，12月6日、13日、21日，1975年1月17日。
70. 我1974年11月25日的日記；《長江日報》，1974年10月2日；第24位受訪者。
71. 我1974年3月24日，4月4日，8月13日的日記；
72. 第13、14、15、27、29、30、57、65、66位受訪者。
73. 第8、12、19、20、23、67位受訪者。
74. 我1974年4月1日的日記。
75. 第8、10、11、20、23、27、43、57、58、65、66、69、74位受訪者。
76. 第26、52位受訪者。
77. 第10、12、19、20、23、27、42、57、65、74位受訪者。
78. 第8、20、50位受訪者。
79. 第69位受訪者。
80. 第50、58、59位受訪者。
81. 我1974年5月5日的日記；第69位受訪者；《長江日報》，1977年12月21日。
82. 第50、58、69位受訪者。
83. 第26、52位受訪者；我1974年11月25日的日記。
84.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0), Vol. 1, p. 225.
85. 我1974年11月25日的日記。
86.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頁369。
87. 《長江日報》，1977年1月17日，5月28日，1978年10月25日；第58、59位受訪者。
88. 《長江日報》，1977年11月29日。
89. 我1975年4月22、26日的日記。
90. 我1975年5月20日、6月14日的日記。
91. 《長江日報》，1978年6月21日；1975年6月5日的日記。
92. 《長江日報》，1975年6月28日，7月4日、11日、24日，8月5日；我1975年7月7日的日記。
93. 《長江日報》，1975年5月2日，7月8日，8月4日，9月4日，10月6日，11月30日。
94. 我1975年11月30日，12月6、7、16、18、20、24日的日記。
95. 我1976年2月25、27日的日記。
96. 第8位受訪者。

97. 《長江日報》，1977年12月2日。
98. 《長江日報》，1977年2月14日，12月21日。
99. 《長江日報》，1977年11月29日，12月1–2日。
100. 《長江日報》，1977年2月7日，11月29日，12月1日；我1976年2月25日的日記。
101. 《長江日報》，1976年12月8日，1977年2月7日，4月20日，7月11日，8月11日，10月31日，11月29日，12月21日。
102. 《長江日報》，1976年10月23日，12月8日、12日。
103. 《長江日報》，1976年12月14日，1977年2月21日。
104. 《長江日報》，1977年11月29日，12月21日。
105. 《長江日報》，1977年2月14日。
106. 《長江日報》，1976年12月12日。
107. 《長江日報》，1976年12月11日、17日，1977年11月29日。
108. 《長江日報》，1976年12月8日、11日，1977年12月21日。
109. 《長江日報》，1977年8月12日。
110. 《長江日報》，1976年4月20日，11月29日，12月11日。
111. 《長江日報》，1976年12月8日、19日。
112. 關於20世紀70年代積極分子和落後分子之間分化的探討，參見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13. 關於這些選擇的理論探討，參見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14. 第1976年3月11日、4月3日的日記。
115. 第8、19、20、43、67位受訪者。
116. 第1976年4月7、16日的日記；《長江日報》，1977年1月3日，11月29日。
117. 關於這些事件的親歷記述，參見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118. 《長江日報》，1976年12月9日，1977年11月15日、29日，12月21日。
119. 《長江日報》，1977年3月26日，11月4日。
120. 《長江日報》，1977年11月29日，12月23日，1978年5月12日，6月17日、21日、26日，7月14日。
121. 《長江日報》，1977年11月29日。
122. 《長江日報》，1976年12月8日、14日、17日。
123. 第8、50、67、69位受訪者。
124. 《長江日報》，1977年1月3日。
125. 《長江日報》，1977年11月12日、15日、17日、19日。
126. 第50位受訪者。

127. 第52位受訪者。
128. 《長江日報》，1977年10月31日，11月5日、7日，12月1日、3日、24日。
129. 《長江日報》，1978年6月26日，8月31日。
130. 《長江日報》，1976年8月4日、18日、25日，11月24日；第50位受訪者。
131. 《長江日報》，1977年8月12日，11月29日；第26、52位受訪者。
132. 我1976年10月13、17日的日記。
133. 《長江日報》，1977年2月7日，11月29日；我1976年11月6日的日記。
134. 《長江日報》，1976年12月12日、19日，1977年4月20日，7月10日；第24、57、69、75位受訪者。
135. 我1976年11月8日的日記；第75位受訪者。
136. 《長江日報》，1977年10月31日，11月29日，12月21日；第20、24、50、51、69、75、76位受訪者。
137. 《中國共產黨六十年》，頁673–674。
138. 《中國共產黨六十年》，頁695；《長江日報》，1978年12月3日。

第十二章

1. 毛澤東1966年8月4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參見《萬歲》，第三種版本，頁650。
2. 毛澤東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參見《萬歲》，第三種版本，頁657–660。
3. 王力：〈毛澤東73歲生日的談話和我的看法〉，載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XXXX)。
4. 最後一個省級革命委員會(新疆)直到1968年9月才成立。
5. 王年一：〈毛澤東同志關於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間的估計〉，載《黨史研究資料》，1983年第6期。
6.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Chap. 10.
7. William H.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8. 一位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學家指出：「人民群眾雖然沒有成熟系統的政治思想，但他們的感性直覺往往是驚人的正確。1967年底以後，群眾運動愈來愈變成『骨幹運動』、『頭頭運動』。廣大群眾漸漸失去了熱情，失去了興趣……一種懶散離心的趨勢在『造反派』中悄悄地蔓延。組織內的掛名成員(第二類逍遙派)漸漸增多。打傢具、養金魚、搞『線路鬥爭』(裝收音機)之類日益興旺。一度蔚為壯觀的群眾運動消逝了，而為爭奪席位的上層鬥爭卻在『內部』激烈地進行。終於，在『上層鬥爭』中連連敗北的造反派頭頭們，又想

起他們手下的群眾。朱洪霞之流又出現在街頭向群眾發出『反復辟』的呼籲，但響應並不熱烈。」參見Liu Guokai,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1987), pp. 113–114.

9. James V. Downton, Jun., *Rebel Leadership: Commitment and Charisma in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3), pp. 61–72.
10. 當然，把所有人都看作真正的信仰者是錯誤的。雖然大多數人真正地相信毛澤東的天才，但另外一些人接受其權威的原因是：他們擔心對毛澤東那怕只是顯示出一點點不敬的話，也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還有一些人既不被毛澤東的神秘所迷惑，也不擔心受懲罰；他們緊跟毛澤東，是因為感到毛的政策對滿足他們的個人利益極其有用。然而，後兩部分人在總人口中只佔很小的比例。
11. 它發生於1968年7月28日。
12. James Davi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3), p. 283.
13. 毛澤東最初於1958年就提出，可以根據人的政治態度來定義階級，但他從沒有在理論上來闡述這個觀點，而且這個術語的用法也非常不一致。因此，甚至連高級領導人也不能掌握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方法。1965年，有一個高級領導人問毛澤東，地主的兒子應該屬於哪個階級？毛澤東回答說，這個問題不必討論。見《萬歲》，第一種版本，頁161；第三種版本，頁597、602。
14. 在這一方面，闡釋學理論是很有啟發性的。見 H. 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Sheed & Ward Ltd, 1975); Paul Ricoeur,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ssays in Hermeneutics*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Steven Mailloux, *Interpretive Conventions: The Reader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Fic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15.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359.
16. Barrington Moore, Jun.,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New York: M. E. Sharpe, 1978).
17. Erich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s: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A Trident Press Book, 1962), pp. 88–133.
18. Lowell Dittmer,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and the Participatory Ethic in China," in David S. G. Goodman (ed.), *Group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4).
19. Russell Hardin, "Theory on the Prowl," unpublished paper, 1992, pp. 16–20.

參考書目

《長江日報》
《黨史通訊》
《黨史研究》
《紅旗》
《湖北日報》
《解放軍報》
《人民教育》
《人民日報》
《武漢晚報》
《新華月刊》
《支部生活》
《中國工人》
《中國青年》
《中國青年報》

英文資料

Barry, Brian. *Sociologist,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Benn, Stanley I. and Mortimore, G. W. (eds.). *Rationalit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Contributions to 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edge and Kegan Paul, 1976.

Bennett, Gordon A. and Montaperto, Ronald N. *Red Guard: 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i Hsiao-ai*.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2.

Blecher, Marc J. and White, Gordon. Micro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hite Plains, NY: M. E. Sharpe, 1979.

Bridgham, Philip. 'The Fall of Lin Piao', *China Quarterly*, 55 (July–September, 1973): 427–49.

Brinton, Crane.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Chan, Anit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Chong, Dennis.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Daubier, Jea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Davis, Debora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i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No. 42.

Dittmer, Lowell.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Djilas, Milovan. *The New Class: An Analyse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1957.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7.

Downton, James V. Jun. *Rebel Leadership: Commitment and Charisma in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3.

Eisenstant, S. N. *Max Weber on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Eldridge, Albert F. *Images of Conflict*. New York: St. Martin's, 1979.

Elster, Jon. *The Cement of Society: A Study of Soci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Sour Grapes: Stud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Ulysses and Sirens: 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Esmein, Jea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3.

Etzioni, Amitai. *Modern Organization*.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64.

Falkenhein, Victor C. *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7.

Feng Jicai.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Y: M.E. Sharpe, 1990.

Friedman, Debra and Hechter, Michael. 'The Contribution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o Macrosociologic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Theory*, 6 (1988): 201–18.

Fromm, Erich.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s: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A Trident Press Book, 1962.

Gadamer, H. G.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Sheed & Ward, 1975.

Gao Yuan. *Born Re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Garside, Roger.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Geertz, Clifford. '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 in Chandra Mukerji and Michael Schudson (eds.), *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Stu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239–77.

Giddens, Athony and Held, David (eds.). *Class, Power, and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Goodman, David S. G. *Group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4.

Graumann, Carl F. and Moscovici, Serge (eds.).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Leadership*.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6.

Gray, Sherry. *Bombard the Headquarters: Local Politics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1989 Movement in Shenyang*.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enver, 1992.

Hai Feng. *An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anton Area*.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71.

Russell Hardin, 'Acting Together, Contributing Together',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3, 3 (1991): 365–80.

——.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 'The Normative Core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Unpublished paper, 1992.

——. 'Theory on the Prowl'. Unpublished paper, 1992.

Henderson, Gail E. and Cohen, Myron S. *The Chinese Hospital: A Socialist Work Uni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Hirschman, Albert O. 'Against Parsimony: Three Easy Ways of Complicating Some Categories of Economic Discourse'.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1 (1985): 7–21.

——. *Exit, Voice and Loyal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Hoffer, Eric. *The True Believer*. New York: Harper & Row,1966.

Hunt, James G. and Larson, Lars L. (eds.). *Leadership: The Cutting Edg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7.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assified Chinese Communist Documents: A Selection*.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78.

James, Davie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3.

Jenkins, J. Craig.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Move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3: 527–53.

Karol, K. S. *China: The Other Communism*, 2nd ed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8.

Ken Ling. *The Revenge of Heaven: Journal of a Young Chinese*. New York: Putnam, 1972.

Konrad, George and Szelenyi, Ivan. *The Intellectual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A Helen Wolff Book, 1978.

Kraus, Richard.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Lane, David. *End of Social Inequality*?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1.

———. *Soviet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LeBon, Gustav.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New York: Viking, 1960 [1909].

Lee, Hong Yu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

Little, Daniel. 'Rational-Choice Models and Asian Stud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1(1991): 35–52.

Luo Guokai.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7.

Lo Fulang. *Morning Breeze: A True Stor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1989.

Luo Ziping. *A Generation Lost: China und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90.

MacFarqu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980.

Mailoux, Steven. *Interpretive Conventions: The Reader on the Study of American Fic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March, James G. and Simon, Herbert A. *Organiz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8.

Marx, Karl.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Vol. 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Berkeley: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8.

Monroe, Kristen Renwick (ed.).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Politics: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of the Theory of Rational Ac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Moore, Barrington, Jun.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New York: M. E. Sharpe, 1978.

Nien Cheng.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London: Collins, 1986.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Opp, Karl-Dieter. *The Rationality of Political Protes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Parkin, Frank.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5.

———. *The Marxist Theory of Class: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Tavistock, 1979.

———. *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London: Tavistock, 1974.

Raddock, David M. *Politic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Kwangchow*.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

Ricoeur, Paul.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ssays in Hermeneutics*. Chicago: North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Riker, William H.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Robinson, Thomas (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The Wuhan Incident'. *China Quarterly*, 47 (1971): 413–38.

Rosen, Stanley. 'Guangzhou's Democracy Movem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spective'. *China Quarterly*, 101 (1985): 1-31.

———.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Cant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Rosenbach, William E. and Taylor, Robert L. (ed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Leadership*.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4.

Rude, Georg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The Crowd in History, 1730–1848*.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1.

Schelling, Thomas C.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New York: Norton, 1978.

Schramm, Wilbur (ed.).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5.

Scitovsky, Tibor. *Joyless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Shue, Vivienn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r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Smelser, Neil J. 'The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A Theoretical Assessment'.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4, 4 (1992): 381–410.

Swanson, Guy E., Newcomb, Theodore, and Hartley, Eugene L. (ed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1952.

Tarrow, Sidney. 'National Politics and Collective Action: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8.

Taylor, Michael. *Community, Anarchy and Lib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ed.). *Rational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87.

Tilly, Charles.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8.

Tsebelis, George. *Nested Games: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Tsou, T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Unger, Jonathan.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Walder, Andrew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Wang Xizhe. *Mao Zedo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Plough Publications, 1981.

Watson, James L.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Weber, Max.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Welch, Claude E. Jun., *Anatomy of Rebell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0.

White, Gordon. *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Class Origin: The C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1976.

White, Lynn, ?. *Policies of Chao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Willner, Ann Ruth. *Charismatic Political Leadership: A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Wood, Geof (ed.), *Labelling in Development Policy: Essays in Honour of Bernard Schaffe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5.

Zald, Mayer N. and McCarchy, John D.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Resource Mobiliz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Tactics*. Cambridge, MA: Winthrop Publishers, 1979.

Zimmermann, Ekkart. 'Macro-Comparative Research on Political Protest', in Ted R. Gurr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flict: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中文資料

北京教育局：《關於對初中畢業生家庭情況進行調查的請示》，1964年1月14日。

北京衛戍區司令部：《8341支左先進經驗》，4冊（北京：1969年）。

曹志：《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制度概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中國研究資料中心：《紅衛兵資料》，20卷（華盛頓特區，1975）。

———，《紅衛兵資料增編》，20卷（華盛頓特區，1980）。

國家工商管理局：《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大事記》，1957年。

中共中央：《關於高等學校錄取新生的政治審查標準》，1962年。

《對1962年〈高等學校錄取新生的政治審查標準〉的幾點解釋意見》，1964年。

《關於降低國家機關3級以上黨員幹部工資標準的決定》，1959年2月7日。

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1956年3月10日。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參考資料》，8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陳再道：《「7．20事件」始末》，載《革命史資料》（北京：黨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12輯。

教育委員會：《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5》（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

———，《中國教育大事記》（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郝夢筆和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

湖北勞動局：《工資標準選編》（武漢：1973年）。

湖北省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學習文選》，12冊，1967年。

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彙編》，3冊（武漢：1968–1969年）。

林彪：《林彪文選》（武漢：1968年）。

劉豐：《劉豐的講話》，1969年10月3日。

毛澤東：《毛主席的講話》，1969年4月1、5、11、13、14、23、28日。

———，《毛澤東思想萬歲》，3種版本（武漢：1968–1969年）。

勞動部：《關於1963年工資工作安排》，1963年7月21日。
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勞動部：《關於當前勞動力安排和職工工資問題的報告》，1956年12月18日。
山西省地方志編輯部：《山西大事記1949–1983》(太原：1985年)。
國務院：《關於國家機關10級以上幹部的工資標準的決定》，1956年12月18日。
所國心：《1967年的78天：「二月逆流」記實》(長沙：湖南文學出版社，1986年)。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武漢教育局：《高等學校年初報表1964–1965》。
——，《關於1961年未錄取中小學畢業生的安排情?》。
——，《關於畢業生思想情況的反映》，1965年5月。
——，《關於實行重點中學吸收保送生免試入學辦法的通知》，1964年7月26日。
——，《關於中等學校招生工作的報告》，1965年11月23日。
——，《關於中等學校招生錄取分配工作若干問題的請示報告》，1965年7月26日。
——，《普通中學綜合報表1965–1966》。
——，《全日制技工職業學校綜合報表1965–1966》。
——，《全日制小學綜合報表1965–1966》。
——，《武漢市中小學學生家庭出身典型調查1965–1966》。
武漢教育局和武漢公安局：《關於進一步密切配合做好高等中等學校招生的政治審查工作的幾點意見》，1964年4月27日。
武漢中級人民法院：《武漢法院志》(未出版稿，1992年)。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黨史大事記》(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
——，《中共武漢地方黨史》(武漢：1985年)。
武漢高中招生委員會：《初中畢業生推薦工作的情況反映》，1966年9月。
武漢統計局：《武漢1949–1984》(武漢：1984年)。
——，《武漢四十年：1949–1989》(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曾思玉：《曾思玉的發言》，1969年10月27日。
——，《曾思玉的講話》，1971年3月27日。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略》，4卷(香港：聯合研究所，1971–1978年)。
趙瑜：《李順達在文化革命中》，《黃河》1986年第4期。
浙江省委黨校：《「文化大革命」時期資料選輯》(杭州：1984年)。

武漢文化大革命群眾組織出版物

《8·2戰報》
《7·15大血案調查報告》
《9·13戰報》
《32111戰報》
《兵團戰報》
《不忘6·24》
《徹底揭開省委抓辦的黑幕》
《徹底埋葬武漢地區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2冊。
《徹底批判湖北省委資料彙編》
《陳再道與支保》
《陳再道支保罪行錄》
《陳再道鐘漢華的罪證》
《陳再道鐘漢華之流反革命罪行》
《赤衛軍》
《打倒陳伯達》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
《打倒宋侃夫》，11冊。
《打倒武漢頭號走資派宋侃夫》，3冊。
《大批判》
《大橋戰報》
《鄧壆在武漢市中學畢業生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東方紅》
《奪權戰報》
《反革命分子劉真的自白》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雲反動言行彙編》，3冊。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惠農罪行大事記》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宋侃夫罪行錄》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毒草選編》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罪行錄》
《鋼工總》
《革幹聯》

《公檢法一小撮壞頭頭反動罪行錄》
《工造總司》
《關於鋼工總問題調查報告》
《關於薛樸若問題的材料》
《關於楊春亭同志的調查報告》
《紅八月敢死隊通訊》
《紅八月公社》
《紅八月造反報》
《紅色暴動》
《紅衛兵》
《紅武測》
《侯良正何罪之有》
《湖北省委書記處常委會議記錄》
《湖北新華印刷廠革委會》
《江城風暴》
《江城前哨》
《江城壯歌》
《建築革命》
《井岡山》
《進軍報》
《抗暴》
《狂妄師》
《兩條路綫的大搏鬥》
《烈火》
《劉惠農三反言行》
《論革與保》
《批陶戰報》
《千刀萬剮陳再道》
《清理階級隊伍資料專輯》
《七月兵變的破產》
《七月風暴》
《七月江城戰旗紅》
《省市革命三結合幹部簡介》

《宋侃夫罪行錄》
《肅清譚立夫的流毒》
《王任重反動言論集》
《王任重反毛澤東思想言論集》
《王任重何許人也》
《王任重三反言論錄》
《王任重是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
《王任重罪行錄》
《文革評論》
《文革通訊》
《武大三家村案》
《武漢8．2政治迫害事件專輯》
《武漢百萬雄師754兵團罪行錄》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在京鬥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再道大會記實》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武漢鋼二司》
《武漢公安江漢分部罪行材料》，4冊。
《武漢公安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的滔天罪行》
《武漢公檢法赴京彙報團罪惡之行》
《武漢工人》
《武漢赫魯曉夫》
《武漢紅八月》
《武漢紅代會》
《武漢事件》
《武漢市革命工代會籌備小組會談紀要》
《武漢市三結合幹部簡介》
《新東中》
《新華工》
《新華師附中》
《新湖大》
《新湖大通訊》
《新肉聯》
《新12中》

《新水運》

《新中原》

《揚子江評論》

《在險峰》

《斬斷陳再道之流伸向街道中的魔爪》

《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報告會上的講話》

《張體學同志的講話》

《整黨建黨經驗》

《震驚全國的720反革命暴亂》

《政治扒手——王任重》

《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3冊。

《中央首長講話》

《中央首長最新重要講話彙集》

《周總理重要講話》

《資料專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相關書籍

- 在如來佛掌中：
  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戴晴 著

- 失蹤者的足跡：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印紅標 著

- 革命吞噬它的兒女：
  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紀實
  徐慶全 著

- 失落的一代：
  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
  潘鳴嘯（Michel Bonnin）著

- 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鬥
  吳國楨 著
  吳修垣 譯、馬軍 校訂

- 周恩來的政治生涯
  芭芭拉．巴努茵（Barbara Barnouin）、
  余長更 著
  馬繼森 譯

中国文革研究网 wengewang.org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引起全國億萬群眾的熱情參與。文革研究者一般都認為參與這場運動的群眾是「不理性」的；他們受到毛澤東超凡魅力的蠱惑，做出種種瘋狂的行為。其實文革自有其內在邏輯，即使是發動者毛澤東也不能完全掌握其方向。本書作者以武漢文化大革命為主軸，訪問了幾十位文革參與者，運用大量文革期間出版的原始材料，以及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深刻地揭示了群眾參與文革的動機、形式、規律、進退機制，以及與全國大形勢的關係。

本書打破了文革參與者「受蒙蔽」、盲目追隨毛澤東的流行觀念，證明在重大歷史事件中，不管參與者自身是否認識到，他們的行為大多是理性的，即使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也難以左右。

本書加深我們對一個耳熟能詳的年代的認識……它提供了研究武漢的有用資料，特別是關於地方政治及派性主義如何受核心權力的影響……本書具備理論架構，解釋了一個困擾西方文革研究者的現象，即在最理想化的政治運動裏，如何解釋派性的興起？

駱思典（Stanley Rosen），美國南加州大學

本書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本極為吸引的著作……既收錄大量新的資料，亦輔以同樣重要的比較理論……大量武漢研究的資料從未曝光。

白霖（Lynn White III），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ww.chineseupress.com
HONG KONG, CHINA

ISBN 978-962-996-346-0
9 789629 963460

中国文革研究网 wengewang.org